

陶里亚蒂言論集

第三卷

(供内部参考)

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内部图书资料
第 0082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

000:9

173

陶里亞蒂言論集

第三卷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年·北京

出版者說明

这部言論集共分三卷，收集了陶里亚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到1962年底期間的重要言論。第一卷包括1944年4月陶里亚蒂刚从苏联回国到1955年期間的言論；第二卷包括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到1961年初期間有关国际共运的言論；第三卷包括1961年初到1962年底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为止的言論。

1963年8月

目 录

在意共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1961年1月23日《团结报》)	
民主路线和革命前景.....	20
(1961年3月2日《团结报》)	
论社会主义与民主.....	24
(1961年4月《再生》月刊)	
再论社会主义与民主.....	44
(1961年5月《再生》月刊)	
在意共第二届工厂党员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50
(1961年5月8日《团结报》)	
天主教民主党是我们击败的敌人.....	62
(1961年7月13日《团结报》)	
和平倡议和意大利中立化.....	80
(1961年9月28日《团结报》)	
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话.....	104
(1961年10月21日《团结报》)	
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对记者的谈话.....	110
(1961年10月26日《团结报》)	
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	113
(1961年11月11日《团结报》)	
谈“多中心主义”.....	149
(1961年12月2日)	
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样性和团结.....	151
(1961年12月《再生》月刊)	

在 1961 年 12 月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66
(1961 年 12 月 24 日《团结报》)	
在意共成立四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82
(1962 年 1 月 22 日《团结报》)	
为促使意大利当前形势向左转而斗争	185
(1962 年 2 月 14 日《团结报》)	
方法问题	217
(1962 年 2 月《再生》月刊)	
共产党人向政府挑战，要求它充分实施宪法	226
(1962 年 3 月 6 日《团结报》)	
在 1962 年 4 月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257
(1962 年 4 月 28 日《团结报》)	
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	271
(1962 年 7 月 28 日《再生》周刊)	
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 前进	275
(1962 年 12 月 3 日《团结报》)	
在意共十大的总结发言	334
(1962 年 12 月 9 日《团结报》)	

在意共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到会的同志们，朋友们，公民们，我想诸位都很容易理解，在庆祝我们党诞生四十周年的时候，涌现在我们心中的思念和感情的浪潮是多么丰富而奔放。很容易理解，特别是对某些同志说来，情况更是如此。这样的一些同志今天到会的是相当多的，他们不但参加了我们党的创立，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而且还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与党同甘共苦，经历过困难和胜利，坐过牢，亡过命，一直战斗到今天。

1921年1月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建党代表大会上，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人们不分老少都参加了我们先锋队的创立。老一代的战士当时还和后起的一代并肩战斗，可是今天他们有很多都已不在人世了。在这工作和斗争的四十年里，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很多，损失是沉重的和令人痛心的。

在这庆祝会上，我们要纪念那些贡献了力量使我们党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党的所有同志，并向他们致敬。他们支持过我们的党。向敌人作过顽强的抵抗，用斗争打败了敌人并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取得了进展；他们牺牲了自由、家庭、幸福甚至整个生命。

一个政党是不能单靠原则、信念和政治立场来形成和发展的。唯有通过人们的行动、通过集体的和个人的、构成某一特定阶级的群众以及领导干部的行动，它才能生存、发展，壮大和获胜。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工人阶级先锋队所经历的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困难。当我们刚开始前进的时候，就有些人认为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中，我們的反对者以及某些本該是我們朋友的人曾經有一种傾向，把我們看做是一批头脑发热的人，是不久就要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是不能够建立一个牢固而持久的政治組織的。即便是最善意的預言家，也认为我們只能夠維持几年。可是現在，甚至那些預言家的名字也已經被人忘掉了。

在我們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时候，我們有五万八千多人。在反动派的猛烈的血腥攻击下，我們的人数减少了。在賈科摩·馬特奧蒂^①謀杀事件所引起的危机时期，在中央登記的黨員大約有两万人，但我們的組織已有相当一部分完全轉入地下，而且已經开始向国外作政治流亡。

那时的五万八千人、两万人，在我們現在看来是不多的。但那却是个强大的、永不枯竭的动力。产生了能够抗拒一切迫害能够胜利地同一切敌人进行斗争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去信心的力量。

从那里，产生了四千名被法西斯特別法庭共計判了二万三千年徒刑的共产党人。从那里，产生了两千名在西班牙战争中对法西斯作战并在战场上洒下了鮮血的共产党人。从那里，产生了二十一万名在解放和民族独立战争中組成“加里波的”游击队的骨干并在战斗中損失四万二千人的共产党人。从那里，产生了今天的千千万万黨員和战士。現在，我們对于能够代表資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的共产党和意大利最大和最巩固的政党感到自豪。

党和愈来愈多的一批批新的支持者 和战士保持联系的能力

这个四十年前在里窝那誕生的党，其生命中最显著的特点就

^① 馬特奧蒂(1885—1924)，社会党众議員，改良主义派，1924年6月遭法西斯党徒謀害。这次謀杀事件显示了法西斯主义进攻的开始。——譯者

是它能够新的条件下不断地壮大、扩展和向前推进的惊人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党在经历了一个很短的初创时期——党在这个时期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后来则几乎是处于等待每一个国际和国内的局势变动和发展的状态——之后，同工人阶级、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愈来愈多的一批批新的支持者和战士们建立联系。

毫无疑问，不断地把日益众多的一批批新的战士和支持者引导到我们这方面来的，首先是各人的亲身经验，即在工厂的沉重气氛中和在田野的繁重劳动中所日益孕育成熟的阶级觉悟；但是也还由于近四十年来意大利社会所经历的而至今还没有从中摆脱出来的戏剧性危机，即：对于最终淪于外国奴役之下的可耻下场的法西斯政权的悲惨事件的失望和愤怒；其他无力发动和领导人民向暴政作一致斗争的反法西斯流派的失败；以及应该对国家的贫困、奴役和灾难负责的旧统治阶级的罪恶无能；最后，还有最优秀力量心中所感到的团结在一支能够为革新整个国家生活而工作和斗争的新生力量周围的愿望和需要。

这就是我们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作为人民和意大利民族的党而发展起来的大致情况。当我们想起这一发展过程时，我们就对所有用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作过贡献的人们深为感激。这些人包括从要求得到我们的党证以证明他们对未来的信心的普通党员，直到那些为建立地下活动网和从事斗争所不可缺少的千千万万默默无闻而忠心耿耿的合作者；包括从那些在监狱中不但把马克思主义教给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而且给所有意大利人上了人类尊严的一课的人，直到那些执行了争取新的支持和促进新的革命意识的发展这一艰巨任务从而改进了我们的政治和工作能力的人。

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发展过程时，我们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同志

是白白地牺牲了生命的——这样的同志很多，甚至提到其中一部分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现在全都在这里，全都在我们所生存、工作和代表的国际和国内生活的活生生的现实里。

我们把安东尼奥·葛兰西列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因为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真正奠基人。他用他的工作和牺牲为这座大厦、为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将来奠定了基础。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也没有使全党了解葛兰西本人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实际情况的能力确实是新颖和非凡的。这种能力导源于一种决不拒绝承认事物的现实的严格科学思想，同时也导源于用发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创造力的办法改变这种现实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所以，他具有其他人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这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

1917年的十月革命、列宁的理论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斗争所提供的榜样，在他的思想和政治的成长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当时是、以后也一直是撒丁人民和意大利民族的儿子，他从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中看到意大利的前途。他对1918到1920年间“工厂委员会”运动^①的见解就是以民族复兴的前景为依据的。后来，当他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团。根据他的著作所说，他的目的是要提出并解决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这一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有现实性的，并且永远会如此，同时要正确地注意到在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总的局势中意大利的局势、特点和新条件以及它的变化。

^① 工厂委员会是在当时革命情况下在意大利北部创立的由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根据葛兰西的意见，这些工厂委员会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力量在工厂里的萌芽。

葛兰西过去和現在都在領導我們，
不僅用他的思想，而且用他整個生命，
用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

由於他大力鼓勵研究、鼓勵勇於採取政治創見和革新行動，所以我們才能够取得這樣的進展。他教導我們說，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行動不能够局限於經濟要求，而必須正視意大利國家在歷史上的形成所造成的一切問題，必須擴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上層建築的領域里去，在這些領域里，新與舊的矛盾以及舊統治階級的霸權必須通過徹底的批評和鬥爭予以破壞和摧毀。要是沒有葛蘭西的教導，我們的道路就要艱難得多，曲折得多我們的進展也要緩慢得多。

他不但用他的思想來領導了我們，而且用他的全部生活、他的鞠躬盡瘁的精神所作的榜樣來領導了我們，用他在大風大浪中忍受痛苦和孤寂而至死毫不动摇的意志來領導了我們。

我們今天將到他的墓上去獻花，並將同時重申永不忘記他的教導和榜樣的誓言。

同志們，我簡單地回顧了我們的黨自從它 1921 年成立以來直到現在是怎樣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因為我認為，這樣的回顧是對所有那些仍舊懷疑在里窩那代表大會上脫離社會黨、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是否正確的人們的一個最好的、決定性的回答。

我們不要根據“假定”來進行辯論。沒有人能够認真討論“假定”這個或那個事件不會發生的話將會發生怎樣情形的問題。我們應當根據 1921 年年初所實際發生的事情和後來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從里窩那分裂以來四十年中我們所取得的成就來進行辯論

的。这一切都足以证明，1921年1月从社会党分裂出来并建立共产党不但在历史上、而且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根据事实，我们断言，这次分裂和我们党的创立乃是近五十年来意大利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我们不怕这话被人批驳。我们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居于少数，那是真的。这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一次挫折、一次失败，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把这个挫折变为后来整个局势中的积极因素。

认为本不应当在法西斯主义者正向各劳动阶级发动进攻的时刻分裂旧社会党的说法是浅薄的、没有价值的。当保持一个能够导致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内在统一的条件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一种形式上的外表统一在抵抗法西斯主义者的进攻上会有什么用处呢？在1918年到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的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社会党的统一对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意味着两种对立的立场和观点——改良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同最高纲领主义者^①的立场和观点——的冲突，结果两败俱伤，从而阻碍了革命力量的进展。

近几天来有人说，社会党在那些年代里本应该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建立共和国。这曾经是部分社会党人直到1917年所主张的纲领，嗣后变成了“战斗法西斯”^②的纲领。但在1917年，发生了俄国革命。不考虑到俄国革命对整个欧洲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动向所产生的影响，那是荒唐的。特别是不考虑1920年意大利的情况，就更荒唐了。那年4月间从都灵开始（后来又占领了工厂），我们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时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就是说从工厂——冲击着资本主义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为夺地而进军。悲剧不在于社会党没有能够找到过渡性的口

^① 最高纲领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崇拜自发性和宿命论，主张土地社会化。——译者

^② 这些组织后来成了最初的法西斯行动团体。

号去鼓舞一个革命运动并为它打开道路，而在于客观条件、热情和革命运动的开端已经存在，而社会党在帮助发动了这个运动之后，却没有能够或者不愿意领导这个运动向全国性的斗争和胜利前进。

清除改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 亦即恢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

社会党的最高纲领派说了许多空话，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纲领和能力。改良主义派也没有能力制订出任何行动计划，而——也像最高纲领派那样——喋喋不休地大发空论，说什么资产阶级因为要战争而必将“自食其果”等等。当改良主义派领袖走进了魁里纳尔宫^①之后，一切也就完了。

要在这样的局面下找出一条出路并且继续前进，就必须把改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统统清除掉。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创立一个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忠于这些原理并能够将这些原理付诸实施的新型政党。只要这样一个政党不存在，要指望取得胜利或进展、或者要想在工人阶级和人民运动中发动有组织的抵抗，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两派中不论哪一派的任何纲领，都只是一片混乱、模棱两可和涣散人心的东西。清除这两派，就意味着恢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旧社会党虽然没有完全抹杀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它没有洞悉、也没有阐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质。它接受了当时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粗劣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歪曲，这就使唯心主义的阴险进攻易于得逞。列宁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我们研究和行动的牢靠的思想基础，是我们党的政治团结的基础。经过我们加以恢复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现在

^① 即意大利旧王宫，现为总统府。——译者

已經重新作为最新的合理的和自由的世界观而在文化辯論中胜利地发生影响，因为这个学說沒有教条而总是有新的发展。

目前还有人向我們提出了另外一种批評，这种批評也同样是沒有价值的。这种批評的根据是，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曾經有許多共产主义代表人物讲过：那时所以必須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因为那时所面临的局势是一个革命的局势。

实际上，不管当时局势如何，都必須建立一个共产党。至于对当时在欧洲和意大利革命和反动的冲突达到什么阶段的估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过去的意見是，現在的意見仍然是：1920年年春夏之間意大利工人运动达到了最高峰，而在1921年年初我們已处于衰退的阶段。

然而欧洲的资本主义还没有稳定下来。那时欧洲还没有发生法国对魯尔的占領，也沒有发生1921年和1923年的巨大的德国运动。在我国，尽管占領工厂的結局引起了失望，劳动群众的抵抗和斗争潜力仍然頗为可观的。无产阶级的堡垒艾米里亚、托斯坎納和一些大工业城市几乎完整无损。

坚持旧社会党形式上的統一 不但沒有好处反而只是个障碍

不論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旧社会党形式上的統一繼續保持下去，不但沒有好处，反而只是个障碍。这一点甚至原先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反对我們、贊成統一的大多数最高綱領主义者后来也都認識到了。过了不到两年，在又遭到一些新的挫折和失敗之后，梅諾蒂·謝拉蒂、法布里齐奧·馬菲和許多其他的人老老实实地承认了他們的錯誤，并参加了我們的队伍。

創立一个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新政党，意味着在意

大利社会里投入一股具有自觉和自信的革命政治力量。虽然这时意大利工人运动已经强大，人数众多而且组织广泛，但这种自觉和自信的革命政治力量却是意大利过去所未曾有过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本世纪头十年我国工人运动和国内生活的发展，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甚至在那时，根据基本条件来看，问题也已经成熟。资本主义正在日益具备帝国主义的特征；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统治阶级中间正在显露出一种民主转变的倾向。然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能够了解这种新的形势并采取一条适应这一形势的健全的政治路线，而只是在改良主义的议会行动和一种无能为力的极端主义的空洞吹嘘之间摇摆不定。过去五年中接受了社会主义革新理想的中等阶层知识分子，现在背离了社会党。这就为背叛一切民主原则、背叛一切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原则创造了初步条件，而这就是开始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典型情况。

葛兰西写道：“社会主义运动害了一种内部矛盾的不治之症。这种矛盾破坏了最初的意大利工农起义领袖们的历史和政治观念的基础，注定他们的行动要遭到悲惨的和可怕的挫折。如果不指出使群众的新兴力量能够达到真正的和完全的自我肯定的手段和途径，那末，单单唤起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觉醒并号召他们参加政治斗争，是没有用的。意大利工人起义运动的先驱者们没有能够得出这个结论。他们的行动在破坏一个经济制度的同时没有预见到创造一个不同于前者而能够永远消除前者的局限性的经济制度。他们的行动开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却没有预先制订出保卫这些胜利的手段。他们的行动使一个阶级有了自觉并认识到自己的前途，但却没有给予这个阶级以战斗的组织，而没有这个战斗组织就永远不能实现那个前途。他们的行动给革命提供了前提，但却没有创造一次革命运动。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国家的基础，但却认为可以避免创造一个新的国家。”

为了克服葛兰西如此明白譴責的矛盾，創立一个新型政党、一个共产党就成为必要的了。这首先就意味着要抵抗反动派的进攻，要反对改良主义者丢臉和无用的懦弱，要反对和法西斯分子締結一項同样无用的“和平公約”。这也意味着要树立英勇的榜样并要在即使敌人占有压倒优势的情况下繼續进行工作和斗争。但最重要的是要把抵抗运动和把将来的工人、民主和人民运动的复兴这两方面都在政治上組織起来。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对国际和国内局势，对国际和国内阶级力量的活动情况以及它們活动的前景具有新的、准确的了解。常常有人說，我們之所以能够把根子扎在群众之中、扎在意大利的政治土壤之中，是因为我們在法西斯主义統治的二十年里設法集結、訓練和領導了一批願意为建立新的党小組、为让群众知道我們的存在和为把我們的話傳達給群众而随时被捕坐牢的战士。

这是真的，但我們之所以能够繼續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却不仅仅是证明了我們的严肃性、紀律性和英雄主义。从根本上說，这证明了我們具有高度的政治眼光。我們的战士在工作中是沉着而坚强的，因为他对前途具有信心，而这种信心是从我們对世界和我国的前途的看法产生出来的。

在我們党誕生的时候，世界上正照耀着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我党認識到并且
肯定这是一个新紀元的开端

在我們党誕生的时候，世界上正照耀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我們党認識到并且肯定这是一个新紀元——资本主义危机和崩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人民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获得解放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紀元——的开端。因此，我們对未来具有不可动

搖的信心，努力去了解这个新的偉大的前景，并根据这个前景規定我們的任务。

我們坚决斥責某些人的无耻誹謗，他們胡說我們不是一支民族的力量，因為我們一向忠于、而且将来也还要忠于那种把我們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同偉大的苏联、同在許多国家掌握了政权并正在全世界为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而战斗的所有政党結合起来的亲密的、兄弟般的团結关系。我們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可能曾經是我們之所以能够进行抵抗和前进的主要泉源。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在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优良傳統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我們从实际中，而不是口头上給了它新的、具体的內容，因為我們对那些不再受資本主义統治、劳动不再受剝削、而是成为自己和整个社会的主宰的国家和人民、对那些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意大利需要和平甚于一切；它需要和平
不仅是为了能够工作和进步，而且是为了能够生存**

我們认为，我們的优点之一是，我們已經正确地認識到：只有在导致革新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处条件的、具有国际規模的偉大运动的範圍內，才能在意大利打垮法西斯暴政、重建民主政权并在重新走向新的社会制度方面取得进步。这种联系在十九世紀中叶民族复兴运动时期已經存在，而在組織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变得更为明显了。这种联系今天仍然存在，甚至比过去更为密切了。

意大利民族需要和平甚于一切。它需要和平不仅是为了工作和进步，而且也是为了能够生存。由于意大利具有外国軍事“基地”的地位、担当着附庸的角色并处于帝国主义强国集团之中，一

且发生任何全面冲突，它就自然而然地要遭到全部毁灭。因此，争取和平的斗争就意味着为消除意大利导致这一结局的现存条件而斗争。这就有必要奉行一种把战争从国内和国际的前景中排除掉的新政策。但是制造愈来愈强大的毁灭性武器并使它们愈来愈密布在世界各地，是排除不了战争的。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排除战争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欧洲和世界的新组织，这个新组织将取消现有的集团，并且使销毁一切武器成为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为维护和平而进行最有效和一贯的斗争的意大利民族力量；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我们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团结联系。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结束当前的悲剧局面并赢得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独立。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最早——不仅在国内是最早——认识到下述问题的人，即人类在制造毁灭性武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过去和现在都要求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须以新的方式，通过新的会合和愈来愈广泛的合作而展开，因为拯救人类免遭毁灭乃是一个高于一切的目的。我们党应当尽一切努力来进行研究和活动，以便使争取和平的斗争取得新胜利。

也不要以为，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由于后来苏联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产生的决定性推动力，妨碍了我们了解意大利的局势并根据情况的要求在这个局势下进行活动。恰恰相反，引导我们找到并遵循我们自己的道路的，正是俄国、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所提供的榜样。

1919年和1920年，在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尖锐的革命形势下，“照俄国的样子去做”，即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不是一个错误，特别是因为那时并没有人主张机械地照抄俄国所发生的事情。即便在今天，如果“照俄国的样子去做”是意

味着創造一个国民財富由人民管理来为全体人民謀福利、并且不再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而政权将掌握在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的手里的社会,那末这个目标是絕不應該遭到拒絕的。事实上,这个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可是我們在战后初期的尖銳革命形势結束以及宗派糾紛时期已成过去以后所致力任务,却是确定在我国进行斗争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方式和方法。这就是葛兰西所开始的对社会、国家和革命动力进行分析的目的。我們为此目的繼續工作了多年,現在还在繼續工作着。如果没有这种研究,我們如何能够在法西斯主义垮台的时候,強調工人階級的民族解放作用?如何能够采取大力团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政治行动并把党放在民族复兴和革新运动的最前列?我們如何能够做到消除毫无結果的反教权立場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与有組織的城乡天主教群众运动之間的关系呢?我們如何能够制訂出主張召开立宪會議的綱領——这是一个将我国社会的經濟和政治結構进行进步和民主的革新的綱領——并把它提交給人民呢?我們如何能够把工人階級的团結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团結看作是我們行动的永久目的呢?在所有这些方面,我們都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而且將繼續这样做下去,以便使我們的研究和行动适应于局势和群众运动的发展。

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和
行动永远不能是靜止的,也不能紧紧束縛在
已經和现实不符的过时的公式和定理上

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永远不能是靜止的,也不能紧紧束縛在已經和现实不符的过时的公式和定理上。我們沒有教条需要为之辯护,有的只是引导我們去了解事

物和为改变事物而行动的一些原則。即便是我們学說的最偉大的大师的最寶貴的教导，也要經常根据事实和經驗加以檢驗。

在那些存在着有效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必須能够用他們的行动干預这些制度并爭取賦予民主一个彻底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的新內容。在我們看来，这点已經是一个起碼的真理。同样淺近的是認識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制度經常遭到最反动的資產階級力量——即大壟断資本主义力量——的危害，他們企图占居上風，破坏民主或使民主徒具形式。我們向社会主义前进所要通过的道路是：进行反对这些力量的斗争，限制和粉碎他們的权力，并依靠現存的民主制度使經濟和政治生活具有新的方針。工人階級就这样开辟了一条必然导致它連同广大劳动群众一起成为整个社会的領導力量的道路。

我們已經有兴趣地注意到，最近几周比利时工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就是按照这条路綫进行的。他們提出的要求和意大利工人运动以及我們的党所提出和給予支持的要求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西欧国家的无产階級必須为自己开辟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社会的道路，它的先鋒队必須能够在这些新的条件下进行活动。

甚至現在也还时常有人問：我們这样研究和指明一条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具体道路，是否表明我們是一支言行一致的民主解放力量？单請这些人回想一下我們过去在为了把我国从暴政之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中所立的功劳、以及我們目前为捍卫及扩大一切爭取自由的权利所采取的行动，也許是不够的。反法西斯主义乃是工人階級及其革命先鋒队的天性，正如法西斯主义是大資產階級剝削者公开的或隱蔽的天賦一样。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民主，因为我們知道，不論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来发展的条件如何，社会主义現在是、将来仍然会一直是最为广泛的民主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使一切以劳动为生的人們取得政权。

同志們，我們是一個居于先鋒地位的黨。但是，很久以來我們就懂得，這樣一個黨是不能夠脫離或遠離它所指引和領導的群眾的。我們懂得，要沒有和群眾的聯繫，黨就不能夠生存，而且不再成為其本來意圖中的黨。當我們的同志們甘冒坐牢的危險而打起黨旗、散發傳單、印刷非法報刊的時候，他們就是為了這個理由而這樣做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擊敗了法西斯主義之後說，共產黨必須自我更新，清除陳腐的看法、宗派習氣和教條主義，這一切都妨礙黨和群眾的聯繫。因此，我們徹底地——我希望是這樣——掃除了主張黨是由“人數很少、但是很好的同志”組成的那種舊觀念，而去創造一個和四面八方都氣息相通、因而能夠在勞動人民的所有階層中進行工作的人數眾多的黨。

共產黨必須善于使它的行動、組織、幹部、 語言和工作方法永遠適應新事物

這些就是當時十分迫切的任務，因為我們那時剛剛渡過二十年的地下活動和兩年的武裝鬥爭。但類似的任務總是不斷地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提出，因為經濟和生活條件是在不斷地改變，而黨也就永遠不可以停步不前。資本主義在許多國家里還在繼續發展，這種發展總是揭示和引起社會的動蕩和危機的新起因。這樣，新的工作和鬥爭課題就產生了。工人、農民和中等階層的生活條件不同於以往了，因此他們的要求和希望也不能不改變。共產黨必須善于使它的行動、組織、幹部、語言和工作方法永遠適應於這些新事物。只有這樣，黨才能夠勝任它所肩負的階級和民族任務。

在慶祝四十年來的工作、鬥爭和進展的時候，我們必須朝將來看。

我們正在經歷着一個艱巨的政治鬥爭時期。事態的進程愈來

愈明显地证明了必須对意大利社会进行深刻的革新。大多数劳动人民都認識到了这样的需要，但是老的資產階級統治者却頑固地反对任何經濟和政治的革新，而且他們已經在从天主教民主党身上找到了他們在政府方面的支持者。国际緊張局势的緩和受到了阻撓，严重的危險威胁着我們的文明。把国家政策的軸心推向左轉的努力还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在工人、青年、妇女、知識分子和不剝削別人劳动的物质生产者中間已經有了越来越大的决心，要采取行动，要改变社会結構、发展民主制度、拆毀旧的政治經濟壁壘、打倒蒙昧主义并贏得新的自由和持久和平。意大利人渴望生活过得更好，他們要求摆脱匱乏和失业，摆脱被迫到国外去寻找面包，摆脱經常处于恐惧和困苦状态的局面，摆脱富人和权貴的欺凌，摆脱傳統陋习。一批批的年輕人进入了工厂和学校以及开始在田地里劳动；他們从根本上批評現行結構，他們要改变它，并且准备为革新国家的面貌和生活而斗争。

这正是我們党能够而且必須更加向前迈进的时候，因为絕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也正是我們所要求的，正是我們綱領的基本內容。我們有責任每天证明这一点，号召劳动人民和公民把他們自己組織起来，团結一致，在經濟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爭取新的成就。

反共产主义稻草人是除了傻瓜以外再也吓不了什么人了。共产党人的貢獻以及和共产党人的合作是在劳工、政治和文化方面以及在教育、保护宪法权利和人民各項要求等方面取得任何进步、任何改善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向反共产主义的詭詐让步、拒絕共产党人的貢獻和拒絕同他們合作，只能意味着拖延革新和发展民主的必要行动。我們敦促那些仍然糾纏在反共产主义上的人們思考一下我們过去四十年的生活，充分認識我們在人民斗争和国家生活中所应起的作用。在1956年前后，有人曾經认为并且断定，

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經歷的危机和陣痛將是我們衰落、甚至是一——我們的敌人这样希望——末日的开始。可是，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从陣痛中却产生了好事：在提出、討論和解决当前条件下反帝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严重問題方面，我們变得更加有能力、更加真誠了；我們队伍的团結更加巩固了；特别是在我国，對我們的政治和綱領的立場作了更彻底和大胆的研究；教条主义立場的殘余被清除了；对看不清革命和社会主义前景的危險也有了警惕。我們通过这些考驗加强了并且革新了自己。群众對我們的支持不仅沒有减少，而且是增加了。

所有那些也不知道是善意还是恶意地不时絞尽脑汁探求我們力量和成功之秘訣的人們，如果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的話，就應該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观察它，而不要歪曲现实。既然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們相当郑重其事地把這些問題提到他們党各級組織的日程，那我們也应当敦促我們所有的基层党委都从事必要的工作，以便叫天主教民主党干部能够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我們生活在群众之中并且使我們变得强大有力。这些东西是：我們对劳工、社会正义、自由和和平事业的忠誠，我們和那些貧苦、微賤和遭受剝削的人們的联系，我們的全国革新綱領，我們的誠实无欺，自我牺牲，我們为一个偉大事业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

**如果不在群众之中进行斗争，并领导他們
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以及在社会生活、教育和
文化領域为明确的目标而斗争，就不能
解决任何全国性重大問題**

如果不在群众之中进行战斗，并领导他們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以及在社会生活、教育和文化領域中为明确的目标而斗争，就不能

从当前的困难的政治局势中寻找一条出路，就不能击退隐藏在目前“中間派”同盟的薄薄帷幕之下的反动退化的威胁，就不能解决任何全国性最严重的問題。国家的领导作向左的必要转变这个复杂的问题本身，如果没有一次像6、7月間发展起来的反法西斯主义那样的劳动群众运动，是不能得到解决的。但为了展开这样一个运动，有組織的和先进的群众力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进步的天主教徒、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青年和妇女的团结是不可少的。除了我們四十年来向工人阶级、劳动者和全国指出过的道路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前进的道路了。民主和社会进步是决不能同預謀反对我們的斗争相調和的。为了在經濟和政治革新方面取得任何真正的——無論是多么微小的——进展，我們准备随时提供我們的力量，而我們的力量是这种进展所必需的。如果反对我們的力量，或者不要我們的力量，那么国家今天所需要的新的民主多数将不会組織成功。

同志們、朋友們、公民們，在我們結束这次庆祝大会的时候，我們充滿着信心，相信将来的新的成功和最后胜利必屬於我們的党。这不仅我們的过去可以保证这一点，而且还有当前的世界现实——在这个世界现实里社会主义正在前进并必将获得胜利——可以保证这一点。

我們向各兄弟党表示感謝，它們对这次庆祝大会表示祝賀和支持。

我們敦促我們全国各地的組織和同志們作出最大的努力，以期在今年吸收比去年更多的党员和干部到我們的队伍中来，并且更好地組織他們、领导他們。

我們向我們亲爱的祖国致敬。为了祖国，我們工作过、战斗过；而且，我們願意并且一定会通过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把快乐、幸福与进步，安全、独立、自由与和平奉献给她。

讓我們以安東尼奧·葛蘭西的名義，以所有犧牲了的同志的名義，以工人階級和意大利人民的名義，為勞動者的解放，為意大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革新，為共產主義的勝利而穩步和堅決地前進！

（譯自 1961 年 1 月 23 日《團結報》）

民主路綫和革命前景

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我們共产党人进行攻击和抨击，这部分人当中，有各种极不相同傾向的集团和个人，从共和党人到社会民主党人，到天主教分子，甚至还有若干社会党人。他們抨击的出发点和所要达到之点，可归结为这样一点：我們奉行（或者我們說我們奉行）一种民主路綫，而我們同时却肯定并且有着一个革命的前景。这两个东西似乎不調和，因此說我們是在双軌上前进，說我們有两面性，如此等等。于是人們由議論到責罵，到无礼的攻击以及其它这一类的态度，而以大量的伪造的“事实”为根据。

我已經这样回答过一次：研究民主行动和革命前景之間的关系，是我們学說中的最有趣和最现实的部分，但是我們正是根据我們学說的各项原則去解决这种关系的，因为唯有这些原則可以使我們懂得当前社会生活的实况及其实质和变化。

好些时候以前，我曾經說过：任何資本主义国家都是一种资产阶級专政，但是这种专政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实行，就是說工人阶級的自由权利、人民群众的政治代表权和主权有的多些，有的少些。由于我这样說了，我便被认为几乎是一个狂人（例如《共和之声报》就这样认为），而我所說的这些話却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和政治的真相。

我們就以意大利为例。当法西斯分子实行統治时，当时是誰支配社会財富呢？是大工业公司、私人壟断資本集团以及銀行的那些董事会支配着社会財富，是大地主支配社会財富。而今天又是誰在支配呢？还是那些組織，在若干情况下甚至还是那些人，他們通

过政治系統，只是在很小程度上損害了根基。然而，現政权同当年的政权有根本性的、深刻的差異。当年是一种暴政制度，而今天我們有了一种民主秩序，虽然它有众所周知的种种限度。大壟断資產階級維持着它的专政，即是說，維持着它对財富和对社会物质生活的統治，并有从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但是大壟断資產階級也已經不得不忍受自由权利的扩大和人民依靠胜利的抵抗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取得的那种政权形式。正是了不起的恩內斯特·罗西給我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那些經濟社会集团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繼續执政。如果我沒弄錯，罗西并不是共产党人，他是激进党人。

讓我們以法国为例。戴高乐統治已經严重地削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政治和議會自由；可是，人們是否也許可以說，在戴高乐执政以前，法国处在与今天統治它的經濟和社会集团本质上不同的集团統治之下呢？人們經歷了一个复杂的严重的政治变化过程，可是，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本质过去和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国的革命前景如何呢？这是一种要从本质上改变社会秩序的变革的前景，促使新的社会集团——即劳动階級——成为拥有社会財富并为了大家的利益而管理这些財富的統治和領導力量。

不能說这种前景是在民主范围之外，或是在我們的宪法秩序之外，除非是故作无知。我甚至要这样說，只有在这个革命轉变实现以后，才能开始一个真正的民主发展，因为那时才会真正有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国家，一个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可能肯定其人格的社会，民主也才最后将在領導經濟生活方面获得胜利。

我国目前的政治秩序的特点正是在于这样一点：它是建立在一个在主要方針方面規定和指出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宪法的基础之

上的。

問題的另一方面，即是說我們当前的行动和我們長远的目标之間的联系方面，在邏輯上也与这个方向相吻合，这种联系看来是很明显的，以致今天的民主斗争正在开展，而且必然要开展。今天的民主斗争既是为了保卫和扩大自由权和代表权，从而是为了政治制度的演进，同时也是为了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城乡中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从而也是为经济制度的演进。想在这个或那个方向有效地前进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必然与今天的统治阶级的实权——即受历届保守反动政府支持的壟断资本家的实权相冲突。因此，争取当前权利要求的斗争，便变成了争取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斗争。由此产生了执行宪法、区域自治、国有化、监督壟断资本家、工人阶级的经济权力、普遍的土改、真正的发展计划、民主地制订这些计划等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这是一整套的民主权利要求，但它们多少直接地导致进行限制和粉碎目前经济领导集团的权力的斗争，并为劳动阶级取得社会和国家领导权开辟道路。自从1946年宪法转折以来，甚至在此之前，这些概念就指导着我们的行动。这些概念既没有两面手法，也没有矛盾。只有一条道路，我们在其中工作着、战斗着，因而前进着。

我要向那些非难我们、说什么我们采取这样的道路是不同于其他国家劳动阶级为取得政权所走过的道路的人，说明这最后一点。这条道路无疑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其中活动的主客观条件，即在西欧的情况下，或者至少在我国，是不同的。从许多方面看，所要达到之点也是不同的，因为，通过民主斗争的发展不能不导致一些不同于通过内战而达到的结果。我们对内战没有任何怀念。有这种怀念的人，恰恰正是我们的敌人：梦想以暴力制度反对我们和工人阶级的大工业家，塔姆布罗尼和谢尔巴之流的麦卡锡分子，暗中还有教会的绝大部分人。所有这些都认为，可以而

且应当在國內、甚至在国际上实行暴力,使朝向一个新社会的进步成为不可能。而我們,正相反,我們希望群众的强大运动向前挺进,它将积极地应付和解决当前經濟和政治发展的各項具体問題,从而以其不可抗拒的民主力量成功地粉碎当前的階級統治的鎖鏈。

(譯自 1961 年 3 月 2 日《團結報》)

論社会主义与民主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問題現在已經成为政治爭論中所常遇到的題目了。工人階級政党的干部和广大阶层的輿論都对这問題很感兴趣。这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今天政治斗争中的主要問題就是集中地圍繞着这个题目的。

唯一令人遺憾的是，在处理这个和各政党間現有論战的那些問題有着密切联系的問題时，有人却經常使用庸俗的、陈旧的論調，尤其是在要駁倒共产党人的論点的时候。

我想举一个例子。同时我也要对过多地強調这一点表示抱歉。有一次我碰巧提到：資產階級对整个社会的統治（确切地說，我們把这叫做階級专政）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政治形式来进行。它既可以完全取消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也可以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扩大这种自由和制度。

我真是不該讲这些话！一方面，共和党人向我大声疾呼說：談到用民主形式来进行专政，那簡直就是胡鬧；而另一方面，A·巴塔里亚則在《世界报》^①上說我所讲的話（为了他的論点的需要，他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我的講話）簡直是“扯淡”！如果我沒有到过羅馬的屠宰場或是托林皮埃特拉的畜棚，那末我就不会确切明了这个詞的含义。我懂得这是罵街，我对此很为高兴，因为如果一个人

^① 意大利激进党的周刊。

罵起街來，那就說明他已經沒有什麼站得住的論點了。無論怎樣，我要重申一點：那就是，在我看來，今天的意大利存在着大壟斷資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不過，由於歷史的和政治的條件和成果等關係，這種專政不得不以某種民主形式來進行罷了。我是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詞句來說明這個簡單的观点的。不過，今天這種观点正在深入人心，例如深入成千上萬的青年勞動者和學生的心中。硬要反對我們，根據天曉得的什麼現代科學，說社會已不再分什麼階級了，那才真正是“扯淡”，而不是跟生活在今天世界上的人講話。在這一點上，我的反對者又把蘇維埃制度的“蛻化”問題搬出來。關於這個問題，我在1956年已就斯大林問題談到過。我想，我正是在我的文章中用了“蛻化”這個名詞，其目的是為了要證明蘇維埃制度的階級實質絲毫沒有因為斯大林限制並違反了民主而有所改變。我並不要求任何人去讀我的文章。但是，如果有人至少是要確切地引證我所講過的話，那末他就應該去讀讀。

我再說一遍，這段插話並不重要。不過，它有助於說明人們往往在討論中所犯的根本錯誤。這是一種從表面觀察問題、形式主義的錯誤，而其實質則是拒絕認真考慮特別是我們提出的論點。我們的論點是這樣一種政治學說，這樣一種分析並解釋社會生活和歷史的原理的產物。不能把這種學說和原理當作什麼無聊的東西來輕率對待。當我們說直到今天存在過的一切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的時候，不接受這條原理的人對此聳聳肩膀。聳肩膀並不能說明什麼。必須來分析事實並對具體情況作出估價，這樣才能站得住腳。

如果討論的對象是關於民主的問題，那麼我的意見就更是正確了，因為在這問題上流行着現成的、有時則是十分漂亮的話，這些話往往占居優勢，可是人們經常不曉得應當怎樣理解這些話的內容。

譬如說，近来就有这种說法：劳动人民的党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全部問題就是在于宣布自己忠于民主，把民主“看成方法和制度”（“看成手段和目的”或其他等等）。这是挺漂亮的說法，而且在公众集会上会有效果。如果把这些话写进決議里去，大概誰都会感到滿意。假若找到另一些同义語，也許会使它更加冠冕堂皇。可是，所謂在“方法”和“制度”上忠于民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过去有过使用暴力、流血很多的民主革命，甚至是自由主义的革命。所有資產階級革命，在初期都有过暴力和流血的性质，尽管似乎大家今天都忘記了这回事，其目的也許是使人以为：只有馬克思主义者才认为使用暴力是历史上有效的方法，只有穷凶极恶的俄国布尔什維克和中国共产党人才把这种方法付諸实践。可是，在这些革命中，民主到底是“方法”还是“制度”呢？或者說得更一般些：究竟这些革命民主不民主呢？經過一番頗为簡單的审訊之后，把国王和貴族送上断头台，这是在民主范围之內还是超于民主范围之外呢？对此，可以长期爭論。可以从整个整个圖書館中找到为正反两面的观点进行辯护的論据。但归根到底，結論只能是：如果不对当时各种社会和政治集团的真正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进行分析，如果不对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它們的运动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以及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程度等問題进行分析，是不可能作出任何估价的。因此，宣揚以下的信念是錯誤的：即认为民主演变問題、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問題、劳动人民的党对正确解决这些問題所負的責任問題等，都可以通过一个公式来解决。沒有任何公式可以替代明确具体地探索和确定每个时期提出的民主目的和社会主义目的，找出这些目的与統治階級的做法之間的关系，从而确定在一定条件下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应采取的最有效和最正确的斗争方法。的确，如果以一項公式来替代这种具体的探索和确定，那就等于帮助了敌人，因为敌人永远是不难证

明：任何一項有效的行動是違反作為方法或制度的民主的，是違反了這個或那個民主原則的，等等。

我們盡可以時刻記住並使用通常用以表述政治思想的籠統名詞，但是，如果要避免含混而且不進行欺騙的話，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些名詞的真正意義。我們千萬不要忘掉馬克思主義對民主概念所提出的批評，不要忘掉：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項批評，使之成為工人階級、勞動群眾和所有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的階級覺悟和政治覺悟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真想要打开通向民主和社會的革新的道路的話。

二

請允許我指出，如果說有一部分輿論，甚至有一部分工人階級都根深蒂固地錯誤地相信，民主制度是所謂西方世界、即至今在不同發展程度上存在着資本主義政權的國家所固有的東西和特點，那麼我們自己也有一部分錯誤（我指的是爭取或自稱在爭取社會主義的政黨的錯誤），同時這也是，而且特別是社會黨的一個派系為了反對我們而進行的粗暴的、純粹是別有用心的論戰所造成的錯誤。因為這等於說：民主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長處，而一口咬定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長處。旨在宣揚這種錯誤觀點的政論文章是形形色色的。既有成套的庸俗而愚蠢的反共謬論，也有理論性的或所謂理論性的論點，這些論調都在證明：資本主義企業的經濟自由和一般的自由是有必然聯系的。它們說，一個經濟上合理的社會和一個在民主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社會之間是有無法克服的矛盾的。它們還硬說如下情況是客觀必然性，即：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和根據計劃領導經濟的這一制度必然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民主的結束，等等。

我不想在这里来討論这些論断在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脚。我只想提出几点最根本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看法，因而这無論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請拿一張資本主义世界的地图来，在地图上把有真正有效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塗上紅色，把那些在公开暴政統治下的国家塗上黑色，把那些介乎二者之間的、即有某些民主制度、但这些制度受到限制、不稳定、而且完全不能保证有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国家塗上灰色。能塗上紅色的地区一定十分有限。在第一次大战前(只要想一下当时威廉第二的德国、佛朗西斯·約瑟夫的奥地利，以及俄国、巴尔干諸国和西班牙等国的民主就行了)和两次大战間的时期(当法西斯和亲法西斯政权几乎席卷全欧的时候)都是如此，現在也还如此。

現在，讓我們来看看那些在上述三个时期內都能塗上紅色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我們可以首先应用列宁对于所有資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彻底的批評。列宁說得很清楚，在这类制度下，自由权利和公民平等都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因为剝削者与被剝削者無論在民权和政治生活方面或在許多情况下，在法律面前都是不平等的。尽管列宁的这个批評現在不論在任何情况下都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我想把这段話擱下不談，免得有人会对我說：这个批評預先确定了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与用語。我們就索兴根据那些自称是民主主义者的人所接受的概念和估价来談这个問題吧。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普通被称为“民主制的国家，通常几乎都是資本主义大宗主国，这些国家野蛮地压迫并剝削着全世界各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难道这就是民主嗎？显然不是。我們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內都有限制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的結社和行动自由的立法。在劳資冲突中施用警察武力来支持雇主被认为是正常的。普遍选举只是在本世紀初才被承认，而且那

还是經過了十分激烈的抵抗和斗争而取得的結果。妇女的平等权利沒有得到承认。少数民族的自由也被剥夺和否认。有些根本不屬於民主制度范围之内的政治制度,像英国的上議院,被保存了下来,而且直到本世紀初还保有不应有的权力。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选举制度虽是普遍选举,但其目的却总是按照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办法来使得选出的議会的組成不符合人民的意志。代替人民意志的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符合統治集团的利益和决定的議会,完全不符合民主原則的議会。最后,近来我們还看到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对共产党进行迫害、甚至(像阿登納的德国那样)对和平运动的战士們进行歧視和审判等等。

对所有这些应该得出什么結論呢?結論应该是:在工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散播,或更坏的是帮助散播一种对民主問題負有罪責的心理状态,仿佛我們所反对和要取消其政权的阶级是有“民主”的本性和天賦的,而我們却是几乎应当通过說明社会主义与民主可以相互調合这一点来开脫我們自己,这种做法是荒謬的!真理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是相反的一种情况。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当自由制度和民主权利的扩大被用来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扩大政治斗争的战綫、允許人民群众干預斗争时,资产阶级在某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是自由的和民主的(但并非处处如此)。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他們就开始了不同的做法。他們与甚至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保守反动的社会集团取得妥协,或是寻求妥协。他們阻撓巩固和扩大民主自由,压制自由,等等。我們并不否认:在不同国家中,在特殊情况下,过去有、現在也还有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集团(即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有联系的集团)在捍卫着民主制度。有时,这些集团除了他們的思想立場以外,还直接受經濟利益的影响。不过,我們认为,一百多年以来,而且主要是現在,民主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同有組織的强大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

出現和发展相联系起来，而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知道他们的政治目标，也能够通过统一行动和斗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当代世界上，工人阶级的参加社会与政治斗争，他们目前的要求和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愿望，已经成为民主进步的推动力。民主的前途取决于工人阶级在一国生活中所占的具体比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阶级觉悟水平，也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和他们所进行的斗争的效果。每当在这方面发生了削弱和后退的情况，民主就受到威胁。我相信，如果进行一番仔细的历史和政治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甚至对于像英国这样国家来说，其制度的自由与民主性质也不是像人们常常一知半解地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其传统的关系，而更多地是由于工人阶级及其组织逐步变成每个人、就是说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都不能不承认的一种力量的缘故。

三

那末，在所谓的西方社会中，民主原则和实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应用到领导经济生活方面去了呢？应用的程度是很有限的，甚至根本就完全没有被应用。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说股份公司会议是民主的机构，银行、大工业垄断组织等的董事会所作的决策是民主的决策。在这方面，民主是沾不上边的。而这方面恰恰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从而对整个文明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决定意义的。可以根据极为仔细的调查使工厂的职工，包括技术人员，和整个城镇的居民相信：工厂不该关门，而是应该朝着造福大家的某种方向去发展。这并没有多大用处。决定性的是资本家的利益。谁都认为，对分租佃合同应予废除，因为它阻碍农业发展。这又算得了什么？决定性的是大地主的意志。而从民主的观

点看来，地主是处于少数。在这方面，国家的行动，亦即政府机关的行动可以使民主露出一线希望，但是应当看到：上述行动归根到底是受统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的意志和决策所限制、驾驭和指挥的。

不管我们怎样去找，也找不到这样的事例：一个选举出来的议会，由于掌握选票就可对政府向它提出的国家预算进行民主意义上的彻底修改。但是，谁都知道，只有大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们对这个预算的成立才有决定性的积极发言权。国家在领导经济生活方面的干预一般说是不受任何民主决定或民主监督的影响的。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监督的话，那也是所谓西方世界中的例外情况。

意大利就是这种例外之一。我们也可以公开地来谈论谈论我们目前政权的性质。作为这个政权基础的宪法是民主的。不仅如此，它还是这样一部宪法：它体现着战后不久资本主义欧洲普遍存在的把民主原则扩大到经济领域、限制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排他权力，从而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的那一趋势。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也可被引证来作为民主原则是怎样没有被付诸实现的事例，而且配得上是一部政治学的教科书。在进步的人民政党的代表离开了政府以后，所有历届统治者，都应该交付高等法院审判，因为他们进行统治时就好像宪法根本不存在似的。只是通过激烈的群众斗争、通过农民的牺牲和流血才换取到土地改革，而这个土地改革也不是按照全部实施宪法进行的。只是通过工人的牺牲和流血才要求在劳资纠纷中不准野蛮地用武装力量来对付工人（而这个要求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足）。只是由于展开了广泛的、不断的行动，进行了甚至是尖锐的斗争，统治者才在通过一定的投资政策等对经济生活进行民主干预的道路上采取了某些微小的步骤。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应该走什么道路，并且应使这条道路畅通无阻。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实质，而且在某些时候，群众的警惕性和行

动的削弱，都足以使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及统治者們經常的、根深蒂固的反民主願望得以实现。

我們的議會制度怎么样呢？讓我們来談談这一点吧。我們同意說，这个制度是一个偉大成果。但这是从它原来应当和可以做的这一点來說，而不是就它实际上所做的而言。它从根基上就是有缺陷的，因为选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着教会上层——即反民主力量——的控制。此外，还有一种普遍缺陷，这种缺陷就是：傳統类型的选举，就像“西方”世界所进行的那种选举，总是更多地表示了群众的被动和群众与目前状况的联系，而没有表达出他們对于社会革新的深切願望。由于对社会党和共产党进行的政治歧視，也由于宣傳那种关于只包括能够执政的力量的“民主”領域(應該作“資本主义”領域)的理論，議会在組成多数方面也陷于癱瘓状态。因此，也正是由于实行这样一种理論的緣故我們的議會制度具有明显的階級性质。議會經常受到以下趋向的破坏：企图限制它的决策的有效性，使它的辯論丧失任何意义，把它的监督权約束在十分狹窄的界限之內。至于說到关于社会結構和有必要改变社会結構等基本問題，我們的議會就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有着一整套所謂“幕后政府”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完全不受議會监督的。而这种活动才是政府的真正日常活动，全体公民的切身問題就取决于这种活动，正是在这方面，最无耻的貪污舞弊是經常发生的。不过，当统治者們當場出丑的时候，他們就会許諾要好好干。因此，民主的概念就逐步地被一种家长統治式的开明专制所替代了。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呢！

在当前意大利的情况下，民主的推动力过去和現在都不是来自統治階級。这种推动力来自人民群众，来自那些最好地代表人民群众、为了使宪法的进步原則得到尊重、实施和发展而斗争的政党。这种推动力来自工人階級，来自我們共产党，来自社会党，也

来自那些沒有屈服于资产阶级統治階級和代表他們的政党的权力的民主主义者。只是由于在某些問題上国内展开了强大的人民群众运动斗争，議會本身、它的工作和決議才能行之有效。不过，光看到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指出：我們的民主压力之所以过去是有效的，現在和将来也会是有效的，这恰恰是由于我們並沒有滿足于形式，而且我們还为向社会主义前进而进行了斗争。我們的行动給了民主自由本身以新的內容。由于我們的斗争把民主自由同争取福利和經濟进步的要求結合起来，这就加强了自由权利。它把議會制度本身提到更加高得多的水平。它要求对政治制度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如发展地方权力、区域建制)；它提出在工厂和农村采取和发展新形式的民主的問題，以争取使經濟变革和經濟进步有助于滿足劳动群众总的切身要求。正是我們推动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動，鼓舞着我們争取民主的斗争和我国整个民主生活，充实它們，并且使它們产生效果。

我們必須使大家都对这点很了解。我們不仅要強調民主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要用言語特别是用事实来证明，民主對我們來說是某种实际的、新的东西。我們不滿足于形式。光是常常举行选举并不足以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希特勒通过公民投票而取得的多数是丑恶暴政的一个插曲；目前戴高乐的公民投票也证明他的政权是不民主的(如果有必要来证明的話)。我們要使人民的意志成为真正决定政治发展的因素，使它深入到經濟生活、从而深入到整个文明社会的組織中去，同时改变这个組織。

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所讲的“民主”，与人不同的特点就在于此。

四

这条路綫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和我們党在意大利所执行的实际政策相符的。今天为爭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种力量“今后”将会是怎样呢？尤其是当他們掌握了政权并领导社会时，他們会不会坚持站在民主立場上呢？这条路綫就含有对这問題的明白和暗示的回答。将来和現在所做的应当而且也必将是相符的，也就是說，和我們目前斗争的民主內容也会是相符的。劳动阶级取得政权，乃是在經濟和政治方面以及在整個文明社会中建立一个真正民主政权的开始。

那末，为什么要提到专政呢？首先，我們所讲或所想的专政，比方說，和那些耶穌会神甫們所讲或所想的专政是不一样的。根据闡明他們思想的最权威人士之一的意見，“专政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当除了通过革命的暴力改变已不可能有其他方法来保存国家并改变它的过了时的政治制度时，只要相当大一部分人民同意专政，那专政就絕不是一件坏事。”^①

事实上，这些話的意思显然是在为反民主的政权、亦即一种法西斯式的暴政辯护，只要建立这种暴政时不要打草惊蛇，不要鬧得滿城風雨就行了。我們所讲的专政和这个是大不相同的。从原則上說，它是民主的扩大。它意味着新的統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掌握社会领导权，其任务是为了众人利益而不是只为特权阶层利益来使用社会财富，因而也就是要消灭結束对人的剝削保证众人能过像样的生活，并保证他們的个性得到必要发展。新的阶级掌握政权，就其本质來說，乃是整个社

^① 見1956年8月4日 *Civiltà Cattolica*, S·林納:《意大利各政党》。

会真正民主革新的开端。

如何实现这一点，这既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政治行动的目的。甚至在法西斯垮台以前，这已经就是我们研究的题目了。我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肯定我们的靠近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这个论断到现在也仍然是有效的和坚定的，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同我们论战，力图糟塌它或毁谤它。不过除了研究和论断以外，我们也根据上述论断采取了行动。如果不是存心在政治和思想辩论中背弃诚实的基本规则，那末就很难否认我们的行动的效能。

不幸的是，最近以来，社会党的一部分同志为了助长他们党内的争吵，却正是这样做的。这些社会党同志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证明他们是“自主的”。为了证明这点，他们就必須批评共产党人。当然，批评共产党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一大堆无聊的东西、蠢事和鄙劣的行为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不管所有这一切与我们实际上所说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以及我们所做的究竟有无关系，一味自以为是地加以谴责，于是乎“自主性”就被证明了！共产党人被这些所谓的批评者们指责为“权术家”和“耍手腕者”。多么可怕！他们说，共产党人之所以支持西西里的天主教社会运动并和他们合作，并不是由于那个运动粉碎了天主教民主党的壟断地位并且使这个教权派政党产生了分裂，而只是为了要打开一条道路，开办一个“公司”。（尽管说这话的人是《前进报》^①的总编辑，而他却对天主教民主党的分裂熟视无睹。）有一家报纸竟用了整版的篇幅来谈汽车駕駛问题，据说这家报纸是受了共产党影响的，多么稀奇！我们还是别在这种无聊的问题上花费太多的工夫吧，因为这对严肃的人们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① 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译者

不幸的是，甚至弗·德馬蒂諾同志^①走的也是这条道路，特别是当他論及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时，而人們原来希望他在这方面是会采取更加負責和認真的态度的。他首先指責我們把一般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制度和目前存在于世界上那样多地方的人民民主制度等同了起来。如果这是真的話，那末我們努力寻找并爭取一条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目的又何在呢？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意大利的道路与俄国、中国和在中、东欧以及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另一种历史需要的条件下，所走的道路又是不同的。他不应当向我們否认，除了我在上面提到的国家外，在世界上就不能找到任何有哪怕是稍微类似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恰恰是我們主張并強調有必要（亦即不仅是有可能）在我国的条件下列展开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由于是从我国条件下出发的，因而有其政治和历史的独特性。

但是，社会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文件之一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就提出过如何把共产党人所积累的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經驗和社会党人的类似經驗綜合起来的問題，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社会党人的經驗根本不存在。甚至在保卫民主制度方面，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沒有一点积极的經驗；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为挽救資产階級政权而卖力的。在理論闡述方面，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和会后，所有新的經驗都是我們提出的；在实际斗争方面，在西班牙內战中（那是在什么条件之下！）以及通过法国的人民陣綫，新的經驗也是我們提供的。战争还没有結束，西方的几个最大的社会民主党中那种反对朝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趨勢就已經开始占上风。至于共产党人，列宁曾經反复地說过，取得政权的道路和工人階級政权的組織形式是不同的。如果列宁的教

^① 意大利社会党副書記。——譯者

导有一部分已被忘掉了，那是很难责怪这样一些共产党的：这些共产党自 1945 年以来一方面追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另一方面则受到来自资本主义西方的残暴的反动压力。因此，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发展葛兰西同志的学说，着手进行新的探索和展开新的行动，这就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也不要对我们说：我们所制订的路线已被最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议（八十一个共产党会议和决议）所否定，因为这完全是不真实的事。譬如说，有谁能够断言：各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向社会主义前进不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取决于世界上的社会与政治关系了？难道是因为我们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的进步为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吗？这是一个起码的真理。它和硬加给我们头上的邪说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把对方的观点歪曲到这种程度，那怎么还可能进行严肃的辩论呢？

我不知道德马蒂诺同志是不是想这样走极端。他肯定是采取他自己特有的作法，这种作法可能是由他的教授身份所决定的，但最后还是得到类似的结果。他问我们三个问题，想要考一考我们，但不是考罗马法，而是以民主为题的考试。可是，他没有等我们回答，也没有从我们的某些文件中去找答案。答案是他自己作的，并且根据他替我们作的答案来拒绝我们升级，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那末，这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承不承认“民主和阶级政权的目的是不相符的”？这是什么话！请他读一读我们刚才所说的话，不要把清楚的问题弄乱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进程必须是、也正是民主发展的进程。不过，在资产阶级专政被取消了的同时，民主不是在量方面而是在质方面向前飞跃了。至于说任何阶级政权的目的是和国家的目的本身相一致的，而这时，国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仅仅是对事务的管理。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認不認為經濟和經濟領導的集中制度構成對民主的障礙？這個問題是個圈套，我們是不會上圈套的。我們絕不接受自由主義學說。根據這種學說，經濟的計劃性意味着自由的結束。任何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不會接受這個學說。對民主的威脅恰恰來自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來自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掌政，而不是來自消除無政府狀態和資產階級政權的行動。至於說集中或分散的問題，我們在1920年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討論中所得出的結論今天仍然有效：集中的程度和分散的形式是由具體歷史條件所決定的，而民主的發展是必須符合歷史條件的。

第三個問題簡直是開玩笑。他要我們說，我們認不認為革命的历史進程是“神奇的(!)(原文如此)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我們有沒有抹煞覺悟這個因素，有沒有抹煞結構和上層建築之間關係的辯證概念等等。我們能對他說些什麼？我們應該再送他一份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和我們黨各次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和綱領，以便使他相信，我們不僅從未拒絕就這些問題進行辯論，而且是我們自己誠摯地、尽可能深入地鼓勵和進行這種辯論。當然，當我們碰到——比方說——有些人提到我們上次代表大會時只會說代表大會“從理論上肯定了米拉佐主義”^①，我們只能認為，這種人委實是無可救藥的了。

五

我毫不猶豫地承認，最近的一些情況和事件，特別是共產黨人自己通過〔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有力譴責等等而對自己的行

^① 米拉佐是天主教民主黨在西西里的分裂派領袖，1958年因與意共合作被開除出黨，成立了天主教社會聯盟。——譯者

动提出强烈批评，使得我们更加难于就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景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等问题展开辩论。但是，那些完全或者几乎完全以上述批评与谴责作为自己的论据的人们，总是忘记这些批评与谴责是我们自己提出的，是各个共产党和它们的领导人提出的。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点，必须加以考虑。职业的反共人士看不到这一点。我收到了他们的一份新刊物——据说这是用美国国务院的钱办的。在这个刊物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常见的这样一个鬼话：说什么某个共产党的书记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时掌握着异想天开的交通工具，这些工具包括：马力很大的深色汽车（我很奇怪为什么非要深色不可？）和由地下钻出来的飞机等等。我也看到了有关苏联发生的横行不法等事件的大量材料。所有这些谴责都是从苏联报刊上摘下来的，因此，这只能说明发行苏联报刊的这个社会的民主性质。你们可以试一试在《人民报》上找些谴责教会上层人物贪赃和专横的事例！不过，你们只会在那里找到把一些无辜者判罪的新闻，而他们正是四下要求把贪污案件调查得清楚一些的人。

共产党人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抱着无比的勇气，认识到摆脱压制和掩盖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本质的沉重负担的必要性。这正是显示共产党人在行动中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密切联系起来的又一证明。上述沉重负担是一系列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个人的条件所造成的。对此，咒骂是无济于事的，而是应当加以分析和理解，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难道列宁没有说过，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能使这个党不犯错误吗？而在犯了错误时就不能够要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些错误负责，尽管整个运动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这些错误的影响。如果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犯了错误，那是不能由任何其他党来负责的。因此，譬如说，我们从我们参加阿尔巴尼亚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代

表那里知道，这次代表大会用据我們看是錯誤的和危險的方式提出了党内生活和党内辯論問題，于是，我們表示了我們的意見，不过，直接負責和糾正錯誤的不应当是我們。

我也毫不犹疑地承认，在不同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人过去所犯的和現在仍然在犯的錯誤可能是：首先和主要強調他們行动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这种不同点甚至表現在很重要的方面。我完全了解，而且誰都会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要这样做。面对着一个以反社会主义和反共的侵略精神为支柱的資本主义世界、面对着一个为了資產階級和反动派的利益随时准备利用社会主义陣营的任何裂痕或所謂裂痕来从事破坏勾当的資本主义世界，大力強調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一致，把这个团結一致放在第一位，是完全應該的。面对着重民党的盲目反对，这样做也完全是應該的。社会民主党甚至拒絕了解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新的經濟和社会內容。不过，为了进行辯論，我們感兴趣的是強調指出在这些国家制度下为解决社会主义的一些最严重問題而进行的工作采取了怎样多种多样的和丰富多采的經濟和政治措施。像工业和农业发展間的关系問題；生产資料的生产和消費品生产間适当平衡的問題；农业生产的集体化形式問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問題等都是这类最重大的問題。最后，还有不同政党共处和合作的問題，把議會变成領導和监督整个經濟生活的有效机构（像在波兰那样）的問題等。在这些方面都已經积累了大量經驗。这些經驗是誰也不能否认的。但是，應該仔細地、深入地對之进行研究，因为，不管你願不願意，它总代表着对解决人們在向建立沒有資本主义剝削和压迫的新社会前进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問題的寶貴貢獻。

無論在資本主义比較发达的国家或在經濟上还是落后的国家，发展民主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形式和新阶段，在某些或許多

方面，肯定会和到现在为止曾经有过的形式和阶段有所不同。如果有人相信这一点——而我认为人们是应该相信这一点的——，那么这种贡献就会更大了。究竟会有哪些不同呢？现在用不着去问，硬说现在就能提出答案——这种答案是摆脱不了含糊不清的——那是荒唐的。其实，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是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内部在客观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成熟的程度，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功地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能力，是资产阶级进行不可避免的抵抗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根据一定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因为对将来的可能性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臆测。

但是，承认和证明这种不同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同南尼在谈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前景问题时（他在最近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就谈到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大不相同，我甚至要说，是恰恰相反的。

首先，我想要指出，在谈论这个问题并且佯作邀请我们展开辩论时，南尼同志采取的手法是极其少见的，几乎是可笑的。他把我们所提出并维护的观点和结论当作他自己的东西提了出来，然后又从这一立场出发反过来攻击我们。正是我们说过而且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进展，不管使世界力量对比起了怎样显著的变化，但是绝没有创造自动过渡到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在我们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我根据我们第八次和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论点说过：我认为以下这种立场是错误的：“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降低为……等待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加强，期望这种加强会使其他国家的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几乎是自发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然后再由这些党成功地去进行争取政权的斗争。”在我看来，这是明确的。可是，南尼同志则恰恰是就我们一向

公开加以譴責的立場来責难我們。据他說，我們的运动“只向劳动者們提出了共产主义集团在全世界胜利这个前景”。

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正确，竟要求你去支持你自己多年来一直反对的观点，而这些观点还可能是他自己以前有过的。試問和这种人怎么能展开討論呢？

不过，这不是最重要、最严重的一点。最重要、最严重的一点是，南尼同志把已在世界上那样大的部分执掌了政权的工人力量 and 人民力量同正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为爭取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分割开来，使两者完全分裂。他一面为世界分裂成两个集团而惋惜，并声称这种分裂必須消除，但他却又把这种分裂扩大到工人运动中去，使得消除这种分裂成为不可能。他說，不能把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已經执政的工人运动等同起来。多謝，这真是一大发现！但是，使用“等同起来”这几个字，据我們看来，正是故意从最庸俗的反共詞汇（“你們这些共产党人都是俄国人！”）中挑选出来的，其目的就在于制造混乱。我們党居然和苏联共产党、甚至和苏維埃国家等同了起来。如果南尼指的就是这个，那就不可能和他再辯論下去了。但是，如果他的意思是說，資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和民主的先鋒队与社会主义国家爭取民主、社会主义和和平的斗争的团结和意图一致，意味着必須在一切国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展开的行动中排除上述的先鋒队，那末，就必须承认：他就是从理論上肯定人类进步力量在国际范围内的分裂。这只能是最狂热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目标。相反地，对事实作客观和心平气和的分析，却能使我們相信，在現阶段这种分裂必須加以消除，而且已經部分地正在消除。这是使爭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每个国家中以符合这个国家的形式发展并走向新的胜利的条件之一。誰想促进这些胜利，誰就必须帮助消除这种分裂，如果分裂是存在的話，并且必須不把这种分裂

看作神灵,当作某种魔影,以便为自己的投降行为找到借口。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争取团结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斗争。一世紀以前,我們的(共产党)宣言就十分简单地表述了这个意思,其口号是人所共知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譯自1961年4月《再生》月刊)

再論社会主义与民主

——对南尼同志的答辯

我們的刊物曾发表过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关系的評論。南尼同志对于其中有关他的那部分所作的回答至少应当說是令人奇怪的。他写道：“我們过去曾認識到意大利共产党人、他們的領導集团和陶里亚蒂本人力图在关于取得政权和行使政权的前景的共产主义学說中导入的新的东西。由于他們的这种貢獻，統一行动才在我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保持得更久。然而事实是，1956年，当那些新的东西同共产党专制制度（自从創立第三国际以来就是这样組織的）坚持不变的論断发生冲突时，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就发现彼此之間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所以自从那时以来，在对共产党人作任何估价时，都必不可免地多根据他們在他們当权的国家中的总行动的状况，而少根据这个或那个代表大会的提綱。并且从那时起，不管在劳动者的共同經濟要求方面能够怎样在日常斗爭中达成一致，但两党之間就再也談不到建立总的联盟，同时，为爭取政权而进行联合斗爭也就成为不可設想的了。”

这段引文值得全部予以援引，因为在这样短的篇幅內有这样显著杂乱而矛盾的說法是很少見的。不仅如此，还因为这些論据也就是南尼同志至今为他改变政治态度、同我們爭論，以及反对我們向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提出的統一方針（这个方針不仅是为当前要求，而且也是为了范围更为广泛的政治行动）等等所能提出的辯护理由。

我們应当立即指出，人們要根据共产党人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的总的行动的“状况”来評判我們，作为共产主义者來說，我們

絲毫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在这个总的行动状况中，积极因素是明显地占优势的，而可疑的和消极的因素尽管沒有完全消除，但至少也是处于次要地位。在共产党人所統治的国家中，資本主义的剝削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不再存在了。在这些国家里，每个人都是按劳取酬的，人民群众的福利和文化水平在有步骤地提高。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中的阶级区分（这是一切限制民主、否定民主和击败民主的行徑的首要根源）已經或者正在被消除。唯有在这些国家里，民主原則才愈来愈多地应用到經濟生活的組織和领导方面去；唯有在这些国家里，由于取得了这些成就并实现了这样多的建树，人們的个性才能得到日益广泛的发展；也就是說，唯有在这些国家里，尽管仍然存在着可能妨碍自由进展的客观障碍、反对和錯誤，但这种自由进展还是在脚踏实地地实现着。最后，在这些国家里，社会具有統一的基础，人們在爭取征服自然以及改进和发展他們的社会組織的联合斗争中真正感到像兄弟一样。除开明目張胆的反动派或是为了各种动机、乃至有意、无意地尾随这些反动派的人以外，誰也不能认为和共产党人統治的国家紧密团結，是一种消极或者甚至是可耻的事。就我們來說，我們认为，自己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以及让群众了解这些国家进步的实际状况，是我們党的威望和力量所在。不过，我們的力量和威望显然并不是而且也不能仅仅建筑在这些因素上，因为我們並沒有而且也不打算仅仅为一个更美滿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作宣傳。我們要成为、而且实际上也是一个能够领导意大利人民和我們整个国家，走向更美滿的社会的政党。因此，我們和所有要求这样一种变革的党就面临着从具体情况出发展开行动和斗争的問題，这种行动和斗争必須把这些具体情况考虑进去，采取和别处不同的方式来发展。

但是，談到这一点，我們不禁要指出，当南尼同志說应当根据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当权国家的行动来判断我們时，他并不是指以

上所提到的积极和有决定意义的偉大成就，他是指过去几乎五十年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行动中所出現的消极因素、錯誤、乃至悲剧和失敗。

他說这些消极因素的重担落在共产党人身上，他們对这一切負責。所以除开眼前的日常斗争以外，就談不到和他們联盟的問題。但是，我們要提醒南尼同志，只要他本人和他的党願意繼續是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和人民的政党，那末爭取在全世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不論遭到任何失敗，他和他的党就要受到指責。有些不願意拿匈牙利事件当作口实来执行分裂工人階級的統一并破坏它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結的社会党人，不是被称之为“加里斯蒂”^①嗎？（这种譬喻就是从匈牙利事件而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敌人的判断和作为是以階級准則为依据的。唯一可以使他們感到滿意的事情就是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倒向他們那一边去。近年来，社会党的做法是頗为耐人寻味的，并且证明了这种情况。南尼同志不顾一切地“破坏团結”，把他論战的矛头指向我們，在匈牙利問題上接受資产階級反动派最荒唐的論調，等等。尽管如此，他也沒有能够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和政治保守主义的壁垒上打开任何缺口。社会党只要是保卫工人和人民的基本要求，它就永远是統治集团的敌人，就要遭到攻击，就要吃閉門羹。

現在讓我們来談談中心問題。从这方面不难看出，南尼所有的論点都是以矛盾和杂乱的理由为根据的。怎么能断言匈牙利事件使我們的思想 and 政治立場发生危机，把它貶低为不值得加以考虑的《代表大会提綱》而一笔勾銷呢？据我看来，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匈牙利事件证明我們的立場是有效的，是正确的和必須采取的。我认为，現在，如果对于那些事件的根源作出公允的判断的

① “加里斯蒂”的意义是坦克車手。这是匈牙利事件爆发时給那些不采取社会党的官方立場、譴責苏联干涉匈牙利的社会党人的称号。

話，那末这种判断就有可能是一致的。首先，应当考虑到匈牙利在社会主义的經濟和政治建設上所犯的錯誤。这些錯誤不但削弱了共产党本身，使它在一定时期几乎达到瘫痪的程度，同时它也因而为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进攻大开方便之門。其次，这些錯誤在于：他們沒有尊重民主原則，沒有經常切合时宜地使社会主义建設适应实际的客观条件和国家的傳統等等。我們在当时就是这样看的。我們发现，匈牙利事件明显地证明了我們的政治和思想立場是正确的。我們正是在那种經驗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和政治檢討，得出明确的結論，并且极为明确地說明結論的根据和內容。因此，匈牙利的經驗不是证明我們沒有能力来理解、处理和解决我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問題，相反却又一次证明我們在这方面所作努力是严肃认真的。这和南尼同志企图不顾事实加以证明的情况剛好相反。

不过，在匈牙利事件方面和他发生的爭論却是另一种性质的。我們公开地譴責以上簡單提到的錯誤。我們之所以能这样作，是因为我們十分了解它們的原因。但事实的发展是这样，当时已經不是在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某些极其严重的錯誤二者之間进行選擇了，而是要在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支持来保卫和恢复人民民主政权和建立一个反共政权二者之間进行選擇。后一种政权必然只能是一种战争挑衅的白色恐怖政权。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們的選擇和立場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我国先进的工人和人民群众由于自己正确无誤的政治和阶级直觉，作出了同样的選擇。这就說明了为什么那时各方面所发出的反共叫囂并没有得到反应，而某些并非沒有才智的政治首脑人物多年以来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終于失敗了。皮特罗·南尼非但沒有承认当时所作的選擇是理应作出的選擇，理应以鎮靜和勇敢的态度来对待的選擇，他反而追隨煽惑人心的反共宣傳，卷入这段混浊的浪潮，并在这个基

础上举行威尼斯社会党代表大会，来助长这一浪潮。他没有认识到(或者不能认识到)真正的事实通过这种狂热的反共宣传之后被狡猾地歪曲了，而那次悲惨的经历所产生的问题的本质也被隐瞒或者曲解了。

对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来说，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彻底地探讨和明确这些国家为社会革新而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形式、邻近目标和长远目标。这就是说，寻找一条导致社会变革的民主与和平的道路。这条道路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将有最大可能使惨痛的错误得以避免，并且使整个社会尽量少受痛苦。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与这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对未来的前景说来也同样是必不可缺的和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加强整个民主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个问题不仅有关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有关整个运动的团结以及扩大并发展整个运动的能力。我们的敌人对这一点很了解。就匈牙利事件进行的哗众取宠的反共骚动的阵线，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阶级阵线。这种骚动的目的根本不是揭发错误和找出避免错误的方法。它的目的是利用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悲惨经历，来打击这个运动，在劳动群众当中制造混乱和分化，引起深重的分裂，从而长期阻挠——虽然不是制止——全世界走向真正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任何进展。南尼同志并没有能够了解这一点。

他最后声明，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和共产党人是不可能达成协议，这说明他至今仍然坚持这个错误立场。诚然，他所说的并不只是“协议”，而是说“总的政治联盟”，这也可能是由于要采用一个广泛得多的概念来使他的观点更容易被接受罢。我们并不排斥这个概念和它所带来的可能性。相反地，我们甚至认为，双方在这个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会达到这一步。但是，我们今天宁愿先讲一种适度的政治协议，因为这种前景更符合目前和最近的将来的情况。

于是我們便肯定，所有大規模的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運動，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包含着爭取政權的鬥爭的成分。為了發展這些運動，使它們具有必要的規模和聲勢，推動和領導這些運動的經濟和政治組織就必須奉行團結的政策。但這還不夠。制訂民主與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路綫所必不可缺的一個條件，那就是：那些不願把這種政治觀點繼續保持為《代表大會提綱》、而希望讓它成為實際有效的行動的政黨之間，進行接觸和協商。拒絕這種接觸和協商，至少在我們說來就意味着阻礙向社會主義前進，杜絕它的去路，不為它提供便利。這就是為什麼社會黨在南尼同志的領導下一個時期以來一直試圖遵循的政策是這樣地充滿着矛盾而沒有效力。實際上它並不是什麼政策。在普臘洛尼揚^①會談以後，薩拉蓋特所提出的徹頭徹尾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政策才是個政策呢。雖然拒絕——正確地拒絕——薩拉蓋特的建議，但其餘的却不過是一系列吞吞吐吐、語無倫次的觀點，儘管在決議和爭論文章中把這些觀點用冠冕堂皇的詞句連成一氣，但這些論點却还是自相矛盾和彼此抵銷。

基本的矛盾在於這樣一個事實：雖然他們聲稱願意找出並遵循一條取得政權的民主道路，可是他們卻閉眼不看主要是共產黨人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和正在進行的一切，從而不僅割斷自己和今天世界上唯一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現實的必要聯繫，而且還割斷和今天意大利所存在的最偉大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力量的聯繫，而這一力量却不管你願意與否，就是共產黨。要想取得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而又拒絕同這個力量協商和合作，甚至對它挖掘不可逾越的鴻溝，這在今天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事。

（譯自 1961 年 5 月《再生》月刊）

① 普臘洛尼揚是 1956 年 8 月南尼與薩拉蓋特會談兩黨統一的地方。——譯者

在意共第二屆工厂党員會議上的 講話(摘要)

“……今天意大利工人階級的圖景是：不固步自封、不垂頭喪氣，以及整個說來，拒絕接受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同僱主合作的思想。這是一個戰鬥的工人階級，它在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努力实现這些要求方面，已經達到高度的團結和進取心——至少就反對僱主的經濟鬥爭問題而言是如此。我認為任何人要正確的判斷我國形勢和前景，就應當考慮到意大利工人階級今天在國家生活中的實際情況。”

“最近一個時期，意大利工人階級進行了互相交織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這些鬥爭在決定我國整個形勢發展方面具有很大的意義。工人階級最優秀和最先進的部分今天正在努力進行探討、學習、鬥爭和行動，爭取日益成為全國社會的領導力量。從意大利工人階級在這裡所提供的情況中，我們看到我們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得到了充分的證實，這些立場認為工業無產階級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進步中具有首要作用。”

“意大利工人階級正處在資產階級取得經濟成就的時刻。這種經濟成就特別表現在我國工業基本部門的蓬勃發展上。”

目前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 進程中的各種矛盾

“我們已經說明了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消極因素、作

为这个过程的基础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个过程在国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結構中所造成的各种新矛盾。这个过程引起了农业經濟解体的深刻危机，并空前地扩大了社会衰落的地区。还有其他关于北部和南部发展不平衡的地区性矛盾以及劳动階級、首先是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中形成不平衡的矛盾等等。我們着重指出了这些消极因素；但在着重指出这些消极因素的同时，我們並沒有隱諱下列事实，即在我国历史上，在整个意大利資產階級历史上，資產階級实质上已經达到国际竞争的水平，因而能够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虽不是处在日益有利的地位，至少也是处在同历来比較强大的其他国家資產階級对等的地位。我們不應該閉眼不看这个事实，因为从这个事实中产生出一些應該加以分析的精神状态、立場和进程，产生出我国今天正在发展着的政治斗争的大部分因素。

可是，在指出这个事实之后，我們不应忘記，相反地应当正确地看待另一个事实：正当意大利資產階級达到了这个发展程度从而在国际上得到加强的时候，它看到在意大利本国，历史性的对手——工业无产阶级及其工会和政治組織，在它的面前站立起来。工业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提出它的要求，这些要求已經部分地触及工业資產階級的权力基础。

不久以前进行的斗争，有一部分是为了保卫劳动階級，首先是为了保卫工人階級的当前利益和生活水平。可是这些斗争提出了一些前景，根据这些前景，斗争就深入到資產階級行使权力的基本部門，即資本家的工厂；同时这些斗争通过工人階級政党的行动也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問題。并非所有西方資本主义国家今天都发生这种情况。”

“我想着重指出两个因素，它們应当成为我們从政治上来考虑更好地制定我們的日常工作目标和比較长远的工作目标的出发点。第一个因素是工人階級对于在意大利建立現行的民主共和制

度所起的決定作用。如果先前沒有抵抗運動，沒有工人階級最優秀的戰士們的鬥爭和犧牲，那麼意大利就不會有今天的民主共和制度。我們就會有非常不同的另一種制度，因為我們很清楚，我國特權統治階級的根本政治方針是怎樣的。”

“我們應該着重指出而不必害怕有人責備我們不謙虛的第二個因素是：領導工人階級的我們黨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它在有關工人階級的組織、教育和政治領導方面都起決定作用。當然，這是由於我們制訂了無產階級戰略和策略，並且努力加以運用，這種戰略和策略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各項原則為依據的，同時也符合我國特點和情況。”

“因此，從我們的會議中也可以看到黨的情況。我們應該認為，黨的情況總的說來是積極的。其所以是積極的，因為，那裏有鬥爭，那裏有人民組織自己，那裏有為改善工人條件和開辟發展社會關係的新道路的鬥爭，那裏就有黨，因為我們處理問題嚴肅認真，對討論這些問題作了貢獻，同時也由於全部發言與討論所表現的那種鬥爭、勁頭和熱情的潛力。”

“形勢正在發生變化，社會關係和僱主直接地或者通過國家在工廠中行使權力的方法本身也在演變。這些方法不斷地在改變，人也在變化，新的成批成批的青年在工廠，因而也就是在工廠鬥爭的舞台上出現。婦女湧進生產領域。所有一系列其他關係也在我國改變了。人群紛紛離開山區，試圖到城市中尋找工作，或者移居國外，在嘗過了一定經驗之後又回來。”

“我們應當好好考慮這個事實：一些天主教運動的代表和一些其他報紙已經了解尋求這樣一條道路的价值，即通過這條道路，工人階級能夠從保衛切身利益和當前成果出發，為爭取更普遍的目標而鬥爭，從而在國家生活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這實質上就是我們的會議的根本課題。我們感到高興的是，甚至在我們的隊

伍之外也已經在了解和討論這樣的課題。”

“这个时刻的新特点是来自全世界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建立、扩大和加强，通过殖民地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已经实现的和正在发生的结构变化。这些事实导致了如下后果：今天资本主义结构不再是统治的结构，帝国主义不再是能够统治全世界的唯一力量，而还有另外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作为一种新社会的建设正在前进着，而且是同劳动群众获得觉悟相结合，特别是在共产主义先锋队有能力发展群众的这种觉悟的国家里。”

意大利存在着要实行国家经济 和政治结构改革的广泛愿望

“有些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方同正在前进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另一方之间的巨大斗争面前，只谈实力的冲突，并说工人阶级的任务是置身在这个冲突之外，而去采集或者寻找纯粹的民主之花。这些人是大大地错了，我甚至要说，他们对当前历史的发展是一无所知，那些企图在工人阶级当中散播这种观点的人是大大地错了。唯有通过战斗，为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和政治目标与民主目标而斗争，为反对雇主在工厂中的方针而斗争，在国内和国际事件的更广阔的领域内为反对帝国主义政策而斗争，才可以向社会主义前进。

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另一种形势对我国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些影响，这种形势对于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些因素，对于意大利民主发展和民主斗争——当前的形势就是从这些斗争产生的——有着特别的影响。在意大利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存在着一种反法西斯的深远传统，这种精神和传统

不仅散布在工人階級的先进力量当中，而且散布在多数居民中。因此存在着对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深切拥护，这些制度是通过不久以前的斗争和遥远过去的斗争建立起来的。这个事实无疑大大地限制了资产阶级统治阶级、意大利特权阶级，特别是其中最反动的集团施展阴谋詭计的可能性。同时也存在着要求改造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广泛愿望，这种愿望虽不是存在于意大利全体居民当中，却是存在于意大利居民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当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共产主义先锋队当中。这是我国现行制度的一个内在特点。”

“当我们共产党人，工人階級的先锋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的党，证明我们同现行民主共和制度的联系，并指明我国宪法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把这些积极因素和我国制度的特点作为行动和前进的根本依据的时候，有些人似乎感到讨厌。对于这些人，我在这里顺便作个答复。我认为，他们有时过于轻率地批评我们的立场，而忘记现行制度的主要因素。在法西斯垮台以后建立这个民主制度时，那些参加立宪会议的人和已经受了那么多痛苦的人民群众以及曾经在抵抗运动中战斗过的人，本来希望建立一种具有新内容的民主制，正如当时我们所說的，建立一种进步的民主制。

如果说在我国宪法中写上了并且规定了某些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话，那是为了保持意大利民主制度的这个标志的。如果我们忘记所有这一切，从而造成今天的我们同意大利工人阶级所需要和缔造的历史之间的裂隙的话，那是荒唐的。

如果人们正确地提出问题，他们也会了解，为什么‘经济奇迹’并没有而且不可能熄灭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能熄灭工人群众与劳动群众争取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斗争。

相反地，经济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或者至少削弱了阻挠

前进的一些因素的消极影响。毫无疑问，经济在一个长时期的停滞，两百多万的失业者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众，曾经沉重地压抑着国民经济，从而使人们不得不进行一些常常只是抵抗性的、防守性的、为争取有限的当前胜利的斗争。失业对于使斗争发展成为更先进形式的斗争始终是一种障碍。

诚然，失业有助于在宣传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但同时也给工厂中的劳动群众造成失业的恐惧。然而今天，促使阶级斗争采取新形式的一些因素已经发生作用了。新一代已进入工厂，妇女已进入工厂，他们都有看待当前现实的新头脑。他们是一些从某种顽强的见解出发的力量，但这往往是一种积极因素，因为它有助于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内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缺点。因此，寻求一种新发展、寻求摆脱目前形势的新道路，并不是同过去决裂，而是同过去联系。在新一代身上，山区游击队员和选举过立宪会议并希望宪法产生与意大利旧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一些新东西的人们所怀抱的殷切期望又复活了。因此，斗争的推动力是从所谓‘经济奇迹’所造成的形势中产生的，而如果说工会斗争表现得那么活跃的话，那是不奇怪的。我甚至要说，这种斗争不可能不是活跃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工会运动的这种活跃看成是同整个国内政治形势分离的东西，那就错了。昨天都灵的一个同志提到恩赐主义式的改良主义，如果意大利工会斗争只局限在这种改良主义范围内——某种工团主义也可能渗入到这个范围——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若干国家里，工人的工团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渗入到恩赐主义范围中去的。”

“新资本主义”思想已为工会斗争的 蓬勃发展所击败

“相反地，我们的工会运动，就它的团结表现而言，是同政治斗

爭有深刻联系的。制造出人为的对立那是錯誤的。相反地，必須了解工会斗争本身如何帶有一定的政治成果。工会斗争对于摧毁‘新資本主义’思想是最有效的宣傳力量，这种思想是鼓吹工人和雇主实现階級合作的思想。工人揭露了这种思想，赤裸裸地揭示严酷的階級关系。此外，我們不要忘記，工会斗争在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内部建立了广泛的团結基础。这些年来大部分的工会斗争都是統一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不同傾向的工会在一起进行斗争。意大利天主教劳工协会和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以及意大利天主教劳动者的各种組織的积极分子都动員起来了，这些人同我們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党同志們一起进行糾察。这些都是偉大的事件，它們在培养劳动者的階級意識方面有深刻的影响。

因此，总的說来，我同意斯凱达同志所談的意見，他指出，各工会所制訂的綱領实质上是整个工人階級据以行动的綱領，这个綱領旨在触及雇主在大企业中的权力，破坏雇主的权力、限制它，并且最終粉碎它。因此，人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要求建立能够在工厂中实行工人监督的机构，这种机构是我們的宪法所規定的。”

新的要求包括共和国宪法早已規定的 政治綱領的某些因素

“但是，我想，如果认为这个要求綱領所表現的向前迈进一步已經完全成为整个意大利工人階級的东西，那是錯誤的。請你們注意，如果整个工人运动今天都已經在这个基础上行动，那么政治危机便会急轉直下而成为革命危机。我們还没有处在这种形势中。可是，同时我們應該看到，許多同志在这里很出色地提出的这个綱領，包含着許多綱領性的因素，这些因素过去是，而且現在也仍然是具有新內容的民主制政治綱領的組成因素，而我国宪法就

是这种民主制的宪章。这些要求是朝着那个方向，朝着建立工人管理机构、大壟断联合企业国有化等等方向的。

應該看到所有这一切，也應該看到我国經濟的一定部門中所存在的特殊条件，这些条件使具有非常先进的性质的一些要求成为现实的要求。我們不要忘記，在意大利我們有一个国有化的工业部門，我认为这是整个西欧最广泛的国有化工业部門，尽管它是不完全的国有化部門，但具有特別的形式。我們甚至有一个国家投資部。如果有人問国有化产生不产生社会主义制度，我們怎样回答呢？国有化本身并不产生社会主义制度；国有化本身并不解决工人階級在經營生产中的地位問題；它本身并不使工人階級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滿足。但是，我們說，国有化創造一种能够有利地开展政治的、議会的、民主的斗争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工会斗争能够推动整个工人运动朝向深刻的結構变革前进。我們不要忘記，在意大利，工业国有化部門中事实上已經出現以这种方式把工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結合起来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因素是不是完全被意識到了呢？我要說，至少在整個工人階級先鋒队中并不完全意識到。广大群众的各种合乎现代的需要也沒有被完全意識到。会上已經着重指出，由于最近一个时期新的青年和妇女阶层进入工厂以及老工人离开工厂，在整个工人階級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有利于我們，有利于工厂斗争的开展呢，还是不利于我們，不利于工厂斗争的开展呢？这种現象无疑給工人階級带来了牺牲、痛苦和苦难。許多工人在四、五十岁就被赶出工厂，由于工会和政治原因而遭到歧視。这些不公正和苦难要由資产階級资本主义制度負責。可是，过了一些时候，甚至在反动派控制工人階級成分改变进程以图造成不利于我們的形势的地方，又看到工人运动有了起色。你們看到雇主階級认为應該始終对我們不利的因素又对我們有利了。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尽管它是一个艰难的

过程。但是，如果采取同这种变化相应的政治行动，采取使劳动群众中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保持活跃并得到发展的行动，那么就会取得上述结果。这种意识不仅是工会意识，而是如下一种意识，即意识到工会纲领中所包含的政治目标同批判现实社会的各种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

“我们有责任使人们懂得，争取实现先进的工会要求，争取政治变革，争取民主发展的斗争，是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始终要从我们所实现的民主基础出发，从工人阶级过去所作的事情出发。

显然，党必须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不是要求党在工厂中对工会活动漠不关心。这样会是荒唐的。但在工厂中应该产生一批工会积极分子，无论是参加我们党和其他党派的，还是无党派的，这批人应该有自己的职能。党应该记住自己不仅是工会的而且是政治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应该鲜明地批评现实社会，应该指出斗争的道路，以便改造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使工人阶级掌握社会的领导。

这无疑是在宣传的任务，而我们绝不轻视宣传；可是这并不光只是宣传。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我在这里要提到一个在我看来尚未得到足够强调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问题。在工会方面，不同工会会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荒唐的、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已经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统一斗争。但在政治方面的情况怎样呢？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并不是说把所有积极的工人都吸收到共产党中来。我们承认，其他派别和其他政治倾向有权利在工人阶级内部存在，而我们愿意在政治上同它们合作。为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意味着为某些具体的东西而斗争。

首先，在工人阶级当中，仍然存在多大程度的反共产主义呢？在天主教劳工协会、天主教行动会和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

會員中仍然存在着反共产主义。这些工会會員在罢工期間同你們一起担任糾察,但当討論一般政治問題时,他們无疑都又会提出庸俗的反共論調,說什么同共产党人是不能达成協議的,因为共产党人嘴里銜着刀,我們还会听到他們談論匈牙利、斯大林等等。必需从工厂出发,采取行动来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的根子。有一大部分意大利工人信仰宗教——我們尊重他們的信仰——并参加一定的工会組織。

現在,問題是信仰社会主义并且追隨我們党的工人階級同参加天主教組織的那一部分工人階級的合作。这些力量的合作問題,在意大利是对走向社会主义以便能够改变我国总的政治形势的条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問題。”

我們党在社会主义劳动者 和天主教劳动者的合作中的作用

“这里就需要党来进行工作。工会是不能履行这个职能的。这是屬於我們党的同志們,屬於我們党的各个支部和党委的职能。宣傳材料应当談論这些問題,党应就这些問題采取具体措施,应同其他派別的劳动者举行專門會議。如果开始时只有五、六个人,如果會議只不过是一种交談,那没有什么关系。我們总是这样开始和前进的。必須采取各种道路。必需問他們,你們认为这支拥有两百万共产党人和七百万选民的力量会被排斥掉嗎?还要問他們,你們认为如果繼續从政治上排斥共产党人,就会达到所有劳动者的共同目标嗎?为了能够創造全国政治斗争发展的新条件,这就是党在工厂中的任务,就是工厂支部的任务。对于具有社会民主主义信仰的工人也可以这么說。我們尊重这种信仰的某些方面。但我們必須摧毁一个东西:反共产主义思想。我們必須消灭反共

产主义毒素。”

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统一而斗争 是共产党组织的基本任务

“社会党的同志们是我们所最接近的。他们是我们的兄弟，二三十年来，我们在一起战斗过。我们不能不向他们展开行动，以便表明那种认为不能同共产党人合作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荒唐的观点。相反地，如果他们真正要为政权而斗争，那就必须同共产党人采取共同行动。我们不希望有人在工人阶级当中散布某些社会党领导人目前的一些观点，因为如果这些观点散布出去的话，会使争取政权的斗争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中成为不可能。在去年六、七月间，当为了制止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大资产阶级的最反动集团掌握政权而进行战斗时，共产党人是站在最前列的，那时所有的人都了解必须同共产党人合作。在这个关头，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同懂得必须改变目前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的那一部分天主教工人阶级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

争取工人阶级政治统一的斗争，是共产党的支部，党委以及我们的整个组织的基本任务。必须对国内和国际形势中的不同问题采取政治行动，以便把工人团结在我们的民主发展、保卫民主机构、同资产阶级最反动集团作斗争的纲领周围，团结在一个先进纲领周围，争取实施我国宪法原则，争取那些应当作为我们希望在我国实行的民主制度的内容的那些东西。我们要把他们团结在土地问题、学校问题和其他国家生活问题的周围，团结在争取和平、谴责帝国主义的斗争周围，以便把他们动员起来，反对领导大西洋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挑拨者。当刚果人民的领袖卢蒙巴被杀害时，在意大利引起了那么强烈的激动，不是毫无意义的。劳动群众表

示他們的憤慨，這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不僅是感情上的抗議，而且是一種政治行動，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帝國主義目前如果不通過犯罪和施用全面毀滅的威脅手段就不能再統治世界。

正是依靠展開這些政治行動，你們才能夠使工廠中的黨組織更加強而有力。當我們不僅環視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而且環視南部的城市的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新的勞動中心，看到一些有幾十個或幾百個工人在那裡勞動的中等工廠。在有廠內委員會的工廠中，這些工人在選舉廠內委員會時多數投意大利總工會的票，在行政選舉和政治選舉中他們可能常常投左翼黨派的票。但是他們不是共產黨人。我認為，在這裡就不僅是省委的領導機關負有責任，不僅區黨委，而且支部本身都負有責任。大工廠的支部應該看到在自己的旁邊出現了其他的生產核心，在那裡有幾百個工人勞動，因此必須在這些新工廠中進行擴充和滲入。當然，這應在黨領導機關的監督下進行。我們應該到我們還沒有黨員的工廠里去，而且如果必要，必須從其他工廠調來一些黨員，以便有一個初步立足點，來開始宣傳工作。我們應該展開活動，使我們能夠日益滲入工人階級並使他們朝着民主、朝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譯自1961年5月8日《團結報》）

天主教民主党是我們要击败的敌人

——就社会党对现政府的不信任案
在議會所作的发言

議長先生：

我的同事南尼同志在昨天會議上所申述的提案对这个政府表示了他的党团的不信任。尊敬的同事們，自从这个政府成立直到今天，我們是一向不信任它的。因此，我們將投票贊成南尼的提案，这是完全符合我們的整个政治立場的。

我們可以談一談不信任的理由。这个政府是“在紧急形势下”成立的，現在比起早已过去的去年7月的日子来是可以更为客观地来討論这个事实了。

現政府无疑是在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候、在民主制度发生危險的时候成立的。

但是，当現政府成立的时候，我們已經达到这样一种局面，即群众斗争所达到的广泛規模和人口中比較先进的民主阶层（工人、劳动人民、青年人、中間阶层、进步的知識分子）在保卫民主和共和制度中所表現出来的决心，已經使政府进一步朝着反动冒險的方向发展成为不可能。那个时候的这个坚决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局势中最重要的因素，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議會中的辯論和策划。然而，正是这个因素沒有被人們給予必要的考虑。

現政府在它的最初的綱領性声明中否认它的紧急性质。当我們拒絕信任它的时候，我們是考虑到这一点的。我們不能够赋予局势和政府以同政府自己不相容的性质，当时政府自称为代表天

主教民主党内所有力量和派别的集团，它还有一个重新夺得权力和长期行使权力的明确的纲领。

实际上，认为局势和政府具有“紧急”的性质，意味着除了成立有法西斯倾向的右翼政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办法。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现在的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我们当时说，现在我们再说，其他办法应当是形成这样一个政治组合，它一心要满足民主的要求，满足社会正义、尊重共和宪法并予以实施的深切愿望，这个愿望曾激励六、七月的伟大的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但是，这个办法在当时乃至现在都被顽固地拒绝了。

不管怎么样，如果的确存在过紧急状态，那它并不是从事实出发的，也不是由于议会中的情势而产生的。紧急状态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民主党直到最后还恶劣地支持声名狼籍的塔姆布罗尼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天主教民主党那时拒绝在政治方针上作应有的改变，正如它直到现在还拒绝这样做一样。

在这方面，这种情况迄今并没有变化，虽然事件本身已使这一切更加明显，因而使社会党改变了它以前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我们以前不断批评过的。

这个政府的处境在许多方面的确是很特殊的。出现了新的事实，以前存在的困难局面已经变得更加严重，而且又产生了新的严重困难。正如民主和反法西斯运动去年所要求的那样，需要有适应上述新的现实的政府政策、决定和立场。可是一直没有这些政策，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局势的确是充满着新危险的局势，它要求人民力量作新的努力去进行斗争。社会党同志们所作的决定恰恰突出说明了这一点。

我现在说的话，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对国内形势，社会关系和党派之间的关系也都是适用的。现政府执政期间，国际形势继续恶化，并且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峰，使各国人民面临一

个十分严重的前景。

国际形势的恶化

这个趋势的起点是殖民主义者对刚果人民的团结和独立的进攻，这已变成了一场流血的悲剧，并且还在继续着。法国帝国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所进行的野蛮的、残暴的战争从来没有停过火。尽管已开始谈判，对要求自由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最骇人听闻的暴行、酷刑和大规模的屠杀仍然在继续进行，它是如此残暴以致引起所有民主分子的反对。“给阿尔及利亚自由”的要求，对毫不留情的法国军国主义的谴责已经成为意大利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一切对我们政府的立场没有产生影响，我们的政府甚至仍然是戴高乐将军的忠实奴僕。

联合国开了一次吵吵闹闹和无济于事的会议。裁军谈判现在陷于停顿。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正临近僵局。在老撾和古巴，我们见到美帝国主义集团侵略干涉的极其严重的表现。在这两个事例中，美帝国主义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被击败了。在这两个事例中，我们都十分接近于危险的破裂点。今天又在近东出现了一个新的危险的冲突中心，成为英国的财富和力量的一些石油资源就在那里。

有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事实——维也纳会谈——在所有要求和平的人们心中再次燃起了一些希望。但是，正是在这个会谈之后，苏联在长期等待——等了十五年以上——后提出的、通过签订和约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和柏林问题的建议，所得到的回答是西方世界挥动着武器，作出疯狂的、极端的决定，进行最严重的恫吓。

我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谈最后这个问题，来阐明我们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要求。我现在要着重地指出，政府在这个时候蓄意甚至不在现有条约的范围内——我强调这一点：**甚至不在现有条**

約的範圍內——採取任何行動，來當眾公開表明獨立的意大利政策，這個政策應促進緊張局勢緩和過程的恢復，反對德國、美國和法國的極端軍國主義，同時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不追隨大西洋大國的行動，因為大西洋大國反對並且千方百計地阻撓各族人民消除任何形式的殖民壓迫和帝國主義統治。

我們和很大一部分公眾輿論得到這樣一個印象：甚至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訪問——不幸這次訪問是在美國侵略古巴這一可恥的冒險失敗的前夕進行的——也並未能提高意大利在拉丁美洲廣大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拉丁美洲廣大人民決心擺脫美國帝國主義的控制，沿着深刻的經濟和社會革新的道路前進。

在上阿的治^① 我們正在直接体会到：大西洋政策所全力贊成的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對歐洲人民會意味着什麼。

正是在昨天，意大利人民听到了駭人听闻的消息，說在博尔察諾省开始的罪惡的、災難性的恐怖行動已擴大到全國領土。這些事實本身，由於它們可能引起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在一些時候以前，當我指出這些危險的時候，我的話被人取笑。現在，不幸有愈來愈多的證據證明，我們意大利人——波恩德國的忠實盟友——首先受到一個或者幾個旨在實行泛德國主義的報仇和擴張組織的行動的危害，這些組織，不但在奧地利，而且在波恩德國正像一窩窩的毒蛇在伸展，在積極活動。

關於國內關係，目前形勢的特點是在支持政府的黨派中間存在着緊張狀態，這種緊張狀態時而公開，時而隱蔽。社會關係方面的緊張狀態也愈來愈嚴重。掩蓋這個形勢的，一方面是肯定作為現政府的根基的，所謂“利益匯合”的永久性和牢固性，在另一方面則是所謂著名的“經濟奇蹟”。

① 在意大利北部。——譯者

南尼同志在他昨天的发言中，在有关目前政治辯論方面，就有很大一部分談到“利益汇合”的問題，我不想学他的样，因为在我看来，談到这一方面可能使問題更加混乱，更加含糊，而无助于澄清問題。

例如有人說，在政府政策中之所以沒有任何民主的社会革新，应归罪于自由党，因为它强加于人，威胁人，甚至进行政治訛詐。

但是，这个意見是完全符合莫罗先生的利益的，因为它有助于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莫罗先生接受馬拉戈蒂先生（自由党全国書記——譯者）的硬行摊派，那是因为他实质上同意与这种摊派相应的政策。

自由党不論是在議會或是在全国都不是一个大党。全体选民給予它——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約为他們給予我們党的七分之一的議會权力，还不到給予天主教民主党的議會权力的十五分之一。我不知道，它在这场辯論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当假屏風，还是充当舞蹈配角。它所扮演的角色，在我們历史上許多次都是十分消极的。例如，在法西斯政权出現的前夕，自由党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現在，正当人們力图肯定和加强教会政权，改变和敗坏我們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它同样起着消极的作用。

但是，这个企图敗坏我們的民主制度的运动的主角不是自由党。这个敗坏和腐化运动的首恶是天主教民主党，它渴望得到权力，渴望它已成功地取得并且不肯放棄的政治壟断地位。这是我国和劳动群众必須注意的中心問題。这就是我們談論成立“中左”政府、要求把它作为成立另一个政府的公式的时候必須注意的一点。要求采取新的經濟和政治方針，坚决貫徹实行宪法的原則和条款，恢复抵抗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理想，同要求打破和結束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壟断以达到新的統一的民主多数——这是互相关連的几个方面。

所謂“利益汇合”：一方面是代表政治、社会保守主义和紧紧壟断政权的天主教民主党，另一方面是接受和承受各种硬行摊派的追随者

如果到时候不改变他們在这里，在能决定問題的議會中的政治态度，而且像薩拉盖特先生这样一个“中左”的支持者，像他昨天所做的那样，再次向我們发出市政委员会的那种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陈詞烂調，那么，像拉馬尔法^①先生所做的那样，就算是写一系列再三呼吁的极有才华的文章，也是不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在市政委员会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是不可能执行“中左”政策的。走这一条道路，只会有助于把国家和我們整个政治生活逐漸教权化。

这是我們今天的全部政治生活无法摆脱的严重矛盾。一方面，有一个一分权力也不肯放棄的，代表社会、政治保守主义的天主教民主党；另一方面，一些追随者（如果可以这么說，而且在許多情况下是这样）說，它們担心問題会解决得更糟——虽然这个最糟糕的能是什么是不清楚的——，实际上是支持执政党的，它們一一放棄所有实行革新，执行宪法和发揚民主的要求，而且一个又一个地接受或承受一切的摊派。

这样，政治生活就陷于停滞状态了，政治生活水平就降低了。議長先生，現在已經到这样的時候，我們应当認真考虑并公开申明，如果現在就发生政府危机，或是由于共和国总统当机立断的权力有限而使政府发生危机的时候，我們會冒险采取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行动。提出这样的論点是荒謬可笑的，但是，这个荒謬的行

^① 共和党领导人。——譯者

为有助于延长一个早应结束的局面，因为无限地延长这个局面是对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制度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危險。

在天主教民主党方面，由于它得到了帮助，而恢复了它的反对党派的团结之后，正极力利用人们向它提供的幌子——甚至社会党也在某个时期向它提供过——，着手实施它的目的和计划。这个党，在牌号鲜明的势力的推动下，力图把国家完全掌握在它手中，并把它变成教权国。他们希望这个转变是和平的，但这是很困难的。

教育制度问题，以及自由问题，尊重宪法所保证的地方自治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民主发展问题，目前为什么会这样严重，原因就在这里。

我认为，教育制度问题不是拟订关于这一个或那一个草案的某种坏的折衷方案所能够解决的，这种折衷方案，即使是从技术上看，也是不可想像的。意大利没有它所需要的教育制度。我们需要现代化的自由的学校，它的结构全部革新，它不受旧的阶级框框的束缚，而且可以自由发展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我们的各级学校应当一视同仁地向全体公民开放，并且应当按照我们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办好。这就是我们在意大利所需要的那种教育制度，但是在教权党之下，它是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的。它应当由民主力量建立起来，这些民主力量只要摆脱它们对教权主义的从属地位，就会懂得怎样一致行动，懂得怎样使天主教民主党或至少它的一部分相信需要遵守宪法，尊重正在从学校本身强烈地表现出来的要求革新的意志。

天主教民主党在这方面的整个行动只是想要利用我们教育制度的危机，利用我国教育制度走下坡路的客观过程，并且在教育方面树立教权势力的完全统治，在必要时，把我们宪法所规定的教育制度推翻。

安全出路不在于妥协，而在于反对和譴責这些計劃，在于采取教师和学生的进步团体正在要求全体学生和居民采取的那种行动。

由于同样的动机，自由問題，实行宪法所規定的自治問題，政府行动应有的理想內容問題，也同样正在变得严重。市选举后七个月，意大利首都的居民都知道，除非他們准备接受教权专制到底，他們便不能够有一个按正規手續选出的市政府。

在經過四个多月由天主教民主党主使的欺騙性的、不光彩的活动之后，西西里大区議會很可能将要解散，因为甚至在那里天主教民主党已失去了使它的教权壟断保持不变的可能性。激进党的代表們說得对，在这种情势下，不可能更多地理解，在某些城市成立的，同社会党人合作的政府的意义。宪法所保证的地方自治的整个結構，今天經常受到威胁，只有坚决的行动和斗争才能挽救它。

本来要作为这个結構的頂头的区域机构，已經被擱置。自从宪法規定成立区域机构的日期以来已过了十多年，現在肯定不是在成立区域机构。1959年11月30日，共和党总书记雷阿勒先生，在他就成立区域机构草案提出的一个报告中公开說，实施宪法中有关区域机构的条款的一切障碍都已消除。我們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任命了一个按照歧視原則成立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問題。这个委员会仍然存在，它已經工作了差不多一年。据說它准备了一个报告，但是，据了解，由于这个报告的内容似乎并不反对成立区域机构，連要印发和在議會中討論这个报告也有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我們必須向雷阿勒先生指出，区域制度的实施遇到障碍，这些障碍，首先是天主教民主党頑固地决心不去充分实施宪法的全部条款，但是这些障碍之所以存在还由于共和党的政策有助于維持这些障碍。共和党在全国支持立即实行区域制

度；但是，在議會这里，它却支持拒絕实施宪法制度的政府，并且不实行宪法制度。这样，我們就使我們的整个宪法制度倒退了，并且首先使議會制度永远倒退了。

我們沒談到反法西斯精神，和忠于抵抗运动的理想的問題，这种精神和理想应成为这个政府的鼓舞力量，因为它是在反法西斯的情况下产生的。在去年六、七月，为維護抵抗运动的理想，而对派去向他們挑衅的警察部队作斗争的年青人，目前却在西西里被判过重刑，其他人在勒佐—艾米利亚和热那亚坐牢已一年，等候审判。同时，在劳資糾紛中警察部队仍被使用来支持雇主和进行恫吓。

在目前的气候下，我們以日益不安的心情眼看着某些集团正在成长起来，它們在和我們的宪法不相容的思想的推动下，妄图在国家机器的某些环节上进行反动的复辟。这个事实使总理所說的，国家机器目前不起作用，这句话具有也許不同于他的意图的特殊意义。

所謂“經濟奇迹”不过是工业的显著而迅速的擴張，这个擴張並沒有解决我国經濟、社会的任何基本問題

天主教民主党以大肆宣傳著名的經濟奇迹来回答一切批評和攻击，这个經濟奇迹据說是天主教民主党的政策的結果，并說，这证明它壟断政权是正确的。

实际上，如果我們更透彻地分析一下这个問題，我們就发现整个天主教民主党的整个政策有其他根源，而且这些也許是主要的根源。但是这些根源并不能使人贊成天主教民主党目前在国家生活中的行动，而是使人斥責它和譴責它。

这个著名的經濟奇迹究竟是什么呢？它不过是我们的工业显著而迅速扩大而已，在资本主义制度处在特殊环境的条件下总是能有这种扩大的。但是，同时，这个經濟奇迹还意味着，我們的經濟結構朝着壟断的方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們进入欧洲共同市場后帮助和加快了这个变化。其結果是，經濟和工业的扩大并不使我們在国家的經濟和社会发展方面所面临的任何基本問題得到解决。

首先，失业的問題仍然沒有解决。我不打算在这里开始討論目前意大利有成百万人或几十万人失业的問題。不过，我确实知道，即使根据最乐观的数字，近年来，被迫离开意大利去找工作的工人的数目，比失业数字所减少的数目要大得多。这样，我們正在丧失宝贵的劳动力；到瑞士去工作的意大利工人百分之八十是熟练工人，我們国家現在感觉得出他們不在的影响。使我們的后代不断地补充到劳动力中去，使所有工人都有工作这个实际問題远远沒有解决。

区域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远沒有消除，而是正在尖銳化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地区的經濟发展上的差距愈来愈大了。从南部地区发出了愁苦的声音，如我們在辯論卡拉布里亚的目前状况时帶到这里来的声音，就是这种声音，除此之外，我們还可以加上来自南部所有地区的声音。

同时，我們正面临我們几十年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一切正发生在工业壟断资产阶级正在巩固他們的地位，已变得更富有，并实际上統治着我們国家的时候。它就是天主教民主党过去当作、現在仍然当作它的真正靠山。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請看看工业联合会主席的一些言論；你們就会看到，現政府的真正主子們是怎样談这件事的！請看看关于工业联合会主席在一次部长會議上的发言，取消对农业作些让

步的决定的那一段插曲吧。工业联合会不能容忍这个决定。这一段插曲是有教益的：工业联合会在会议上中途干涉，决定就取消了。不服从工业联合会是不行的。

我国经济和政府的这些老板们还是有他们的打算的。工业联合会主席本人公开地说，目前的形势相当于1920到1921年的形势。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我不相信说这个话的人不考虑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些年代是怎么回事，1920到1921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法西斯主义上台，我们的民主制度随即完结，接着对工人组织发动了无情的进攻，我们同这个暴政斗争了二十年才把它推翻。

同事和朋友拉马尔法，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有时我们在会议上和意大利各阶层的代表谈话，特别是和青年人谈，向他们说明1920年以后的意大利历史，说明我们怎样陷入那次深刻的危机；说明那次危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进行斗争，我们这样做是好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提醒青年注意这些事情是正确的；我们的最大多数的曾经跟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人，一致地提醒后代注意这些事实是一件好事。我们播下的这个宝贵的种子是会结果的。但是，这里，意大利工业家的组织，也就是拥有我们国家财富（和拥有权力）的组织的首脑人物又一次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前景，他认为那也许是真实的。这个人代表着和政府机器、天主教民主党机器紧密地连结着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

如果我们考虑到近年来这种力量是怎样被肯定和活动的，考虑到它有意識地把我们的经济方针引到什么方向，那么埋怨说失掉了实行某些改革的好机会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改革是为解决我们经济的基本问题所必需的，而实行改革又必须利用经济上升的趋势，因为如果上升的趋势改变了就不能实行改革。这样埋怨

并非問題所在！事情的真相是，近年来完全和天主教民主党意見一致地控制了我們經濟发展的整个趋势的这种力量，是在原則上和在实践中反对我們經濟结构的任何改革的力量。

工业壟断资产阶级根据 它自己的利益增加公共費用

壟断资产阶级，在某种条件下，只要它能够从中得到一定的利潤，它也可以接受的东西就是增加公共費用。就是这么回事。这正是天主教民主党一直在奉行的經濟政策。公共費用的增加分作几个不同部分，而我們預算中名声最坏的部分，即国家收入，却原封未动。增加开支費用的确切目的，是迎合今天通过天主教民主党統治我国的大壟断資本和工业大资产阶级所选择的東西。我們只要回忆一下建設公路的計劃和綠色計劃就够了（虽然我将不在这里重提我們在提出这些措施时的批評），这些計劃的数以十亿計的錢是要用来加快农村資本主义的发展，牺牲中小农民的利益，如此等等。

在这里和那里作了一些让步，但是絲毫沒有触动或改变国家經濟结构的实质；因此，对解决我們經濟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問題沒有作出有效的貢獻。

所謂“汇合”党派的同事們，每当一些这类的問題应当在議會中处理和解决的时候，你們不肯斗争，这是你們自己对这个政策的貢獻。在关于南部的問題上，共和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批評政府政策的总趋势，并且要求对这些政策作大幅度的改变。但是，临到要决定的时候，他們收回他們的批評意見，最后就同意天主教民主党所建議的路綫，天主教民主党还拒絕了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所有建議。关于綠色計劃，也是这样的情况：共和党人和社会

民主党人，在批評了这个計劃的实质之后，現在甚至在接受自由党人所取得的对大地主有利的新的修正案。

一个对建筑用地征税的法律快要在議會中进行辯論。还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說清楚，以免发生誤会吧。原草案的意图在現在的条文中已化为烏有，而原先草案的目的是要对拿建筑地块做投机买卖作斗争的。現在剩下的只不过是會計性质的无伤大雅的法律，它实际上把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拋棄社会民主党人原先提出的一切建議，因此，为建筑用地的投机买卖大开方便之門，这个投机买卖是教权势力的經濟政策的支柱之一。

在同样的形势下，国内社会緊張局势加剧是不足为奇的。这个緊張局势在工业和农业中都表現出来了。而正是这个緊張局势表现为工农群众的强有力的統一的斗争，是采取民主革新的有效行动的主要希望所在。

今年头三个月，据統計研究所的正式材料，发生了九百五十二起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八十五万四千人，損失六十三万三千个工时。这些几乎是近年来最高的数字。这些只是談的头三个月。据工会发表的材料，到了七月底，图景变得更加可观。属于最重要的产业部門的数以十万計的工人参加了斗争：七十万建筑工人在 28 个省中，以地区或企业为单位举行了罢工；五十万五金厂工人，十一万棉紡厂工人，七万食品生产工人，七万五千合同工人，十一万铁路公路运输工人，十万商业企业的雇員，和十八万化学工人，也都举行了罢工。因此，在过去六个月中，二百六十二万一千名工人参加了斗争，一共損失七百零六万个工作日。

工人們在这些斗争中所表現出来的斗争性和团结一致一直是，而且現在仍然是很高的。但是，它所碰到的是雇主們的绝对不妥协的态度。雇主們屡次甚至拒絕开始談判关于按照調节雇主和雇員关系的基本原則办事的問題。正是为了这个緣故，意大利水

泥公司的雇員不得不斗争了四十天才取得同样公司的雇員已經赢得的东西。蒙太卡蒂尼公司的資方反对撒丁矿工的自由和同等工資的要求。化学工人正要再次举行罢工，如此等等。国营工业工人也不例外；在布列达厂和安沙多厂所进行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和激烈的，因为这些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工厂經理，也采取了工业联合会所指示的雇主不妥协的态度。

除此之外，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还用警察部队对付工人。但是，对我们來說，最要紧的，也是我要在这里特別強調的，是这些斗争所引起的新问题的意义。这些问题在劳工部长总结关于劳工部預算的辯論的发言中模模糊糊地觉察到，他当时談到，在产量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資的增加之間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是整个劳工世界目前集中注意的问题。它刺激工人阶级采取行动，来干預工資和利潤的构成问题，办法是提出新的要求，即承认新的权利和新的劳資合同談判方式，以导向于消除这个差距，并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資的增加相适应，保证工人和他們的組織在雇主面前取得新的陣地。

这些要求碰到工业联合会的頑固的反对，这个联合会有它自己的劳資協議政策，而根据这个政策，工資問題必須是同政府取得協議后，由上而下决定的，提出应給多少錢。

工业联合会同样拒絕接受把所有地区的工資拉平的原則，并且嘲笑那些談到需要消除北部和南部之間的不平衡的人。

在这方面，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劳工部长苏洛先生曾經一度建議举行一个工人組織、雇主組織和政府三方面的會議来討論統一工会和其他工会提出的新的工資問題。工业联合会主席拒絕时說的話是值得逐字引用的，因为这些話极其意味深长。工业联合会主席在談到他和苏洛先生的談話时說：“我們到他（苏洛先生）那里去，向他指出，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困难的問題，他最好不要去干

預这件事，以免碰釘子！”这些是工业联合会主席的原話。而苏洛先生的确不去干預这件事。他从我們国家指揮經濟和工資政策的人那里接到了命令！事实上，他在关于預算的辯論結束时的发言中，或多或少明白地同意了工业联合会主席关于工資問題的态度。这么一来，我們可以預料，社会和工会方面的緊張局势将要变得更加严重，在无数的劳資合同快期滿而要談判訂立新的合同时，也会緊張。工业家們所遵循的反劳工的和集团化的趋势，同天主教民主党領袖們的所有社会和經濟立場所固有的集团主义很容易便找到了会合点。

在农村，社会的緊張局势同样严重，斗争同样严肃、規模同样可观。农业短工、长工及其他种类的农业工人正在波河流域和其他地方进行斗争。他們正在提出的要求包括增加工資，承认資历和企业性組織，还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例如在投資决定方面的发言权，男女同工同酬，不再付給实物工資，等等。

特別重要的是分成佃农的偉大斗争，这个斗争，除了有改善他們的合同的当前目标之外，主要的斗争目标是取消分成租佃制度本身。这个受到所有仔細考虑过目前的农业状况的人的公开譴責的制度，却得到农业联合会和它的主席的强有力的支持。农业联合会主席将用工业联合会主席对苏洛先生說話时的那种口吻向范范尼先生說話，而范范尼先生有一次曾經說过，在土地上两人分成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向着取消分成租佃制度前进。范范尼先生要放棄他以前在这个問題上的主張是不难的。目前，数以十万計的分成佃农正参加一个席卷整个艾米利亚、托斯坎納、馬尔凱和其他仍然实行着这个耕作制度的地区的运动。这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如同在佛罗倫薩的情况那样，同时还有群众示威游行和工人階級的同情罢工。

在这方面，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也显然是反动的。它采取了反

对这个运动的立場，动員警察部队去恫吓分成佃农組織的領導人和分成佃农自己。参加斗争的分成佃农只是把分成的事推迟到談判开始以后，他們却受到以示威游行、扰乱治安和其他严重罪名被起訴的威胁。甚至已发生了这样的事：分成佃农协会积极分子被警察叫了去，并受到威胁說，如果他們不把正在全国进行的运动的領導人的名单交給警察，他們就要被起訴。

我之所以強調这一点是因为我們在这里面临一个基本問題。必須把分成租佃制度从我們国家消除掉。在农业會議的辯論中，大土地所有者在这个問題上始終是孤立的。但是，不幸的是甚至这个會議也很可能受到阻碍。它将在九月里結束它的工作，听說它很可能会規避这个問題。但是，如果要对解决目前的农业危机作出貢獻的話，那就必須处理和解决这个問題，而且群众自己必須以他們不屈不撓的斗争来强行解决这个問題。

因此，我們国家現在的經濟和政治領導机关甚至不同意去設想的那些結構改革的行动，必須在全国进行，即必須在工业、农业教育改革、維護自治等方面进行，在必須要求全部实施宪法原則的一切方面进行。

我們认为，民主力量应当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形成真正的新的抵抗运动。应当在这个基础上謀求和天主教界中要求采取政治和經濟革新行动的人們合作（在許多情况下已进行这种合作），因为在天主教民主党內部情况是那么糟，任何变革的願望似乎都是注定要悲惨地熄灭的。

我們向議會提出經濟結構改革和我国社会革新的基本要求，我們还将繼續向人民提出这些基本要求，让人民討論，并号召他們采取行动。改革应从大壟断組織的国有化开始，首先对目前特別重要的电气壟断組織和糖业壟断組織实行国有化。我們將坚持要求采取一个新的民主的經濟政策，这个政策必須不仅仅为下年度

預計合理的开支，它还必須清楚地表明要去达到的目标。像区域机构这样的民主机构，必須参与确定这些目标，这种机构最后必須在全意大利成立，同时必須在所有劳工力量的参与下来实现这些目标。

因此成立区域机构，对我们來說，成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沒有区域組織，就訂不出必要的发展經濟的区域計劃，而沒有这些計劃就不可能有社会和經濟发展的民主政策。

我們把这个行动和我们正在爭取和平的斗争联系起来。为此，我們向这届政府提出具体要求，首先是同正在圍繞着德国問題和柏林問題逐步成熟的危机有关的要求。

我們要求我国政府直截了当地保证力促就这个問題举行国际談判，謀求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以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我們要求采取公开的明确的立場，反对任何軍事上的或政治上的恫吓措施。至于柏林問題的基本点，我們要求政府不要忘記，我們沒有对这个城市承担任何义务：我們的国家和它无关。让西方去要求对柏林的一切必要保证吧！（反正已經答应并已給予这种保证。）但是，让我们取消这种政策，即拒絕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問題的核心，因为这种政策成为刺激和恶化国际局势的經常因素。

至于德国的統一，只要德国不是一个解除武装的，非軍事化的国家，我相信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都不需要实现这样的統一。

因此，爭取和平的斗争，也就是我們为維護工人利益、为爭取宪法所規定的我国經濟結構的必不可少的改革、为爭取南部的新生、为爭取充分实施宪法的斗争。这是今天所需要的。而且这个斗争必須針对着你們，針对着現政府，針对着天主教民主党，因为現政府在議會里和在全国实际上服从于天主教民主党。你們是阻止沿着抵抗运动所設想的、为意大利共和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真

正的障碍。

我們拒絕投信任票是起碼能够做到的。……(中座議論)为什么你們那么激动?

議長:(插話)我相信,在議會制度下,这是人們充其量能做的。

陶里亚蒂:(繼續发言)在議會內,这也許是充其量能够做的事,但是,在全国,斗争有其他方面。

議長:(插話)我相信我有責任申明,議會是反映全国意志的唯一机构。

陶里亚蒂:(繼續发言)这是題外話。至于社会党同志所开始的辯論和所建議的表決,我要着重地說,我們希望,这是政治局勢新发展的起点,它不但有助于愈来愈明显地暴露使目前的形勢变得那么困难的矛盾、不調和和錯誤,而且为开展一个广泛的、統一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作出新的貢獻,从而促进新的民主多数的形成和我們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革新。

(譯自 1961 年 7 月 13 日《團結報》)

和平倡議和意大利中立化

——在議會外交政策辯論中的發言

議長先生：

我十分相信，這個議會的全體成員或者至少是絕大多數的成員都对目前我們面臨的國際局勢的極端嚴重性無疑有所了解。這種局勢和直到去年年底還存在的那種局勢是根本不同的。那時候，國際關係也很緊張，而且由于像老撾的那種局部性的武裝衝突，或者由于美國對古巴的侵略、殖民主義對各族人民的自由的不斷威脅以及裁軍初步談判的失敗等等原因，國際關係是惡化了。

然而，儘管有這一切情況，那時候也還有某些途徑是敞開的，這就使得有可能希望總的局勢會得到改善、和平事業與緊張局勢的緩和會有所進展。但在另一方面，今天這些途徑看來都已在關閉或者更加傾向于要關閉起來。有些局部的問題已逐步地扭成一團，並且造成這樣一種複雜的局面，以致不訴諸于武力就不可能加以解決，那就是有意識地要走向世界性的武裝衝突。甚至有些人還鼓吹這種實力的較量，這表明他們缺乏任何人情和責任感。因而我們已經回到使用最激烈的冷戰詞句的道路上來了，不僅使爭論激化——就像我們某些同事在這次辯論中所表現的那樣——，而且還使用具體的威脅性的口氣，例如正式宣布要加緊採取軍事措施，而更糟的則是，恢復了核與原子武器試驗。

其實，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已不再是將來致命危險的威脅，而是目前涉及全人类的原子輻射的真正危害性。這種危害性在過去大約十年的期間內一直在折磨着人們，但是人們曾經希望這種危害

性会停止。今天这种希望已更加渺茫了，而且核試驗的恢复是对全世界人民的一个明确的警告：如果今天大国之間爆发了武装冲突，肯定是会使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这就是說，我們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現代文明会全部被彻底摧毁。在美国，通过旨在給予群众以强烈印象的論点和事实，公众輿論对于这一前景也已有所領会，这些事实中包括建筑了千千万万的防原子掩蔽所。

我不知道意大利的整个公众輿論是不是充分了解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我确实知道，毫無疑問，某些强大的势力正在尽力掩盖这种悲剧性的现实，用反共濫調来代替，从而削弱人們的警惕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坚持要求这场辯論应在全国議會中举行的理由。国际关系的局势本身和我們亲眼看到的那些正在发生的戏剧性的事件使得这场辯論显得特別重要。

我們确实知道，就像每个人都知道那样，我們的辯論从我們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也有特殊的重要性。意大利政治陣綫的某一部分曾表示：在这些日子里，要在議會里考驗一下現政府及其从总理、外交部长起的領導人和各个政府成員的所謂“对大西洋的忠誠”。

因此，这些人提到了現政府所采取的某些行动，諸如总理与外交部长对莫斯科的訪問，主張通过談判解决柏林和德国問題的立場，以及他們后来对那些曾經拖延并且現在还在拖延开始这项談判的人的批評，尽管这种批評是很溫和的。

就是这些和其他的行动（我不知道这些行动究竟是眞的还是說說而已）也已經受到大西洋联盟的极端忠誠派（魯宾納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剛才发完了言）的猛烈批評。政府已經受到具有以下內容的挑战：要么再一次和那些忠于大西洋同盟的国家采取同一立場，設法否认它以前的自主的立場，哪怕只是很胆小的自主；

否則政府在适当的时机就会得不到这样或那样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政府短期或长期得以維持下去所必不可缺少的。

对于辯論的这些方面，我們完全不是漠不关心的。我們沒有参加这个政府，而且我希望不会有人以为我們想参加这个政府。我們譴責这个政府活动的总政策及其具体細节。我們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并且和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而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則是今天意大利的客观情况所要求的。这就使我們有可能就目前辯論的問題发表意見，而不至于被怀疑为玩弄政治伎俩。我們所想到的只是意大利人民的利益、保卫我們的国家、文明与和平。

在评价这个政府和其成員的行动时，无論是过去、現在和将来我們都是从上述那些利益出发的，而且我們还要向这个政府提出确切的要求。这些要求是針對政府目前的立場和我們认为政府在不久的将来所应该采取的态度而提出的。特別要提到的是，如果国际关系更加緊張起来以至于会把我們帶到武装冲突的边緣，或者甚至使这种冲突成为不可避免时，意大利究竟应该持什么态度的問題。

在我看来，如果要有一項正确的方針的話，那末，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設法了解目前国际局勢之所以緊張的真正原因，不是偶然的原因而是根源之所在。尊敬的同事們，在我看来，这原因就在于目前的世界客观結構和所謂西方大国的政治傳統之間日益增长的和日益深刻、尖銳的矛盾，尤其是这种傳統从战后到近年来形成起来和发展起来了。这种矛盾到今天已經是这样尖銳，它不仅为緊張局势的加剧而且也为不可避免的破裂創造了条件，除非及时弥补来防止这种破裂。

几年来，我在这个議會的外交政策辯論中的发言一直都在指出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新进展，对于这些进展是必須加以考虑的，

要避免采取一种絕望的、反动的敌对态度。

我記得，有一次由于我坚持要对事物和世界所发生的客观变化作一种现实的估价，就曾有一个共和党的議員（我想大概是个共和党人）嘲笑了我一通。今天这些变化的范围之大已使得沒有人能够不加以承认了。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范围以外的各国，那就是說由共产党执政的各国，正在不断地加强和巩固；而另一方面，旧的殖民政权已不可能維持下去，新民族和新国家的大家庭建立起来，殖民主义崩潰以及所謂**新殖民主义**陷于危机状态。新殖民主义是大国不願完全放棄剝削和奴役他国人民利益而采取的手段。

尊敬的同事們，現在你們必須承认，从1947年到現在，西方国家的政策的主要目标一直是阻止共产党国家得到加强并且最終要使它們垮台。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是为了想要实现这目标，西方国家却采取过最荒唐、最狂妄的一些行为，这样做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在国际关系的整个范围都能觉察得到。战时的同盟破裂了，在那些同盟还仍然有效的时候協議就被違反了。所謂西方世界的团结是以軍事同盟为基础的。这个同盟的侵略性质是否认不了的，因为主張把它变成一个对所有欧洲国家都开放的有組織的安全体系的建議竟遭到了拒絕。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部，保守的和反动的势力都得到了鼓励和支持。人們用准备新的世界冲突的观点来看待大国間的关系問題。对待德国問題就是从这样的思想框框出发的，虽然曾不断地寻求这問題的解决，但却被一再推迟，所以战争結束虽已十六年而問題則仍然还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世界和殖民地 人民的不断进步

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目的。盎格魯撒克逊的原子壟斷

已一去不复返了。共产党国家很可能已占优势，至少在某些部門是如此，而这些部門是軍事效率方面的关键性部門。在战争結束时西方国家的經濟优势是相当显著的，但这种优势已被竞赛所代替，而在这項竞赛中，共产党执政的各国至少在生产发展的速度方面已經战胜了一个回合。共产党执政的各国，特别是苏联已在科学进展的某些部門被证明是高人一筹的，例如对外层空間的征服以及，一般說来，教育制度也是較优越的。

最近，沒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进展将会停止或会放慢。恰恰相反，看来这种进展一定会繼續下去，进展还会扩大，而在某些部門則还会加速进行，比以前更稳步地前进。

面对这些现实，大西洋政策和冷战的老公式和老方案，以及“遏制”、“推回”、“战争边缘”等理論还有什么意义呢？和这种态度相适应的虛伪的解决办法、推迟、拖延和挑衅也同样还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殖民地世界方面，我也可以作类似的补充。西方世界不仅仍然还在进行血腥的、可耻的战争以镇压那些正在为他們的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解放运动，如在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西方世界不仅对自由的人民，如古巴人民采取暴力和侵略行动，而且它們到現在还不能够理解和承认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說，和那些渴望获得独立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必須基于相互尊重和自由。剛果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在剛果，联合国的秘书长成了西方政策的牺牲品，他被杀害卢蒙巴的劊子手們謀害了。昨天我們还在这个議會厅里伤感地悼念他。最近巴西总統事件以及好些其他严重的事态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們必須得出这样一个結論：那就是，西方国家所有的傳統政策，大西洋政策与冷战政策都必須加以根本改变，要考虑现实，并避免那些否則会是不可避免的灾难。

在冷战气氛中用来解决各项重大国际问题的办法已经不再有效了，不顶用了。如果还要不惜代价并无理地去为这些办法辩护，那末就必然会发生破裂，而破裂在今天就可能意味着武装冲突。如果今天真的爆发了武装冲突，它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原子和核战争。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路的话，我们所有国家和全人类所面临的前景就只能是这样。

尽管公众舆论还不能够充分估计到我们怎样会走向这样一种前景，可是它对恢复原子试验却是忧虑重重的，而这就是前景的一部分。

我们也颇有同感。我们对于恢复核试验表示强烈的遗憾。这次恢复试验是由于到不久前还有效的暂停试验协议的终止和本来应该把该协议变成一项永久性的禁令的会议遭到故意的破坏所造成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所发动的抗议“苏联显示毁灭力量的威胁”（就像共和党领导人最近的一项决议中所说的那样）的宣传时，我们就公开地回答道：你们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权利来进行这种宣传并提出这种抗议，因为多年来，当美国进行了更加有威胁性的显示毁灭力量的行为时，你们在全世界面前却连一声也不吭！当美国最大的画报的封面上发表了一幅莫斯科及其七百万居民被美国炸弹毁灭的恐怖的图画时，你们也保持缄默。对于你们来说，似乎吓唬一下共产党人，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武力来教训他们一顿等等都是合法的行为。这就是你们的内政部长最近所主张的。可是，那时候你们却没有抗议。你们为意大利政府挑选了一位部长，他竟敢于说他才不在乎死于原子弹，也不在乎他的一家人，他的女儿死在原子弹之下，因为他知道为了防止出现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些武器是非用不可的。你们在道义上已没有资格抗议了。当美国拒绝禁止一切原子试验——甚至那些他们还在准备中的试验——并且实际上使已经就这问题进行了三年辩论的

會議非失敗不可的時候，你們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對於法國進行的試驗，你們也沒有提過抗議，而我們知道這項試驗很可能是在大西洋盟國同意之下進行的。

美國採取的軍事措施

這個明顯的例子說明，沒有考慮到像蘇聯這樣一個國家的力量和威信就會導致非常致命的後果，而這種後果又必定會影響全人類。

如果你想要知道事情的全貌，那就讓我們來看看美國政府在蘇聯建議召開討論解決柏林地位問題和簽訂對德和約的會議之後官方所宣布和所執行的軍事組織措施吧！撥了好幾百億美元作為軍用。我掌握的材料很可能不夠完整，但就已經很驚人了。從美國總統的第一次演說算起。在這演說中，他宣布美國將要重新整頓和加強它的整個軍事組織；他還宣布要建立一支用來發展在外國的內戰和叛亂的部隊。我們再來看看肯尼迪在1961年3月28日發表的演說，他在演說中要求為國防費用增撥十九億五千萬美元。5月9日，宣布又多撥款五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來建造轟炸機；5月15日，批准了一個法案，讓政府掌握總數為一百二十五億美元的款項用以購買重型軍事裝備。7月25日，又進一步提出要求撥款三十二億四千七百萬美元，等等。當美國政府如此囂張地採取這些措施並宣布動員幾個新的師團到歐洲去的時候，波恩德國的軍事和政治當局也在發展並加緊他們要為德國軍隊獲得原子和核武器的活動。

因此，作為對僅僅是一項建議的答复，就在全世界面前出現和擺出一幅武裝衝突的前景，而這項建議是為了解決一個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的問題的。誰也不能認為，像蘇聯這樣一個多年來一

直受到不分清紅皂白的可耻攻击的国家会忽視这些事实，尽管这个国家所必須作出的决定令人吃惊，而我們也知道，对于全人类來說，这些决定是多么困难、沉重和严肃。

今天，武装冲突的前景不再有軍事胜利和光荣的那种虛构的吸引力了。今天，任何一方面都得不到什么胜利和光荣。

原子战争毁灭意大利

尊敬的同事們，有些人在談論现阶段使用原子和核武器的世界性冲突时漫不經心地断言——就像戴高乐总统最近所說的那样——在这样一种战争結束时，这个或那个政治制度都只会遭到更大的損失，从而使与之对立的制度得胜。我不是持有这类意見的一分子。我也不这样考虑問題。我所关心的，也是我們大家所必須关心的乃是意大利。我們的国家面积很有限，半島的这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只有两三百公里寬。人口和城市都很稠密，几乎沒有躲身之处，整个国家完全都暴露在原子火焰的毁灭性災禍下。我們要保存我們的国家和我們的文明；我們自己的前途、我們党的前途和我們謀求劳动人民的經濟、政治和社会解放也都与此相联系。

肯尼迪的言詞和拒絕談判

肯尼迪总统最近用了很美丽的詞句描繪了一个和平的前景，他把这个叫做和平竞赛。这些詞句在文字上的完美无疵受到了贊揚。对于这方面，我不能給什么評語，但是究竟有哪項政策和美国总统的这些要求和平竞赛、緩和緊張局势等詞句相适应呢？而和平竞赛、緩和緊張局势正是我們所希望的，而且也是人类的先进分子多年来所一直在爭取的。除非把冷战所激化的一切問題、把涉

及欧洲、亚洲、非洲和整个世界的结构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都予以解决，要在今天打开和平与缓和局势的前景是不可能的。应当用新的方法来对待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以便找到新的合理的、正确的解决方案。

只要世界上还继续分裂为两个储备着各种武器的军事集团，怎么能够谈得上缓和紧张局势，又怎么能谈得上持久和平呢？让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进行新的会谈和讨论以实现普遍的和有监督的裁军，但是我们不该忘记，由于西方国家总是只带着为争论而争论的意图来参加会议，所以这些会议到现在为止都失败了。

我们的同事，尊敬的李嘉多·隆巴迪昨天有力地回顾了一个荒谬的插曲：西方提出了一项建议，但后来由于苏联接受了这个建议却又把这建议说成是不合理的而加以放弃。由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首先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裁军会议就在最近举行了。在这个会议上，西方国家有意识地使辩论在一个模棱两可的范围内进行，那就是说，不是要求对裁军进行监督，而是裁军之前就进行监督，而这是苏联不会也不能接受的。

甚至在美国总统最近的一次演说中，有一点曾被所有报纸得意洋洋地捧为是非常突出的新东西。那是关于禁止原子与核试验。我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一家最有影响的报纸上读到这个建议的准确的全文。美国总统建议禁止在“大气层”的试验，那就是说，他只是重复了一项他知道不会被对方接受的建议，因为对方不接受可以自由继续在大气层以外进行试验的主张。因此，这是一个实际上只隐藏着虚伪、含糊和圈套的建议。

缓和紧张局势与军事基地

在共产党执政的各国周围还有许多为了侵略目的而建立的美

国軍事基地时，怎么能够談得上緩和緊張局势呢？共产党国家不能够繼續接受使它們在国际上几乎处于“受特別管制”的局面。試問，有哪一个西方国家肯接受一种类似的局面？誰也不肯，更不要說美国了。美国借口在古巴島上据說有苏联基地，企图使它对古巴人民共和国^①的軍事侵略合法化。

当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基地都有发射原子和核武器的設備，我們又怎么能够实现緩和緊張局势并禁止原子和热核武器呢？

在这个問題上誰都能找到資料。讀一讀9月23日的《紐約时报》，你就会知道，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埃費尔高地，在雷諾以东地区，正在建造八个能够防原子彈和氫彈的地下(发射)装置，每个装置都能够发射四个射程为一千八百公里的“馬丁(执权杖者式)”火箭。苏联西部和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城市都在这个射程以內。除了这个之外，还在意大利設置了三十个射程为三千三百公里的“丘辟特”火箭，因此就能够打到苏联的首都。在英国則設置了六十到七十五个“雷神”火箭。这完全是一幅对苏联进行不折不扣的圍攻的图画，而这个国家，就我所知，并没有攻击任何人，它只是威胁过要裁軍和要召开會議以解决对德和約和給予柏林以新地位的問題而已。

我們了解公众輿論对于空气中日益增多的放射性而感到恐惧。我們认为，我国政府有責任采取有效的行动。我国政府必須用提若干建議来作出政治上的行动。它首先必須要求，美国总统所提出的只禁止大气层中的原子和核試驗的建議應該扩大到包括所有各种試驗在內。这将会为开始談判鋪平道路。不过我国政府还有責任要求取消所有美国在欧洲用以进行原子侵略的基地，而且首先應該取消在我們領土上的基地并應該为此而采取行动。这

^① 原文如此。——譯者

是一个使禁止原子和核試驗問題并按照全人类的願望来积极解决这个問題成为有可能的步驟,而且也許是唯一的步驟。

中国必須被联合国組織所接納

只要一个今天在人口上是,并且在几年內也会在其他方面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被排斥于各民族和各国的大会之外,人們怎么可以来談論緩和緊張局势并鼓吹进行和平竞赛呢?

我們从来沒有得到我国政府的滿意的解釋为什么它沒有参加要求积极地解决这个問題的行列,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會員并承认这个国家根据国际条約所拥有的一切权利。联合国大会成員之一現在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通过內战而产生的政府,因此它不能被接納入联合国組織。我現在要問,难道美国就从来沒有过內战嗎?我看美国就有过:它有过一次廢除奴隶制度——不过並沒有完全被取消——的內战,就像在中国也有过一次內战一样。中国的內战是为了摧毁封建的奴隶制、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并为一个新的、自由的制度打下基础。

拒絕接納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那个地区建立了它的新型的殖民地:由一个卑鄙的傀儡統治的台灣島;另外一个同一类型的傀儡則在美国枪杆子支持下在南越当权。美国不肯放棄这些贓物。它們知道,一旦中国和它的一切权利被联合国所承认,那么与这些殖民地的存在有关的一切問題,就会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并且照国际正义、公平与自由的新原則来求得解决,而不是按照那些想要用使一切人民屈从于他們的支配的方式来統治世界的人的意志办事了。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会是对在远东的美国統治体系的一

个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体系是必定要瓦解的，而且与其将来面临可能使世界上的那部分地区处在战争边缘上的暴力危机，远远还不如现在通过联合国的决定来给这个体系一个打击。

我們要求我国政府正式与美国殖民地台湾的所谓政府断絕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并在联合国大会即将举行的辯論中采取相应的立場。我們的要求是一項正式請求，我們要求政府对此問題表示态度。

試問，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还被否认，安哥拉的本地人民还在繼續被屠杀，还在威胁要对古巴共和国进行新侵略，我們怎么能够实现緩和緊張局势和和平竞赛呢？

每当人們談論到由目前国际局势所引起并且影响着全体人民和各国政府的重大問題和矛盾时，人們只是把工业先进国家的发展和在經濟上抬不起头来的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当作矛盾的所在。我們并不否认这个問題是存在的。不过，这只是今天世界結構的危机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这是一个或两个世紀来殖民政策的直接后果，也是今天还在繼續推行这项政策的做法本身的直接后果，虽然用的方法不同，但其結果同以往則几乎一样。

这种情况受到了貝尔格莱德會議大多数参加国明确的和强烈的譴責。我們一向支持这个會議的倡議和決議，因为我們认为这些倡議和決議对于确定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和平政策的基本方向有着真正的貢獻。这一政策的內容必須加以說明，不容有任何含糊和虛假，如果要用积极行动来避免一場災禍的話。

联合国組織的危机

联合国組織本身也受着这种国际关系的普遍危机的影响。多年来，它一直被机械的美国多数所支配和操纵，这种多数使联合国

組織的辯論和討論成为冷战的工具。今天，这种多数已不复存在了，但新的政策則尚未出現。面对着法国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罪行，联合国組織是无能为力的。它甚至拒絕討論对古巴的武装侵略。它通过了一項对剛果的新殖民主义政策，這項政策以失敗告終并不幸地、悲慘地酿成了罪行和流血事件。只有执行裁軍、緩和緊張局势和和平的政策，才能把联合国組織从这个日益加深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这样的和平政策必須从合理的立場出发，正視和解决目前世界各地存在的实际問題，考虑有关的各方面的利益，停止和消除到現在为止所曾有过的备战活动、作为权宜之計的冷战挑衅、瘋狂的軍备竞赛和有意或无意地加速奔向新的世界性冲突深淵的做法。

所有这些只能意味着——今天必須公开說出来——逐步取消旧的大西洋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无非是冷战的最明显最露骨的形式。

这意味着寻求并建立各国和各族人民間在各个方面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是以相互信賴、对不同的国内制度的容忍、相互諒解和在一切方面进行合作为基础的。

这就是我們今天作为一个在資本主义世界进行活动并領導着广大群众的共产党为之而奋斗的目标，也是我們的运动所追求的目标。

为爭取和平而采取共同行动的基础

对于今天在国际舞台上所产生的一切問題，我們的行动应着眼于寻找并向大家指出那些合理的主張，使有关方面能够圍繞这些主張达成協議，使这些主張得到一切有时能够按照合理的原則办事的人們的支持，他們从和平的利益和捍卫我国的利益的必要

性出发，至少能够对形势的某些方面有足够的认识，尽管他们经过普遍的讨论后今天还不能充分体会到有必要采取一项新的政策。

今天，须要尽早解决的迫切问题之一，而且也是对世界舆论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柏林的新地位和德国的新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是战争遗留下来的最严重的问题。这本是一个早就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如果各个方面都尊重波茨坦协议的话。根据这个协议，德国必须解除武装，它的战争工业必须拆除，并且应该采取具体措施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这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西方国家抛弃了这些原则，用看来是荒谬的、吓唬人的手法，以那种像是希特勒在全面溃败前夕的迷梦来代替这些原则。这个迷梦是以一个重新武装了起来而且军国主义化了的德国作为主要支柱，在欧洲建立一个反对苏联和其他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军事同盟。

这个计划是冷战的轴心之一，而且是冷战的主要轴心。从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情况来看德国问题的解决，特别是使德国统一问题的解决，已成为不可能。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估价与李嘉多·隆巴迪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尽管我们还要对别人的意见补充几点意见。

德国统一和“自由选举”的问题

关于德国统一问题，你们的宣传，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宣传都把西方说成是一贯主张统一的，而共产党人却被说成是阻挠统一的。我们必须彻底地揭穿你们的宣传所散播的这种虚构的神话，因此我要尽可能地把问题讲清楚。真相则恰恰与你们所说的相反。关于德国的未来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统一它的领土和国家的問題，从1947年起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

第一條路綫是共产党人一貫所遵循的路綫。它的目的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統一的、单一的德国，并按照波茨坦原則使它不参加任何軍事集团。第二條路綫是西方国家所支持和实施的路綫。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軍国主义化的德国，把它包括在大西洋軍事同盟之內，其代价是破坏和葬送德国的統一。这就是事实的真相！所有其他的說法都只是一大堆无耻的謊言！

說什么共产党人和苏联方面拒絕以自由选举作为解决德国問題的方式，这也是一項卑鄙的捏造。这是不真实的！文件就在这里：

1947年德国各州首席部长在摩納哥举行的會議，有双方占領区的部长参加。共产党人曾提議討論統一問題并达成一項協議。然而西方占領区的部长們反对討論這個問題。

1950年12月，奧托·格罗提渥先生写信給阿登納先生，建議为建立一个全德国的制宪會議而开始談判。这个建議后来被修改了，并提出了选举原則。

1951年1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議院向西德議會提出新建議，主張开一次联合的制宪會議。

1951年9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議院通过了一項宣言，并将它交給了波恩的議會，要求召开一次全德国的代表會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此宣言做了十四点答复。共产党方面认为这十四点大部分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圍繞着监督选举的权力机关这一問題有了爭論。

1951年11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統皮克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議組織一个全德国的联合監察委員會来筹备选举，从而重新确立德国的主权，不受外国的干涉。

最后，到了1952年1月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委員會所提出的一項主張在全德国举行选举的法律草案被发表了。我

們总算在这里談到了自由选举問題！这个草案是根据1924年3月6日的老选举法拟出的，而威瑪議會就是根据这个选举法选出的。可見，这是一項民主的法律，甚至可以說，是具有“西方”性质的法律。

1952年3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于选举和德国統一問題发表了新的声明，并在声明中重申有必要在选举法的問題上訂立一項全体德国公民的公約。

可見，共产党方面多年来一貫坚持这些原則，建議應該举行选举，提出了选举法的草案，要求應該通过民主选举来解决德国統一和建立全德政府的問題。

可是所有这些建議都一个接連一个地被阿登納总理所拒絕。他的理由是：你們向我們提出的这些建議都是要阻止德国重新武装、阻止德国参加大西洋同盟，因而不能接受。

說这些建議都是为了这一目的，那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个目的和全体欧洲人民的利益都一致嘛！这个目的在波茨坦协定中得到了确立，而且今天仍然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我們的利益。

現在讓我們来談談最有兴趣的事件。在1954年2月4日的柏林會議上，苏联外交部长——当时是莫洛托夫同志——向其他国家的外长們提出了一項建立全德临时政府的提案。提案中的第一个項目就指出了，應該认为，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議會組成一个全德政府是一件紧迫的任务。第二个項目則确认，临时的全德政府应予以解决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备并举行全德国的自由选举。提案也指出，組織这项选举首先必須包括拟定选举法草案，并进行調查研究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自由选举和受德国的权力机构的监督。

西方和你們的宣傳，散播什么共产党方面由于害怕自由选举

而阻撓德国的統一，这簡直就是无耻的捏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結束了复仇主义

看一看西方国家用什么理由来拒絕这个非常合理的最后一項建議是很有趣的。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先生所提出的主張是最精確不过的了。他断言(我引用會議的記錄)：“苏联的建議是不能實現的，因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能廢除巴黎和波恩的协定”。那就是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今天对大西洋同盟和对把大西洋同盟轉变成欧洲防务集团承担了义务。这里有波恩与巴黎的协定！要往回走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是1954年发生的事。后来，有两种过程在进行。一方面，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軍国主义化的过程，建立了一个參謀总部，复活法西斯复仇主义和納粹运动；另一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土地問題的解决，容克家族大财产制度的廢除和工业壟断的消灭，使經濟得到发展和巩固，并且由于广泛地采取了上述措施，在經濟和社会方面开始取得了进步，尽管經過了某些困难。

的确，西方是在不断地大肆宣傳，指責有成千上万的公民从东德外移和逃亡出来。但問題在于：这种宣傳是以那些在过去看到过类似情况的老头子为对象的。我們記得很清楚，在1936到1938年間，希特勒德国也开展过关于苏台德区、奥地利和麦默尔城的类似的宣傳攻势。就在那个时候，在边界上也有过开火和逃亡的事件。这样做是为了想要通过这些事实来让全世界相信希特勒的要求是合法的。这种宣傳对于头脑清楚的人們來說已不会再起什么影响了。

安福索(新法西斯派的議員插話)問道：“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当局要圍繞西柏林筑一道牆呢？”

陶里亚蒂(繼續发言):我馬上回答你的問題,安福索先生,要了解为什么要筑这道牆的动机,像你所說的那樣,人們必須从以下这一真正的事实出发:那就是說,有一个国家是存在着的,它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們在辯論柏林地位問題时所提出的一切其他問題都是沒有任何根据的,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什么对柏林的自由的威胁,因为大家都郑重地宣布要尊重西柏林居民的一切自由,并且还提供过軍事的和国际性的保证。

对于通向柏林的通道也不存在什么威胁。人們都知道,通道的95%都已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控制了,而且誰也沒有威胁这剩下來的5%。在这方面,也反复提供过正式和严肃的保证。

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所反对的是拒絕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事实。如果不是这样的話,那么誰也不会对于在8月13日建立了一道众所周知的牆而感到惊奇了。这个步驟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让我再补充一句,我所不懂的是为什么早沒有采取这个步驟。一个国家不能沒有边界,但也不能有一条让黑市买卖、投机倒把和挑衅行为能够有空子可钻的边界。沒有任何国家会容忍类似的情况!况且,西方国家自己对这措施的反应也只是进行了口头上的抗議,这就表明,他們也知道这些措施是环境逼出来的。阿登納总理和柏林的市长当时还叫囂要采取特別的經濟制裁,如取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間現有的貿易协定。其实,这两个国家虽然在国际政治的重大場合互相装着看不見对方,它們在几个月以前实际上却訂立了一个正常的貿易协定。現在取消这个协定恐怕会使通向柏林的通道在事实上和在权利方面中断,因为柏林的通道是該协定規定的。我之所以引用这个插曲是因为它点出了西方的立場是多么荒謬。西方官方拒絕承认,可是事实上却又被迫承认,因为它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想群众輿論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問題，那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要恰恰在这个时候来提出柏林地位問題和解决德国問題呢？有时候我們还听到有人問过，現在究竟有沒有真正的必要来提出一个看来就很难于解决的問題呢？

首先必須看到，这个問題并不是現在才提出来的，而是提出来好多年了。不过，今天为了最終求得一項解决办法，对这問題加了一把勁儿罢了。此外，联邦共和国的事态，軍国主义、复仇主义和納粹組織的蔓延已經走得够远了，如果让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那将会呈現出很严重的前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共产党方面沒有把这問題这样尖銳地提出来，联邦共和国就很有可能用其他方式来提出这个問題：它可能不建議談判，而是会采用更加危險的方法了。

阿登納总理甚至不能控制他自己所讲的話，他在一个选民的集会上不自觉地暴露了他自己，說什么他期望在东柏林和在民主共和国发生暴乱。也許这是由于他的年紀太大了吧！我們知道从一个帝国主义統治者口中讲出这种話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也許它們已經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得这种暴乱会爆发起来，而且策划了罪恶的阴謀，进行这种或那种干涉并在联邦共和国建立一个流亡政府等等。它們根本不顾采取这种行动会有什么后果，而这就等于有意識地在欧洲的心臟燃起战争之火。

共产党方面以一項平靜的、公正的和經過深思的建議来反对这种策划，主張在有关德国的整个結構的广泛前景下，通过談判来解决这个問題，誰也不能否认，如果我們想要避免不断引起冲突的因素，欧洲中部的政治組織必須不再以两个对立集团的存在为基础，因为两个对立集团的存在促使彼此瘋狂地进行重整軍备的竞赛。人們任意談論德国的統一，这两个現存的国家應該像它們規定它們之間的貿易关系那样，共同協議找出一种最可取的走向統

一的办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就是我想在倫巴迪先生所談過的問題之外所要加以補充的一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改變那個國家的基本結構的工作中取得了些進展，廢除了封建大地主所有制和壟斷制度。這些進展是符合所有理解德國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真正根源所在的人們的利益的。這些人們知道，如果歐洲的中部和整個歐洲的事態進程必須加以改變的話，就必須把上述的根源予以消滅。要形成一個新的結構，這個結構是以部分或全部解除軍備的區域為基礎的，然而不能忘記，這個新結構提出了奉行不再是大西洋政策的舊政策而奉行歐洲各國普遍裁軍的政策的問題。

這裡就提出了我國政府的政策問題和我們向政府提出要求的問題。

我們要求我們的政府，特別是那些管外交政策的人，要認識到今天存在着涉及一切國際關係的危機；要認識到，如果要克服這個危機的話，西方各大國對它們迄今推行的政策進行深刻和帶根本性的改革，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完全知道，希望目前的政治集團來實現這種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就向輿論呼喚，向全國呼喚。新的外交政策路線在意大利占上風會是開始和平競賽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和平競賽則應該是一切政府和一切國家的目標。新的外交政策路線當然必須意味着，在國內政策方面，民主的和進步的新政策也占主導地位。這兩件事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誰應該對強行採取歧視政策來對待勞動人民的最先進的力量負責？誰應該對分裂勞動人民的團結負責？而這種團結本來是可以作為一種更加公正和更加自由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基礎的。強行採取這些政策的就是大西洋集團和冷戰的鼓吹者們。所以，今天在我們議會里的法西斯分子成了大西洋政策的最死硬的

辯护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当他們听到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是个曾經因为在列宁格勒圍城战中屠杀平民而被判过刑的战争罪犯时，他們竟欢呼了起来。

当你听到有人宣称保卫西方文明免受布尔什維克野蛮的摧殘是阿登納德国军队的任务时，你就会回忆过去。在这方面，就是这些話的本身和悲剧性的过去也有着惊人的而且是意味深长的相似之处，而我們是永远不願回到这种悲剧性的过去的，不过我們記得过去，并且永远也忘不了它。

經过了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德国种族主义，反对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德国軍国主义的殊死斗争，我們才有了这个共和国，才有了民主。任何把为德国軍国主义辯护作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政策都是和我們制度的精神、我們人民的思想、我們共和国的有生命力的傳統背道而馳的，而这些傳統在我們人民的思想意識中是根深蒂固的。那是一种鼓励或容忍德国軍国主义的复活的政策，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旧的意識形态、骨干和它通过对共产党执政的各国的侵略来实现統治世界的罪恶迷梦的政策。

我认为，不仅对我們而且对全欧洲來說，在这方面觉醒起来和轉变过来的时候已經到来了。我希望其他新的政治力量——非共产党人、民主人士、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界——也認識到必須轉变过来，并且为此而行动起来。

革新我們的外交政策和經濟与社会政策，从而革新我們国家的結構，这些革新的联系是那样地紧密，就好像是三位一体似的。我們7月底已向政府提出了有关不久的将来的确切要求。我要把这些要求通过电视讲话提出来。我們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諸点：

(1) 确认有可能通过談判解决柏林地位和德国問題；从而推动人們开始进行談判。

(2) 制定并提出合理的建議，使談判得到积极的結果，避免更为可怕的前景。

(3) 意大利不参与任何有可能使局势恶化的行动。

起先，主張談判的建議受到了輿論的多数和西方宣傳的反对。但意大利的总理和外交部长却认为这种建議是公正的，这是政府首脑訪問莫斯科的行动中的积极方面。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們当时不能不同意，而且现在还表示我們是贊成的。但是什么叫談判呢？必須承认，以前所有关于德国問題的談判从来都沒有具备真正談判的性质，因为西方在每次談判时都注意对他們的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建議作点补充，致使整个建議成为不可接受。談判并不意味着用一个观点去反对另一个观点，只是一味重申自己的观点，使談判破裂，然后走开。它意味着通过相互接近和合理的相互让步来寻找一条出路，而又不危害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

我們現在发现，在这方面我国政府不主动，而这种主动性應該是訪問莫斯科的行動的直接后果。我們要求政府應該有这种主动性。有人会回答我們，意大利不参与解决柏林問題和德国問題。但是我們仍然坚持我們的上述要求，因为我們不能忽視这个問題的比較带普遍性的方面，即保卫和平、防止一場武装冲突的灾难。你們回答說，談判不应由我們来搞。但我們坚持要求意大利不应参与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特別是不参与采取可能导致武装冲突的恫吓措施。我們正式要求我国决不参加任何这一类的措施，而且應該把这种立場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

不要去談論什么我們應該用威胁来保卫自由，更不必談到什么我們應該和旧的德国將軍們与德国軍国主义的新斗士們来并肩保卫自由。当你們在談論大西洋集团中的自由时，你們对你們自己所讲过的話也是不会相信的。自由同戴高乐的政权一点关系也沒有，同攻击了古巴共和国的美国也同样沒有关系。自由同今天

指揮德國軍隊的納粹將軍們也毫無關係，而這些將軍們則在準備要為他們罪有應得的失敗復仇。自由同那些法西斯納粹和軍國主義組織也是沾不上邊的，這些組織正在阿登納總理的部長們面前提出修改（德國）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蘇聯的邊界綫的要求，甚至提出修改我國在阿耳土—阿迪杰的邊界綫，而這些要求又得到了那些部長們的支持。

意大利決不能在支持這些反動勢力方面承擔任何義務；也決不能對可能使我們國家陷入災禍的問題上承擔義務。

我要強調指出，不承擔義務並不意味着只是拒絕採取威脅性或其他性質的軍事措施而已；根據我們的要求來看，不承擔義務意味着發展一項正式的聲明，表示意大利在有關德國和柏林的問題上，決不允許讓它的領土被用來進行軍事行動或進行威脅。不幸的是，正如我已指出過的，在我們的領土上還有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射導彈的美國基地。允許設立這些基地的協定是對我國的犯罪行為，也是件罪惡的蠢事。我們必須在還有可能實現的時候為取消這項協定而鬥爭，或者我們至少必須要求由我們自己的人員來管理這些基地，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美國或德國將軍們用這些基地來進行針對社會主義世界的侵略計劃。

我們所有的建議都只有一個目的：保衛我們的國家、保衛和平、在國際關係上開始一個走向和平共處的新的發展階段。

你們作為一個天主教政黨，應該現在就有在這條道路上，沿着這個方向邁開幾步的勇氣。你們應該有勇氣把你們自己從附屬於大西洋集團的舊枷鎖下解放出來，使意大利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據有對和平起作用的新地位。你們應該有勇氣與侵略者和殖民地人民的壓迫者和屠殺者斷絕一切聯繫，使我們國家得到億萬人民的同情。所有你們這些在這個議會中把自己稱為民主人士的人們都應該有這個勇氣。你們應該有勇氣讓他們（陶里亞蒂用他的手指

着最右方)、让法西斯分子們在希特勒的將軍們領導之下举起軍事集团和战争的旗帜！你們應該有勇气把你們自己同我們的抵抗与解放运动的最好的傳統——和平与和平主义的傳統——相联系起来，并使这种傳統发揚光大。

我不知道你們中間有誰会有勇气沿着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前进。但我向你們保证，我們有毅力、热情和能力来进行必要的斗争，使得我們外交政策的这种革新成为革新我国全部生活的綱領的組成部分，工人階級、劳动人民和民主的最先进的力量則正在为这个綱領而奋斗。

(譯自 1961 年 9 月 28 日《團結報》)

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话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们！

我能够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全党、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和我国的所有进步力量，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转达兄弟般的衷心敬意和祝贺大会成功的最真诚的愿望，这使我感到高兴和激动。

同志们！我们同你们最近一次的会面是在两年前，在你们党举行第二十一非常代表大会期间。对我国来说，这两年是尖锐的經濟性的、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冲突的年代，是工人阶级进行广泛的和严酷的斗争的年代，是我们党进行紧张的和富有成果的工作的年代。

在这些岁月里，经济情况是良好的。工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增长，这种增长现在还在继续，并大大改变了我国旧的结构和古老的传统面貌。发生了居民从农业地区向工业中心大批迁移的现象。青年和妇女的许多新阶层头一次被吸收到生产中去。造成工业生产这种增长的部份原因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新原料的利用，也就是生产力相当发展的结果。但这种增长同时也是依靠劳动强度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断增强，依靠工人生活条件的相对恶化而实现的。大垄断资本令人难于置信地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它已在国家的帮助之下变成了我国整个经济生活的真正的全权的主人，它控制着经济生活，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指导经济生活。

因此，除了极少数的問題之外，有利的经济情况并没有能够解决同劳动群众的福利和社会进步最直接有关的问题，同时，却产生

了使階級对立和社会对立特別尖銳化的新的問題和新的矛盾。虽然已有两百万意大利劳动者迁移到外国,但是,失业現象仍然帶有大規模的性质。

同資本家利潤的巨額增长比較,工人的工資增加得很少,同时,八小时工作日原則实际上已不再遵守了。农业正經受着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使小农和中农受到的損失特別惨重。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同落后的南部地区之間的对立加剧了。在其他区域,出現了新的經濟蕭条和衰退的地区。大壟断組織的压迫和肆意橫行引起了劳动居民各階层的反抗和回击。这就为經濟政治、社会的尖銳矛盾創造了条件,而且开始造成深刻的政治危机。

在这些条件下,我們面前发生了和正在不断发生着新的問題。由于我国結構的变化和我們的敌人的活动,劳动群众爭取自己的福利和爭取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斗争的傳統問題常常采取新的形式。

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他的詳細和丰富的报告中,曾几次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对于你們的党的重要历史意义。这些決議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对于我們的党,也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我們完全贊同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領導的批評,因为它蹂躪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恢复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国际无产階級团結一致的原則。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时,我們曾經指出,在这个党内籠罩着不能容許的内部制度,我們还曾公开談到这一点。

对个人迷信的坚决批判,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在不同国家爭取社会主义斗争形式等問題方面所宣布的新的理論观点,有助于对教条主义积垢和机会主义惰性給予决定性的打击,帮助我們认真钻研和更好地理解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基础,为我們党的革新和加强的过程开辟了途徑,这一过程

使我們能扩大和加强同工农业劳动居民群众的联系。所有这些造成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的团结。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用强大的斗争的高潮来回答大工业垄断组织的进攻。1960年罢工持续时间达二千九百万工作日，而1961年从1月到9月就已经达到了四千九百万工作日。工会斗争的发展总的说来获得了好的结果。比如，争取男女同等劳动报酬的斗争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种日益增长的群众战斗力表现出来了，而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中。

1960年夏季，当公开的反动政派企图通过政变来限制和消灭民主和议会自由，企图建立极右的独裁制度时，正是由于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干预，特别是由于青年工人和学生的积极干预，才击败了这些计划。在全国进行强大的战斗性的街头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并有伤亡。强大的统一运动堵住了反动势力的道路。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还有一部分天主教组织的积极分子。

我想，没有必要说，在这里，如同在其他一切不同目标的群众斗争场合一样，我们党无比重视团结人民力量和民主力量，并尽一切努力来达到这种团结，使它扩大和持久。

目前在我国进行的争取和平和裁军的一大部分斗争，其特点正是规模大和团结一致。我们党懂得，在这方面，今天它面临着特别严重而刻不容缓的任务，因而它加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活动。仅在最近两个月，我们就直接组织了四千七百余次群众大会和二千七百八十次群众争取和平的示威。我们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参加了在贝鲁加、都灵、马札波托举行的大规模和平进军和示威，有一万、五万和十万公民分别参加了这些示威。

其他地方也在准备这种示威。我们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反法

西斯的斗争以及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有助于我们更广泛地动员群众，使他们的斗争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意大利人民在反对侵占我国的希特勒军队的流血斗争中夺回了自己的自由。意大利人民永远不会同意为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而被推入新的、疯狂的战争冒险中去。

我想，我可以大胆地说，与国际形势发展的进程相关联，争取和平的广泛群众性运动的发展，是造成当前意大利政府集团，特别是造成天主教界陷于大混乱的原因之一。我们集中火力反对旧冷战政策的拥护者。我们的目的是要孤立和击败战争势力。同时我们表明我们理解和赞同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通过合理谈判解决当前最尖锐的问题、消除冷战和建立各国与各族人民之间和平共处制度的每一个步骤。

同志们！经常研究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发展和应当在我国发展的那些特殊条件，是我们党的特征。这使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组织的群众性和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具体活动的的能力，使我们能在群众中不仅进行宣传工作，而且能经常进行具体的政治活动。正是这种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斗能力使我们与各国工人运动，特别是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向意大利人民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全人类的未来，社会主义将对一切使我们祖国不安的问题作出正确的解决。我们的党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芒的照耀下、在它的火焰的温暖下、遵循着伟大的列宁的号召和教导而诞生的。这一号召和这些教导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形成和这个阵营的不断加强，这同时也是我们的成就和成绩，这些正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和成绩。

今天你们给自己提出新的伟大任务——通过建立使向共产主

义过渡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的途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是我们的整个运动新的、坚决的前进,和质量上的跃进。这种跃进将成为这一运动今后整个发展的决定因素。

你们正在审查并且将要通过的新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文件。马克思主义,这不只是纯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是理论和行动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你们的新纲领的历史重要意义正是在于:在纲领中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实际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展开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争取改造一切社会关系、同时也改造人的意识这一实际斗争的最终目的。

这样,共产主义就不再仅仅是遥远的理想或幻想了,而成了我们时代里的活生生的现实。你们的新纲领在为工人群众和人民群众了解以后,将使他们深深地激动,并使他们深信,共产党人提出的解决他们一切生存问题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保证着把人从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事业的胜利。

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和幸福——这正是全体劳动人类向往的目的。从《共产党宣言》开始,一直到你们的新纲领,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善于给各国人民指出了达到这些目的的道路的。但是,在你们的新纲领中,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将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新社会的具体特点,而从1917年10月以来的现代史的全部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你们在自己面前提出的目的将会实现。这就是说,不仅这一代的苏联人,而且全世界这一代的工人和劳动者都可以确信,新的光明的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你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过去和现在对实现人类美好愿望而作出的有决定意义的贡献,我们向你们,向苏联的同志们和人民表示感谢。请你们相信,工人阶级所有的先进队伍、所有的进步力量、一切爱好自由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将永远同你们保持生动的

和有效的团結。

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团結
万岁!

各国人民在反对战争挑撥者、爭取普遍裁軍和爭取和平的斗
爭中的合作万岁!

苏联共产党——人民建立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的引导者——万
岁!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譯自 1961 年 10 月 21 日《团結报》)

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間对記者的談話

在代表大会走廊中，在一个大厅里（在那里喝的咖啡同在意大利的酒吧間里喝的咖啡差不多），我們和意大利代表團的其他同志們一道，碰見了陶里亚蒂同志。我們立即告訴他意大利報紙是怎样报道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的，接着，我們問他，他对这些工作的总的判断是什么。

他回答說：我觉得，要对这次代表大会作总的判断，似乎为时过早，我认为，代表大会的工作至少还将繼續八天。無論如何，我們在作判断中，不能让資產階級和反动派的報紙牽着我們走。这些報紙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它們想以杜撰和捏造的方法，来向輿論隱藏或报道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党的偉大大会的工作和決議，而这个党过去和現在始終是遵循着偉大十月革命开辟的革命道路的。在代表大会正在辯論的全部問題中，这些報紙之所以挑选某一个問題来报道，是因为它們觉得這個問題最适宜于用来进行撒謊、歪曲和使人迷失方向的宣傳，因而圍繞這個問題大肆叫嚷。当心吧，別陷进这个陷阱啊！据它們說，首先，整个代表大会的工作似乎只限于宣布最近要爆炸原子彈，并将在最近几天內爆炸，其次，整个大会工作似乎只限于批評阿尔巴尼亚党的領導人，最后，整个大会工作似乎只限于譴責195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員會的那个集团所犯的錯誤。諸如此类的解釋，一个也不真实。其中有的解釋甚至是可笑的。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隱藏代表大会的真相。

問：那末，据你看来，构成代表大会辯論的实质的基本問題是什么呢？

答：我已經向你們說了，在會議工作結束後我們才將作會議的總結。然而，首先應該提到的是新綱領。就這個綱領的提出、它的理論論據、它的內容而言，它的确是國際工人和民主運動發展中的某種在質上的新東西。假如我們說，這個綱領的目的不僅在於改變蘇聯社會的基礎，而且也在於改變國際經濟、政治的整個關係、因而改變整個世界局勢的基礎，這肯定不是什麼誇張。而且，這個轉變是從要害上和基礎上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打擊。我清楚地知道，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小丑們打着自由的招牌，是不願意聽這些的。但是，我們將向人民談這些，人民是會了解的，而且已經在了解了。

問：眼前的政治問題是什麼呢？

答：首要的是和平共處政策，代表大會通過赫魯曉夫同志作的報告，已經對這個政策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其次是：在七年計劃的頭三年中，工業發展指標已達到和超過了，而且農業困難也正在得到克服，同時完全克服這些困難的客觀條件已有保證。最後，我認為，代表大會過去和現在確認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全部（我說是全部）決議，這特別對我們意大利共產黨人來說具有極大的意義，我們知道，這對於全世界工人和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對於我們，具有多么重大的決定性意義。

問：批評小“反黨集團”是屬於這方面的問題嗎？

答：毫無疑問，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的批評也屬於這方面，我們已經在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上以及公開地譴責他們變成了宗派的、專橫的、強暴的、遠遠離開黨和國家生活的任何民主概念的集團。至於對“反黨集團”的批評，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大家也應該集中注意這種政治意義。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時候，許多事情似乎是很难了解的，而今天則變得很明顯了。自從斯大林死後，這個集團代表着堅持斯大林所犯的不幸的、最嚴重的錯誤

的傾向，這些錯誤使他對真正的罪行負責。〔蘇共〕中央委員會意識到改變路線和使各方面開始進行根本革新的必要性，便逐步研究開辟新道路的方式，但是這個集團卻不願意了解這一點。每一個即使是非常需要的新措施，都遭到它的抨擊、拒絕和破壞。這是保守精神、沉重的教條主義的典型例子，是對局勢和新任務、以及對拒絕過去一切錯誤的必要性愚蠢地熟視無睹的典型例子，而假如共產主義運動願意迅速地向前邁進，它就必須善於擺脫這一切。蘇聯同志們在擺脫這個死沉沉的包袱的同時，他們前進了，在一切方面取得了新的輝煌成就。當然，我們的敵人是永遠也不會說這些的。這該由我們來談這些，使所有的人聽到這些和了解這些。

（譯自 1961 年 10 月 26 日《團結報》）

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

同志們，要把苏共二十二大的工作成就压缩在一个简短的报告里，是不容易的，要描绘这一工作的完全图景也是不容易的。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四千三百九十四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四百零五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九百七十一万六千名党员，比二十大时增加了二百五十万人，这就是说增加了原有党员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讨论是分两部分进行的。第一部分是讨论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就它五年来的活动和就新党纲草案所作的两个报告。第二部分是研究修改党章。可是，关于这最末一项的报告和发言也都涉及了许多一般政治问题，从而有助于使对党的活动的检查，使制定它当前的任务和长期的任务的工作更加完善。总的说来，讨论是充分、活跃和内容丰富的，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充满着毫无偏见的诚恳态度和伟大的政治战斗力，同时充满着充分的自信心，这一点在领导人的发言和周围的组织代表们的发言中都表现了出来。从这里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和劳动人民群众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在评判和谴责过去的错误和过失方面严厉，甚至是无情的，意识到自己任务的伟大，但是从上至下渗透着那种热情，那种顽强的工作意志，这是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须的。我认为，今天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其他那怕是勉强能同这幅图景相比拟的政治组织。

同斯大林逝世后举行的两次代表大会比较，二十二大有其自己的特色，这点必须立即予以阐明。在二十大，主要是进行批判性

的探討和肯定新的理論原理，確定一切方面的新的工作方針；這就是我們稱之為，而且實際上也是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一次轉折，以及蘇維埃社會發展中的一次深刻改變和質的進步的東西的實質。具有非常性質的二十一大的召開，是為了批准七年計劃，七年計劃在那時是討論和作決定的中心。可是，這個計劃的通過是同發現和譴責經濟建設方面的錯誤和缺點，並同批准旨在促進革新經濟和整個社會的措施連在一起的。在二十二大，這兩方面，即確定新的原則立場和制訂實際工作的準則和目標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代表大會上揭示的經濟不斷高漲的材料，不管它們是關於完成和超額完成七年計劃頭三年的指標的，還是關於將來的，都給人深刻印象，使人感到吃驚。可是，如果把代表大會的工作局限於這一點上，而忽視那政治鬥爭，忽視重新確認二十大的立場和在這種立場基礎上所製定的新的組織方法和工作方針，那將是嚴重錯誤。政治和經濟總是以同一步調行進的。沒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就不可能有美好的經濟和社會建設。

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二十二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今天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的情況是多麼混亂。這些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彼此公開對立，不能制訂出同冷戰和加緊進行軍備競賽的舊路線不同的國際政治路線。它們囤積武器並以武器相威脅，雖然它們知道，如果它們企圖用這些武器來侵略社會主義世界，它們就會被粉碎。因此它們的地位非常不穩，甚至沒有它們自己的前途，因為它們不能向各國人民建議採取保證和平共處和平的措施。那些儘管仍是謹小慎微地希望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們同極端分子集團之間的鬥爭越來越明顯了。但是到現在為止，在實際行動中發號施令硬行加緊擴充軍備，並阻撓開始為解決目前特別尖銳的對德和約、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全面裁軍以及停止原子試驗等問題所不可缺少的談判的，是後一集團。資本主義國家同

新独立的国家和仍受殖民奴役的人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困难了。美国想要使用武器来保住它在世界上任何部分的地位的意图非但没有打消，反而日益明显。在这种意图面前，在继续进行殖民战争面前，在残酷屠杀非洲全部居民的情况下，以实际上丧失独立为条件的经济援助的诺言是一文不值的。但是今天在新独立的国家和最老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使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人民群众中间的迷乱情绪。一方面，这些群众担心囤积毁灭性武器终于会导致使用它们，也就是说，导致原子灾难。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一个走向建立一个比当前社会自由、比它公正的社会的真正前景。

二十二大了解到这种局势，并根据这种局势作出了自己的决议，以便使各国之间的关系得以和缓，并向全世界提出它自己的前景，全心全意建设一个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会、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前景。今天科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文化人以及普通公民脑子里所想的关于今后数十年人类命运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明白而令人信服的答案。苏联再一次像过去一样在全人类前面带头，不仅在研究保证和平地走向进步的新目标的必要解决办法方面，而且在开始这一进展并逐步使它加快的工作和斗争中。代表大会的口号是：和平、工作、自由、各国人民之间平等和博爱，它们表达一切自由人的共同愿望。

苏共新纲领在性质上 和工人运动一切类似文件有所不同

我们也不应该对今天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我国猖狂进行的歪曲二十二大真相和公开撒谎的歇斯底里和卑鄙的运动感到惊异。这个事实甚至颇有教益，因为目的是明显的。在代表大会面前，在这种必然会引起苏维埃经济和社会朝着新的历史阶段——

共产主义——稳步前进和资本主义世界混乱情况之间的对比的决定面前，反对者企图达到的明显目的是阻止这种对比产生。因此才再一次打开反共的阴沟，希望这能有助于掩盖现实。但是这个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因为事实和真相最后总是要出现的，而且也因为我们能够让所有公民都知道它们。

代表大会的出发点和中心工作，是通过共产党新党纲，这个党纲规定过渡到经济和社会演进的新阶段——共产主义阶段。人人都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主要在于分配标准。在前者，分配的基础是劳动，在后者，则是人们的需要本身。在前者，是按劳分配，在后者是按生活需要分配。

然而这个实质区别确定以后，还有许多其它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和社会的性质以及实现这种社会所必须走的道路。

曾经有许多思想家在各种不同的时代提出过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自然资源和人力将得到合理的使用。但是，关于这种新社会的描写都是空想的，因为它们没有表明为了实现这种社会要使用什么方法，要走什么道路。因此它们没有超出纯属虚幻的、梦想的范围，它们有时是一种批评和抗议，这种批评和抗议采取把当时社会制度同一系列抽象的标准进行虚拟的对比的形式，其依据是道义原则和实现秩序、平等和人的合理发展的笼统愿望。只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几个社会主义空想家，特别是圣西门和他的学派，他们对工业发展的研究产生了更具体的思想，推动了通过萌芽性试验办法寻求新社会秩序的行动。但是，本质没有改变，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说：“社会的活动就得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实现解放所必需的历史的条件就得由他们玄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一步一步向前组织成为阶级的进程就将由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方案

实行組織社会的努力来代替。”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締造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避免陷入这种主观的臆想，从来不描繪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是什么情况。他們只表明建立这种社会的一般原則，而集中力量闡明在当时具有迫切性的那些目标，闡明夺取政权作为改变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的必要性。

但是，現在客观和主观条件都根本改变了，由于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政权已經被工人階級夺取了。在苏联，剝削階級再也不存在了。那里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按照它自己的規律发展的，而且已經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問題已經具体地提出来了，而且可以实现了。

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經討論过这个問題，在二十二大的辯論过程中，提起过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指出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是不符合这种过渡的，而且是不能保证过渡的。他們曾經談到“生产力的合理組織”，他們曾經說把工資和薪金增加一倍，普及高等教育等等就够了，今天这个問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因为它有了巩固的理論基础。不能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活水平低的平均主义的社会。生活水平应当很高。为了实现这种生活水平，就必须使生产力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而且它們的发展必須是不断的和逐步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則。这就意味着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須創造能保证向更高級的社会組織形式过渡的巩固物质技术的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存在，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苏联工人階級和各族人民打算在二十年內建立的正是这种基础，共产党新綱領指出了必須走的道路和为了达到最后目标必須实现的各种的局部性指标。因此，共产主义原則的理想的确立不是同目前的条件远远脫离和分开的。相反，它們同目前条件，同实际活动，同通过經濟政治和社会建設来改造社会的日常工作直接連系在一起的。

苏联共产党新綱領因此在性质上同工人运动的一切类似的綱領性文件不同。在这个綱領里面，理論和实践不只是联系在一起，而且是溶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也不仅仅是經濟和社会关系的科学和批判，也不是关于它們发展的預測了，它們是一种社会革新的现实，这种革新已經开始，并且今后肯定将有进一步发展。因此綱領包括一个具有广大前景的社会和經濟成就的具体計劃。它不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最实际的现实，这是有許多明显理由的。

首先，它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执政四十四年的党的綱領。如果說我們現在能够談論建設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因为四十四年以前工人阶级和团结在它周圍的劳动群众粉碎了旧的剝削和反动阶级的政权，夺取了政权，而且四十四年以来巩固地把这个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建立了新的国家，保卫它抵擋了各方面的进攻，并且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組織了整个国家的生活。这个二十年計劃的拟訂和实现，在目前情况下是十月革命的繼續。

第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組織苏維埃經濟和社会，不仅意味着苏联生产力和社会財富的发展是一貫的，不断的，而且其速度比資本主义的速度高的多。这还意味着，阶级之間的对立已經基本上消失了。工人的工作和农民的工作之間还存在着差别，但是，再也没有剝削者或社会寄生虫了。財富不再集中在个人手中，产量的增加几乎可以完全用来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了。我們必須強調这点，以便使人了解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增加社会財富是不够的。例如，美国也許是今天最富有的資本主义国家，但是它的財富不是来自在生产过程中剝削工人，就是来自在世界範圍內剝削各国人民。为了使生产和社会財富的不断增长創造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可能性，剝削阶级的消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最后，我們还必须加上一句，經濟計劃化也是这种过渡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条件。新綱領中所提出的二十年計劃是远景計劃，这个計劃必須逐步通过多少是短期的当前目标的計劃来实现。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只有通过計劃經濟的經驗才能拟訂出这个計劃。有如在資本主义經濟中，利潤产生利潤，剝削产生剝削一样，在計劃經濟中，“計劃”产生“計劃”，这就是說，必須根据已經达到的目的做出远大的預測，并根据自发的基本的經濟事实，日益穩妥地管理社会，因此，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它的发展的一定时刻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具有可以实现性质。

由二十大的轉折开始的新的 經濟方針的成就

在作了这些概括的說明以后，我认为也有必要強調指出，完成和超額完成七年計劃的头三年目标和完成及超額完成二十年計劃目标是互相結合的，形成一个整体。如果头一个計劃沒有实现，后一个計劃就不可能拟訂出来。

因此二十二大注意到了二十大以来，这就是說从1956年到1961年經濟建設的迅速进展。

在这五年中，国家在国民經济中投下了一千五百六十亿卢布，这就意味着比二十大以前苏維埃政权所有年代的投資还要多。这意味着使大約六千个新的国营工厂投入生产，又敷設了三万公里的新油管 and 煤气管，建立新城市：伏尔加河上的斯塔夫罗波尔、沃爾斯克、堅西尔坦、布拉次克等。

在同一时期，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3%，建筑业提高了60%，铁路運輸提高了56%。据估計，工业产量增加的全部数量的70%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的成本平均降低了11%，運輸业平均降低了22%。我还要补充一句，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像我们工厂中这样利用人为地缩短生产时间，并且加紧劳动强度来取得的，它主要是采用新机器、采取广泛措施和改组整个生产机构而取得的。

改组包括了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它加强了各加盟共和国在计划和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和責任，它发挥了党的地方机构的主动性，也发挥了基层经济组织和苏维埃的主动性。

对东部地区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这就为利用西伯利亚的巨大的新的动力资源——水电和煤炭动力资源开辟了道路；为利用哈萨克斯坦的新铁矿资源和烏兹别克斯坦等地的巨大的天然气资源开辟了道路。苏联经济的动力基础完全从煤炭轉到了天然气、石油及其副产品方面。

这种经济努力引起了苏联工业基础的质变和各个生产部門的技术的广泛现代化，从而带来了工业的新的巨大发展。

在重工业方面，引用几个数字就足以说明这种变化了：

生铁产量从 1955 年以来增加了 53%，达五千一百万吨。

鋼产量增加了 57%，达七千一百万吨。

石油产量增加了 134%，达一亿六千六百万吨。

煤气产量增加了 475%，达五百九十五亿立方米。

电力产量增加了 92%，达三千二百七十亿度（等于又建立了五十个新的第聶伯河上的列宁动力站）。

水泥产量增加了 124%，达五千一百万吨。

輕工业方面，特别是消费品方面，也有巨大的增长。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之间的几年中，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比过去快的多了：

家俱产量增加了 161%。

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产量增加了 57%（1961 年是六百万部，而 1955 年是四百万部）。

家用电气冰箱的产量增加了 3.8 倍。

皮鞋的产量增加了 63% (1961 年是四亿四千三百万双)。

毛織品增加了 41% (四亿五千二百万平方米)。

植物油的产量增加了 48%。

奶产品增加 245%。

在工业生产的各方面, 如果不以二十大的数字为基数, 而同二十一大所通过的七年计划的数字比较, 成果是同样值得注意的。

大家知道, 七年计划规定全部工业产量在七年内增加 80%, 这等于在过去二十年中实现的绝对增长数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七年计划规定工业产量在头三年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8.3%。但是, 事实上, 在这三年的增长速度约为 10%。因此就使计划的最后指标得到提高。

在七年计划结束时, 将生产七千二百到七千三百万吨生铁, 而不是计划规定的六千五百到七千万吨。钢将不是八千六百到九千一百万吨而是九千五百到九千七百万吨 (比目前的美国产量多五六百万吨)。电力、水泥、奶制品、纸张、家具、耐用品等也是同样情况。

三项目标: 甲、更合理地利用资源;

乙、改进规划; 丙、改善领导

在最近若干年, 苏联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已经比美国的速度快得多了。现在就许多最重要的产品 (钢、石油等) 的生产绝对增长数量来说苏联也正在超过美国。现在苏联的工业产量将近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这比意大利、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比利时、荷兰加在一起还要多。因此有二亿二千万居民的苏联的生产量比总人口达二亿八千万的这几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产量还要多。

在工业部門有哪些問題还部分地沒有得到解决而需要今后几年在实现建設共产主义基础的計劃中加以解决的呢？

二十二大主要提醒注意三个問題：甲、更合理地利用資源問題；乙、不断改进計劃化問題；丙、改进国民經济的領導方法和机构問題。为了最好地解决这些問題，就需要——大会在这一点上非常強調——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事实上这将在今后二十年中把工业总产量增加三倍的主要因素。但是，同时着重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要依靠热情、坚持性、勤勉，也不要依靠能力、知識、高度文化、先进技术和革新精神。这一切都是重要的，但是与这些因素同时必須有的是：

甲、一种計劃化，这种計劃化要严格遵守国民經济发展的比例关系，保证生产計劃和物质技术供应完全协调，并且保证建設計劃和撥款、物資及设备的供应完全协调；

乙、从經济上正确确定对每个工业部門的发展方向，在生产各方面实行严格的一个卢布一个卢布的經济核算和监督。

赫魯曉夫在这里指出，領導人的任务不能仅是“不惜代价执行計劃”，而是要以最經济的方式达到計劃的各个指标。

已經沿着二十大所指出的路綫采取了重要的措施来不断改进計劃：建立了經济区和“大經济区”，在它們内部实现了統一的領導（通过国民經济委员会和国民經济委员会下屬的委员会），在各企业中設立了儲备金和周轉物資基金，給地方机构以更大的責任和自治权等。

上述的某些措施已經明确規定为新党章的准則，不論是在加强地方机构的作用方面，还是在提高它們解决区、州、共和国所面临的政治經济問題的主动性和自治权方面，还是在区别和避免混淆党、苏維埃、工会以及合作社各自任务方面。（見新党章第四十二条）

住宅方面还有特別的問題。根据二十二大的材料，近几年住宅建設的进展是空前的。五年来建造的住宅比过去十五年还多。五千万人，那就是說，約为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得到了新住宅。在苏联每一千个居民中建造的房屋为美国和法国的两倍，为英国和意大利的两倍以上。尽管如此，住宅問題仍然是一个很尖銳的問題。这是由于过去的錯誤，部分是由于迅速的城市化过程（在七年計劃結束时，城市居民将比原先預料的多一千五百万人）并且部分也是由于在工厂和建筑工地的配合和领导方面的錯誤。

就农业而論，这是人們在二十大到二十二大期間着重注意的一个方面，也是这次代表大会談論最多的問題。为什么会这样，是容易理解的。农业部門是由于战争，由于过去的錯誤和领导的严重缺点而受損失最严重的部門。此外，目前正进行着大規模的从质量上改組的工作。这包括广泛改变作物、取消落后的旧輪耕制度，在农业劳动日益机械化方面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大規模使用化学肥料等，同时采用新的制度。

在二十大以后，农业方面的旧的工作方針完全革新了，随着农业的发展，集体农庄的农民和国营农場的工人得到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国家征购改为收购，收购价格提高了；农业机器和拖拉机归农民組織所有；耕作計劃完全交由地方作主了；开垦了大面积的生荒地。从1955年到1960年这五年，农业方面的投資几乎增加了一倍。

农业方面的新政策的結果是积极的，显著的。小麦的平均年产量比前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增加了42%；甜菜90%，亚麻87%，水果38%，葡萄56%。畜牧业增长的百分比很大，因此肉类消費量增加了73%，奶类消費量增加了102%。在最近几次會議上所指責的落后現象还没有在所有地区完全消除。但是已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克服缺点，并使整个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門的高速度发

展相适应。

在完成七年计划头三年的目标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使得有可能拟定二十年纲领性计划，并保证实现计划规定的指标。

很难用几个数字来说明这些成就。事实上，没有为所有部门确定明确的数字，但是有工作计划并强调某些质量目标，代表大会上集中讨论了这些目标。主要的总的目标是在今后十年中约把工业产量提高一倍半，从而超过美国目前的工业生产水平。在今后二十年中，将工业产量至少增加五倍。在这方面可以顺便举出下面几个指标：

——建造六百四十个新的水电和热电站以便在二十年中使发电量达到年产二万七千到三万亿度（目前美国的发电量是八千七百二十亿度）；

——在二十年内使钢的年产量达二亿五千万吨（目前美国的产量是九千一百万吨）；

——新设二千八百个五金机械工厂；

——把树胶和各种塑料的产量提高五十九倍，人造纤维和纺织品的产量提高十四倍，化学肥料的产量提高九倍，水泥产量提高四倍；

——建立一个统一的深水系统，把苏联欧洲部分的主要内河航路连结起来等等。

二十年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业的日益合理的布局。在二十年计划结束时，乌拉尔以东地区所生产的钢、石油、铁矿砂和煤炭将和今天整个苏联的产量一样多。至于电力、铝、天然气和机器制造业，仅这些地区的产量就将比苏联目前的产量多几倍。就质量指标而论，主要是结合寻求最妥当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逐步改变工业结构和各工业部门间的关系等）。在今后十年中，劳动生产率将再提高一倍，在二十年中，提高

三倍半。在二十年中，苏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超过美国目前水平一倍。同时，每小时产量——考虑到工作日的缩短——将大大超过目前美国的水平。

至于农业生产，二十年綱領的总指标是农业总产量增长二倍半，（在头十年內增加一倍半。）在这个总指标範圍內規定，谷物总产量增加一倍；肉类产量約增加三倍；奶类产量增加一倍。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联系的农业問題

在农业方面，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方面，提高的速度比工业中还要快。在十年中将至少提高一倍半，在二十年內将提高四、五倍。实际上，这将是进一步机械化、电气化、采用最先进的劳动組織方法，发展化学工业以及实行大規模的建立灌溉站計劃的結果。

与此同时，二十年綱領和代表大会的討論也注意到一系列其他問題：这些問題都同进一步扩大劳动場所的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着，同最大限度地发揚經濟领导方面的民主基础、改进国家对經濟的集中管理、以及集体农庄結構內部的現有关系密切联系着。

从二十年綱領和代表大会的討論所研究的問題和提出的要求中，下面的問題是值得注意的：經常謀求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費之間的正确关系；更好地規定集体农庄中的劳动定額的标准，以使这些标准达到国营农場的水平 and 标准形式；发展集体农庄之間的生产关系，以便經濟的社会主义化过程可以通过这些关系越出一个个集体农庄的範圍；以加强工人集体和職員集体以及工人大会和生产會議在农場管理和社会福利事业管理上的作用来发展国营农場中的民主，最后还有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場和地方工业企业之間的直接关系，以便在生产各个方面組織共同活动。

因此，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在于改进国民经济的计划和领导方法的更普遍的准则范围内考虑。让我们追述二十年纲领和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两个重要说法。第一，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范围内，以及地方工厂企业和地方机构的经济自治权和权利将不断扩大。来自基层单位即工厂企业的计划和建議将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第二，必须充分利用商业和货币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特有的新内容来建设共产主义。

然而，经济发展的指数，不足以保证通过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来完成社会的根本变革。注意力必须集中到人、人们的生活条件和他們之間在文明社会中的关系。在今天，同苏联工厂的劳动者或者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作过非表面的接触后，我們就会看到一种正在前进的新型的人道的特点了。宁静的心情，没有任何的恐惧，自信，对未来的信心，相互亲密的关系，工作中的热情和自觉，这些都是越来越显著的事情，而在过去，苏联各族人民不得不經受各种严峻的考驗和痛苦的时刻，这一切便不是經常有的事情。

二十年纲领计划着不断地改善物质生活条件：

提高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資，使之在未来十年中約提高一倍，并在二十年中提高两倍多（社会福利基金考虑在內）；

提高集体农庄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未来十年中提高一倍多，并在二十年內提高三倍多；

在二十年內彻底解决住宅問題（每家都有一套舒适的房間），并在后十年期間逐漸取消租金；

在二十年結束时，免費使用一切市鎮的交通工具和服务事业（水、煤气、取暖等）；

在未来十年中，将劳动日縮短为六小时，而且每周有一天休息；在那些不可能这样作的地方，工作周将縮短为三十四到三十六小时，每周休息两天（对健康有害的行业；实行五小时工作日，每周

三十小时)；

延长劳动者每年的假期(直到一整月)；

企业食堂中，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免费进餐(用午餐)
(在计划的后十年中)；

从最近几年开始取消对公民征收的任何捐税

总之，在二十年结束时，每个苏联劳动者的平均实际收入，将比今天的美国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高 75%。

这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这种跃进，是在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是多么困难的时候，是在新独立国家和仍然是殖民地的国家中人民境况非常悲惨和由于挨饿而濒于死亡的时候，提出并且付诸实施的，但是这仍不是一切，它也很可能不是主要的东西。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在 1917 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的水平是怎样的，并把它和同一年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相比较，我们必须记住多年的内战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然后再下结论。无疑，今天苏联劳动者的平均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意大利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甚至连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这一事实。可是，文化水平，社会主义觉悟水平，个人积极参加领导经济生活和集体生活的水平，不仅大大高于意大利，而且也高于一切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预料将取得惊人的进展。事实上，如果不是以不断增进科学知识和广泛地把这种知识传播给各种水平的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所有的公民将念完十年制学校、专业学校、技术学院、大学等等的数目将要倍增，将有更多的工程师、专门技术人员、农学家、医生和教师。此外，在科学方面，特别是在诸如宇宙航行等某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今天承认它们不仅

已被赶上并且已被超过。

旨在逐步减少国家职能的措施的革新意义

可是，我們对于公民生活，对于公民之間的关系，对于他們同国家的关系特别感到兴趣。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我們看到在傳統的民主自由和工会自由方面以及在日常生活方面，情况都在不断地大大退化。这是一个事实：在有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国家里，与此同时出現的是一种人們生活貧困化甚至是墮落的过程。这反过来又甚至反映在艺术方面。人們倾向于同自己的同类不相往来，因为他們被生产机器累得透不过气来，由于被生产活动搞得精疲力竭，在业余时间被人为地束縛于上面强加的利用业余时间的形式上，因而感到心煩和厌恶。此外，他們被剝夺了在集体生活組織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何可能。共产主义社会必須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以便使人們的生活更舒适更丰富；这种丰富主要表现在积极参加解决經濟和社会問題，表现在主动性和当人們在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机构不断的改善和进步的推动者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真正自由。在这种基础上，出現新的道德，这种新的道德消除自私自利，但它不是用无用的說教来消除的，而是通过把人变为多种多样的以平等和博爱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中心来消除的。

这就是二十二大为了逐步地减少国家的职能，把这种职能交給公民的自由团体而規定的措施的深刻意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使現有的一切群众組織活跃起来，从苏維埃到工厂委员会，从工会到社会救济組織，到青年組織、到妇女組織等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无疑地使苏維埃社会傳統的政治面貌发生改变。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今天已經不适合这个社会了，因为目前无产

階級專政的國家正在轉變為全民的國家。

有人對於這樣的事實提出意見和批評：在預見國家要逐漸消亡的時候，黨作為經濟和社會生活管理機構的職能被保留了下來。必須作的答復是，第一，共產主義社會不是也不能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它相反地應當是有高度組織的社會，建築在生產技術的堅實基礎上。可是這種組織不能用經濟的或是政治的強迫方法獲得。恰恰相反，它將是自願參加的結果。現在，國家和黨的不同正是在於，前者主要是一種強迫的工具，而後者則依靠自覺參加，正如將來必須接管目前國家所行使的那些職權的其它組織，也是依靠自願參加的。此外，不應忘記，黨過去一直是、現在仍然是、將來也繼續是蘇聯經濟活動的真正領導，不論是在對經濟的一般指導方面，還是在動員群眾方面。因此，這是蘇聯情況的特點，這個特點很難在短短幾年之內就會消失。在一黨制不存在、政治發展條件不同、議會式的代議制議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甚至在向共產主義過渡中保持首要作用的其他國家里，事情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出現，即不同於蘇聯共產黨目前的新綱領。

當然，黨本身必須在發揚主動精神、民主生活以及發展同群眾的聯繫方面經受深刻的內部變化。它必須在內部生活方面以及在同勞動人民的聯繫方面成為整個共產主義社會以之為基礎的新的自由、互相合作和博愛關係的模範。

國家消亡是這樣一個過程，實現這個過程的形式在今天只能非常一般地加以概述，而使來自新社會基礎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大有發揮余地。

實現二十二大所通過的這種綱領，當然不是很容易的。它的實施要求工作、努力以及一致意圖和創造性的智慧。但是當我們環視四周，注意其它一切政治和社會傾向所表示的、說出來並且實際去做的事情時，我們應該得出結論說，這個文件是很長時期以來

唯一的一个用新的語言向人們說話、使人有充分的工作目的的文件，这是給人类展示光明前途的唯一文件。当二十二大开会的时候，屬於第二国际的各党在羅馬开会。几个月以前，天主教会最新的社会通諭发表了。但是第二国际的各党离开羅馬时連对一个关于工人階級运动目前任务和前景的簡短決議都沒有取得一致意見。

經過討論但不能通过的決議有一半是最下流的反共誹謗和关于对粉碎了殖民枷鎖、沒有对社会民主党給予更多注意的国家的情况的怨言。至于其它部分，根本沒有明确指出西方世界工人运动发展前途，也絲毫沒有提到为取得这种发展而必須进行的斗争。就教会的最新社会通諭而論，無論我們对作者多么尊重，我們也不免有这样的印象：天主教的社会思想有点像桑科·潘扎^①騎馬一样，那就是說，他总是姗姗来迟的。这个信件痛苦地承认，国家可以在經濟方面行使某种职能，但是又說，生产手段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你考虑到現今人类已有三分之一取消了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把經濟生活的管理权交給了国家时，你看到这种說法会感到不大舒服。

这是否意味着天主教的社会思想因此就不能表示除了詛咒这样重要的一部分人类以外的任何东西呢？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就意味着，它感觉到而且目前也是脱离实际生活的当前潮流的。然而我們倒是认为，至少一部分天主教力量同所有为实现新的社会秩序而胜利地进行斗争的人必須携起手来。这是一个必然性，从长远說来，这是不可能避免的。

馬克思主义是今天能够了解和解釋整个現实的唯一学說：不論是离我們还远的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还是帝国主义世界的矛盾，在这个世界以及在前殖民地国家展开的阶

① 唐吉訶德的僕人。——譯者

級斗争的现实。因此，馬克思主义继续是希望有一个美好世界的一切人的唯一有效的行动指南。因此苏共新綱領不仅对于通过这个綱領的党和国家是有价值的，而且对整个工人阶级、对所有劳动人民、对全世界进步力量也是有价值的。

确认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重申二十大提出的路綫

苏共最近的大会充分确认了 1956 年二十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綫，而且在各个問題上从头至尾都是这样的。人們不断提到这个政治路綫，因此誰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二十大不仅革新了苏联經济建設和国内生活的方針，而且它向整个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新的方向。二十大不仅革新了經济建設和苏联国内生活的方針，而且还向整个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新的方針。我要肯定說，当以前的几次會議上出現遺忘或縮小这一事实的傾向时，我們就困惑不解，甚至不滿意和提出批評，我这样說也并不是說出了什么新东西。二十大的決議、特別是关于避免新的世界冲突的可能性、关于达到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等論点，对于我們是非常重要的。这倒不是因为这会导致我們修改我們过去二十年所遵循的政治路綫，而是因为它证实了我們路綫的正确性，因为它向我們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更透彻地分析这条路綫，更好地說明它的理由，更大胆地在当前条件下发展这条路綫，更好地在我們的整个工作中把理論和实践联系起来，从而完成大規模的革新我們的力量过程。因此二十二大給了我們一种新的推动力，推动我們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我們現在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研究今天輿論、国际工人运动和我們党内所討論的有关最近的代表大会的某些問題的。

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已經毫无保留地被确认了，虽

然代表大会不得不考虑到国际局势在过去几个月中恶化的情况。正是这种更加严重的局势本身表明了：苏联的力量、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牢固、一大批不结盟国家拥护和平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反抗，所占的比重能够使得那些企图发动新的武装冲突的人们非常不容易发动这种武装冲突。在8月1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决定要像所有国家一样有一个正常的边界、西方国家的恫吓和威胁遭到了失败，这一事实也部分地证明了这种看法。

二十二大对缓和国际关系作出了贡献。它作出这种贡献是由于它重申证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和平共处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是由于它提出对德和约问题的态度以及它的明确声明：苏联准备就这个问题以及任何其它未决问题进行谈判并同时考虑到有关各方的利益。

但是我们不应当就此以为这种对缓和紧张局势的贡献意味着劳动群众争取和平和争取孤立并击败好战的人们的斗争就应当中断或削弱。由于我们在意大利和在法国的人们，这种斗争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必须继续进行这场斗争并且更加扩大，一直到至少在意大利政府的方针和倡议方面获得具体结果为止。继续斗争之所以有必要，还因为意大利和法国的成果可以作为其它还没有采取必须采取的行动的国家的榜样。我们确认，我们的目标是使意大利政府同大西洋各极端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我们希望这个政府主动在解决有关对德和约问题上、在要求和开始就全面裁军进行新的谈判问题上、在欧洲非核区以及禁止原子和核武器、从而结束任何原子爆炸试验——无论在大气层、地下、海中或空间——的问题上提出具体建议。

在原子爆炸试验——苏联已再度开始，它是不得不这样做的，而且它在进行试验以前郑重通知了它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问题上，你们知道人们进行着多么疯狂的反共宣传运动。在这种

运动面前我們必須提防采取防守的立場。我們必須使群众能采取坚强的态度来攻击和譴責所謂西方世界及其領袖們。

所有这些資產階級報紙，所有这些多少在执政的党派在过去一点也不关心、而且今天仍然不关心毁灭性的原子战争和由于爆炸試驗而产生的放射性危險。只要回忆一下它們过去的行为，再看一看它們所刊載的东西就够了。那么为什么它們从来不大声疾呼地反对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呢？它們的外交政策多年来就是建筑在原子恐怖的基础上的。为什么它們毫不抗議地接受这种政策，为什么它們主張“核威懾力量”的理論，也就是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以及所有其它西方政府的理論呢？我們从这些報紙的篇幅中不知多少次看到这样的說法：原子彈和核試驗是和平的保障。就在現在伪善的大惊小怪的叫喊所謂毒化空气的同一个地方，三年以前我們可以听到这样的說法：苏联单方面建議和实行的結束核試驗是完全不应当接受的，因为这将使美国不能发展一系列新式武器，因为这将使英国不能成为第三个核大国，并使法国不可能制造它們自己的原子彈。在这些報紙和政治家中間，有誰曾經指責純粹为了恐吓的目的而刊載吓人的画面而显示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被原子彈燒成一片火海是一种罪行呢？它們中間有誰譴責过丘吉尔提出的幸而沒有实现的要装载原子彈的飞机在苏联城市上空进行好战示威的建議是一种罪行呢？你們《晚邮报》、《报信者报》、《邮报》等等的先生們，你們的良心太黑了，我們不能认为你們有任何权利装成拯救人类于原子恐怖的保护者的样子！这些人感兴趣的是些什么，在过去他們就公开的写下来。这些人們的打算只是扩大反共的范围，加强反共的論战（根据《晚邮报》恬不知耻提出的一个方案），从而企图在群众中間恢复旧的冷战动机。因此我們看到法西斯分子、“薩洛共和国”^①的殘余以及所有

^① 指墨索里尼在第二次大战結束前夕在德寇扶植下建立的政权。——譯者

念念不忘墨索里尼和黑衫党政权的人们在这群伪善者中充当急先锋。因此我们不当采取防守的态度，而应当公开地同所有这些人员进行斗争，揭掉他们的假面具，暴露它们的真面目。

当薩拉盖特谈到最近苏联的核试验时，他提到“野蛮的实力政策”。我们有责任提醒他，这是美国十年来所奉行的政策。当他说苏联的试验是不合民主逻辑的行为时，我们有责任提醒他，他认为民主的国家所进行的试验比苏联多一倍以上。当他在众议院提出提案要求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试验——那就是说不是禁止任何种类的试验的时候，他就暴露了自己的冷战鼓吹者的面貌。因为他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由于西方拒绝停止任何核试验，日内瓦会谈才宣告破裂。因此他的立场的辩证法完全不是什么自由的辩证法，它仅仅是老一套的破烂的冷战和核恐怖的辩证法。

苏联被迫也完善了它的原子军备，因为，至今差不多一年了，它不仅面临着西方世界的军备竞赛，而且面临着很多明显的侵略威胁行动，美国及其盟国正是以这些活动来回答为解决德国问题举行谈判的建议。

当我们路过维也纳的时候，我们都在所有报纸上看到：德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边境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了全部用核武器装备起来的五万美国兵和五百五十辆装甲车。

一年来，美国的军事预算在不断增加，最近又增加了六十亿美元。

你们可以翻开一本美国最有权威的杂志。你们就会在上面看到，现在美国已经拥有三万五千到四万个核弹和原子弹头，其全部威力大约相当于三千五百亿吨的三硝基甲苯。杂志说，可以计算一下，这就是说给苏联每个居民准备了大约二百吨三硝基甲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在苏联周围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原子弹基地、导弹发射台、拥有导弹装备的原子潜水艇。一按电钮二百个带有

核彈頭的導彈就立刻奔向蘇聯；此外還會使用五百個短程和中程導彈和五千多個原子彈轟炸機。

我們對這方或那方的原子爆炸不加區別看待

最近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提供了同這些內容類似的資料和情況。

另外，最近，美國軍備特別集中在西德，離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都很近。

面對着這種局勢，蘇聯政府能夠漠不關心嗎？難道蘇聯政府對它自己的人民、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以及對我們所有的人就沒有明確的義務來不惜任何代價地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衛自己並給予任何侵略者以殲滅性的反擊嗎？我們認為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都有這種義務，並且應當去履行這種義務，這可能給它帶來犧牲和痛苦。如果向全世界人民解釋這些事情，他們將不會不了解的。

請允許我追述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幾天以前，當我們到達布列斯特車站的時候，我們利用短短兩小時的逗留去參觀了一個在第二次大戰開始的時候位於這個城市附近的一個城堡的遺址。幾百名蘇聯戰士受到希特勒七個師的襲擊。他們被打敗了，但在斷壁殘垣中抵抗了將近一個月。當希特勒軍隊向前進了五百公里到達斯姆棱斯克的時候，他們還在戰鬥。為了紀念這些英雄的壯績，已經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博物館，那里收集了他們在這場不幸的戰鬥中的許多遺物。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一個文件，這份文件不僅給我們深刻印象，而且使我們感到觸目驚心。這是一些原應在6月22日發給士兵的衛戍部队的報紙草樣。大家知道，希特勒的進攻是在21日開始的，在這張報紙上一點也沒有談到即將爆發的

战争。

社論談到夏季体育并且要士兵到白俄罗斯的美丽的森林里去釣魚和打猎。其余文章都是这一个調子。这是对于军队进行和平教育的一个惊人的例子，也是一个輕敌和沒有責任心的一个惊人的例子。由于犯了这种性质錯誤，苏联在战争中牺牲了两千万人；并且它的一直到列宁格勒、莫斯科近郊、斯大林格勒的領土都被人占領了。当苏联同志对我们說，他們再也不会重犯这种致命的錯誤的时候，我們只能表示贊同，所有善良的人也都只能贊同这点。

我說的这些话也是对社会党同志们进行反对原子爆炸运动所抱的态度的答复。按照他們的說法，应当反对苏联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且总的說来，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因为它是“实力政策”。这种性质的批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苏联应当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批評呢？难道說当別人在揮动武器的时候，应当表现出自己不是强大的，并仅仅作出和平主义的請求，去专心从事夏季运动或冬季运动嗎？帝国主义世界是一个殘暴的豺狼世界，不能用演讲来叫它規規矩矩时，从1919年到1941年苏联不止一次地受到这群豺狼里的某一只豺狼的殘酷侵略。只有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威力，才能够避免侵略的重演。这特别是因为苏联不会去威胁任何人，它向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国家提供友誼与和平共处，不論他們的国内制度如何，它願意就任何問題进行一次理智的談判，同时它的大部分力量都用于一个偉大的經濟和社会建設，对这种建設來說，和平是必需的，因为这个建設不是別的，正是和平事业。

工人阶级和它的各个党从来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主义者，即便在取得政权之前。我們的和平主义并不是閉着眼睛的；因此它不能不去判断帝国主义领导集团的政策，以便在人民群众面前予以揭发。

也許，这几周的瘋狂的反共运动，竟能向这些群众掩盖现实，

并且也真有一些人善意地认为我们对一方和另一方的爆炸予以不同的看待。不，我们没有予以不同的看待。而我们倒要谴责当前这个运动的发起人，因为是他们予以不同的看待，他们对于美国、英国、法国的爆炸从来没有提高过声调，而总是为它们的爆炸辩护和赞扬。竟会有一部分舆论仅仅抗议苏联的爆炸而另一部分舆论仅仅抗议西方的爆炸，我们认为这都是无聊的，甚至是可笑的。由于它们是善意的，双方就必须会合一起并且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伟大的人民力量，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且要求立即就裁军举行谈判，这将甚至能在短期内终止任何试验性爆炸。我们认为这是今天唯一理智的、正确的和有效的出路。

苏共二十二大采取的一些态度和决议，特别是对由斯大林和在他领导下所犯的专断、非法行为和罪行的再一次的严厉谴责，从这些谴责中所得出的结论，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批评，是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直接联系着的。苏共二十大的这些决议直接关系到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正如它们关系到苏联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一样。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批评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已引起了和中国同志的分歧。

一贯从事反共煽动的专家们，死抓住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议的这一部分，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但是，我们应当自己来努力讨论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在1956年所做的那样，以便更好地了解局势，更好地把党武装起来，去反对一切公开的或伪装的敌人，并且更好地站稳我们自己的立场。

重新谴责斯大林的罪行和控诉反党集团的意义

人们问，是否真的有必要重新揭发195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一批斯大林的旧同事，并且向这批人集中开火呢？由于我们

不了解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的全部生活，要对这个问题给以详尽的回答是不容易的。可以肯定，代表大会对这个集团进行的猛烈抨击，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在苏共二十大时还不能完全了解的许多事情。因此，当时所决定的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的转变，不得不通过同拒绝这种转变、阻碍一切革新措施、仍然和旧事物旧方法联系着的一批领导人不断斗争来实现。这批领导人甚至在经验证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这种旧事物方法的时候，还是如此。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大概就被这个集团利用来展开它的拖延和妨害行动，以致到1957年6、7月间，他们竟然真正试图发动政变，来改换党的领导，并且埋葬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苏共二十大对此不能不像它已经做到的那样予以反击。当时的危险真是十分严重。如果立即在当时或不久以后提供关于这个企图的更加充分的材料，也许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有所帮助。这些事情的大白决没有害处。弄得越清楚，人们越能胸有成竹地迅速地前进。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抨击所谓反党集团这件事的政治实质，是极其清楚的，我们毫不怀疑地同意它，这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也不得不公开采取反对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和反对害怕新事物的态度。

苏联共产党在肩负起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的时候，不能不提出彻底更新自己全部活动的任务和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改造结构，上层建筑也必须改变，因而党的工作方法、它同群众的联系、它在必须扩大劳动人民的民主生活和首创精神的阶段行使领导职能的方法，也要随之而变。在这种情况下，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留恋过去和憎恨新事物，就成了主要的障碍。苏共二十二大的主要决议与重新展开的对反党集团的斗争之间的真正联系，肯定就在这里。

至于新的揭发，并没有提出许多在有名的“秘密报告”中所看

不到的东西。这些被揭露了的新情节，大概是苏共二十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已经知道的事实。也许，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进一步的揭发是不再必要的了；也许这些谴责会在这里和那里引起动荡和困惑。可是我们应当努力去了解存在于苏联的情况。党、军队和国家的领导在斯大林负责下所犯的破坏法制的行为和罪行，是一个可怖的悲剧，它至今仍然沉重地压在老一辈和新一辈的心头上，他们还没有摆脱它。很可能是下面的人要求了解全部真相，而共产党人却不能像某些天主教历史学家一样，把亚历山大六世也算作伟大的主教之一，而忘了叙述他事实上是怎样一个人。此外，如果要想防止回复到过去的情况的话，这种揭发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的情况必须永远埋葬掉，虽然不是应当把它忘记。

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陵墓迁移到共产党其他伟大领导人的骨灰安葬的地方去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早在苏共二十大就应当采取的措施，其所以推迟，我想是因为当时舆论还不会了解这样的措施。我个人在听到改变斯大林格勒城名字的决定的时候，有一种困惑的感觉，这不是指斯大林的名字而言，而是因为千千万万的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以这个名字来称呼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著名战役。苏联同志必须考虑到实际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情绪的敏感，不应当要求做那些不是绝对必要的事情。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严重的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它超出了仅仅谴责不人道行为的范围，它牵涉到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是不能回避的。因此，我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而且是缺乏教育意义的，他们还部分地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对于苏联同志谴责斯大林的作法，阿尔巴尼亚人却仅仅用简单的、肤浅的、没有任何批评内容的颂扬言词来加以反对。这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

誰也不否認斯大林的功績，而且如果否認蘇聯工人階級和各族人民在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時所實現的事業的偉大，也是荒謬的。但是從某一時刻起，難道不是他的個人行動成為整個局勢的障礙和消極因素嗎？即使從理論方面來看，這也是必須得出的結論。

例如，如果你再讀一遍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最後一部著作，就會在其中發現有保守主義的表現。要想前進，就必須粉碎這種表現。我們應當想一想：當他站在黨的領導地位，成了唯一能表示意見的人時（當時任何人都得附和這種意見），這是多麼有害。這是一種嚴重的危險，這種危險，必須注意，必須永遠避免。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南並且必須領導群眾進行廣大行動的政黨，不能把自己降為一個一神教的機構。它必須在它的隊伍中，而且還在它的領導機構中，鼓勵展開討論，鼓勵培養各方面的領導人物，鼓勵不斷交換意見，而不導致在產生不同意見時發生分裂和進行懲處。這在今天尤為必要，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們面臨的形勢是如此的複雜，並且不斷地產生新的問題，因而需要不斷提出政治創見。在工作中，在行動中，必須要有完全的團結一致，但只有進行公開的、直言不諱的討論，才能造成和保持這種團結一致。

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特別使我們反感和厭惡的是，他們全然無視這種方法，把黨的會議降低為對一個人的功績進行不斷地、令人膩煩地頌揚的會議，同時蔑視黨內民主的一切準則。這不是共產黨為了組織和發展自己所應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例。在那種情況下，沒有可能在理論上進行探索，從而也沒有可能在理論上獲得進展。誰談到新的東西或是不同的東西，誰就被認為是異己分子，那就是說，人們最後只是承認和欣賞重複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如果人們這樣把自己降低為一個猶太教的派別，那麼如何能使工人、知識分子、青年中間的新生力量

接受馬克思主义呢？一个像阿尔巴尼亚党这样掌握政权并且发生这种变化的党，不可避免地会从单纯物质力量角度来考虑权力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这是斯大林本人所犯的错误之一。

要求苏共和其他党同志的合作和帮助， 把 1956 年开始的批判性探讨和分析推向前进

此外，在谴责多年来在斯大林领导和负责下所做的那些事情（粗暴地违反宪法和苏维埃国家庄严制订的法律）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大问题：这样严重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会发生的，又如何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再重演？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仅仅把一切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我仍然认为这种回答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况且列宁过去发现并且谴责了这种不良品质。在斯大林周围，还有其他人同他结合在一起违反法律。此外，党虽然在它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得知了列宁的郑重告诫，却没有考虑这一告诫，这又如何解释呢？有必要深究这个问题，对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作出分析；这不是要为我们今天所谴责的东西辩白，说什么“当时只能如此”（这是错误的，应当加以反对的做法），而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事情，为了使大家从这些事情里吸取教训。1956年，我在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的同意下，但在我自己的负责下，在大家知道的那次同《新讨论》杂志记者的谈话中，曾试图用这种看法来分析这个问题。我现在仍然认为，我当时得出的那些部分结论仍然是完全有效的。至少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提出适当的论据来驳倒这些结论。苏共二十二大的新的揭示并不同这些结论相矛盾，而是证实了这些结论。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这种探索，并把这些分析更深入一层。

苏联同志应当为这种研究提供大力帮助，因为毫无疑问，在年轻一辈人的头脑中也出现了这些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也需要这样做。

现在，从苏共二十二大所谈的东西看来，走向连续不断的歪曲的起点和转折点，是那晦暗不明的基洛夫事件。在1934年，苏联虽然在经济上仍然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但是已能在全世界面前赞扬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党的领导违反、否定和摧残社会主义法制的行动这种严重矛盾的事，这怎么成为可能的？必须承认，正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客观矛盾和困难，对于这些矛盾和困难，斯大林的领导不能理解，认为解决它们的办法在于建立一种猜疑的制度和公正地进行镇压的制度。必须承认列宁下面这句话是正确的：成就可能成为官僚化的原因之一。还必须提到以前的事情，提到长期的内战、外国干涉和恐怖，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特别的工作习惯和方法，这说明斯大林周围的一批领导人如何会变成一个简单的权力集团，对这个集团来说，任何问题都被简化为物质力量的矛盾。当然，这些只是一般的看法，这些看法应当用事实来加以核对，以便使每个批评和每个谴责都恰如其分，同时也要看到，劳动群众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实现的经济建设的巨大的和积极的工作，创立和建设了一个新的社会，同时确定了一项在各国人民心里引起最大反响的国际和平政策。

1956年，我们曾着手进行这项工作，通过与苏联党的领导同志的接触，派出考察代表团，大量的公开报道和出版了一些调查报告和书籍（这些调查报告和书籍肯定你们是知道的），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有必要多做一些这种工作，并且我们应当要求苏联同志和其他党的研究人员给予新的帮助，来着手从事这项工作。对于我们整个运动来说，最糟的是仅仅用颂扬来对付谴责，而不关心

其他东西。在这个問題上同中国同志存在的矛盾，也需要通过探討、研究和討論来更好地加以解决。

代表大会用充分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处理了保证防止重演斯大林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問題。为了在各級社会組織中扩大民主而提出和通过的一切措施，对党章的重大修改，要求苏維埃和工会等組織更积极地展开活动，对錯誤的刑法原理的批評（过去就是用这些錯誤的刑法原理来掩盖真正的和明显的違法行为），以及关于为了保卫人身自由而研究制訂更加严密的司法規章的建議——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因此，大家庄严地反复表示决不回到过去的局面这一点得到了明确的政治、法律和組織措施的保证。

恰恰相反，南尼同志采取的态度是不能接受的。按他的看法，防止在斯大林負責时期由于他的过失而发生的事情重演的唯一保证，是必須实行制度的改革。苏联的制度是长期历史过程演变的结果，是不能推翻的。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如果說需要证明的話，已經为它本身的存在和苏維埃社会持續的經濟和政治进步所证明，为它在上次大战中的胜利和目前的和平政策，以及它已經开始的向共产主义的迈进所证明。抽象地以資产階級民主国家的制度来反对苏維埃制度，认为可以而且必須恢复那种制度，是荒謬的。那么，有名的西方民主国家制度实际上到底保证了些什么呢？这种制度有沒有給予法国人民以足够的保障来防止建立个人暴政、防止阿尔及利亚的殘酷战争、防止苏伊士的冒險事件、防止目前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屠杀呢？有沒有使美国人民得到防止五角大楼將軍們的瘋狂行为的保障呢？自由的真正保障倒不大在于制度規章，而更重要的在于人民群众爭取民主的意志，在于他們活动和防禦反动派进攻的能力。在1960年，我們在我国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个工人階級及其政党掌握政权的国家里，自由的真正的保证在于在一切現有組織中发揚民主精神和民主生活，在于經濟、教育、

文化和全体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进步。今天的苏联已大大不同于創立初期的苏联,那时,一切都得通过斗争来取得和保卫。今天的苏联也已大大不同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且它将随着新的一輩人的出現、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进和随着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将在苏維埃制度的基础上和範圍內发生,因为正是这种制度过去和現在使得有可能实行經濟和社会关系的质的变化,即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們正在为意大利工人階級和人民向社会主义前进开辟道路而工作着和斗争着,对我們來說,关于防止脱离民主路綫的保障的問題,現在是我們的政治工作的中心,过去也曾是我們第八次和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決議的中心。正是为了取得这种保证,我們才确认有必要和可能遵循民主的道路,依据我国的条件和我国工人階級和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已經获得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取得这种保证,我們才特別努力保持和发展我們党的民主性质,經常地在党内鼓励展开討論,鼓励思想交鋒。同时永远不拒絕同任何敌对者进行討論与交鋒。因为我們确信,我們的力量不在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在于不抱成見地面对今天出現的一切新問題,在于我們在新事物面前无所畏惧,在于我們永远紧紧坚持实际的本来面目。如果有什么錯誤要糾正,要揭露,就必須从这种切合实际的态度来予以糾正和揭露。例如我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波匈事件以后,就遵循了这一行动方針,这就使我們能够使那些曾說什么这些震动会給我們以致命打击的人大失所望。我确信,現在情况也会是这样。

誠然,我們不能否认,我們的这种行动方法使我們党在目前如此广大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独有的面貌。但是,这决不使我們感到不安,而是恰恰相反。我們在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著作中,沒有发现任何东西是与我們的行动方式相

矛盾的，或是譴責这种行动方式的。我們一向坚定地維護下面这种必要性，即：工人階級的斗争和工人階級先鋒队的党必須具有它符合本国国情和傳統的自己的面貌，并有相应的政治行动路綫。这一点在很早以前我們就已这样做了。这就是为什么苏共二十大的決議、特别是确认每个共产党在政治和組織上自主这一点，對我們具有这样巨大的价值。除苏联同志以外，我們第一个主張現在不能有領導国和領導党，这一点現在已为大家所接受。

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最遙远的国家，客观条件的不同和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和工作方法的不同，就不得不有許多领导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对一些具体問題出現不同的立場，这样，就有必要不断地就这些具体問題交換意見，进行討論。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和随后在1960年举行的八十一个党的會議，作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貢獻，这两次會議使我們能够确定在全世界的政策的共同因素，并使我們整个运动的思想 and 政治团結有了坚实的基础。

况且，我們所支持的和所做的事情，毫不違反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以及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团結的原則。相反，愈是了解本国的情况，就愈是能够在爭取民主、爭取社会主义和爭取和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对共同事业的貢獻也就愈大。我們并不认为有任何一个別国的党在过去几年中比我們更努力来謀求同其它共产党的联系，以便不断增加彼此的了解，討論和澄清彼此間的隔閡，并消除誤会。在这方面，我們和法国共产党在1958年組織的羅馬會議是一个极大的成就，这次會議拟定了一个到現在仍然保持其价值的綱領。我們特別希望同法国同志今后保持經常的联系，因为我們知道，对于决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目前的方向，我們两党在目前担負着什么样的任务。在目前完全談不上可能重新出現集中的国际組織問題，而且我們也反对出現这种組織。

过去曾經举行过許多次对有关理論和解釋现实情况的問題进行研究的會議，这种會議必須繼續举行。在我們看来，共产党之間奉行冷靜的和客观的討論是没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我們的运动現在已經大大发展了，它在世界上占有了許多空間，它有这样多不同的立場，因此我們不能想像，在并不总是一致的各种說法之間进行比較会有什么害处，只要不違反我們的理論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則。人們不能原諒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是：除了違反民主集中制的一切准則之外，他們竟然在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关系上，背棄和踐踏无产階級的国际团結。周恩来同志对于赫魯曉夫同志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所提出的批評的異議，只涉及各党之間的关系的形式；但是即使在这个限度內，我也不认为这种異議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个事件上，公开的批評是在审慎地把一切問題提出来、并加以討論而毫无結果之后才进行的。

我們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曾經有过接触，而我們現在也同他們保持友好的相互关系。这不仅仅是由于我們的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必要性。不止这一点。我們批評了，并且坚持我們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上届代表大会通过的綱領的批評。但是面对着今天在南斯拉夫存在的制度，我們不能不自問这是一个怎样的制度。这不是某种同在苏联或者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里所存在的类似的东西，但是它既不是一种封建制度，也不是一种資本主义制度，而且我們认为，它更不是一个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之后，現在向后轉而走向一些过时的形式的制度。这样就有了加以認識、研究和深思的必要。这样也就发生了把南斯拉夫和它的制度当作敌人看待的錯誤，而相反地应当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感到：可以同他們有分歧，但是对他們沒有任何带有成見性的敌意。我們設法同社会民主运动接触，而同时我們却拒絕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发生任何接触，这是很奇怪的事。这就是我們在去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

人党會議上的态度。

最后，苏共二十二大对苏联共产党、对我们党、对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体劳动人类都是具有非常的决定性的重大意义的事件。

在国际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处在我们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的开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防止世界冲突，因此全人类都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着手解决有关实现各国人民平等、自由和幸福的任务。对苏联来说，正在开始的阶段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的阶段。这就意味着进行新的、迅速的经济建设，改变社会关系、实现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党的活动进行质的革新，以便使它适应新的任务和局势。对其它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新的阶段必须是革新和加强的阶段，这种革新和加强能够使整个运动保持在同苏联所要追求和达到的新的目标相称的水平上。正在实现的新的、共产主义的世界对于劳动群众和人民大众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共产党人，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都必须知道如何了解这个新的客观要求，从而自觉地给予支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过去的任何有害的残余，明确地规定我们的目标，并且要求我们自信。这就要求充分掌握我们的理论并且有能力在每个国家、在各种情况下应用它，以便使我们永远站在前列，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消除任何机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或宗派主义的障碍，永远把宣传和发展理论的工作同政治行动和群众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对我们的党来说，这个新阶段必须意味着把我们的政策应用在日常斗争中，从而使这个政策进一步深入。这仍然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制订共产主义政策方面所能做的最好贡献。因此，要更多更好地工作，要更仔细地不断地研究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经验和我们整个运动的经验。毫无疑问，在这个新的阶段，共产主义在全

世界的威望将要提高，而且在我們队伍中間可能进行的討論也只会提高我們的威望。因为哪里有討論，哪里就向前进，理論知識和实际行动就更加丰富。現在，我們正朝着发现和征服新世界的方向前进。苏共二十二大的決議帮助了我們，启发了我們，但是要由我們来作出有效的貢獻，来使共产主义和平事业在我国以及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譯自 1961 年 11 月 11 日《因結报》)

談“多中心主义”

——答多烈士同志

在目前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問題的討論中，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組織形式的“多中心主义”这个公式的含意問題。

在我們党書記处根据領導机构指示所通过的文件^①中，已經清楚地說明：我們党内談“多中心主义”是为了強調不存在唯一的中心，从而強調各党在共同思想和共同斗争的基础上的完全自主，而不是为了要求建立各个区域中心。由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們坚持后一种錯誤解釋，《团结报》曾詢問陶里亚蒂同志，是否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說明，他作了如下的答复：

“法国同志們的解釋和他們的論战使我吃惊，特别是因为这种解釋来自了解事情的全部細节的这样权威的領導者們。从1956年情报局解散以后，我們的立場始終是肯定各党的自主，就是說，在作为整个共产主义的基础、作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和国际主义的基础的那些思想原則和行动目标的範圍內的自主。我們曾特別要求的是，1957年11月众所周知的六十四个共产党会談时通过的決議中应清楚地談这一点。可是，應該补充的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間，在参加情报局各党代表均出席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这样的建議，即打算建立某种“地区”类型的組織，就是說，在相似情况下活动的各党建立更密切的情报联系这个基础上建立这类組織。但是，不是我們党提出这个建議。这个建議当时是作

^① 指1961年11月27日意共書記处关于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

为試驗而且不是沒有疑惑地被接受了。当时也曾进行了一些嘗試来实现它，特别是法国同志和我們曾进行了一些嘗試，但沒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结果，这条道路就被放棄了，以后在任何场合再也沒有談到它。我所說的这些，可以由同我一道出席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間召开的那次会议的斯科奇馬罗同志和当时领导我們的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們来证实”。

1961年12月2日于羅馬

(譯自意共《从九大到十大的政治文件》)

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 多样性和团结

大家都知道，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是在1943年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散的。当时参加主席团的，有下列各党的权威领导者：苏共（日丹诺夫和馬努尔斯基）、奥共（柯普勒尼希）、保共（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法共（馬尔蒂和多列士）、德共（皮克和弗洛林）、意共（埃尔科里^①）。这个决定得到当时在苏联的各党代表的支持（意共代表比安卡、西共代表伊巴露丽、芬共代表勒蒂宁、罗共代表波克、匈共代表拉科西）。美国共产党从1940年11月起就已决定退出共产国际，它的这个决定得到了执行委员会的注意和同意。没有任何一个党把解散国际的措施提出讨论。所有的党都赞成这个措施。它对于各党是一个时期的终结，同时，大家也明确承认它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大家同样地知道，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时，特别是紧接着七大后的几年中，就已经感到，各国的支部必须在执行代表大会决定的政治路线上享有较大的自主，国际领导机关应该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进行工作，限制自己对各党生活的直接干涉。1935年以后，事实上已不再举行任何有各党代表团参加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而在过去时期，这种会议几乎每年都召开，甚至一年内召开两次，这种会议对于制订整个运动的政策、研究各地区的形势、领导干部的教育和挑选曾起过广泛的积极作用。

^① 即陶里亚蒂本人。——译者

曾經發生過解散波蘭黨的事件，這是同上述路線絕然抵觸的錯誤和災難性的決定，應該深入研究作出這個決定的具體環境，以便弄清在這個案件和這個方面如何出現同第七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必要的和正確的領導方法相對立的領導方法，在我看來，這種領導方法是同斯大林的領導當時所犯的悲劇性錯誤直接有關的。至於這個組織的一般方針，應當說，解散國際的決定是在通過這個決定前几年就已經成熟了，主席團的決議中公開談到了這一點，我們是根據這個決議行動的。

我記得很清楚，大約在1940年年中，我從西班牙戰爭和巴黎的監獄回到莫斯科時，曾有機會同季米特洛夫同志談到這個問題。他當時具體地預計到了國際的解散。其所以拖延到1943年底，我認為主要是由於當時的事態發展。在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期間存在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那時解散共產國際，可能顯出是由於這個條約而對反共產國際公約主謀者的讓步。這樣會使敵對者，特別是社會民主黨人之流把它說成是這種讓步——他們是進行這類誹謗的能手——以便在我們的隊伍中散布混亂。後來，直到斯大林格勒勝利前，戰局對於反希特勒的聯軍和對於蘇軍都不太有利，當時解散國際，如被錯誤地解釋，就會挫折共產黨員和勞動群眾的士氣。在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轉折之後，已經不再存在第二種危險，於是採取了解散的措施。

回顧這些事實，可以看到根據什麼論點來說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是根據形勢和根據工人運動當時所面臨的各種任務作出的。我認為，人們過去從未很注意作這個分析，而我覺得，為了很好地了解當前的形勢和任務，需要這樣作。

出發點是明確肯定不同國家所碰到的問題和要完成的任務是不同的。“世界各國歷史發展道路極大的不同，社會制度的不同性質乃至矛盾，它們的水平不同和它們的社會政治發展的方式不同，

以及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不同，也決定了各國工人階級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多样性”。

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文件就是这样写的（我們引自意共五大时出版的报告和文件集《爭取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这本小册子。文件原文有一些錯誤，但可以很容易地加以糾正）。上述說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极其明显的。但是否說它在以前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是永远正确的呢？就是說：运动的客观条件和发展的不同所造成的問題和任务的多样性；只是在决定解散国际的那个历史时期产生的，还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永久因素呢？回答是无可怀疑的：这是一个永久的因素，是国际工人运动在其演变的各个时期都具有的一个特点，虽然在不同的时刻，其突出的程度有所不同。

只要看一看列宁所写的东西，我們就会看到他非常清楚地肯定我們的說法。例如，他在1908年所写的著名的《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那篇文章中，根据主要的国际事件，研究了无产階級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首先，他說明了正在形成的形势，但在作这种一般的說明时，他也沒有忘記各地的多样性这个要素：

“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的斗争尖銳化的現象在一切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政治制度和工人运动的形式不同，同一的趋势有不同的表現”。^①

接着他指出若干事实证明美、英、德、意、法各国都存在这种形势，并用下列的話作結論，这些話說明各国的不同是工人运动的总特点：

“无产階級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里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发展。只有在各个国家的工人所进行的总的階級斗争中，才能充分地 and 全面地利用一切活动场所中的一切

① 見《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0頁。——譯者

机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带进总的潮流里来,但是,在每一个国家里,运动都有某种片面性的毛病,都有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某些技术上^①或实践上的缺点。”^②

像这种强调工人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发展方式各不相同的说法,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有些人不了解或者否认制订确切符合具体的主客观条件的政策和采取确切符合这些条件的行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失去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可靠的整体观点,有时,举例来说,他们甚至由于没有看到在具有同样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国家中在同一时间内或者自始至终发生具有同样性质和同样紧张程度的同样斗争而感到不知如何是好。这两种人都应该好好思考我们援引的那一段话。当然,这并不是说,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不在于进行斗争来克服从技术或实践上的缺点和弱点——像列宁所谈到的——或者——我们还可补充一句——从方针和行动的缺点产生出来的不平衡。

可是,引述列宁的这段话可能遭到这样的异议:这种异议关系到1908年处于第二国际时期的运动的情况,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政党已经被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被空谈的极端主义蠹蚀了,这不能不造成不平衡和弱点,不能不使整体的统一和一致更加困难。那么,让我们看一看同一个列宁在不是第二国际的年代,而是在1920年,当共产国际已经成立,已经成长,并开始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发展它的支部而且正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如何提出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内的多样性问题以及如何将一个国际领导中心同这些多样性联系起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对左倾宗派主义的论战作几点一般性的结论的那一章里写道:

① 中译本为理论上。——译者

② 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页。——译者

“現在全部的問題就是要各國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考慮到同機會主義以及‘左傾’教條主義進行鬥爭這個基本的主要的任務，又考慮到這種鬥爭由於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愛爾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別種種特徵而具有而且必然具有的一些**具體特點**（黑體字是原來標的）。現在到處都可以感覺到，對於第二國際的不滿正在蔓延和滋長，這一方面是由於它的機會主義，一方面是由於它不會或者不能建立一個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起領導作用的中心，一個能在革命無產階級為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進行的鬥爭中掌握無產階級的國際策略的中心。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中央領導機關無論如何不能建立在使鬥爭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定、彼此雷同的基礎上。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也還要保留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消除多樣性，取消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運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國家的不同情況下，在細節上把這些原則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和應用於這種情況。當每個國家採取具體的途徑來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的時候，必須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點和特性。這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主要任務。主要的……是吸引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個步驟上，也就是說，要找到向無產階級革命過渡或接近的適當形式；這個步驟看來似乎比較次要，並且從某種觀點上說，也的確比較次要，但是在實踐上更接近於實際解決任務”^①。

^① 見《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3—74頁。——譯者

这是需要一讀再讀并加以思考的出色的一頁。必須向那些把对具体形势的具体特殊性的探討看成是机会主义偏向的人們提一提这一頁，这一頁的价值正是从下述事实产生的，即：它是列宁在国际革命危机尖銳的时刻写出的，当时列宁正确地认为，夺取政权和組織苏維埃政权形式的专政是整个运动的当前任务。即使在那种环境下，他也认为必不可少的不仅是适应每个国家的特点，而且是，在这个前提下，探討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和接近的各种形式（他在同一段話中談到这两件事情，这不是偶然的）。

那么，根据列宁在 1920 年共产国际在創立时的这些如此明确的主張来看，1943 年所采取的解散决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是否意味着，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二十三年中，列宁的指示沒有得到执行，还是意味着只要国际領導中心存在就不可能执行他的指示呢？这种解釋是完全錯誤的。可能的是，甚至可以肯定的是，当深入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錯誤的决定，不正确的指示和漏洞。会发现人們不止一次地未考虑到运动在各国的特点，某些指示被机械地一般化了。列宁自己曾指出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批評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个关于組織問題的決議。但是，决不能說这种錯誤地提出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普遍的。相反地，注意对各国形势的研究一直是經常作的事，国际的領導机关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注意这种研究。因此，應該肯定：仅仅简单地提一下必須考虑各国情况不同，并不足以說明解散国际的措施。必須更深入一步。

1943 年主席团所通过的決議本身可以帮助我們这样作。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事实上決議不仅談到各国情况“极大的”不同，而且談到在“战前很长一个時間”“通过一个国际中心”来解决工人运动的問題就已經碰到“不可克服的阻碍”，接着还补充說，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选择的劳动者組織和联合的形式“甚至已經变成

了各国工人政党进一步加强的障碍”。

集中的組織形式构成了“阻碍”和“障碍”，这是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超出了单纯指出民族的不同性和特殊性。必须直截了当地排除这样的看法：这样产生的问题是技术性的，或者組織——技术性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就会像过去那样得到解决，即使是要通过巨大的困难。问题是政治性的，我们正在分析的共产国际決議——坦率地说出了这一点，虽然是用非常简短的形式。

首先決議強調，“由于国际上已經形成的整个形势，特别是由于已經使世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的战争”，“各国条件的差别”已經变得特别尖锐了。显然，由于问题是这样提出，人們所想到的不仅是不同国家中数量或者分量更大的差别，而是具有质的不同的一个真实的过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法西斯国家和法西斯的盟国中）必須遵循原来的使本国败北的路綫。另外一部分必須为争取对法西斯的胜利而斗争，而这个胜利首先必須是通过“群众的全国动员”来取得的军事胜利。而“各国工人运动的先鋒队在本国范围内能够更好地并以最富于成果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动员。

在我看来，最后的这句话无疑是最重要的。它最简明地包含关于崭新的任务的战略和策略，这些任务是由于战争的变化而提出的。事实上，1943年下半年，在斯大林格勒发生的轉折以及希特勒在庫尔斯克地区的攻势失败以后，苏联解放軍大步逼近了波兰、捷克和巴尔干国家，同时英美开始在意大利的領土上推进，而意大利法西斯已經垮台。因此当时被具体地提出的不再仅仅是共产党人参加反法西斯和反希特勒的战争的问题，还有他們参加已經解放的国家的政府问题，而且不是作为輔助力量而是作为推动力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作为领导力量去参加的。这就是說，以萌芽的形式提出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以及胜利与和平以后，以完全开展的

形式摆在我們面前的那个局面。当我在1944年2月底动身到意大利之前，最后一次看見乔治·季米特洛夫时，——当时他已經病得很重，我非常了解，他所关心的是，各党能够通过制訂新的政策和群众的大規模行动，在一条虽然是新的但实质上是由国际七大的決議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对于向革命过渡和接近的形式的探討应表现为爭取新型民主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应以符合欧洲和世界范围的各国中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的方式灵活进行。可是，由一个单一的中心来领导和掌握这种性质的过程已經变成真正的不可能，这个过程当时已經显示出困难、复杂和在质上是多种形式的过程，与此同时，一些共产党变成了领导人民民主国家的执政党，殖民主义宣告崩潰，这种崩潰后来在印度的独立和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最大的表现，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正如所預計的那样，准备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动，即冷战。

在这种新形势下，任何人都不认为可以向后轉，重新建立国际工人运动的单一組織和领导中心。各党自主的公式被提出来了并被遵循，人們逐漸日益明显地肯定它，并拒絕了——首先是立即在實踐中，然后也在书面的決議中——“领导国”和“领导党”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曾从另外的道路使一个集中的领导得以产生。1947年成立的国际中心——情报局——仅有情报的任务，目的是克服运动的一些党之間的分離的危險，以及促进它們之間的更好了解和交流經驗。可是这个情报局也被放棄了，因为它的存在本身似乎也是对肯定各党的自主的一种限制。（为了表示这种自主，在我們党内使用了“多中心主义”一詞，这个詞我們理解为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心。这个字眼已經引起了一場以模稜两可的理解为根据的論战，即把多中心主义这个詞解釋成在大的地区中存在着若干地区性的领导中心。这絕不是我們的意图，可是應該誠实地承认，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曾朝这个方向作过嘗試。这个建

議并非来自意大利共产党人，但是他們和法国共产党人一道，曾經試一試，看是否有可能來實現它。當然，這是在互換情報和交流經驗這樣的任務範圍內來實現的，后因碰到實施上的困難，在法國同志們同意下放棄了。）

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的運動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也發生了若干消極因素，我們過去已經談過，現在我不打算回過來再談它們。

在人民民主國家，當時往往發生模仿和機械地運用蘇聯的榜樣；在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到處都能夠通過非常符合新形勢的政治方針和群眾行動來維持和擴大戰後不久所取得的進展的。因此，對於各黨自主的承認是同對於像二十大決議中所提出的那些政治原則的肯定聯繫着的，對自主的承認并非純粹是一種解決困難的組織問題的方便辦法。

可是，各黨自主的制度也呈現出消極的，甚至是嚴重的危險的因素。不承認這一點是錯誤的。首先是各黨的孤立、閉關自守、盲目地方主義的危險，這種地方主義可能以許多形式表現出來，可能表現為國際主義精神的削弱，表現為不理解 and 低估同國際形勢、反帝、反殖民主義、爭取和平共處與爭取和平的鬥爭直接聯繫的鼓動和行動的目標，也可能表現為那種特殊形式的傲慢，這種傲慢可能促使人們把自己當作全球的中心，認為自己有任務使運動的其他部分受到膚淺的批評，而絲毫不作些努力來深刻地認識其他部分的发展條件。人們在同這種危險鬥爭，可以用加強各黨的國際主義教育，同時增加各黨同其他黨的接觸、加強研究其他黨的工作條件、成功和失敗以及在這個基礎上促進互相交流經驗等辦法來消除這種危險。在共產國際較好的若干年中，對運動的各部分提出的批評始終是本着責任感，還可以依靠重申這種責任感來同上述危險鬥爭。（不能認為恩維爾·霍查在最近一次的阿黨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是共產黨人進行批評和辯論的可取榜樣。下流

話和侮辱占了主要地位，而且毫無道理。蘇共的領導變成了馬克思主義叛徒的集團；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變成了一個匪幫；而我們在阿爾巴尼亞黨代表大會後提出的友好批評是“逐出羅馬教門”的作法，等等。這不是討論。這是對公開的敵人講話，或者是要分裂運動。)沒有單一的中心和各黨自主的實質結果是，各黨必須通過制訂自己的政策，通過自己的研究和行動，通過努力更好地解決在結構相似和社會發展相似的国家中以多少相似的方式提出的那些問題，來幫助整個運動的發展和克服它的困難。只有在这个基礎上，經驗交流和對這些共同問題的辯論才變成真正有成果的事情。總之，我們越能夠前進和用例子來證明我們所取得的思想 and 實踐的立場的正確性和效果，我們就越對推進整個國際運動作出貢獻。這並不排除在必要時進行相互批評，特別是不排除、而是要求舉行會晤和召開會議來比較各種意見並在必需的程度上給那些共同問題制訂共同的綱領。應該看到 1959 年羅馬會議的例子是非常積極的。

可是，所有這一切還不夠。事實上，還有對於整個工人運動和所有的共產黨來說應該是共同的鬥爭總目標、方針和行動前景，它們緊密地取決於我們所處的历史時期的特點，如果沒有這些共同的东西，我們就會離開自主的境地，而進入那種紊亂、迷失方向和混亂的境地。

情報局成立的時候，我們正處在國際形勢發生轉折的時候。戰時的聯盟已經分裂，出現了冷戰危險。情報局存在的那幾年里，曾犯了一些錯誤，對某些國家產生了不利的後果。可是在幾個共產黨和工人黨 1947 年召開的國際會議上——情報局就是由那次會議成立的，曾以必需的力量和權威，着重指出當時國際形勢所發生的轉折以及為了用廣泛的擴及整個運動和全世界的鬥爭陣綫來對付帝國主義的進攻所必需的事情。人們肯定——而且是真實

的——在那次會議上也表現出某種教條主義，例如，由於這種教條主義，對走向社會主義不同道路的探討受到了批評。多列士同志在最近一次談話中提到了這一點，我們也曾幾次說過，那些批評使我們黨內在發展我們的鬥爭和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方面產生了猶豫不決和陽奉陰違的現象，儘管我們是大力推進這種發展的。可是，可以認為，這些消極因素，這些與“個人迷信”有關的不理解和錯誤立場的分量是大大次於情報局在引導整個工人運動採取行動反對冷戰、反對把冷戰變成熱戰的企圖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的整個政策方面所給予的積極推動力。如果沒有這個推動力，勞動階級對帝國主義政策的抵抗和鬥爭會更差，第一個時期的結局對於各國人民的獨立與和平事業也許會沒有像當時那麼有利。事實上，這個時期是以建立在西方原子武器壟斷的基礎上的統治世界計劃的破產、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和鞏固以及殖民主義陣地的不斷崩潰而結束的。

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我們現在不想回頭來談它的重要性的重提起它的決議，但只想提到下述一點：一方面它提出必須使我們的政治立場符合新的具體條件，因而它是一次反對固步自封和教條主義積垢的鬥爭，另一方面，它肯定戰爭可以避免，因而把如何避免戰爭的問題，即在目前時刻和以後的前景中的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提到我們的整個行動的中心。從那時迄今，這個問題就成為真正的主題，成為擺在工人運動面前和在工人運動中引起爭論的決定性的中心主題。1957年和1960年的會議就是圍繞這個主題舉行的。當時也集中注意了我們的運動的弱點及其原因和克服辦法，可是所關心和所探討的真正目標乃是，如何在帝國主義仍然根深蒂固的西方國家內，用同帝國主義敵對的階級的強大力量，即同群眾廣泛聯繫並能夠領導群眾進行鬥爭和取得對整個形勢有決定性效果

的勝利的先鋒隊，去反對帝國主義。

事實上，對於關於避免戰爭從而實現和平共處制度可能性的論點，可能有各種理解。可能有一種靜止的看法，即把這個任務歸結為維持現狀，而不認真對待前景問題。根本上是不願意接受下述論點，即：戰爭可以避免，因為，鑑於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並繼續發生不利於帝國主義的變化，帝國主義儘管本性不改，可是已不再能夠為所欲為。上述靜止的看法是一種錯誤看法。可是我們了解在受到一個侵略和驕橫的帝國主義不斷的、直接的壓力和挑釁——例如，像美國對待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樣——的那一部分工人運動中是能夠接受這種看法的。可是同樣錯誤的是這樣的看法——在我們，小資產階級左派報紙時常發揮這個看法，即認為緩和過程是某種“不可扭轉的”自然而然的東西，他們說，這種過程只是從客觀條件，從使用現代武器的戰爭不再是可以想象的這個事實中產生的，等等。這種看法直接導致消極，因為它從舞台上勾銷了敵對者、和平的敵人、帝國主義，而這些敵人無論如何都不放棄用一切手段來統治世界。他們在準備一場原子和熱核戰爭並且已經準備好要發動這種戰爭，雖然，抽象地看，這種戰爭是不可想象的。阻止他們和約束他們的首先是這種恐懼，即害怕對手今天比他們更強大，以及勞動群眾對他們的政策的抵抗和鬥爭。

唯一正確的看法是，把和平共處的前景以及“沒有戰爭的世界”的前景作為行動、同帝國主義鬥爭以及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進展的前景，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里，這個前景是通過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不斷加強來實現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是通過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在破壞和摧毀大資產階級的力量和權力方面的進展來實現的，而在殖民地國家或前殖民地國家是通過新舊形式的殖民主義的完全毀滅來實現的。這實質上是1960年八十一個黨決議的內

容，而〔苏共〕二十二大是以此为根据的。上述決議是由一个會議制訂，在这次會議上進行了一次廣泛的辯論，在这次會議之前，還在兩次重要的國際會議（一次在布加勒斯特，一次在莫斯科）上，進行了不同意見的交鋒。

關於使這次辯論被普遍了解和運用它來使各黨和所有的黨員有可能對所有爭論過的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從而能夠用行動來運用它這一工作作得怎樣呢？應該承認沒有作得很好，因為例如，在我們的隊伍中，有若干同志對〔蘇共〕二十大期間透露出來的分歧感到驚訝（可以提一下：關於布加勒斯特會議和八十一個黨會議辯論的主要文件，在我們黨內都已經讓所有的中委和中監委以及省委書記了解）。但是，必須向所有的人提醒如下一點：運動今天的狀況、它目前所具有的那種靈活性以及對已得到肯定的各黨自主的尊重，要求在如此巨大的政治力量中進行討論時，用不同於在過去進行的討論、不同於在一個黨的範圍內或者我們的支部會議和“政治論壇”上所進行的討論的方式。必須保持高度的責任感，對於所有為共產主義的勝利而戰鬥的人們來說，這種責任今天特別巨大。

應該看一看阿爾巴尼亞黨領導集團的例子。我們已經簡略地提到這個集團所採取的不可取的論戰方式。但最近到過阿爾巴尼亞的人都知道，問題不僅是不可容許的無禮和下流的論戰，而且是企圖在人民面前破壞蘇聯和它的領導人的威信。他們在人民群眾面前舉行可笑的儀式，鄭重其事地摧毀用蘇聯資金修建的一座大建築物的地基，因為這個地基是赫魯曉夫奠立的，在上面嵌鑲的一張羊皮紙——像人們常常作的——被撕成碎片並隨風飄走。這種儀式同思想論戰有什麼共同的东西呢？我們更不用說甚至更嚴重的和發生在二十二大以前的其他行動，像我們已經提到的那種行動。在這些行動中沒有任何責任感；相反地似乎是表示這樣的意

图：使協議成为不可能或者导致絕裂。

因此，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目前的組織形式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开始于国际七大和国际的解散而达到各党的自主，这是由于——像列宁所指出的——考虑到各国所提出的任务不同，由于强调走向社会主义不同道路的可能性，同时也由于不要将共产党人执政的国家的职能和任务同党的任务混淆起来。毫无疑问，这种組織形式要求进行思想和行动的进步所必需的辯論，但在組織这些辯論时要考虑到目前形势的全部新因素。为了使这种組織形式有效，不仅不排除，而且要求共同制訂运动的基本問題及其总目标和前景，通过这种共同制訂可达到团結。如果没有或者缺乏这种团結，反帝、争取和平共处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会在徒劳的各自为政的沙滩上擱淺。国际团結就会失去其意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会仅仅存在口头上。为了使这种团結存在和加强，各党必須作出自己的貢獻。

为了能够有效地和正确地作出这种貢獻，重要的是必須了解并始終考虑到，我們并不是处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剛剛开始的年代。我們已經达到运动迄今所达到的最高点。在思想和政策制訂方面，我們拥有巨大的資本，这个資本給那些願意深入研究今天提出的問題的人提供可靠的出发基点。我們拥有已經扩展了半个多世紀的經驗，在这个經驗中，人們始終能够在列宁的著作和行动中，在劳动群众一直以勇气、以及往往是以英雄主义来领导的、在各国和在最不同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斗争中，进行发掘，以便发现新的宝藏。我們今天拥有难以估量的力量，这个力量首先表现在苏联和领导它的党所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中，这个党是軸心，环绕这个軸心聚集着一个日益扩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包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各个人民民主国家和它們的全体人民，这些国家都完全独立自主地行动，但它們首先是团結在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

的斗争中，还存在着空白，特别是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还存在着需要克服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们正在进行共同的认真的工作，来认识和克服它们，特别是在这个工作取决于我们和我们有可能作的那些地方。由于这个工作，我们的国际团结和我们的一致应该得到加强并将得到加强。

(译自 1961 年 12 月《再生》月刊)

在 1961 年 12 月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召开之前曾进行了集体的准备，参加这次准备的不仅有领导机构的同志们，而且还有党的一大部分人员。省委会参加了，举行公开讨论的同志们也参加了。从这次整个集体工作中——我要着重指出的正是集体工作这一点——产生了那种一致的方向，这是这次中委会和中监会会议辩论的最重要的积极因素。

这种看法促使我来谈一谈我对于会上十分详细地辩论过的关于领导机构和中央委员会在制订党的政治路线上的关系问题。

斯科奇马罗同志已经谈了形式上是完全正确的看法，即：如果领导机构中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它应该决定把分歧提到中委会来。可是同志们希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同斯科奇马罗同志争论的同志们希望领导机构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有关制订政治路线的一切因素，源源本本地都让大家知道。现在，这种要求在根本上是正当的。这并不是说，应该在所有的报纸上公布书记处和领导机构的详细记录，这样作会是绝顶荒谬的，而是说，领导机构的同志们通过开头的报告和其他发言，可以而且应该把一切看法提交中央委员会来处理。

当然，无论是领导机构，还是中委会都是从一致的基础出发，并且为了达到团结而工作的。

我不想多谈对党内正在进行的辩论的看法所引起的問題，而打算谈我们现在正面临的政治形式的一些因素，因为，在我看来，对事情进行更深入一点的研究，以便确定我们所提出的目标，即我

們目前向工人階級、劳动群众和民主力量提出的目标，是有益的。

有人說形势是在变动中。正确。我认为补充如下一点也是正确的，即：目前在資產階級这个統治階級中，在政府局势的发展前景上，因而也在政府的行动方針上，是存在着矛盾的。我并非根据瓦勒塔^①工程师——讓我們这样假設——关于菲亚特公司领导人是否喜欢这个政府的言論来看待这些矛盾。我不打算談这类性质的言論，而是要談一談自由党現在所采取的立場，我认为这个立場是有代表某种政治前景的特点。

今天，自由党要求在短期內，在最近进行选举。共和国总统似乎也有这个要求，但他的意图也許不同。自由党人之所以要求选举，因为他们认为，今天，选举除了可以維持天主教民主党的选举地位外，他們党的选票也会大大增加。这就会在議會中給建立自由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多数創造客观条件，这个多数就会不得不接受自由党的根本立場，自由党也就势必变成不久的将来的政府局势和全国政治的政治軸心。当然，自由党虽然說接受天主教民主党的所謂“社会性”，但完全反对任何关于对迄今奉行的經濟、內政和外交方針作任何实质改变的暗示。相反地，自由党在这个时候強調它支持大西洋集团的极端派，因此它是政治和社会方面保守的党。

今天，这种立場和这种前景是否符合整个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傾向呢？难說，因为自由党很久以来——大約二十多年——就不是整个意大利資產階級的执政党了；它先后把这个职能让給法西斯和天主教民主党，至少从1948年以来，天主教民主党就是整个意大利資本主义有产者統治階級的真正执政党。

自由党提出的这个前景沒有被天主教民主党接受，反而受到了公开的批評，因为在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或者至少在很大一部

^① 系菲亚特壟断集团头子。——譯者

分领导人看来，这种前景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或者至少有利于形成左翼集团。今天，这种左翼集团的建立会动摇天主教民主党的群众基础，可能使天主教民主党的团结本身发生危险，而这种左翼集团在争取意大利民主发展的斗争中，则有在不太遥远的时期内取得胜利的希望。

因此，今天在天主教民主党内，似乎是另一种前景占上风，即他们称作“扩大民主地盘”，把社会党拉到这个地盘里去。

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如何看待这个前景呢？天主教民主党在舆论中散布它自己的观点的一个权威机关报企图把这个前景说成是有产者统治阶级政策的必要发展。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企图把这个前景说成是意大利有产者统治阶级的历史传统政策的继续。在这样说的時候，他们提出历史的先例；他们提到上世紀中叶加富尔^①所实现的联合，提到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发生的，把左派干部吸收到议会集团中，甚至来实现1900年查纳德里^②和乔利蒂^③的政策转变。当然，在这个说明中，他们把许多十分不同的事情混淆在一起，他们忘记了当时历史情况的特点，这些特点不能同目前情况的特点相提并论，当时的特点是：争取全国统一的斗争，随后则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统一的国家及其政府机关的行动，以一定形式开展的阶级斗争，等等。

可是有一点可以谈一谈，即意大利在1900年到第一次大战这个时期内所实行的政策问题。而我谈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可以把当时发生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看成完全一样，而是为了把当时

① 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十九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任首相，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译者

② 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多次当过部长、议长，1901—1903年曾任首相。

——译者

③ 意大利自由党左派，1903年至1914年间曾三度任首相，对内实行怀柔政策。——译者

的事情和今天的形势作个大体的对照，以便更好地说明目前形势的一些应予批判的因素以及阐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前景的一些因素。

1900年的转折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责任

最值得注意的，所谓1900年的转折是在意大利经济发展和工业扩张的时刻开始和完成的。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说，1900年的转折是在经过几十年后才实现的真正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完成的。毫无疑问，在当时，即在本世纪的开始，意大利为了摆脱落后和不发达国家的地位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随着这一步而来的是：某些资产阶级政治集团在对待工人运动方面倾向于放弃反动的办法，而承认——因为他们不能不承认——工人运动最先进部分拥有组织和工会方面的自由，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劳动人民的贫困的生活条件的存在，而这种生活条件是应该结束的。这就是说，当时他们把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过渡的一些因素吸收到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来，但也仅仅是一些因素。

对于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具有民主倾向的执政者立场就是，承认工人运动所取得的一定成就，促进各个领域成立某些形式的组织——合作社、工会等等，但同时使社会主义运动并入整个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同议会中的许多政治力量一起，成为一个从属的力量、一个配角。

可是，需要集中注意的一点是，在资产阶级某些领导集团中表现出这种倾向的同时，保守和反动的力量也发展起来，天主教力量打入了政治生活，主要为的是起反社会主义的作用；而民主机构和劳动群众的基本自由的发展过程不断地受到约束和压制。整个过程的结果是反动的；就在那些年内出现了狂暴的民族主义运动；

1911年他們进行了一次殖民地征服战争，这次战争开始給意大利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后来他們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走向法西斯主义。

那么，在这个从长远看来实质上是带来消极的反动后果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有没有责任呢？当时社会党的立场是怎样的呢？据我看来，需要强调两个决定性因素：一、当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前景，因而没有制订能够开辟国家向以社会主义为前景的民主发展前进的纲领；二、缺乏团结。

当时意大利社会党看不到意大利社会的基本问题，或者很迟才局部地看到这些问题，而且不善于把这些问题作为改变当时意大利政治斗争条件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它看不到南部问题、农民问题、梵蒂冈和天主教运动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等，也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必要的阐明和进行必要的政治斗争。

当人们试图看一看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制订的纲领性方针和前景的时候，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笼统的词句、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词句。当时政治前景是提得不具体的，这种具体性只能从如下事实产生，即：应当对纲领问题进行深入的、触及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基本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还缺乏团结。虽然当时该党是完全统一的，但党内存在着一个由改良主义者领导的议会党团，这些改良主义者也没有遵循改良主义政策，而只是企图向政府争到一些局部的让步。这种情况是同政治前景上的完全盲目相适应的。在1906年改良主义者谈到当时可能开始的“第三阶段”，即实行改革阶段的那个阶段，他们没有看到保守和反动的浪潮恰恰在那时候向前涌进，这些浪潮后来占了上风。

在党的基层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最高纲领主义幼稚病，而这种情况在危急关头则爆发出来，它使人们在工会方面进行特种形式的鼓动，有时也通过政治运动和政治罢工。当利比亚战争爆发时，

在都灵举行了罢工，議會党团发生了分裂，因为一部分人支持发动战争。当世界大战爆发时，都灵、勒佐·艾米利亚和其他一些城市举行了罢工，而领导机构提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战争的口号。

无论就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来说，当前的形势是不同于那时的，而且是大大地不同的。今天我们也是面对着工业的扩展，同1900年左右发生的情况相当，虽然条件不同。但是当时的国际条件是帝国主义发展以及后来导致世界战争的那些深刻矛盾成熟的条件。而今天我们处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特点是：世界的一部分向社会主义过渡，两个世界的竞赛，殖民主义的结束以及争取和平共处制度的斗争。在这些条件下，今天，在意大利，旧式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代替这种发展的是什么呢？是对大西洋极端主义的支持。那些表达意大利最保守和最反动分子的意见的集团和报纸今天煽动反对力求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各国人民，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些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问题上都站在大西洋极端主义阵线一边，这些问题包括：苏联问题、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刚果、果阿、新几内亚问题等。今天大西洋极端主义狂热是保守和反动集团反对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进展可能性的最明显的斗争形式。

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不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
装饰品，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因素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存在着，它已经变成巩固的体系，它在全世界公众面前存在着。这里产生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积极意义；我们肯定说，我们应该加强这种团结，应该把它不是看作我们偶而提到的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一种装饰品或者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因素。今天，

如果我們要同我国的保守和反动的集团斗争的話，我們就應該肯定无产階級国际团结的原則，这些原則鼓舞着我們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鼓舞我們爭取和平共处与穩固的持久和平的斗争。

因此，今天国际政策問題在整个我国政治形势中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共和党人拉·馬尔法^①坚持这一点，而他这样坚持也許是因为他感到在今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問我們，我們是否承认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道路不同于苏联、中国或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們只消这样回答他：我們从1944年起就肯定了可能的发展道路的不同。从1944年起，我們就說，西方国家能够遵循不同的途徑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个途徑是根据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政治条件以及承认西方国家人民群众在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某些成就的价值。

他們問我們，我們是否承认像西方一些資产階級大革命所肯定的那些民主原則的价值。什么話！我們不是反复指出正当西方有产者領導階級拋棄民主旗帜、把这面旗帜扔进海里的时候，我們就拿起它来并把它变成我們的旗帜嗎！当然，我們承认民主成就的实质价值，而这倒不是因为这种成果表现在这一种或那一种机构中，問題不在这里。民主的各种机构具有历史性的价值，它們是通过历史創造出来，也通过历史发生变化的。我們承认民主机构的价值，因为我們参加这种机构的生活，我們試图使每一个民主机构成为我們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前进的一个因素。

可是，今天在西方国家民主的命运是怎样的呢？你們怎能不看到，今天在“民主的”西方国家所出現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深刻的瓦解过程，这个瓦解过程通过抗拒、通过为了阻撓殖民主义制度各种残余被消灭而进行的武装斗争表现出来，通过各种旧民主机构

① 共和党的一个领导人。——譯者

的蜕化表现出来，像法国所发生的那样，它还通过用一切手段进行的、旨在阻撓人們組織工人階級先鋒政党的斗争表现出来，像波恩、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那样。当我们說为了拯救民主必須向社会主义前进时，我們所注視的正是上述情况。

还有其他事情我們也要說一說。当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已經开始具体地提出深刻改变統治階級以便走向社会主义的問題时，目前的資產階級領導集团求助于什么东西来阻撓这种改变呢？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求助于武器的暴力！正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們才提出沿着民主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景并为此而工作，使广大的劳动群众集結在人民先鋒队的力量周圍。这种斗争和这种前进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民主保证。如果不开始西方社会的經濟結構改革和政治結構发展的过程，那么民主就势必衰敗和消灭。这是意大利今天所面临的现实問題。

面对着这个問題，今天人們議論紛紛的中左政府勾当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可能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它可能是旧式的应变勾当，或者可能是一种革新的开始。它可能是这样一种勾当，即只是按照一些意大利政治集团在1900年和1910年期間所鼓吹的精神来进行的勾当，目的是俘擄社会党，使它起支持政府的从屬作用，与此相应的是人民、民主、工人和社会主义力量团結的破裂。可是，如果它表现为有意識地采取一系列的步驟来实现或者至少开始国家政策向左轉的話，那么它也可能是革新的开始。

今天在統治政党天主教民主党領導人的趋向中，上述趋向中的哪一种趋向占上风呢？他們想要的是什么呢？是作为应时之計和分裂勾当的中左政府，还是作为国家政治方針的长远、广泛和深刻的革新实施的开始的中左政府呢？就目前而言，可以說，占上风的不是革新的要求，而是应变的打算。这可以从他們如何提出同社会党的关系問題上看出来。例如，他們說，搞中左政府的勾当，

天主教民主党就可以走出碉堡而投入为摧毁共产党——就是说最先进的民主力量——的影响的斗争。可是我们应该考虑到，这并不是所有在天主教民主党中战斗或是投它的票的人们的想法，也不是所有天主教民主党干部的想法。多萨同志^①非常正确地提到一些表现了领导艾米利亚天主教民主党的那些人的立场的文件。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矛盾的过程，我们应该了解、研究这个过程，而不应对它漠不关心。

在其他希望成立中左政府的政治力量中，也有同样的矛盾过程。在社会民主党乃至在社会党中，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有这种过程。我认为，事实上社会党的多数不可能接受如下的关于中左政府的解决办法，即：给社会党以从属的职能，根据天主教民主党某些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意图，缩小社会党；这些领导人认为，如果社会党的领导人进行有害的应变勾当，那么通过该党所发生的危机，以及它的选民也可能发生的危机，它就会缩小。

我们早就作为基本的力量 插足于意大利民主中

我们必须考虑到上述各种争执和矛盾，以便决定我们的方针和行动。有些人辱骂我们，因为——像他们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插足于这个局势和这个运动中。但听到他们这样来谈我们党只能令人失笑。我们早就插足于意大利民主中，插足于肯定、保卫和发展民主的过程中，而且我们是作为主要的基本力量参加进去的。如果没有我们党，意大利的民主制度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就不会有我国所存在的比西欧其他国家为多的那种民主气氛，就不

^① 意共中监委副主席，波伦区市长。

会有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也不会有我们今天在天主教民主党内也看到的那种民主要求。

只要想一想 1949—1953 年时期就够了，那是个艰巨和困难的时期，当时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第一次受到大规模的进攻，这个进攻的高潮是欺骗法提案。我们击败了那次进攻，我们不仅抵抗，而且采取了广泛的政治行动，这个行动从某些要求出发，并把群众运动的某些部分推向前进，甚至使它们取得某些阵地。

因此，我们在研究今天必须如何前进的问题时是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力量和责任的，我们考虑到在回顾 1900 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时所看到的消极因素，并且看出如何行动来克服它们。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些消极因素总的说来是，缺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发展的明确前景，没有在这个前景范围内制订纲领，以及工人、民主和人民运动缺乏团结。

因此，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景和需要向全国提出一个目标。这是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我们曾力求依靠第八次和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称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即走向新社会的民主进展的那条路线的实质。

向左转的必要性是同这个前景相联系的，向左转意味着在革新我国经济政治方针方面有力地前进一步。这种转变的因素是：争取和平与共处政策的斗争，经济和社会的彻底改革的要求，确认新的领导阶级或者至少确认会导致新领导阶级形成的过程，在这个领导阶级中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拥有迄今未曾有过的地位，因为像格隆基总统所说的，他们被排除在国家大厦的大门之外。

我要强调首要一点是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在这方面，最近几个月，我们已经作了一些重大事情。但我們要注意不要忘記这个斗争，因为它对于政治转折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所谓对“社会性”原则的确认，不仅会是一种矛盾，而且会是一种欺

騙，因为伴随这种确认的会是对大西洋联合中最极端势力的支持，正如現政府的政策那样。这会是某种以后不会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进展而是为反动和保守力量的进展开辟道路的东西。

此外，必須有一个綱領，而我們的職責就是对这个綱領的制訂作出貢獻。我不接受这样的建議，即认为，我們今天應該拼湊可能成为我們所要求的政府的綱領內容的各点。我們宁願看一看，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才需要在議會中来这样作；但今天問題是制訂更广泛、更深刻的綱領，在这个綱領中，有时候也可能插入一些局部的目标。主要的是对于能够引导整个运动而且是朝正确方向来引导运动的綱領的制訂作出貢獻，这个正确方向就是：深刻的經濟改革、深刻的政治改革和深刻的社会改革。

在我們中央委員會上上次會議中，我們把一个新的积极因素引到我們的政治行动中来，即：我們对那些要求成立中左政府的政治集团說，請告訴我們，他們的綱領是什么，請把它提出来在群众面前討論。我們已經得到了一些回答，而現在我們不能不答复，要求他們告訴我們，他們要依靠哪些力量来实现所提出的各点綱領。可是，除了对这个要求的答复外还应该补充一点，即：綱領的制訂必須能够立即提出一些引起劳动群众深刻关心并能够立即开展群众运动的斗争目标。

在我看来，这些是决定我們在爭取成立新政府的运动中的立場的主要东西。

但是，怎样才能取得积极的結果，特别是怎样才能造成一个运动，即某种真正的运动呢？首先必須从对經濟和社会形势的确切判断出发，使我們能够提出符合群众的目前情况的要求。有人說今天我們面临着壟断資本的扩张。不錯，这是意大利形势最独特的因素。可是我們要注意：壟断資本扩张并不是形势中所有的各种因素。不要认为我們只是重复了一个提法就是很好地作了分析。

今天意大利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于下列因素造成的，即：（1）工业的蓬勃发展，（2）壟断資本的加强，（3）壟断資本加强过程在农业中的反映。我們應該整个地看待所有这些因素，因为壟断資本的扩张和加强并不意味使工业的发展整个从属于大壟断資本。大壟断資本的发展是趋于占上风的主要因素，可是也有其他发展因素，培基欧利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正确地强调了这些因素的存在（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工业中，也存在于农业中）。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因素呢？因为，在我看来，确切地知道工业如何发展，对于正确地制订工人阶级的当前要求具有很大的重要意义，而且也因为这些因素对于使我們在深入生产性中间阶层方面取得进展，具有很大的重要意义，生产性中间阶层今天正在经历一个相当明显的分化过程，一些集团富裕起来，而另外一些集团则贫困了。

我們應該从这一点出发，以便找到同中等阶层很大一部分人的接触点和相互谅解之点，这些中等阶层包括手工业者乃至小工业家。我們不要忘記：中等阶层今天在整个整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有着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我們應該善于依靠他們所理解和能够支持的一些立场和要求——因为这些立场和要求是以對他們的境况的确切理解为根据的——来接近他們。

这里产生了团结問題并且使团结問題必然成为突出的問題。如果我們要实现向左轉，我們就應該考虑到，如果不同那些今天不准备追随我們党、沒有組織在总工会內但像我們一样希望政治方針发生深刻轉变的社会集团和政治集团达成某种形式的相互谅解，就不会实现向左轉。如果我們希望創造使我国局势发生变化和实现民主革新的条件的話，我們必須同这些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建立接触。

在这方面也提出了同社会党同志們的接触和論战的問題。虽然社会党人在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方面距我們甚远，但是他們是一个很大的工人和劳动人民运动。我們應該考虑到这个运动的方針，并且应当能够在制定推动全体劳动群众的斗争目标这个基础上同他們有真正的接触。

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是沿着走向 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前进的一个条件

在同社会党关系方面，我要劝大家避免像《前进报》对我們那样进行論战，那是一种尖酸和恶意的論战，这种尖酸和恶意既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愚蠢之至的。我們應該同社会党人开展論战，但必須从意大利形势的根本因素出发。社会党同志們认为我們應該怎样才能前进呢？他們认为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力量团结在争取向左轉的斗争中起什么作用呢？他們如何看待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党的应变計謀呢？

正是在这条路綫上提出了单一的劳动阶级政党問題。很显然这是一个遙遠的問題，并不是为今天而提出的。但我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呢？首先是为了回答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內希望成立这样的党的人們。但我提出它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为了着重指出，如果这样的党是要领导工人阶级和领导劳动人民运动去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政党，那么有一些总方針和綱領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因素当中，列在头等地位的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同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的互相信任的关系。不会有一个排斥这个因素的单一的劳动阶级政党。因此我才結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后我們所爭論的各种問題来談這個問題。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同我国形势有更直接的联系的綱領性問題，我們應該对

这些問題表示态度，但我們对劳动阶级单一政党問題——虽然它还是远景——提出答复也是好的，即使仅仅是为了让人們了解我們感到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团結的必要性，因为这个团結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上迅速而稳步前进的一个条件。

如何克服党应该作的和正在作的工作两者之間的不平衡

談到直接关系到我們党的工作的这些問題，我同意若干同志的意見，他們說在应该作的和正在作的工作两者之間存在着不平衡，可是他們並沒有忘記強調我們在制訂政策和进行某些大規模的真正斗争方面获得怎样的进展。但如何克服所存在的而且是很大的不平衡呢？要用通过辯論、通过更多的同志参加政策的制訂从而参加党的实际工作而取得正确方針来克服。

在解决这些問題方面，党所取得的进展不是各地都一样的。但讓我們提醒一下，这种不平衡是不能用官僚主义的措施来克服的，例如，由中央作出一个好計劃，然后看看地方上如何实现它。而是我們必須依靠同志們的正确政治方向来推动地方上的主动性，檢查我們的政治路綫的执行，从而推进其实现。

特別必要的是，我們要关心我們党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力量不断增长，关心选择目标，同群众接触来发展真正的群众行动和發揮党的政治主动性。貝林格同志会詳細地談这些問題。我只想着重指出，在目前变动中的形势面前，如果党丧失或者削弱群众性政党的特点，那就糟糕了。因此，吸收党员和党员登記的工作今天具有也許比过去更大的重要性。

特別需要克服去年党员登記和吸收党员方面的一些不可理解的缺陷。例如，在妇女当中，正当妇女涌入生产領域以及工业和农

村劳动妇女群众进行大规模斗争之际，如何解释党竟是在这方面落后了呢？只有用方针和工作的重大缺点才能解释。南部地区和新工业区的缺点也同样如此。因此我劝同志们强调下述必要性，即：通过吸收党员、党员登记乃至增加地方组织的数量和灵活性，使党在我国社会各处都能够存在和积极活动，来保持党的群众性。这个提法是我们1944年提出的，现在也必须仍然予以恪守。

在选择目标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要满足于字面上。“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光说必须争取这一个或那一个企业国有化或使农村所有制关系发生这一种或那一种改变等等是不够的。首先必须把争取工厂、农村的劳动者和中等阶层的特定要求、争取关于国家结构和生活的组织问题的要求、争取实施区域机构等的斗争等放在首位。可是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应以长期的政治行动来支持，在这个行动中还必须结合宣传鼓动，同敌人，也同盟友辩论，并通过整个运动来寻求对于实现我们所提出的各种目标是必需的那种团结。

争取结构改革而斗争就是说，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基础而战斗。如果想要取得成果，就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根本的努力，在各方面进行工作。因此我同意罗珊达同志的意见，在我看来，她强调了这种必要。对于这个目的，群众运动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我看来，缺点最多的地方仍然是农村，特别是南部的农村。我请南部的同志们再次集中注意这个问题。过去在南部我们拥有非常弱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未曾拥有——举例来说——一个工会或一个政党所能够具备的那种力量，但我们曾拥有在某些时刻和为了达到某些目标而使群众最低限度地动员起来的巨大能力。这就造成了前进的可能性，而仅仅依靠党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获得这种可能性的。因此我们应该加强今天存在

的各种群众組織，但同时研究一下，是否还有可能建立其他的統一行动形式。在农村，特别是南部农村，仅仅靠宣傳是不能前进的，而要靠提出得到整个整个社会集团支持的具体要求。

党的革新和加强的过程就意味着在我前面扼要指出的所有这些方面取得进展。要前进同时糾正錯誤的事情，不要让革新变成集团的斗争从而削弱团結；不要让党内形成一个监督別人作事情的要人阶层；要利用党的全部力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以便在各方面取得进展，并通过政策的深入研究和各級組織的思想加强来支持这种进展，使它成为可能和普遍化。

我认为已經进行的辯論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而且以后还会有好处。它激发了新的力量，并使之行动起来。現在必須运用我們所激发的力量，运用在党内相当大一部分人当中所出現的热潮，来对待目前发生的一些問題的实质，即向左轉、中左政府、国家的經濟和政治革新的問題；来对付敌人的联合，說服和爭取更多人的支持，从而对于建立正在爭取我国革新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結作出巨大的新貢獻。

（譯自 1961 年 12 月 24 日《团結报》）

在意共成立四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陶里亚蒂在佛罗伦萨庆祝意共成立四十一周年紀念会上讲话，在談到意共所经历的道路后，他說：

“根本的問題是和平与战争的問題。原子武器使战争的性質发生了质的变化。双方没有一个能够說，它有最起码的信心能够在同敌人的武装冲突中安然无损。

我维护上述观点，即使是同其他同志不一致。如果发生一場原子冲突，那么不仅会有几千万和几亿人死亡，而且我們所想象的各方面的人类文明也将蕩然无存。从文明的廢墟上和灰烬中，不可能产生我們所向往并为之而斗争的那个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須通过現社会的革新而不是通过它的浩劫，从現社会内部产生。

由此人們得出这样的結論：必須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但是我們要补充一句：由于爱好和平国家以及向往确立巩固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力量的实力已經占优势并且日益加强；战争不仅必須避免而且能够避免。

誠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和平力量面前，有帝国主义者，他們根本不排除战争而是在准备新的战争。那么我們的行动路綫應該是怎样呢？在我們的国际运动中也有不同的立場。第一种立場，也是我們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立場，肯定：为了维护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和平力量必須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爭取和平共处的胜利，就是說，必須对引起摩擦的一切最尖銳問題进行耐心的和不断的探討，以便把它們摆在桌面上，进行討論并通过甚至是妥协性的協議，来一个一个解决它們，从而消除緊張局势和創造互相諒解

的气氛，作为普遍裁軍和建立稳定的和平的前提。

· 德国問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被篡夺的席位，保障从殖民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各国人民的独立，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些最紧迫的問題。这是爭取和平共处的路綫。

还有另外一种立場，就是：集中注意力在揭发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否认局部解决的可能性。这种立場的支持者就这样把自己关在某种宿命論之中，把自己排除在解决問題的道路之外，并且仅仅依靠一些主观因素，如社会主义国家經濟的日益发展，和客观因素，如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斗爭和起义。

这里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問題。存在着同客观的不平衡有联系的分歧意見。在苏联，在四十多年前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人們在扩展和工业化新阶段的浪潮上正向共产主义迈进。其他国家較落后，一些国家处在革命过程的开端。最后，还有若干共产党在西方世界資本主义国家中，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斗爭。如何維持团結呢？必須依靠在互助和互相支持的範圍內承认任务的不同。

有些人提出这个問題：苏联是否應該向共产主义迈进，还是應該集中力量和資源来推进其他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

但是，苏联向共产主义迈进是从事物本身，从苏維埃社会最高度发展本身产生的，因而这种迈进是客观的事实，拒絕这种迈进会是荒唐的和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应用大量資源来援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援助是有的并且是极大的，而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逐漸接近共产主义，援助将日益增多，日益有效。

因此，要承认任务的不同，从而承认走向社会主义有各种具体的道路，而且决不忘記下列共同的根本任务：反对战争、爭取普遍裁軍、爭取消除以及最后消灭原子毁灭威胁的斗爭，从而在全世界

打开新的革命进展門戶,这样才能巩固团结和一致,来反对共同敌人。我們党将继续进行研究,进行政治上的探討和斗争来对这条路綫作出贡献。”

(譯自 1962 年 1 月 22 日《团结报》)

为促使意大利当前形势向左轉而斗争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會議上的报告

(一)

爭取使国家的方針发生深刻的变化,更明确地說,爭取国家政策向左轉的这种要求和斗争,一直是我党政策的一个根本因素。在目前朝着这个方向行动的人們当中,有許多人过去由于属于这种要求所反对的保守势力集团,或者由于与保守势力有着某种联系并支持这种势力而远沒有朝这个方向行动,即使在那时候,我們的政策也是如此。

看来也許这一点是明显的,即由于抵抗运动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力量的团結遭到破坏,反共主义正式成为一面旗帜,議會多数以这面旗帜的名义而形成,国家也以这面旗帜的名义而被統治。这一目标本来是应当成为我們行动的一个根本問題的。但是我們认为重要的是,在今天回顾和強調我們的长远要求若干年来在不同的环境中所包含的内容,以及我們是怎样为其实现而工作和奋斗的。即使在我們和工人阶级組織受到最激烈的和往往是最愚蠢的攻击的时期,我們也从未让自己局限于或者被迫进行一种單純的反抗和原則上的全盘反对多数派或只是对它提出否定的批評。我們的敌人企图把我們描繪成一种只会提抗議——多多少少是吵吵嚷嚷的抗議——并且固步自封在这种抗議之中的力量。这是不真实的,是經不起事实真相的檢驗的。在我們的行动中,坚决的反对和抨击,总是同积极的因素,同作为爭取經濟、政治和社会革新总計劃一部分的建設性建議結合起来的。

这种性质的计划鼓舞了统一的抵抗运动；它的基本轮廓为宪法所采纳和承认，被视为指导共和政府的总的准则和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时应予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些在实际上并没有兑现。宪法被搁置起来了。它所规定的种种改革没有得到实行。抵抗运动的反法西斯精神、经验、原则和纲领一概被遗忘了。歧视代替了人民和民主力量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旧的保守政治制度同其传统的反动集团一起复辟了。

因此，我们的反对和我们的斗争，是根据原来的民主和社会革新的共同计划进行的。我们一向竭力使这个计划变成关于政府的新方针和关于经济、政治具体措施的积极建议以适应形势的需要、适应国家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是根据真正深刻革新的政治社会制度这个伟大的前景在各种情况下，强调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最尖锐的问题。

·我们一贯为和平与缓和紧张局势——这是国家利益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所提出的迫切使命——而进行的斗争，就是上述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坚持提出旨在遵循宪法所规划的路线，实现真正革新的经济建设的具體路线，也是这一斗争的组成部分。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我们在战后不久争取民族团结的行动；争取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要求；劳动计划的拟订——这一计划在全国所引起的反响是如此深刻；以及全面土改计划的拟订；争取实行和扩大议会已经通过的农业结构的局部和有限改革措施；为南部和其他落后地区工业化而进行的斗争；在劳动群众的面前并在他们的参与下民主地制订地方和大地区复兴方案和计划这种强烈的要求；在争取建立大地区制度的行动中所作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等等。提一下下述事实并不是多余的，目前的执政者所吹嘘的若干创举——例如在塔兰多兴建一个炼钢厂等等——不但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提出的，而且正是根据政府企图禁止的那些

政治和工会力量所制訂的建議建立的。

历年来，意大利劳动者不仅证明了他們具有惊人的組織能力和战斗性，而且也已普遍觉悟到自己有任务要求和促进經濟結構和民主制度的进步的革新。他們为达到此目的而施加的压力是如此广泛、坚持不渝和声势浩大，誰也沒法忽視它，沒法按照旧神話的說法把它看成顛复活动或看成共产党人策划的阴謀。向左轉的問題目前之所以显得如此紧迫，而且必須面对和加以解决，其原因之一，或者可以說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让我补充一点：如果說关于經濟和政治結構改革的要求已經摆脱籠統的提法，而变成具体的斗争目标——也許还没有广泛到足以夺得决定性胜利的程度，但已足以激动广大劳动阶层和范围日益扩大的輿論界的是非之心——的話，那主要是归功于我們，就是說归功于我們如何从一开始就提出并領導了工人階級以及劳动群众在当代意大利社会中采取了行动。这种情形必然会影晌——事实上已經影晌了——所有民主性质的运动或多少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各种运动。归根到底，連最頑固的經濟社会方面的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也理解了这一点。因此，即使天主教民主党最近举行的党代大会主要討論的是他們与社会党的关系問題，我們也非常清楚，这种討論的背景，以至整个大会的背景，就是我党的存在和我党的力量，如果不是企图找出別的办法来制止或进一步阻碍我們爭取国家政策向左轉、爭取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斗争的話。但是向左轉的需要已得到了如此普遍的了解和肯定，所以我认为他們要达到上述目的是很困难的。

(二)

在我們最近的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高兴地看到人們

开始如实地引用我們的討論的发言，而不再采取历来慣用的歪曲作法——我們不仅关心更深入地理解、更好地論证和闡明我們的政策，而且还积极地进行制訂关于意大利民主制的經濟和政治革新綱領。正如我說过的，問題不仅是忠于反法西斯民主斗争的总方針，实行宪法所規定的原則，而是要在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形势下做到这一切；这种新形势的造成是由于工业生产的有力发展以及从而引起的我国經濟结构的改变。特别是从1960年以来，在我們一切活动中，对于新事物的研究和确切估价这些新事物的努力是不断地坚持进行的，这些研究和估价首先是涉及社会的变化从而涉及爭取实现某些当前要求的斗争和爭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长期斗争的条件。

有些人在走上这条研究和指出新事物的道路方面是迟鈍一些，这或許就是他們至今仍看不见当前局势中的一些主要因素的原因。这些主要因素中的最重要者——我們強調这个因素——就是私人壟断資本及其领导集团越来越紧地控制我国經濟生活的领导权从而控制着政治生活的领导权。人們常常听到政府和执政党的代表們吹嘘經濟的进步；他們把这种进步归功于所执行的政策。这种观点应受到一番十分深入的批評。工业的发展、意大利的經濟生活重心从农业轉到工业、国民收入随之提高等等，是目前資本主义世界相当广闊区域内起作用的一些总的因素所促成的。在这个区域里，出現一种飞跃的現象，这是整个制度演变的特征。在这一方面，政府的方針並沒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是起了作用。相反地，政府的政策在确定經濟发展的方式、确定哪些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哪些人付出代价，哪些人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领导这个发展，哪些人只能承担这种經濟发展的消极后果等方面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首先是那些統治意大利的人們无疑應該对大壟断資本的严酷統治負責；現在，从我国人民中

最优秀的部分，已經提出对大壟断資本的抗議。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这种大壟断資本的統治是特別有害的。

从壟断資本擴張的矛盾中 产生的普遍民主要求

上次大战結束的时候，我們面临种种悬而未决的問題、穷困和矛盾。拖我們的后腿的不仅是相对地发展的資本主义的弊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剝削和因此引起的斗争；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特有的經濟停滯和殘酷的階級压迫；而且还有深重的灾难、可悲的不平衡和国内社会的真正分裂，这种分裂是我国的历史所造成，因为我国的統治階級一向只关心頑固而自私地保卫他們自己的特权。在壟断資本領導集团领导下而且只是为了这些集团自身利益而实现的工业发展，也不例外。規定这个发展的趋向的是謀求最高額的壟断利潤，而不是对全国的經濟和社会重大問題，以及解决这些問題的必要和方法的絲毫关心。因此，这些問題在今天是很紧迫的，而我們的形势的特征就是新旧的混杂；一面是无耻的豪富，一面是长期貧困；用先进的計劃来加强剝削劳动，为私人攫取利潤，新和旧的不能解决的矛盾紛乱地加深和交織在一起；在有限的部門实行怀有私心的恩惠主义；在发展状态方面存在着大相悬殊的現象，发展本来不应局限于工业和經濟方面，而且應該包括社会进步、福利、安全和自由。

对于現在还被人叫做經濟奇迹的那种現象，已經有了正确的批判性的估价，关于这种估价，我們不需要再說。凡是不但关心劳动階級的利益，而且也关心国家总利益的人，都会同意这种批判性估价的。工人、农民、中等阶层已經为这个奇迹付出了代价。它并没有提供办法来解决与我們的未来休戚相关的問題，諸如学校問題——这个問題的解决仍然刻不容緩；就业問題——也仍然极尖

銳，尽管大批大批的人移居国外；南部問題——仍然大大落后于北部。新的、同样尖銳的問題錯綜复杂地出現，而都未获得解决。例如，农业結構的总危机；全国地区間的悬殊情况日甚，有的地区比較发展但很混乱，有的地区人口日益减少，土地被廢棄、境况蕭条；形形色色的投机倒把、貪污腐化流行。

問題不仅是了解，在这种形势下，怎样不可避免地出現普遍而热烈的爭取实现种种要求的願望。相反地，我們必須承认，即以全国生活各个行业 and 各个部門的单独要求而論，有关的群众运动并非到处都开展到客观需要的程度。問題是除了爭取实现某种要求的运动之外，还有一种涉及国家生活領導方式的民主性质的要求。大壟断資本的絕对統治加深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而且使更多居民阶层感觉到这个矛盾。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团人数越来越少，圈子越来越狹，他們的专制統治的趋势越来越加剧。但是，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都反对这种統治，他們意識到自己事实上遭到排挤而不能参与国家生活的真正領導，因而就提出制止这种状况的要求。这就說明为什么人們如此普遍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要求民主地参与国民經济的領導；要求制訂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发展計劃；要求国家更多地干預国民經济，起一种反壟断資本的作用，要求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門国有化。

这些有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要求是从客观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日益广泛的觉悟中产生的；与工人階級和人民有着最直接联系的一些組織和党派的政治行动經常表达了这些要求。为了滿足这些要求，为了解决經济发展和国家生活的最迫切的問題，我們过去和現在都要求經济和政治的民主发展，并将这个总要求变为明确的綱領要点。但是其他党派，如共和党、社会民主党、激进党、天主教民主党的某些派別以及各种性质的运动和团体也在討

論、研究和提出同我們類似的綱領要點，作為整個政治活動新方針的一個部分。輿論界態度越來越鮮明地支持這些要求。

(三)

必須在這樣一幅巨大的圖景中——其中有變化與發展、國家生活的動蕩、新舊矛盾、勞動群眾的新舊要求——來觀察和判斷最近天主教民主黨代表大會的工作和結果。有些天主教民主黨的領袖表明自己已經懂得不能再用舊的方法來應付目前的形勢和問題。我們只能向他們表示祝賀。但是，毫無疑問，他們之所以重新考慮和修改他們的立場，並不僅僅由於對經濟作了一番最深入的分析，而是由於群眾運動不斷產生的壓力、工人運動的重新高漲、農村的鬥爭、新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戰鬥團結的加強、1960年6月和7月的壯烈鬥爭以及選民的不斷向左推移。也由於他們的政府計劃和他們不惜任何代價力圖維持權力壟斷的努力沒有成功，由於1953年“欺騙法”的失敗以及“中間”解決辦法遭到公認的失敗，以至妄圖在沒有合格的多數的情況下來執政，塔姆布羅尼的血腥的試驗和曖昧的勾搭。我們現在也能够頗為滿意地看到，天主教民主黨統治者們叫囂了好幾年，說我黨處在危機之中、最後已被孤立起來、被排除在一旁，他們收羅了大批選票，花了億萬錢財，而現在他們竟不得不承認，他們已被孤立在一座碉堡里了；而為了在公開的場地上解決那些刻不容緩的問題，他們不得不走出這個堡壘。

因此，讓人們歡迎為探索“新的一頁”而作的努力，歡迎對過去進行的批判性修正以及對新情況的適應和更新立場。可是我們認為重要的是明確地解釋這些一般聲明背後的意圖是什麼。不論對經濟政策或者對政府陣營，都必須仔細研究。

甲

莫罗先生所作的經濟分析中並沒有很多新的內容，只是較多地触及实际。以前的多塞蒂集团——莫罗先生曾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員——在批評資本主义制度方面要比他深入得多。所以当制宪議會制訂公民的新社会权利时，这个集团曾經是我們的同盟者。天主教民主党書記的报告企图把某些当代經濟学家研究出来的一些手段翻譯成最时新的經濟政策術語，这些經濟学家看待資本主义，就像一个医生站在一个患重病的——也許是痼疾——的病人床边，企图想出一剂良药来把病人治愈。在这个病例中，良药就是通过各种措施，实行更多的国家干預；这些措施不应再限于提高公共开支，也應該包括国有化，以至某种类型的計劃，以及对生产市場的直接干預，并应能够克服最尖銳的矛盾和处理最迫切的問題，从而保障整个制度的效能和生命力。

目前天主教民主党現任領導者們的政治計劃中 沒有旨在削減壟斷資本权力的任何断然行动

这样一种經濟方針的基本特征仍然是經驗主义；只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沒有革新的明确打算或全面的計劃。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信賴一批干部的技术能力，政府授命他們干預經濟；信賴一个由各种性质的委員會、理事会构成新的官僚組織的效能。在范范尼先生看来，这第二个因素是极关重要的，我相信这是适合他的性情的，他的性情中仍然保留着若干过去的特点。尽管所宣布的意图是首先考虑最貧苦階級的利益，但对于那些經濟問題，从它們的人道角度来看，从民主生活和发展民主制度的需要来看，却缺少一个有条理的、全面的观点。所用的詞汇也有了改变。現在再也不談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他們不談农民和农业劳动者，而談农

业企业，以及談把這些問題作为技術問題而不作为社会問題的道理。他們多少超然地考虑到南部地区进一步减少人口的需要，甚至考虑到由于欧洲共同市場扩大的結果，意大利南部可能会长期蕭条。对分租佃制只是順便提到一下；但是根本沒有提到全国农业會議的結論：“对分租佃制不符合現代农业的需要。”沒有提到工厂劳动組織的人道关系和各种要求的問題，而解决這些問題是为了防止資本家所實現的合理化和自动化逐漸取消工会的胜利果实，加深对工人的剝削，以致使工人在短期內变为机器、早衰和殘廢。

如果好好地观察的話，最近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作法本身是符合上述趋向的。还是和从前一样。普通人的呼声、被剝削者和穷困的人的抗議，他們都沒有听到。天主教民主党的干部似乎越来越像各种国家或公共机构的官員，他們是通过半官方的权力手段来联系群众的职业政治家。国家企业的发展本身，就促成这一类型領導者的增加，也足以解釋这种人物的观点，但也說明了这类人的局限性和弱点。

可是，在这一切的底下，却有一个极大的錯誤，一个根本的缺点，这是在矛头指向我們的、关于国有化問題的爭論过程中暴露的。人們一直說，国有化的确定不應該是为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动机，国有化也不應該全面实行，而必須被当作可以在新的經濟方針下采用的权宜手段的一种。我們首先應該指出，現在誰也沒有要求在意大利实行全面的国有化措施。我們从来沒有提出、現在也沒有提出这种要求。我們始終承认国有化公共企业和广大私人企业并存。我們說过，在意大利这样的一个国家，不容許全面实行国有化，甚至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时也是如此。我們清楚地說过，一部分私有企业的存在“不但不会危害新社会的建設，而且由于所有生产力的充分發揮，会促进这种建設”。那么，为什么要求实行国有化呢？为什么要求实行經濟发展計劃和国家干預国民經濟的領

导呢？这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因为这种要求是许多在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的集团共有的，而是由于一个更简单的、然而更迫切的理由。要求实行国有化是为了反对、限制和可能消除大垄断资本的日益增长的摧残力量的。如果要以新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当前形势的问题，那么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这是民主地发展经济的一个关键。我们并不要求缩小私人企业的领域，但是我们要削减大垄断企业的势力和专权的地盘。国有化是为此目的而采取必要的断然行动的手段。

但是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目前的计划中缺乏的正是这一点。而这更确切地说明了他们的立场。

我并不认为这些立场——像人们有时说的——仅仅是大垄断资本或者一部分大垄断资本的阴谋诡计和预谋的计划，目的是依靠国家的帮助，为其自身的利益，实行目前意大利经济结构所需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措施。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公式化的看法，有碍于透彻地理解事物的实质。我宁可认为，我们在一种新的形势下面临着要实行天主教阶级合作主义公式的新企图。天主教阶级合作主义不承认经济制度的阶级本质，即使这种本质已经比任何时候更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企图寻求妥协和调和的解决办法，绝不触动社会关系的根源，来促成深远的改革。垄断资本的阵线并不是一条统一的、一致的战线，其中有着明显的分歧。当人们谈到现代化和合理化时，就是意味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各有其经济和社会内容，以不同方式涉及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利益。天主教民主党的计划是企图对这些集团和利益进行谨慎的调解，甚至在生产活动和市场上运用国家干预来达到这种调解的目的，但是回避作明确的抉择，首先是不作如下的根本抉择：使所有国家活动具有反垄断资本的内容。在必不可免时他们打算同某些垄断企业进行谈判。如认为在这一类谈判中，垄断企业最后总是不能使他们的

利益压倒全民集体利益，那是可以怀疑的。归根到底，大壟断資本和国家机器将在經濟生活中建立越来越广泛的联系，而且会打成一片。人們将会更迅速地沿着組織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道路前进，而国家資本主义就是資本主义发展的最先进形式。

但是，在我看来觉得很明显的是，在这样的前景之下，不論局部的或根本的經濟問題都有了不同于过去的內容和意义，因此，就給爭取有效地革新社会的斗争打开了新的道路。

乙

如果直接就政策方針和政府陣容来看，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出現的打算中有許多部分是更清晰了，虽然还有若干非常模糊的因素。

有积极意义的是，拒絕同极右翼势力达成協議，因而也拒絕了类似在关于費烏米契諾机场問題的辯論終結时支持了政府的那种議會多数。但是在这方面必須不断保持警惕。今天在所謂西方国家，出現专制和法西斯式制度的危險是經常存在的。

对过去的“中間”政策的批評和拒絕同自由党联盟也是积极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情况就开始显得模糊，因为完全沒有排除这一点：在选举之后或者在“中左”政府經過了不能令人滿意的試驗之后，可能又要搞这种同自由党的联盟。

**天主教民主党人企图使社会党拋棄其团结立場，
这就暴露了他們政治手法的策略性质**

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成立中左政府，作为必要的解决办法；但是，出于什么样的必要，則未加說明；究竟是从議會观点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用通常的老办法来解决；还是从政治观点出发——就是說，要实行一套新的明确的綱領。他們

只是一再說，問題在於使社會黨改變其團結立場（與共產黨團結的立場），因此，又一次把我黨的問題——就是說要“孤立”我們——作為中心問題。所以整個作法的策略性質不可能比這個更明目張膽了。情形是如此清楚，代表大會的某些關於社會黨的提法對社會黨來說是侮辱，而不是恭維。即使他們說，社會黨可以支持這一新的政治措施，而不要求它立刻分裂勞動階級的運動的持久團結，可是他們立刻補充說，或者讓人們懂得，這種事情將逐步地來，團結的破裂將是一個目標，而不是它出發點。但是勞動群眾的統一運動、農工的團結一致的鬥爭、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和地方議會民主左翼選民的聯合壓力，是促使用完全新的眼光來看待有關國家經濟政治革新的一切問題的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分裂現有工人階級的和民主的團結形式的企圖和努力明白地透露了天主教民主黨領袖們公開宣布的目標和真正意圖之間的深刻矛盾，暴露了在他們的新想法和新作法掩蓋下的計劃，這種計劃決不是進步的，而是打算保持住整個意大利政治陣綫或使之倒退。此外，與此相應的是，他們不斷堅持政府行動的連續性，而為了前進，必須大大地改變這種行動。

即使他們終於表示願意實行憲法的某些規定，如建立大地區政府，這種保守的立場也是顯明的。這種諾言在今天是要同社會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一起取得議會多數所必不可少的，同時隨着這種諾言還有許多保留和疑問，因此，導致新的拖延的道路是敞開着的。他們小心地避免作出關於立刻舉行大地區議會選舉的明確諾言，而今天唯有這種明確的諾言才是真正的新方針的保證。

當轉到檢查國際政策問題的時候，這種停留在舊的並需要克服的立場的情況就更明顯了。如果在這方面沒有根本的轉變，要想在政治和經濟方針方面實行革新是很困難的。誠然，莫羅先生和范范尼先生都肯定去年夏季提出的關於促進大國談判和緩和國

际紧张局势的創議是正确的。但是这类創議当时只是偶然的事情；它們并没有同新的有机的对外政策結合，而且当时在議會提出这些創議时，外交部长同时却肯定了旧的死硬的方針。誠然，莫罗先生自己在嘮叨不休地叫嚷反共濫調之后，也承认要使社会主义世界后退是不可想像的事。但是，这只是純粹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它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断壮大和发展，而肯定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統治集团增加了智慧。

我认为，报告中提到最近美国總統的言論和立場的一些話，是没有价值、甚至是消极的。美国總統也曾說了一些有意思的話，但正是他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了武装侵略，正是他促使軍备竞赛达到目前这种一触即发的程度，迫使苏联恢复了核試驗，正是他在最近組織了埃斯特角會議，在这次會議上，美国要强行封鎖古巴共和国，而古巴的罪名是把某些大壟断企业收归国有，把土地交給农民，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否定每个国家建立自己所相信的制度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的自由，无异否定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再沒有更好的证据来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統治下的世界并不是自由世界了。請看法国的混乱局势，法西斯鬼魂又在那儿出头露面了；請看波恩德国、葡萄牙、希腊，如果想得到证明的話。

如果不公开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政策，

意大利的革新是无望的

如果不公开摆脱上述国家的国际政策方針，要想在意大利进行某种革新都是徒劳的。在这方面，我們的立場、建議和行动必須鮮明；例如，我們應該不允許再让美国把我們的国土当作原子武器基地使用，大多数其他大西洋联盟国都不願这样做。我們不仅可以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經濟和文化关系，而且可以同这些

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明确的目的就是迫使所有大西洋集团具体地走上缓和紧张局势、和平共处和裁军的道路，并放棄目前使国际关系继续恶化的道路。

至于和亚洲、特别是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天主教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正确地表示，应该广泛地发展这种关系，这要求采取与帝国主义大国不相同的立场。这些帝国主义大国目前企图在经济援助的幌子下进行新形式的渗入和殖民统治，这种新形式的渗入和殖民统治，事实上摧毁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政治自决的自由，阻碍它们的经济制度得到自主的、蓬勃的发展，使旧宗主国能够保持对它们的经济资源的掠夺。意大利不应采取这条道路；它不能、也不应为了我国大垄断企业而参加争夺新型殖民地地盘的竞赛。我们的行动方针必须大大不同，唯有联系到我们的外交政策方针和经济方针才能做到这一点。业已宣布了的与帝国主义领导集团建立的大西洋“团结”是今天在实践中必须摆脱的束缚。

在等待实行成立一个稳定的中左政府（作为新政治方针的第一步）的决定的时候，上述这些意见和批判性的保留应该能够提醒大家产生某种警觉。我们将把记录事态的进程和进行预测的任务交给新闻界。这些任务一向是艰巨的，而在这种情形下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任何真正的改变都会遭到多么强烈的反对，在另一方面，即使最顽固的保守派也有着很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我们责成我们的议会党团担负起观察形势和提出我们的观点并使这些观点的价值得到人们承认的任务。

(四)

作了上述分析之后——这个分析我认为是客观的，没有掩盖消极因素和回避作必要的批评——我们必须得出对形势的全面看

法，这种形势是由于天主教民主党領袖作了关于要同中左党派建立政府的新的多数的決議而产生的。

我认为应该完全反对这样的意見，即认为不論怎样做，絲毫不会改变形势，因为不会改变我們社会的階級本质和結構，因为不会改变統治階級，而这一階級的利益将一直压倒一切。这是一种傳統的最高綱領派虛无主义这种立場，無論怎样用教条掩盖，也始終是虛无主义，就是說它沒有能力理解社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也就沒有能力通过批評和行动进行有效的干預。

同样錯誤的是认为既然天主教民主党領袖宣布該党已經更新，新的政府多数行将成立，所以一个新的紀元将要开始，那时政府将会采取主动滿足群众的合理要求，宪法将要实现，而且得到尊重，一切都非常美滿。政治上的弊病、天主教民主党的保守反动观点，就是我們的社会和居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不可免的禍害的表現。在那不勒斯党代表大会上，完全沒有听到大会提到天主教民主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以及解放初期曾采取的人民力量团結的立場。相反地，大会宣布繼續执行天主教民主党后来所做的一切。大会从头至尾都揮动着反共旗帜。

我們一直认为一个单独的党是不能处理和解决經濟建設和政权問題的；但是我們又一次被誣蔑为极权主义的。而天主教民主党統治意大利的天职——誰知道要統治多少世紀和有什么根据——却被說得神圣非凡。因此，这种权力壟断的願望是很难根除的。不顾一切地进行公开斗争和狡詐的阴谋活动，首先是为了保持所謂天主教徒的政治团結，这也是符合上述願望的。但是这仅仅意味着天主教民主党的团結，因为在意大利，支持各种党派的所有群众都是天主教徒。

**如果实行中左方針，我們爭取真正向
左轉的斗争将更容易，在某些条件下，
也可能具有更有利的前景**

因此，有理由怀疑，当目前正在进行的阴谋活动的隐秘目标不能实现时，那么，在一定的时刻，对新的政府方案的探讨以及有关的新纲领的制订，也可能成为暂时的东西，或者表明只是一种暂时的东西。而且人们又要宣布有新的必要来重新采取中间主义的解决办法，或者回到同自由党建立稳固的联盟。

所有这些批判意见都有其真实性；必须记住，但是目前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上面。

关键是必须指出，不论天主教民主党领袖们怎么说，不论他们的意图和行动如何，我们正在面临政治斗争的新阶段，这是主客观发展的结果，是从形势本身产生的矛盾、不平衡、需要和问题，同时还有阶级差别的尖锐化以及从劳动群众中产生的民主要求所造成的结果。现在我们要问，当被称为中左政策的方针付诸实施的时候，我们和真诚的民主力量争取真正向左转的斗争会更容易或更困难、会有更有利或更不利的前景呢？我们毫不犹豫的回答是，整个说来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争取国家的经济政治革新的斗争的前景将是新的，但是更加有利，这种革新是通过严格实施宪法，通过有效的反壟断行动，满足工人的切身要求，在新的客观条件下发展和调整民主制度来实现。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必须在与以往不同的水平上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将提出新的问题，要达到的目标也需要有新的确定。为此，从十月以来^①，我们就敦促所有党派不应仅仅要求新的政

^① 指1961年10月意共中央全会，詳情見本集陶里亚蒂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譯者

府，而應該靠攏來進行綱領的制訂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是顯著的。目前，今天在輿論界面前已經有一個經過相當仔細地制訂的反壟斷經濟政策的大綱，從這種大綱中，已經有了某些當前的目標。這些目標是：廢除對分租佃關係，電力資源的國有化，立即建立大地區政府，作為解決南部問題的決定性措施的南部工業化，等等。我們密切注意了這一綱領的制定，並認為它具有積極意義。我們根據我黨上次代表大會所確定的、並由我黨中央委員會作了更充分的闡釋的立場——這些立場我黨所有同志都應牢記不忘——過問了上述綱領的制定。我們特別重視社會黨提出的綱領，雖然那種把綱領的實施不大可理解地分為幾個階段的作法是有害的，這種作法可能是取決於當前議會鬥爭的需要，而不是取決於正確的政治判斷。我們打算進行辯論以便更深入地探究這些問題。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不能停留在这个階段上。如果認為現在把幾個綱領湊在一塊，讓執政者們去執行，過一段不知多長的時期再去看看原先的綱領是否需要改進以及如何改進，那就完全錯了。綱領的制訂需要進行工作，需要有不間的批評、鼓動和鬥爭。不作這種努力就是一種讓步，這是必須提防和避免的。我們的根本要求和主要的口號必須是：從綱領到行動。

此外，必須指出，所有的綱領，即使包括社會黨的在內，都沒有談到直接與工人階級有關的一些問題和要求，如工資太低、社會保障和工人階級的前途，工人階級的政治自由和工會自由，以及工人階級積極參加領導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意義。總工會有它自己的、值得注意的經濟政策綱領。我們必須把它當作新形勢中的一個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而必須使它成為眾所周知的文件。在努力促成國家經濟的民主發展方面，工會組織能夠而且應該起首要作用和擔負首要任務。但是，如果目前各工會組織之間的分裂和鬥爭能夠得到克服，那麼一定能更好地確定和完成這些任務。

我們申明，我黨是主張通過成立獨立於僱主、國家和政黨的單一的工會或者如果還不能成立單一工會的話，就採取其他辦法來克服這種分裂的。

天主教民主黨的書記在那不勒斯黨代大會上對我們進行了冗長的攻擊，說我們企圖用種種的創議、行動、鬥爭、建議、與其他政治力量的會合和合作來掩蓋或偽裝我們的真正目的，這種目的就是“**改變目前社會和國家的統治階級**”。真象是，我們不但不掩蓋，相反地，我們一直公開宣布我們的目標。說實話，要發現這是我們的目標，是並不困難的。毫無疑問，我們希望以體力和腦力勞動者階級為首的不同經濟和權力集團來代替目前大壟斷資本領導的經濟權力集團，體力和腦力勞動者階級創造社會財富，而且是唯一能夠為所有人的利益管理社會財富的階級。因此，千真萬確的是，我們的行動，通過各種各樣的創議和運動，旨在孤立和擊敗大壟斷資本，粉碎它的權力，並在這個鬥爭中團結各階層勞動人民成為穩固的聯盟。這種聯盟幾乎應該說就是將來統治整個社會的經濟和權力集團的前身。根據這種原則立場，我們認為工人運動的問題、工人運動的要求和組織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正在研究目前經濟問題的些一中左黨派的具有民主傾向的人士們也許還沒有正確地理解這種意義。這是一個必須彌補的缺陷。唯有工人階級運動才能給爭取向左轉的鬥爭以取得成就所必不可少的推動、全國性的規模和堅決性。人們應該記得，反法西斯鬥爭的情形正是如此。當先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在同一行動的基礎上會合并團結起來時，鬥爭就取得了勝利。

我已經說過，如果創造了某些條件，爭取向左轉的鬥爭就會有更有利的前景。最主要的一個條件是，必須從提出要求 and 綱領轉到爭取實現這些要求和綱領的群眾性行動、運動和鬥爭。如果沒有群眾運動的干預，情況可能依然如故，控制形勢的也可能仍然是

保守集团、或者企图分裂工人阶级、分裂人民团结的那些人。这就是我们以及所有民主力量的有组织的活动应该全力以赴的中心问题。人民运动、群众中间的辩论、劳动阶级的动员和斗争，不仅必须揭露两面手法和屈从行为，使投降行动无从发生，而且也必须指出有效的反壟断措施的道路，指出经济计划 and 发展的目标，并使民主力量产生越来越大的声势和能力。

这里需要提到我们自己常常表示的见解，那就是，总之，我们会遇到的无非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和目前的执政党所策划的应变阴谋罢了。不可否认这种情形。这种意图是存在的。有些人谈到通过破坏人民力量今天存在的团结来实现“民主范围的扩大”，就公开承认了这种意图。但是，采取应变阴谋始终要有下述前提：某种运动的存在、统治阶级阵线中的内部矛盾、承认劳动者争到的某些果实、承认为了保存整个制度，某些让步已不能延迟。在本世纪最初十年中，在乔万尼·乔利蒂的领导下，自由资产阶级也曾企图采取这种作法。我以前已经说过，现在再来说一遍：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那个历史时期中所犯错误就是缺乏团结，特别是未能用自己的政治谋略，绕过最高纲领派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派的机会主义的暗礁——来积极地干预形势。如果采取这样的做法会使工人运动介入当时的整个运动，打开并扩大资产阶级的阵线的缺口，抓住政治主动权，粉碎资产阶级的保守计划。我们今天必须避免重犯上述错误。如果重犯那些错误，就会造成与那时候类似的后果：几年之后，我们面临了反动攻势，其中已经包藏着法西斯主义的萌芽。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必须接受向它提出的挑战，它不应该、也不能够拒绝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战斗，它必须有自己的首创精神，并在行动和斗争中体现这种首创精神。

**如果我們善于很好地工作就不存在
我們被孤立的問題，可是存在着
爭取向左轉鬥爭的效率問題**

我們並不隱瞞这种做法的困难；我們也不隱瞞工人階級和人民力量的團結，不隱瞞社会党本身的團結受到的威胁所具有的严重危險。但是不要认为我們所关心的是所謂被孤立的問題。只要我們善于很好地工作，就不会有這個問題，因为我們党有力量、有經驗，而且联系群众，在国家生活的許多方面，我們同群众是打成一片的。問題在于爭取向左轉的鬥爭的效率和成就。这不仅代表我們和社会党同志們的利益，而且与整个工人階級有关，与先进的农民群众有关，与反壟断的中等阶层有关，与知識分子和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天主教民主党左派有关，与所有忠于宪法、并希望意大利人民得到和平、民主和工作的人們有关。分裂現有團結的意图无异是要击败那些要求向左轉的人們。但在这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行动，通过組織一个运动，通过制定其目标，通过实现这些目标的鬥爭，来解决團結的問題；这样就能粉碎保守派的計劃。在旧的組織基础和政治基础上，以及在与人們今天提出并希望解决的新問題相应的新基础上，可以保持和捍卫这个團結，同时也通过在这方面努力改进、探索、接近和相互了解来扩大團結。

这也就是爭取向左轉的鬥爭取得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

(五)

說到这里，我們應該自問，我們党是否胜任上述对形势的簡單分析中所指出的任务；我們党是否具备必要的方針、力量和政治能力来有效地和胜利地进行爭取向左轉的鬥爭；也必須看看我們党

是否已經正确地走上这条道路。

我們的回答，总的說来，應該是肯定的。但是，必須本着批判的精神来檢查我們工作的許多方面，而这將特別是这次中央委员会會議的任务。

首先，必需正确地估計我們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正确地估計这个形势中所表現出来的并使工人阶级和民主运动必須經歷的新阶段具有某种特征的新因素。在这方面，不是所有事情都那么簡單，正如我在前面已經尽力說明的，不是人人都看得那么清楚。我不想談某些人思想上的疑惑和混乱，这些人不是从具体研究客观情况出发，而是企图根据揣測、根据錯誤的类推或局部真理，根据輕率而肤淺的判断来寻找或提出預言。在揣測的領域內，什么都可能正确或錯誤。至于預言，那就根本談不上确定政治远景了。通过一次討論——就像目前我們的地方組織中已經或正在大規模进行的那樣——这些錯誤是很容易糾正的。而这种討論則又一次证明了我党的民主性质。

当討論涉及爭取向左轉的必要斗争以及由于建立中左政府而产生的变化的内容和实质时，对于在我們党内和社会党内部出現的若干立場和論断的看法必須是不同的。正和大家剛才听到的，我們也不会閉起眼睛不看天主教民主政策的消极方面，其政治計劃的保守内容，及其或多或少地加以掩盖的意图。为了不至于解除自己的武装，必須不断地坚持这种批評；而这种批評是涉及一些根本性問題的。可是有些人的观点是不同的，他們认为目前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在新的基础上巩固整个現有政治經濟制度的一个过程罢了。这种观点沒有看到形势的基本因素，沒有看到资产阶级势力本身的分化和内部分歧这个因素，特別是看不到人民群众斗争这个因素；而在决定不久前的政治陣綫的危机，从而决定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改变想法和新的傾向方面，人民群众的

斗争始终是最强有力的因素。人们认为用公式和笼统的字眼——例如壟断企业和新资本主义——可以解决一切，可是不愿意分析经济和政治现实的各个具体方面。随着这种倾向发展下去，最后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固步自封，可是，这种现象并不缺少修正主义的出发点。

那种出发点就是，例如，过份地强调以及几乎是颂扬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前途和发展。据说，资本主义已在进行一次伟大和深刻的“革命”。不大清楚他们所谓革命究竟是指国家壟断资本的发展呢，还是仅仅指大量生产物质的和精神的消费品，使得头脑简单者惊叹不止。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发展，内部包藏着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萌芽的成熟，但是，在基本上，它们只是深刻的矛盾过程的结果，并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之间的根本矛盾更尖锐，使每个国家根据其历史的条件而特有的具体矛盾更尖锐。必须集中注意力探讨这些矛盾，而不是单纯记载外部过程。否则就会为现存制度辩护，而不是批判这种制度，同时要为那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批判形式，即群众性行动，开辟道路。

至于这种行动，已有的结论是：无产阶级现在必须“同发达的资本主义较量”。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真理，但是，如果除了重申这一点以外，没有得出今天必须用“公开的搏斗”来对付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论断的话，那还是缺乏具体的说明。这话说得响亮动听——还带点儿军人味，因此当然是很激昂的——但是它在实践上会成为什么呢？在想要把它付诸实践的各种企图中，我认为唯一可以给予肯定评价的是寻求在资本主义工厂组织和雇主权力的目前条件下进行工会斗争的新形式的种种努力，虽然在这方面，有时也出现公式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做法。

**工人的要求的任务是必須触及国家經濟和
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戒除
宗派主义的关门作風**

至于在其他方面，我們碰到一种批評，这种批評的目的是要否认和抹杀工人階級和共产主义运动根据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立場，在制定符合目前条件和各国的情况的战略和战术方面所取得的所有进展。工人和各种农民結成联盟的必要被排斥了，农民中只有发达的資本主义企业中的农业工人被认为是今天的革命力量，而忘記了在目前的意大利，反对現存的經濟状况的斗爭的强大推动力是来自沒有土地的农民。为距离高度的資本主义发展还很远的落后地区和居民的要求而进行的斗爭，也受到怀疑和不信任。因为，据說，这些要求不是“階級”的要求，可以加以忽視。仿佛工人的要求的任务不應該涉及国家經濟和政治的各方面！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傳統的基本价值和全国团結的意义也不再受到珍視，因为据說同非工人的民主力量的团結，在这样进步的世界上，已不再是现实的了。从法国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多么錯誤。此外，抵抗运动的政治果实——例如，共和国宪法——也被低估了；这些人怎能不懂得这个宪法——它表达了一个偉大的、胜利的群众运动的目标——和一个世紀前君主在1848年所仁慈地施予的宪法在历史上和政治上的本质的不同呢？同样，工人階級的全国性作用以及它在目前的历史时期的作用也不再得到理解；已經取得的所有民主胜利果实以及所有具有民主內容的要求都被怀疑，仿佛这些果实和要求意味着工人階級的先鋒队不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創建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奇怪地自相矛盾，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形式民主的要求，而不努力去理解那些国家已經取得和正在取得的真正民主成果。

总之，我們面对着某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最終会导致新型的“經濟主义”。工人階級及其斗争被孤立地、不联系其政治和社会矛盾来理解，一切都被归结为資本与劳动之間的原則性矛盾，被归结为由此产生的意識形态的对立。

所作的唯一具体努力是，把工人监督的要求作为中心，作为目前工人階級整个政策的目标。如果同广大而复杂的工会和政治运动的联系来看的話，这种要求今天无疑是有现实內容并且是合乎时宜的。这种运动应该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甚至議會民主方面以各种形式开展，使工人监督的要求具有现实性和可以实现。否則，它就变成关于沒有根据的目标的空想，因为在提出它的时候，工人階級的各种問題脱离了总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各种問題。

要使一个口号成为有效，而且政治上正确，那么，只是从教条的观点看来有道理，是不够的。同样地，一个工会組織为了完成其組織工人階級的职責，光靠宣布罢工，也是不够的。一个工会随时可以宣布罢工。重要的是它必須能够使罢工取得胜利，当然，这也并不排除失敗，作为教訓和准备也是有好处的。

最可笑的是，这种教条主义，尽管是从公式出发而不能变成一种政策，却一再断言必須在資本主义更为发达的西方社会探索和制訂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这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探索和制訂道路的工作。

我可以容易地承认，这是一个难题。但是它不能靠公式来解决。事实上，关于在一个发达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制度下如何胜利地进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还没有任何經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这个問題的时候，投降了，甚至连社会主义这个詞也拋棄了。英国工党最初向某些結構上的改革推进以后，又陷入旧的狹隘經驗主义中去，看不到前途。法国的社会党人为一个独裁政权开辟了道路。比利时工人最近的大規模斗争并没有表現为一种彻

底的反壟斷政策。北歐的經驗并無任何普遍意義。

在我們的學說的經典著作中也沒有明確的啟示，除了列寧的一個極為寶貴的啟示以外。他在批判資產階級民主及其發展時，作出了下述結論：

“徹底發展民主制，找出發展的形式，用實踐來檢驗這些形式等等，都是為社會革命進行鬥爭的任務之一。任何單獨存在的民主制都不會產生社會主義，但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永遠不會是‘單獨存在’，而總是‘相互依存’的，它影響經濟，推動經濟的改造，受經濟發展的影響等等。這就是活生生的歷史的辯證法”。^①

對於研究和解決我前面所指出的問題，對於在一個偉大的歷史前景中決定爭取民主的鬥爭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之間的聯繫，上引這段話里面就包含着寶貴的啟示。

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統治的傾向以及 爭取發展和改造民主制度，擴大 人民主權範圍的正確鬥爭

我們一向承認，我們結合勞動群眾鬥爭來解決經濟政策問題的方式歸根結底會導致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關於國有化和國家干預生產市場，關於制定發展計劃等建議，都表現了這種傾向。誠然，恩格斯早已說到由於工業大規模的集聚而事實上實行的計劃化。但是，今天却有了一个新的因素，因為是國家有意要實行一些計劃措施。但這種國家的性質如何呢？難道國家資本的這種發展不促進民主制度的發展嗎？甚至在這方面，也有人犯了重大的公式主義錯誤，他們認為國家對經濟活動進行這些新的干預必然是或者必然成為專制的國家。我不否認政治上的專制傾向是從大壟

^① 列寧：《國家與革命》。見《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9頁。——譯者

断資本领导集团的本性产生的。但是，我肯定，这就是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因为在这点上，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运动提出其传统的民主自由要求和新的要求，这种新的要求的产生基础，就是根据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新条件以及发展和改变民主制度的需要。

我们从来不认为民主制度是固定的、永远不变的。某些自由党流派所表达的法制国家概念不是我们的概念，他们的国家概念只是局限于肯定某些自由权利。我们也要求那些权利，并希望宪法庄严地承认这些权利。这是一个实质问题，而不是形式问题。但是宪法也庄严地承认了另一个原则：人民主权的原则。要贯彻这一原则，人民主权不仅是选举权和议会制度。也需要平等的社会条件和人类的尊严。为此，宪法也承认了新的社会权利，就业的权利，获得公正报酬，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因此，由于这一点法制国家概念已经有了新的内容。我们从政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及进入其中建立的关系。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实现这种变化呢？共和宪法的价值，除了已经谈到的一般政治价值之外，就在于至少指出了通过规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改革来实现这种变化的一些办法。这些改革旨在使人民主权成为真正的、有效的主权。但是人民主权怎样行使，也就是说，在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国家倾向于担负重要的新的经济任务，人民主权的范围怎样扩大？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度来解决。

工人阶级必须看到并理解这个任务。如果把自己孤立起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独的要求上，就不能对这一任务的实现作出贡献，相反地，应该努力使自己的联盟体系不断更新并得到扩大，给自己提出符合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政治目标。必需时刻警惕任何向专制倒退的企图，并与之进行公开的战斗，这种倒退的企图迟早会导致法西斯式的制度。同样必需的是通过群众的参与和他们的斗争来争取使新的政治经济创议具有民主的内容。

教条的公式主义会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使它看不到新的任务，在目前危险性特别大，因为它助长宗派主义和故步自封，造成蔑视与其他政治势力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接触、甚至辩论；它使人不能清楚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使人不能在新的条件下胜利地行动；它使党的行动毫无效果，使党陷于消极。我们队伍里目前政治斗争的主要打击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因为这是最大的危险。我们知道，而且也不会闭上眼睛不看，我们的许多敌人为了在事实上分裂工人力量的团结，和败坏工人阶级的意识，而散布种种荒谬理论，根据这些理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因为统治阶级本身承担满足经济公正和社会进步要求的任务。我们并没有闭上眼睛不看这种危险。但是，我们知道，避免这种危险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击败我们队伍里和人民群众当中的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事实上，拒绝担负目前政治斗争的任务，而敞开大门，让各种异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渗透进来。

击败和克服各种形式的宗派主义，是使争取向左转的斗争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

(六)

我现在就党在若干方面的活动作一简单的批判性检查，并就最迫切的任务，作出扼要的提示。若干问题将由其他同志以及中央委员会的整个讨论来作更全面的论述。

我们队伍里存在着对政治方面正在出现的新趋向的浓厚兴趣；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满意。可是，还没有同样迅速和广泛地转到必要的群众行动形式，包括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公开讨论和接触，以至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运动。我们波伦亚和艾米里亚的同志们在形势的发展中采取有效的创举是值得称赞的；他们要求

省議會和市議會的其他政党代表同我們辯論地区經濟发展的最迫切問題，以便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再次強調建立地区政府的迫切性的那次會議的創議也是正确的。这些連續而又及时的創議——其他地方和其他方面也有这些創議——使得我們的政治行动成为有效和富于成果，使其超出了单纯論述的范围。必須弥补这方面仍然存在的严重缺陷；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牢記爭取向左轉的斗争中的主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問題。同志們知道这些問題就是：

——爭取和平和爭取实行新的意大利对外政策的斗争；

——爭取大大增加国民收入中工人階級收入部分和使工人階級参加領導国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斗争；

——土地改革；从速廢除对分租佃关系；

——立刻进行大地区議会的选举，这是在劳动人民代表的参加下确保經濟发展計劃的制訂具有民主性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与这一問題关联的，是地方自治权的維護和扩大；

——采取击破壟断資本陣綫的行动，打击电力和糖业壟断企业；

——爭取通过迅速的工业化和改变土地关系以复兴南方的斗争；

——进行教育制度的民主改革，通过撥款和充分实行宪法規定，設立具有現代的教學大綱和必要的設備的单一制义务学校；

——自由問題，消除政治歧視的一切殘余問題，反对过去的蒙昧主义做法，如出版檢查制度、无綫电——电视广播的狹隘、反动的指导方針等等的斗争。

还可举出其他問題，因为意大利整个經濟和社会生活都需要深刻的革新。党的任务是在任何方面都决不能落后，必須有自己的創举或者支持其他政治力量的行动。

在我們各方面的工作中，对于所有民主的、人民的势力，不管

他們屬於什麼黨派，我們都有責任使我們的各種創舉具有團結的性質。例如，我們必須停止——就像有時候發生的——只是根據人們對社會黨同志們的意圖的追究，而對社會黨的同志們進行純粹是否定的批評這樣極有害的作法。在社會黨的右翼中間，無疑是有投降打算的。使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甚至里卡多·隆巴迪同志也認為我們同社會主義國家保持階級的團結證明反共的政治排斥和歧視是正當合理的。難道無產階級國際團結不是社會黨勞動群眾階級覺悟中的一個構成因素么？因此，讓我們根據事實來批評各種錯誤、讓步和錯誤的立場吧，但是我們不要錯誤地以為社會黨和天主教民主黨之間有了較多的接近就會造成勞動群眾之間的更深的鴻溝或者分裂。

在我簡單提到的各個方面，我們的工作都有着非常積極之處，也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和落後現象，我們在上次會議上曾詳細地談了這些現象。

在開展爭取和平的鬥爭方面，已經採取了許多有益的、正確的和有很大成果的積極行動。其他行動也在準備之中。不要鬆懈或者減輕壓力。必須在群眾當中徹底提出和普遍宣傳要求美國從我們領土撤除原子基地，必須使輿論界注意這個要求。我相信，真正群眾性的公民投票也可能在某些地區舉行，只要我們能夠在這一問題上取得其他力量的合作。

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新老工業地區工廠中的工會活動和黨的宣傳工作和活動都必須最密切地注意有關工人階級，有關提高其工資、談判權力從而提高其政治權力的鬥爭的各種問題。工廠會議所作出的決議還有待於充分實行。

不錯，在最落後的地区和所有的地区，必須努力謀求最適當的辦法來克服目前的不平衡狀況和保證經濟的民主發展。但是我們決不要忘記，我們的這種研究不能以教條主義的抽象見解為根據，

而必須根据对形势的全面認識，必須首先重視劳动階級的經濟进步問題，反对穷困，反对落后的生活条件，反对强迫移民、工資过低、不公正的社会关系、住宅和学校的缺乏、工作的缺乏等等現象的斗争，并給予这些問題以主要的地位。我們在制訂我們的綱領的过程中，决不能放棄在群众中揭发目前形势的一些常常是触目惊心的現象。那些說我們这样做就是保卫我們社会和經濟中最落后的部分的人是可笑的。我們肩負进行不懈斗争的任务，为了促使經濟进步变为社会进步，必須解决那些对于人的生活 and 尊严极关重要的問題。

我认为我們还没有同那些在目前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居民阶层建立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接触。我所指的，一方面是非壟断性的中等生产阶层，这些阶层在某些地区有显著的发展，他們常常依赖于大壟断資本，但因后者威胁着他們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們就倾向于反抗大壟断資本并同它們斗争。另一方面是与学校、工业生产和农业变革有联系的技术人員和知識分子力量的阶层。这些阶层往往与資本主义的保守的集团有联系，他們受到这些集团的影响，但是他們也能够理解到爭取民主发展的需要和要求。我們應該采取特别的措施来弥补工作中的这些缺陷。

为了完成所有这些方面的全部任务，我們必須切实地保证、保持和扩大我們党的群众性，增加黨員人数，采取特别措施克服征收女黨員方面的缺点，加强共青联盟組織，而首先是加强在各工厂吸收新黨員的工作和党的活动。剛解放的时候，我們使我們的党有了这种群众性，这不仅是作为遵循我們的思想導師們的指示的一个原則問題，而且首先是为了政治上的和实际上的理由。我們認識到，在我們遭到正面攻击的那些年代里，这种群众性是多么重要。我們从我們的斗争以及爭取实现要求和爭取积极的解决办法的一切民主力量的斗争的效力中看到了这种重要性。当时所收获

的成果就是目前正在形成的政治上的轉折的根源；如果共产党沒有在所有形势下保持其偉大、人数众多、活跃、战斗的群众組織的性质，那些成就也許是不可能取得的。今天則比以前更有必要保持这种性质，我們應該拒絕在这个問題上作任何保留和任何的犹豫，这种保留和犹豫往往是在处理和解决我們革新和加强党的問題上的机会主义、組織上的无能、缺乏决心和錯誤的結果。

同志們，現在要由你們来討論所提出的問題了，要你們更具体地指出弱点、缺点和錯誤，但是也应该指出那些积极的方面，这些方面使我們有信心，即使在政治生活的这一新阶段上，我們党也能够作出最偉大的貢獻，以實現向左轉，爭取意大利社会的民主革新和朝向社会主义的新进展。

在結束这个报告之前，請允許我就有关目前我党的領導問題談几点意見。我們不應該隱瞞——而我並沒有隱瞞——目前形势中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可能会造成某种迷惑，甚至混乱。（苏共）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产生过这种情形，当时在一場必要的、而且有成效的辯論中，也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立場和仓促的論断，这些后来已經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糾正。甚至在关于成立中左政府前景的辯論中，也暴露了一些混乱。當我們从批評和辯論进入彻底的行动和斗争，爭取實現向左轉的时候，无疑地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因此，一方面，必須通过更好的政治上和意識形态上的准备来特別注意对問題作出更深刻的分析。正在筹备中的大地区代表會議对达到这一目的是有用的；对这些會議我們有很多期待。另一方面，必須更多地注意我們一切活动的政治領導。事实上，我們需要在見解上和行动上有一种坚实而持久的政治紀律和团结。如果让一部分同志的錯誤見解造成无所作为和錯誤，那是不能容許的。同时，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各級党組織的首創精神和开展政治工作；我們知道要达到此目的，必須进行討論和广泛的思想交

流。困难在于如何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而不牺牲任何一面。正是在这一点上，应该表现出我们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所有参加这种领导的人的能力。中央委员会必须发挥作用，不仅是通过集体讨论，而且要靠全体委员的活动，中央委员们必须起到统一全党方向和活动的作用，因为中央委员会正是统一的领导机关。必须更多地注意领导方法，无论是在中央或在地方组织中。必须避免任何可能造成新老干部之间的裂痕或误会的立场。但决不可堵塞心窍，不理解新事物；从新的形势中涌现出的新干部必须加以使用。同志们可能犯的错误，应坦率地指出和予以纠正，而决不可以粗暴地对待他们，给他们扣上不能容许的帽子。一切有损党的团结或降低领导者权威和威信的事，必须避免。不能用棍子或鲁莽行动来领导党，而必须依靠讲道理和说服，以及依靠那种必须始终通过言行本身来巩固的权威。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必须注意考虑我们采取的每一个立场的后果，这样才能领导。地方组织和群众的接触现在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地方组织的领导者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有责任保证这种接触，以利于一切政策的制订和政治工作，特别是为了帮助更高级的领导机关和在这些机关中工作的同志们的工作。因此，如果要使党有真正团结，就必须保证有两个方向的不断的思想流通：从中央向下以及从基层组织向中央流通。因此需要建立密切合作和信任的关系，消除任何形式的误会或流言蜚语，这些只会降低党内生活的水平，给党内生活带来有害的个人因素。

如果我的意见中联系了大家都知道的非常一般的原则，批评了一些显然只有次要意义的事实，那就请原谅。但是即使小事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加注意，它们可能成为麻烦的因素。我们的党是坚强、健康而有能力的。如果我们领导得好，我们将能够实现需要实现的目的。

（译自1962年2月14日《团结报》）

方 法 問 題

在确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一个大党的政治方向，规定其政治目标和工作任务的时候，有一个东西特别重要，就是要有这样的能力：不把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或者看作同样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可以而且应该归结为一个共同的总概念，可是，在它们具体的实际存在中，它们是彼此不同的，而且往往是非常不同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对形势、对社会集团、政治集团的立场和运动以及对个人行为看法。我们的学说的大师们曾多次提出这个告诫，但在目前时刻，即在现代社会的结构和上层建筑迅速发展以及不断地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这个告诫特别有效。甚至在最近的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我们都听到过去一直是而现在也仍然在实质上是保守派的政客们宣称，世界在变化，经济关系在改变，改变社会关系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不愿落后和掉队的話，就必须考虑这一切。如果这种担心竟可能支配那些迄今能够有理由被列入因循守旧的以及为了不改变任何东西而妥协的犀牛之类的人们的言論的話，那么，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一个革命党是否也应该记住它，把它作为經常的鞭策呢！

例如，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进行的关于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斗争的整个辯論，都是从下列必要性出发并环绕这个必要性进行的，即：必须透彻了解我们时代的特点；不仅要看到已经发生的客观变化和建立在这些变化之上的新的力量对比，而且要很好地了解这些力量对比的意义，了解革命进展的新可能性，从而了解由此产生的前景和任务。今天可否像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者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那样看待帝国主义呢？在第一次大战前还谈不上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只有一个国家打碎了锁链和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世界的整个其他地区则仍继续被帝国主义领导集团统治。没有疑问，帝国主义的客观性质和定义仍然和过去一样，同帝国主义的这种客观性质和定义相应的政权的根本趋势也没有改变。可是，目前的具体现实是另一个样子了。这样说是正确的：在这个新现实面前，在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不断积极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面前，以及在从旧殖民主义废墟上产生的、人们不再能用旧方式来对待的新独立国家面前，帝国主义领导集团不再能够为所欲为，不再能够做它们过去所能做的事情了，其中包括在半个世纪内发动了两次世界战争。可是，有的人即使说了这一点，也没有完全根本认识到目前形势中的所有新的东西。还必须能够了解：帝国主义领导集团不仅不再能够照旧行事，而且它们知道不可能再照旧行事。就是说，它们迫于需要，不得不寻找新的道路和手段，它们指望通过这些道路和手段，以某种方式来依旧实现它们的具体的统治目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已经不能够像五十年或三十年前那样，依靠派遣炮舰和屠杀土著居民的办法来维持它在印度一部分领土上的统治。而比、英殖民主义者已经在刚果制订和试行了一条新的行动路线，以便控制和掠夺新刚果国家的大量矿源。这是一条新路线，根据这条路线，暴力、挑衅和罪行同腐蚀相伴随，而且这条路线也不排除在“联合国”范围内——你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同当地领导集团保持和平与合作关系这付假面具！这条路线在敌对力量的压力下还可能有变化和修改，但其目的首先是要挽救旧殖民主义关系的经济实质。因此便产生了今天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东西，这种新殖民主义的许多方面令人想起美国资本主义为了保证它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而采取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排除使用公开的暴

力，像去年侵略古巴所表明的那樣，但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新因素。如果不察覺這個變化，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就會解除武裝或者武裝得不好，因為必須如實地揭發這些新因素，並用新的方式來同它們鬥爭，因為它們开辟了新的鬥爭場地，我們必須善于用適當的方式在這些新場地上行動。

如果看不見資本主義領導階級對形勢和目前階級力量對比的反應，看不見它們改變自己行動中的某些部分，並給自己的行動帶來過去不存在的因素（這不僅對於落后國家——無論是殖民地或者剛獨立不久的國家——是如此，而且總的來說，對經濟發展的最先進的地區也是如此），那就錯了。帝國主義領導集團並不排除戰爭這個前途，雖然他們已經知道，戰爭對於它們將是全面的毀滅或者幾乎是全面的毀滅（但遺憾的是，對我們也是這樣）。它們利用戰爭前景，依靠恐怖和軍事聯盟來維持自己的一部分統治，繼續動員一些士兵以刺激本國經濟和避免深刻的突然事變。可是同時它們用新的辦法來處理經濟發展和國內與國際的競爭問題。所有關於歐洲共同市場和該市場的擴展，關於西歐、美國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言論、創議和建議，都屬於這一類。它們就是這樣按照競賽準則來對待同社會主義世界共處的問題的，這種競賽準則不是什麼諒解和可能的合作，而是尖銳的對立。因此，資本主義制度在其發展的現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性質並沒有改變，領導階級的根本目標也沒有改變，可是，新的課題和新的問題被提出來了，而根據舊公式是不能解答這些課題和問題的。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更迅速和更完善地相互滲透的必要性表現得更尖銳和更迫切，另一方面，在工人階級、勞動群眾和他們的組織面前則擺着一些綱領性的目標和工作目標，如果不願意落后於事物的急遽發展，不願意被敵人的主動所挫敗，就必須正視和解決這些目標問題。

工人階級是下列鬥爭的主角：爭取徹底改變社會經濟關係、爭取結束對人的剝削和仇視，爭取贏得人的完全自由（這種自由必須表現在對社會經濟組織的統治上）。然而，如果從這一論斷得出如下結論：工人階級鬥爭本身和資產階級對這一鬥爭的抗拒總是表現為兩個對峙的陣綫，一方全是紅的，另一方全是黑的，兩個陣綫經過多少是局部地並且規模大小不一的交兵之後，以一系列的行動進入決定一切的衝突中，那會是錯誤的、幼稚的。假使事情果然如此，規劃前景就會不怎樣困難了。總之，前景會永遠是那麼一個。事實上，階級陣綫完全不是清一色和簡單的東西。它們十分錯綜複雜並且在它們之間發生的種種衝突的過程中和由於這些衝突，繼續發生變化。如果不願在看法上迷失方向和在行動中解除武裝，必須特別善于在這方面加以分辨。

統治階級陣綫總是十分參差不齊的，即使是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且不談那些在發展上還落后並且拖着沉重的舊日殘余的社會。從居于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金字塔頂端的那些集團，經過一系列中間階層，直到那些緊靠着勞動群眾，甚至可以同勞動群眾混合一起的社會集團，就是說，同那些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完全不參加、或者完全形式地參加社會管理的社會階層混合一起的社會集團。當我們談到作為資本主義制度賴以建立的權力集團，我們是指這個金字塔，其特點就是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清一色的。在頂端的各集團之間存在着嚴重的分歧，不論是由于它們的性質，即：它們與之直接聯系着的那部分經濟組織，還是由于就在同一性質的各個集團之間也可能存在的利益矛盾的鬥爭，還是由于使它們同下面集團和階層結合，從而對來自基層的運動有不同反應的那種關係。這個統治集團自然企圖永遠表現出自己是穩定的，它在自己內部解決各種矛盾，但是這些矛盾不斷受到客觀發展，即生產力發展的影響和來自下層的、各種要求所形成的推動力

的影响，这种推动力表现为人民群众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为了不断在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中赢得新的阵地而进行的斗争。应当注意从中产生的矛盾和运动，这不仅是为了从一开始就理解正在酝酿的变化，因而不至于对这些变化感到意外，同时还为了及时地发现以一个与局势相符合的运动来对付局势的可能性，及时地看到修改先前作法上的某些东西，矫正射程，定出新的目标并胜利地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斗争。

举例说，我们记得，当资产阶级经过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初步发展，开始壮大直到成为在经济上最为活跃的力量时，争取我国民族统一斗争的条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1848年到1859年发生的转折是符合那种新局面的，先前的作法，对这个局面来说，就变成陈旧了。同样我们也记得，在本世纪开始时，当工业生产有了初次跃进时，或者当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特征的资本集中过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表现了出来并且迅速进行时，在整个国内局势中发生的种种变化。经由那条途径，今天，大工业和金融垄断组织形成了并且取得了优势。整个资本主义权力集团不可避免地都受到这种优势的后果的影响，从而在寻求可以用来解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来自工人群众、劳动人民和中间经济集团的要求而提出的问题的办法中，开始了内部分化和重新集结的新过程。最概括地谈，可以说在一个由大资本垄断组织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为整个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趋于成熟并且加深，但是今天这一矛盾趋于变得比过去更加尖锐。对于其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一个过程来说，真正的领导集团变得越来越小。不仅劳动群众，就连中等阶层集团也不能真正参加对政治经济生活的领导或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监督了，因此人们就更广泛、更深刻并且更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脱节现象，与此同时，以适当的组织措施和新的政治方针来结束这种脱节现象的要求日益强烈并且更加公开地表现出来。

例如在我国，正好在现在这个时候，当壟断組織变得如此强大和如此专橫，在各方面都耀武揚威时，关于經濟规划、区域計劃、控制性干預、国有化等等的建議傳播得很广并且得到最广泛的贊同，这并非偶然的。就这样，由于經濟結構的演变而产生的一个矛盾暴露出来，其結果是，这一矛盾趋于影响經濟結構。这一矛盾无疑包含着根本的对立，它只有通过結構的彻底改变才能得到解决，但是，必須懂得是哪些条件使这一矛盾成熟，把資產階級权力集团看作是一个永远清一色和一致的整体，并不能引导我們懂得这个矛盾。誰要想睜着眼行动和前进，就必须对这个集团內成长着、存在着和表現出来的分歧进行仔細的研究。

在当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存在着比較发达的政治民主形式的地方，資產階級力量方面的差異和各种变化，是从各政党的立場和行动中表現出来的。但是，即使在这个問題上，也必須避免刻板 and 幼稚的簡單化作法。我們应当說，政党乃是各階級的专门用語。但是，人們是通过历史过程和政治发展才有了这个专门用語的。因此，政党同各階級的关系不是什么眼前的或是自发的东西。它是一种調停的結果，或是一系列調停的結果，这种关系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綱領和行动中表現出来，但这些綱領并不总是使人一眼能看清这种关系的，有时恰恰相反，这些綱領的目的是要掩盖这种关系。甚至对于一个像我們这样的党來說，它光是說自己是工人階級政党也不足以真正成为工人階級政党。只有在宣布和保卫一些特定的原則立場时它才能成为工人階級政党，就是說，必須对資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必須肯定无产階級国际团結，而且特别是必須采取行动，进行长期斗争，把一般原則体现到日常活动中去，这个行动应当为劳动人民所理解，从而逐步把他們团結到他們的先鋒队的队伍中去，团結到他們的先鋒队周圍。崇拜原則，坐待实现原則的一天，这都无助于建立一个革命政党。有助于作到这

一点的是：能够在原則基础上，发动一个适应于当时具体情况的运动，这个运动能够推进斗争的整个战綫，即使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同最終目标相距甚远。但是，研究有关工人阶级政党的問題，同本文主题沒有直接关系。

就同资产阶级领导集团有着各种各样联系，因而属于一个社会的执政力量的那些政党来说，毫无疑问，必须考虑到如下一点，即：这些政党所肯定的原則和它们的思想論述，充其量不过是策略性的。但是，也不应隱諱：这些成为一个政党同另一个政党之間有所区别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不应忽略，因为根据这个因素，可以看出完成某些任务的能力大小，这些任务在一定时刻，可能是特別重要，特別难于实现的。例如，粉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的人民民主力量集团的任务，当时如果这个集团继续执政，它就会深刻改革国家结构。

从天主教民主党在解放最初几年后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来看，从它破坏人民民主力量集团以及后来它的一切作为来看，它只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对自由党也应当这样看待。那么，为什么领导旧资产阶级国家复辟和领导这个国家上层成立的历届政府的责任落在前者身上，而不是落在后者身上呢？教会的支持和由此而来的选民群众的支持，并不能说明所有原因。或者说，至少只有在同时考虑到过去和现在都同教会的那种支持和由此而来的选举走运有着密切关系的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时，才能解释一下所发生的情况。教会过去给过自由主义政党援助，当它认为这对达到它的政治保守目的有好处的時候，但是，它现在宁可给予一个对群众所说的語言同教会的語言更加相符的政党以援助了。

也不仅仅是語言問題。自由党是不会提出什么不好的或是不坏的再或不好不坏的土地改革草案的。而天主教民主党所提出并

且使人們通过的土地改革草案，不論就方針來說，还是就实行的範圍和方法來說都不是好的。但是，这个草案是劳动群众施加猛烈压力的結果，这种压力，不仅使得某些不容忽視的客观变化成为可能，而且还使得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这一点是确实的，而且同样确实的是如下一点：如果那些年农民运动搞得更强大一些，并且以南部某些地区的那种战斗精神，扩大到其他行业和其他地区，那么，爭取普遍土地改革的斗争原会进展得快得多。

但是，天主教民主党的思想立場是否可能在某个时候，在某种情况下采取什么自主的行动，确定同大資本和大資產階級領導集团的方針和行动路綫不相符的方針和行动路綫呢？天主教民主党在宣傳中是从不以維護社会保守，而是以主張有步驟实现进步的面貌出現的。不应当籠統地和抽象地提問題，就是說，不应当只从問題的一个方面看待它，例如，从今天天主教民主党所承担的資產階級执政党的職責这个方面来看待这个問題。如果这样做，就会得到不能令人十分滿意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必須根据資產階級权力集团中現存的种种差異，根据最下层和劳动群众的推动力和要求，根据整个經濟社会組織中正在发生的变动来提出問題。如果我們这样具体努力，那么，就会得出如下結論，即：在一大堆經常錯綜复杂地相互交織并且需要采取新方法來加以解決的問題当中，即使是最干练的善于謀划在策略上为統治集团利益效劳的計謀和解決办法的人，也要面临一些难于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既可能从具体事物中产生，也可能从人們的变动、他們觉悟的提高以及他們所进行的斗争的坚决和有效中产生。于是，人們也可能求助于声明必須有新的作为，尽管与此同时，他們已經在想用什么方式可以打着新作为招牌來販賣老一套貨色。但是，也必須善于考虑在所通过的各項綱領和实际意图二者之間的矛盾，必須善于正确估計这个矛盾，因为問題正在于通过机智和

有效的行动来揭示这个矛盾,并且使它爆发。

因此,让我们回到开头所谈的问题上去吧,即关于必须正确考虑内部差异、主客观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变动——或者说得更恰当些,由此可能产生的变动——问题。后一点阐明是特别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积极因素在起作用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采取行动,展开人民群众的斗争,来打破旧权力集团的平衡,防止在不实现实质上的变化、不解决任何根本问题、不在事实上——不光是用冠冕堂皇的口令——来满足社会广大阶层所提出的革新要求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平衡,可能到最后也不会产生变动,差异可能会减少,矛盾甚至会消失。

(译自 1962 年 2 月《再生》月刊)

共产党人向政府挑战,要求它 充分实施宪法

——就中左政府的政策在議會进行辯論时的发言

議長先生、尊敬的同事們：

也許我必須說，我是被迫来开始我的发言的。我的講話將規定我党議會党团对政府声明的发言的內容，同时我将联系到議會外的估价和看法，联系到所有輿論机关对意大利共产党在現政府的筹备和組成时期所采取的立場、所提出的看法和所作出的决定而展开的那种不断的吵吵嚷嚷的、甚至是令人厭煩的运动。

他們對我們提出什么样的指責呢？一方面，我們被指責为否定了自己；另一方面，我們又被指責为不了解局勢的新因素。或者像有人所說的，我們的每一个立場都是出于策略的打算，我們的意图只是用陰謀手段排挤最接近我們的这个或那个政党。或者說，我們已經奸詐透頂，以至能够宣称贊成某些步驟，甚至贊成某个政府，目的却恰恰是阻撓这些步驟的實現和使这个政府組織不起来，并无法进行工作。

同事們，这簡直是說夢話和胡扯。但我們倒可以借此自慰，因为，我們看到这次运动的規模之大本身就是間接地承认了，证明了我們党在我国当前局勢中所具有的政治影响。所有人不断地說我們党已經陷入了危机，然而一旦需要决定如此重大問題的时候，我們党的态度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們的政治立場始終是明确的和一貫的。我們現在的立場是

从我們以前的經驗直接产生出来的，而且和这些經驗有着密切的联系。多年以来，我們进行着斗争和工作，以求实现我国局势的向左轉，也就是說实现政府政策在国内关系、国际关系和經濟活动方針方面的向左轉。我們认为，为了劳动阶级、人民群众和整个意大利民族的利益，这样一种轉变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我們认为，这样一种轉变应当真正地表现在对我們的国家政策的革新上，应当表现在坚持不渝地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上，特别是应该表现在实施宪法所指出的对于使意大利共和国成为一个真正以劳动为基础的共和国是必需的那些基本改革上。

尊敬的同事們，从1947年至1948年曾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和民族起义的胜利的民主力量的团结发生分裂以来，我們就声明，一个以长期的政治行动和斗争来实现这一轉变的时期已经开始。我們預见到这样一个时期甚至可能很长，而且要经过政治斗争中或松或紧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說，我們預见到，有的时候，仅仅是运动的苗头朝向我們所希望的方向，这种苗头应当得到我們密切的关注、理解，甚至給予应有的帮助。

可是，首先，我們一向认为，我們所要求的政策轉变必须由广泛的群众运动、由广泛的政治运动、由一切行业的劳动群众的行动来激起、来要求和强制实现，劳动人民是彻底保卫自身的利益和願望的，并能够强制要求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作为意大利政治制度发展的前提。

現在，不仅在最近几个星期，而且在好几个月里被提出并经过辯論的——特别是各中左政党和最近天主教民主党在那不勒斯代表大会上所辯論的——若干立場中，我們注意到了一些新的立場的出現，特别是某种希望政治民主革新的要求，这种要求大体上是朝着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兴趣的方向发展的。

并不是这些政党所提出的和所說的——特别是天主教民主党

代表大会上所說的——事情全都和我們所希望的事情相吻合。但是，有一些經濟政策的目标和社会政策的目标的制訂和提出与我們长期以来所制訂和提出的目标实质上并非不同。

这个变化在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是以比較縮手縮脚的、非常小心謹慎和拐弯抹角的方式表現出来的。这种情况表明：天主教民主党要从它长期实行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政策的后果中解放出来，还有障碍。

但是即使在天主教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出現了，或者至少我們认为似乎出現了企图对过去的方針作某些修改的意願，即要回到实施宪法的規定，如果不是完全实施的話，至少也是更广泛和更彻底地实施。

現在，要求彻底和完全地实施宪法，这一向是我們从1947年直到今天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我們过去和現在都知道，这些打算革新、打算改变、打算作不同于至今所作的事情的意图虽然是根据对我国經濟和政治发展的客观条件所进行的研究，但它首先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民主觉醒所取得的进步。由于这种民主觉醒的发展，才产生了席卷持有各种見解和各种行业的全体劳动阶级的要求和斗争。我們一向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領導者和鼓舞者，我們为此感到自豪。所以，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要我們去参加一次革新的运动，因为我們一直都在这种运动之中，而且凡是真正的革新运动，我們都将置身于其中。但是，迫切需要由我們采取一个新的更有效的行动，去推动那些声称要进行革新的人們，去承认無論在什么地方存在的企求革新的意願和意图，同时为此目的起推动和监督的作用。

我們的行动从許多方面提出来的新要求和新措施着手，但通过在全国发展广泛的、真正的政治运动来起到推动和监督的作用，这个运动必須能够迫使共和国宪法的各个部分得到遵守，迫使它

所規定的各种改革得到实施，迫使在国家生活领导方面至今仍在奉行的方針发生深刻的改变，并从而实现整个局势的真正向左轉。

从这个基本的方針产生了我們对現政府的态度。現政府的情况異常复杂。它的組成就十分杂乱，以致它是否有真正的力量和效力都十分值得怀疑。可是，它包括有保证实现革新并要对国家的旧政策方針作某些修改的政党代表和人物，他們在制訂有力的和明确的綱領——例如关于反对近年来事实上是国家經濟生活、从而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的大壟断集团的斗争綱領——方面作出了贡献。

政府的另一部分，特别是支持这个政府的那些政党中的另外一部分——尤其是占多数的那个党——显然是不同意这些目标的（他們已經清楚地声明过和表明过这一点）。因此，不仅是这部分，而且是整个政府，都受到了多数派中那一部分人的阻撓，他們的实际目的就是繼續走老路，而絲毫不顾这将給我国經濟和政治生活造成后果和危害。

总理在他的报告开头中宣称，政府打算面对新的問題以便勇敢地解决它們。其实，需要的倒不是勇敢，而是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說，制訂这些解决办法、提出这些办法并将这些解决办法付诸实施的意願和能力。但一轉到实际問題和具体解决办法的时候，犹豫、曖昧和缺乏决心就都出来了，那些为一切投降和倒退敞开大門的打算也都出来了。

总的說来，我們同意政府声明中所提出的課題作为政府下一年度活动的要点。然而，我們对于从那些具体解决办法和作为这些解决办法的依据的許多看法中产生的路綫，却感到难以理解，这些办法是为了解决所提出的某个課題而不是为了协商而提出的。

这就使我們作出了否定的看法。我們强烈地感到：如果要想

迫使現政府放棄它在提出自己的綱領的作法時所產生的曖昧和可疑的立場，它所需要的就不僅是一個多數派（我們不知道這個多數派的一致性和穩固性如何），而且更需要一個反對派。而我要說，它不需要來自留戀法西斯的議員們的那種吵吵嚷嚷的歇斯底里的反對派；要是歷屆共和國政府一直忠於它們的職責，在一切場合下採取一切措施和明確的規定維護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的價值、綱領和要求的話，這些新法西斯議員們是不致於這麼趾高氣揚的。

不需要那樣的反對派；也不需要自由黨這個反對派；對於自由黨，我認為，可以稱它為反憲法的反對派，因為它反對任何關於實施憲法條款的建議，並且要求、希望和堅持繼續遵循不實施憲法條款的舊惡習。現政府所需要的是一個特殊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必須是這樣一個反對派，它必須承認綱領和綱領聲明中可以實行的積極方面，但它必須要求貫徹實行那些已得到肯定的、要求在我國的政治領導生活方面有所革新的意願，並且要朝這個方向推進。

政府所需要的反對派必須是由工人、中產階級和其它各階層的行動、要求和鬥爭所體現出來的全國的一個真正的、強有力的政治運動的表現。我們黨所要給現政府充當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反對派。

因此，我們所持的反對態度——按照我在上文所說明的——和我們所不同意而且予以批評的意大利社會黨的立場具有自然而然的和客觀的聯繫。這是一個新因素，這個因素至少在1960年7月還不存在；雖然，在那時，我們對同年7月組成的政府所採取的立場也是和社會黨不同的，因為我們投反對政府的票，而社會黨則有好幾個月投棄權票。

我們的投票和社会党的投票之間的联系

現在我們认为情况不同了，在我們反对政府的立場和意大利社会党将要投的票之間，存在着那时所沒有的联系和接触点。这种接触点存在于事情本身，存在于劳动群众的真正的群众运动，而真正的群众运动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是統一的，因而是不可压制也不可取消的。

我們一向承认，我們和社会党对政府可能有不同的立場。我們一向认为甚至由社会党同志参加我們所沒有参加的政府是可能的。

米凱里尼：（插話）这是第三个阶段。

陶里亚蒂：（繼續发言）我們也承认，在以階級为基础組織起来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階級运动的各种力量和具有天主教信仰的有組織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力量之間多年来造成的鴻沟已經很深，这些力量的相互接近将不可避免地需要逐步地实现，先是涉及有組織的工人运动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我們的目的和兴趣是促使社会党变成社会民主党式的党，以便嗣后在群众中接收他們的遗产从而扩大我們的队伍，那是荒唐的。社会民主党的危險，也就是說，拋棄社会主义前景和使工人运动在資产階級政权下成为一个附庸的危險，目前仍然严重地威胁着工人階級运动。我們正在采取各种手段并在所有战綫上为反对这种危險而斗争并且將繼續斗争下去。意大利工人运动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傳統；这些历史和傳統是不能抹杀和否认的。这个运动将如何和天主教工人运动实现接触和合作，这对于我們国家以及任何希望我們的經濟制度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实现深入和彻底改造的人來說，都是具有几乎是决定意义的問題。

我們正在为实现这样一个前景而工作。我們也正在为傳統的工人运动在自己队伍不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实现这种接触而工作，因为这种分裂只对統治的資產階級有利而对我們的事业和你們——天主教民主党左派的同事們——的事业都不利，对天主教工人的事业也不利。

我們在研究形势时也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决定我們对这个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作用，我认为我在前面已經清楚地說明过我們对政府的态度。現在，讓我們更直接地分析一下政府的声明吧！

范范尼报告中令人沮丧的政治思想的貧困

我們党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可能使我們那一天讀过的政府声明的作者大伤腦筋。我理解这种操心，因为在这个問題上他无疑受到了拥有广泛发行量的那些新聞机构的公开压力，同时还受到来自他自己党內的更为有效的压力。其結果是，除了清楚地暴露了存在着这样一些毕竟是众所周知的压力之外，还暴露了令人沮丧的政治思想的貧困(范范尼先生，請允許我这样說)。

最近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講話的一位天主教民主党領導机构成員(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断言意大利政府是由于国际职责和义务而同共产主义斗争的。我希望这不过是一位欠考虑的演讲人所作的一个輕率的講話。如果是他所讲的那样，那就意味着你們已經部分地放棄了我們国家的独立了。你們有义务尊重民主，因为这是共和国的宪法規定了的。你們有义务尊重共和国宪法所規定的那种民主，而不是盟国的組織或會議，或其他国家的代表可能規定的那种民主。

此外，你們又重复了关于两种极权主义的陈詞濫調，又說什么

我們这支最坚决的力量(范范尼先生,我感謝你承认这一点!)正在准备襲击民主制度。

我必須指出,前几届的总理們都已認識到在提出他們政府的政綱的时候有必要放棄这些陈詞烂調。但是既然你——范范尼先生偏偏又要采用这些陈詞烂調,那末,我就要把这个问题清楚地重复一遍:如果这是現在的事,如果你們握有证据或者綫索(但是,我們所說的证据或綫索不是指前任的一位内务部长专設的办公室中所捏造的假信件),证明我們正在組織对国家和民主法制的襲击,那末,你們必須向司法当局提出这些证据和綫索。如果你們不提出这样的证据和綫索,那么就证明你們的話就显然不过是政治投机和挑衅。既然你——范范尼先生談到过去有过反共和国法制的图謀,那末,我就要在这个讲坛上再度向你提到我过去說过的事,就是說,在过去十年里,发生过两次对民主制度,对国家的攻击,一次是在1953年,那次是用“欺騙法”来进行攻击的,該法事实上廢除了自由的議會;另一次是在1960年,那次塔姆布罗尼政府竟然要求进行由法西斯分子支持的政变。

而在这两次事件里,你們的党都是此种襲击的策划者,我們則是抗击这种襲击和击败你們的領導力量之一。至于“两种极权主义”的說法,范范尼先生,我要給你作寬大一点的評論。

你可能年紀还太輕,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你的兴趣又和我們不同,和我們相去很远,所以要是你不了解我国过去十年或二十年的政治历史的一个恒久因素的話,那也不能够苛責你。固然,你本可以用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和共和国政权的建立的經驗来弥补空白点。可是看来即便这种經驗对你也沒有用处。我說的几十年来意大利政治史的恒久因素,不仅仅在于我們为之作过最大的貢獻和最大的牺牲的那种对民主的敌人、特别是对法西斯主义所进行的不断的、沒有停止的根本反对和剧烈、惨酷的斗争。意大利历史

的恒久因素不仅在于这一点。我们对反法西斯斗争所作的贡献，甚至就在昨天，还为法西斯统治以前和墨索里尼时代的保守派和法西斯主义政论家的一位庄重的遗老——密西罗利先生——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刊上所承认。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实。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斗争的方针。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和十多年来的共和民主制度生活中所制订的政策。

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努力给予反法西斯斗争的团结一致的性质，为了维持这个团结，我们作了所需要做的一切。我们所要的团结，不仅仅表现在为了更好地达到我们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而进行的合作和相互谅解上。不是的，它应该表现在反法西斯的政治纲领上，而在法西斯主义垮台之后表现在制订一个革新国家的政治纲领上面，民主意大利的重建应该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进行。任何一个集团，只要它对民主国家的重建能够作出过贡献，就不应被排除于这个团结之外。与此同时，要深刻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实现必要的改革，使这些改变得以实现，这样来开辟一条通向真正的劳动者的社会、通向真正公正的社会的道路，开辟通向首先和主要地同劳动和劳动者组织有联系的新领导阶级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的道路。

这个政策的制订，是意大利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年月中和在法西斯垮台以后在民主共和国的头十年的生活中所发展起来的政治斗争的新的恒久因素。主要由于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启发，劳动群众今天是朝这个方向行动的。这个方向是消除消极等待的，而你范尼先生还是有这种消极等待的毛病，也消除那种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愿望。这些政治制度在别的国家的一定历史条件下虽然走运和取得成就，但由于它们的制度和它们的结构，它们并不适合我们自己的条件、传统和需要。

这就是你没有能够抓住、没有能够看到的恒久的政治因素。必

須从这一点出发来評断我們党在意大利政治斗争演进中的作用。这个恒久的政治因素表现在什么东西上呢？它首先表现在共和国宪法里，宪法肯定了人民主权原则，以及有必要使工人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和有必要进行使这点成为可能的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宪法描绘了一个国家的轮廓，这个国家再不是旧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也不是法西斯统治以前的旧民主国家，而是应该成为而且必然成为某种新的、与过去不同的、并为群众所企望的国家。

十多年来向天主教民主党提出的挑战

范范尼先生，我們向你們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十多年了：你们应该实施宪法。只有充分地、彻底地实施宪法的一切部分，你们才能打开通往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的道路。这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們向你們提出的真正挑战！你们向我們提出挑战，要我們說說是否有必要进行一次革命才能实现我們的要求，我們要提出的倒不是你向我們提出的“是否”这个黑話。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充分实施共和国宪法。是否需要一次革命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需要，那就請你們明白地告訴我們吧！

由于你們对我們的运动抱着反动的观点，并且由于你們未能了解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恒久的政治特点，所以你們从来没有努力过充分而忠实地实施宪法。你們多年以来一直处在发动一次实际奇襲的边缘上。在（1948年）4月18日举行选举以后，你們甚至談到封閉我們的支部和禁止階級的工会。只是当你們認識到全国人民不会答应你們繼續朝那个方向走下去的时候，你們才住手。可是你們还是使用了1953年和1960年的那些令人遺憾的手段。

范范尼先生，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政党不能制造革命。革命是在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日益成熟起来的冲突的不

可避免的結果。当这些冲突爆发的时候，革命政党应该将这些冲突引向彻底改革社会的目的。

这并不是当前的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实施共和国宪法。你们如果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一个有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方面作出一些革新的政府的话，你们就必须接受我们的挑战。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挑战，而且还是我们对国家全部政治发展的保证。这个保证是写入了宪法的，因为在制订宪法上我们会同你们合作过。这也是我们的保证，这个保证影响着并且应该影响所有想要继续自称为民主政府的整个活动。

现政府的声明在某些地方也说到要遵守宪法的准则。但人们免不了有这样的印象：这只是一种滥调而已。

关于这一点，总理似乎忘记了说出他本来应该说的和别的总理以前曾经提到的事情，首先就是，政党的斗争和政府活动是两回事；政府的思想意识、愿望或指导思想只能是国家宪法中所写的那种思想意识、愿望或指导思想；因此，不可对我们党有什么政治歧视，在全国也不可有以观点、思想分歧或政治分歧为根据的歧视。这将是我們据以评断现政府的活动的根本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还必须继续并将继续进行揭发和斗争，因为这确实是关系到政府活动具有民主还是反民主性质的歧视问题之一。

总理先生，你甚至曾经暗示可能拒绝我们的投票。在目前情况下这对我们关系不大。如果在其他对某些具体问题投票的情况下，那倒可能使现政府感兴趣。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个问题。不过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在议会政治的场地上，对我们的投票加以歧视，不仅是荒唐的，而且甚至是可笑的。众院议长先生，请你记住，几个月之后，我们将被召集来选举意大利共和国的新总统。谁愿意声明我们的二百张选票在那次选举中无关紧要呢？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声明，那就请告诉我们。在1955年4月的选举中，我们的

投票构成了那次导致选举現任总统的政治行动的一部分，而且也构成选出現任总统的多数。我认为，如果現在有人声明我們的二百張选票不应計入那次的多数之内，那甚至是对共和国最高职位的一种侮辱。

我們是为整个民族利益而提出我們的建議

現在回过来談你們的“是否”以及与此有关的論据。人們所提到的有关和我們党的关系的基本問題，在我看来似乎是被归結为用什么手段对付共产党最为有效这个臭名昭彰的問題。是应该用先驗地、全盘地、反对任何来自共产党的建議而不顾这些建議的内容的办法好呢？或者还是应该接受我們多年来向历届共和国政府提出过的挑战而走上我們所建議的实施宪法的場地并接受或者至少考虑一下我們所提出的一部分合理建議更好些？

我們知道，这个問題在你們的队伍里引起了并繼續引起广泛的辯論。我們也关心这个問題，并且提出了我們的答复。我們对上述問題的回答向来只有一个，即：我們提出的建議本身是有积极价值的。我們提出这些建議，不是为了让你們拒絕这些建議，而是便于更容易来揭露你們并在輿論面前譴責你們反动。不是这样的。我們提出这些建議，是因为它們符合工人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是因为它們符合国家沿着民主道路向社会正义前进的利益。这就是我們的回答。在我看来，你們的声明对这个問題是只作了一半的答复，就是說你們同意我們提出的問題——或至少一部分問題，但是在制訂解决这些問題的办法的时候，你們寻求中間道路，这个道路表面上似乎是一种革新，可是却迴避革新的必要性，拖延革新，或者把一切归結为純粹官僚主义的措施，这些办法不能正視也不能解决所提出的問題的实质。

为了证明我所說的这些話，我現在要談一下政府綱領的主要部分，特別要談一談有关对外政策的部分。

在这方面，我必須說，我們不仅表示不同意，而且深为忧虑。我們面临的国际关系是十分严重的；沒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在今年夏天曾經有过极尖銳的因素，接着爭执有了某种程度的緩和。現在，我們又再度处在困难的形勢下。不能掩盖的是：使国际形勢尖銳化的最大責任就在于美国現政府所进行的活动。談論万年和平是沒有用处的。这种說法会使我們漠不关心；一万年以后人类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呢？而我們所要的是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的和平。这就是我們所要的东西。要保证取得持久和平，要保证和平永远存在，要保证各国人民永远贏得和平，就要使用这种方法。

在过去十个或二十个月里，美国政府負有严重的責任。

首先，是对古巴的侵略。这是美国現政府对外政策的第一个行动，是严重的行动，是公然違犯国际法的一切原則和联合国宪章所批准的一切原則。美国首先开始了一个瘋狂的軍备竞赛，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核試驗的恢复，使接触成为不可能，而通过这种接触原来至少是可以解决分裂世界的两个集团当前存在的某些最严重的分歧的。

我們現在正处在一次隆重的會議前夕，这次會議将有相当多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些代表必需再次討論全面和有監督的裁軍問題并得出某些結論。而就在这次會議的前夕，美国政府拒絕了召开一次以期把这次大会引到积极的方向的預备性會議的建議。而且，在核試驗問題上它作了絕對不能容許的事，它向另一方，即向东方提出了一个“最后通牒”，宣称：你們必須接受我們的要求，否則不能进行討論。

显然，我們是面对着一个集团，我們不知道它在决定美国的整

个政策方面有什么影响，和可能有什么影响，但是，去年他們在一切国际关系中都制造了极度緊張的局勢。范范尼先生，讓我們不要存幻想吧！我們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且你們全都知道我本人对毁灭性武器发展現阶段中今天如果爆发的战争的性質所抱的看法。

在这方面，我的想法是很悲观的。基于我們这样的看法，我們近年来曾敦促合作、諒解和采取共同行动以避免原子毁灭对我們文明的危險。

我現在承认：現代武器的毁灭性質对于战争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起遏制的作用，因为双方都拥有这种武器。但是我們認識到：如果軍备竞赛，特别是原子竞赛，一直进行下去、拒絕理智的談判并提出必然被拒絕的最后通牒式的建議，那是不可想象的。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而竟不会导致破裂，那是不可想像的。

范范尼先生，在那不勒斯，你甚至頗为混乱地暗示：如果双方或者其中的一方找到了一种防御手段，足以减少或消除敌人原子攻击的效果，那么战争的前途就会成为现实的。

范范尼：（插話）那是为了告誡，而不是一种希望。

陶里亚蒂：（繼續发言）很好，你是作为告誡而說，但我引用你的話是为了指出：这就是軍事科学的演进和毁灭性武器及防御这种武器的发展方面目前所达到的地步。現在已經达到这个地步：有一方在一定的時候可能认为自己是有保障的。但是各国人民是否得到保障可以避免毁灭呢？各国人民是得不到保障的，我們的文明是得不到保障的。

这就是應該驅使我們去寻求新的政策和新的政治立場的基本动机，这些政策和立場應該指引一个真正希望避免我們的文明遭到毁灭的威胁并希望为和平而工作的国家的外交政策。

但是，你們是否感觉到，在爆发一場核冲突的前景——这场冲

突在某一阶段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和你們在綱領声明中提出的懦怯的、有局限性的和妄想的新政治方案——这种政治方案并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我們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的实际行动——之間，存在着多么深刻的矛盾？

你們外交政策立場的核心就是肯定同过去政策的联續性，你們用对大西洋义务忠誠的詞句来表示这个联續性。

現在，你們十分清楚地知道，大西洋公約問題在形式上目前并未发生，也不存在。可是，存在的問題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局势。問題是要看一看当初所拟定的并在后来年月中所奉行的那个大西洋政策方針是否符合这种局势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符合这个局势，是否能应付我們所面临的形势的严重性。

存在的問題不是忠于或不忠于大西洋公約的問題。問題在于必須和这样的政策一刀两断地絕裂，这个政策不再符合当前局势，或者只在下述意义上符合当前局势，即旨在使当前局势恶化和加剧——如果繼續执行下去的話。

凡是对事物作一番客观考虑的人，甚至在政治和議会的范围以外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問題。

产生大西洋公約的前提为什么改变了

我看到在羅馬最近出版了一种有趣的刊物——羅馬大学历史研究所机关刊。它的第一期的主要論文就是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問題的。它是陶斯康諾写的，文章討論了意大利参加大西洋公約問題，研究了导致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集团的事件以及参加的意义。这篇論文是一位权威的学者写的，他不能被指責为同議会中的左翼党派有絲毫的关系的。这位权威的学者的文章开头就断言：大西洋公約是在一种局势中誕生的，构成这一局势的基本因素現在

已經完全不存在。他的原話如下：“那時，在簽訂大西洋公約的時候，美國擁有對原子武器的壟斷；歐洲國家——全都處於極端惡劣的經濟狀況下——確信華盛頓能夠單獨承擔軍備重擔，而且萬一發生戰爭，也將僅僅牽涉到兩個國家。與此同時，對西方安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歐洲的邊界。現在，所有這些前提都已經改變了。蘇聯趕上了並在某些方面超過了美國的軍事力量；大西洋聯盟成員國的經濟情況看來已大有改善，它們被要求擴充現在被認為是一旦發生戰爭時為它們的防禦所必需的常規武器。主要的威脅不再是在歐洲的邊界，而且美國現在正在經歷著一個長期的經濟衰退。”

正如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是一個客觀的分析，而且是以關於戰爭威脅來自東方的一些說法為根據的，而這些說法是我們所不同意而且應該予以拒絕的。然而，從這個看法可以看出，我們今天面臨的局勢是根本不同了。

如果我們考慮到上述事實以外的其它事實，如果還考慮到西方大西洋死硬傾向在冷戰中的失敗，那末，這個看法就更為明顯，因為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日益變成更加強大、更加牢固和更加團結，新解放的國家占世界上愈來愈多的地區並提出更多的要求，中立國家的陣綫正在形成，甚至已經存在。這些中立國家已經變成應當給予考慮的力量；尤其是，原子毀滅的威脅比十年或十五年前變得更為現實、更為緊迫。

那麼，我們要問，在這種局勢里你們——政府中的先生們——將選擇什麼樣的政策呢？是大西洋政策嗎？那麼，請告訴我們究竟是哪一種大西洋政策，因為我們知道大西洋政策有兩種、三種、四種、甚至五種，如果你們願意這麼說的話。在美國就存在着至少兩種外交政策傾向，其中實質上是死硬的傾向在最近幾個月中正占著優勢或者至少是得勢的；還有阿登納總理的大西洋政策；阿登

納依靠德国問題来阻撓局势发生任何緩和，并且依靠德国軍队的常規武器和原子武器以图为希特勒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失敗复仇。还有戴高乐的政策，这个政策一部分和阿登納的政策吻合，但并不完全一样。另外还有举棋不定的英国大西洋政策，这种政策的結局总是被迫向美国的更为紧迫的要求投降。另外还有像葡萄牙、希腊等这样一些較小的卫星国所奉行的大西洋政策。这些国家的兴趣主要在于用他們租給大西洋联盟軍事組織的基地来換取美元。

那么，你們支持这些政策的哪一种？当你們談到大西洋政策和对这种政策的忠誠的时候，請你們應該把这一点說一說，而且請你們針对具体問題把这一点說清楚。

我們想知道，例如，政府是否同意美国向所有大西洋公約国家提出的对古巴共和国实施制裁的要求。有些国家——如加拿大——就拒絕了这个橫蛮霸道的要求，但我們还在等待知道意大利政府的观点。

我們想知道你們——政府中的先生們——对阿尔及利亚問題的立場。你們对于那些遭到踐踏一切法律、一切崇高的原則、一切忠誠和道德的原則的，只是要杀戮的殖民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軍队殘酷屠杀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沒有說过一句合乎人情的声援的話。

請你們說一說，你們对于以原子武器装备大西洋联盟軍队、特别是装备波恩德国軍队的問題持什么立場。你們就我国領土上的火箭基地发表了一項声明(是穿插在政府声明当中的，目的是不让人看到，或者企图不让人看到)，断言这些火箭基地的存在增加了我国的威望……。

范范尼:(插話)我說过这些基地的存在增加了我們的責任，不是說它增加了我們的威望!

陶里亚蒂：(繼續发言)我們的意見是，这种言論是純粹的死硬言論。从这种声明、从这种性质的声明出发，就会走到加速原子軍备竞赛，加速人类和我們的文明的毁灭。我們国家的威望并不因建立美国的火箭基地而重新提高。在意大利領土上建立这些基地乃是我国历届政府在美国参謀部压力之下所能够作出的最可悲的决定。

今天你們應該在另一个問題上，即在建立欧洲无原子区問題上表态。这就是意大利政府目前所面临的問題，而不是用将美国原子武器設置在得不到卫护的我国土地上并从而使我国面临毁灭的办法来重新提高我們威望的問題。

你們應該同那些要求在欧洲建立无原子区作为走向創造整个欧洲的新形势的实际步驟的人們联合起来。

我們要求你們說明意大利政府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和准許它根据那些权利进入联合国組織的問題上采取什么立場。我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們的政府在这个問題上要和美国站在一边。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一个自称决心也要在国际关系方面作出某些改变的政府竟然这样做。我們认为，我們也应当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你們自称贊成东西方談判。很好；但是你們对于在裁軍會議开始时召开一次最高級會議的建議所采取的态度，是拒絕这种最高級会談的态度，从而迎合了美国在这方面的要求。

我們曾經贊成你們、特別是范范尼先生(虽然我們并不贊成外交部长)去年夏天为和苏联建立接触以及为了很明确地提出开始談判德国和柏林問題以及两个国家集团的談判問題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可是我們要問，你們当时的态度有什么結果呢？請允許我們說，結果是很少的，你們几乎一无所成。如果你們的建議在提出的时候被采納，本来是可以防止8月13日以后所发生的緊張局勢

的加剧的。……

范范尼：（插話）这是真的。我們曾經建議赫魯曉夫先生不要开始核試驗，可是他还是进行了試驗。

陶里亚蒂：（繼續发言）好。你为什么不要求你們的盟国提出使苏联同意不开始試驗的建議呢？你最近为什么不建議美国和英国重申他們 10 月 13 日提出的那些建議，而不是在苏联一接受了那些建議的时候西方（因为西方想不惜任何代价地恢复試驗）就立刻把那些建議撤回去呢？

現在，我們高兴的是，你們要奉行去年夏天开始的那条路綫；但是我們要指出：那条路綫当时实质上只是願望而已，而不能导致一定的結果，它仅限于空洞的声明，而沒有真正的政治行动。現在，面对着国际关系的目前危机，面对着威胁着我国和所有国家以及人类的严重危險，必須作出决定性的抉擇和采取这样的行动，即至少能够成为制定一項符合新局势的新政策的开端。

必須同已經擺脫殖民主义的国家接触

你們反复說，大西洋联盟是捍卫民主的，是一座民主的堡垒。可是在大西洋联盟里边，你們在政治上所团結的是一些和民主毫无共同之处的政权：极权主义的葡萄牙、民主正在衰退而法西斯主义正在上升的法国、波恩德国——一个浸透了完全反动的、希特勒式的“复仇主义”精神的国家。你們在政治上甚至还团結佛朗哥的西班牙，它的領土已借給美国建立基地，这种基地实际上也就是大西洋联盟的基地。

要作出民主的抉擇，必須譴責原子武器，这种譴責应具有原則的意义；必須选择通过直接談判的建議来实现东西方緩和的政策，这种談判要立即从最高級开始。要作出民主的抉擇需要和新解放

的国家建立新的关系，建立此种新关系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加强那种保证宗主国的大壟断資本对那些国家的渗透的殖民主义，去危害它們的經濟，而是要奉行帮助落后經濟发展的政策，使这些国家开辟进步的道路。

最后，必需对中立国家执行新的政策，要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的政治领导中起日益巨大的作用。

可是在政府声明中我們一点都找不到关于这一点的话。因此，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須继续，它必須以已經采取和继续采取的广泛和团结的形式在工人和所有各个阶层人民中开展下去。我們欢迎像佛罗倫斯市市长和其他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卓越的政治家和文化人士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的主动行动愈是得到工人們的贊同和支持，愈是被他們所接受和推进，就会愈有价值。

至于国内政策問題，我在談到你們對我們党所作的判断以及政府和我們党的关系时，已經简单地提到了。但有些方針問題是如此重要，所以我打算就这些問題再說几句。

在过去十年里，大部分意大利政府的国内政策主要是一个官僚主义集中化的政策、一个为了政党目的破坏宪法規定和法律的政政策、一个对大資產階級领导集团奴顏婢膝的政策，这是事实。这些领导集团始終得到警察力量的支持，而这些警察則被动員来反对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劳动群众和工人。这样一种政策已經成为傳統特点，必須予以結束；这种政策包含着把民主共和国的統治变为政党統治的严重因素，也包含着使意大利国家墮落、腐化、脱离民主制度和教会化的因素。这些恶劣的政治倾向所造成的恶果在国家管理的某些部門更加明显，如在司法部門、在屬於內閣的各机关和在各个部里。在所有被称为：“幕后政府”里。

“幕后政府”是不民主的，我們断言，如果要进行某些革新的話，那末，必須从这里着手，并根本改变至今还在奉行的方針，而不

是依靠局部性的措施。你們把審計委員會的長官排除在政府各部之外，這是好的，這是合理的事情，但決定性的、關緊要的事情是總的方針，也就是說，將各個不同的部，特別是內閣，所進行的一切活動置於公眾監督之下，置於議會監督之下。政府的自由決定權的範圍必須不斷削減和廢除。

因此，我們同意旨在廢除對戲劇演出檢查的那些措施，但我們也根據全國電影劇作家協會所提出的建議和社會黨同志們向議會提出的法案，堅持要求終止政府對電影作品進行預防性檢查。

我們認為，唯一可以存在的是那個決定什麼電影不讓十六歲以下的年輕人看的那個政府委員會，而發生違反刑法的情況時才應訴諸司法部門。這就是說，我們要求在這方面實行充分符合憲法規定的方針。我們要求廣播和電視事業不受政府的決定性政治影響。這個事業應當不再是政府和政黨的工​​具，而應成為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受公眾監督的輿論機關，而不是為一個黨和政府利益服務的。

我們贊成政府聲明中宣布它終於要實施大地區建制的意願。這並非一個黨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是發展民主、擴大公民有組織地參加政治生活的領導的問題、特別是完全實施共和國憲法的問題。

但是，請允許我對有關這個問題所已經發表的言論提出一些嚴肅的意見。在1960年夏天，——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成立了一個由杜平尼領導的委員會，從事研究實施大地區自治問題。過了一年多，這個委員會才發表它的工作的結果。

因此當時，那只不過是一種拖延的作法（請允許我提出這個看法）。現在人們對我們說，大地區委員會的選舉——就是說大地區委員會的成立——要等到1963年普選以後才能舉行。我們斷然不同意這個打算。1948年1月1日生效的憲法上寫着，大地區委

員會應在一年之內選舉出來。現在人們對我們說，那時的制憲者是如此無知，以致不理解他們決定的嚴重性，而且竟不知道這個事情是不可能在一年的之內作到的，這種說法是荒唐的。事情不是這樣，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問題是，制憲者和憲法當時並沒有把設立大地區政府看作僅僅是一種行政措施，而是把它看作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體制的一項不可缺少的政治措施的。而這個因素卻被逐漸遺忘了，以致在人們對這一問題所作的考慮中竟迴避了它。我們將考查那些將要被提出來的法律，我們將要求提出這些法律，我們將積極參加關於這些法律的內容的辯論，而從此刻開始，我們號召所有要求實施共和國憲法的人們——公民們和地方政府代表們——對研究和辯論這個問題作出他們的貢獻。爭取設立大地區政府的運動必須繼續而且將繼續下去。我們相信，從這一運動中，將在這個領域中產生和應該產生有效地實施憲法規定的推動力。

就弗里烏利—威尼斯—朱利亞大地區而論，奇怪得很，政府的這個聲明中的說法同1960年7月范范尼先生所作的政府聲明幾乎是每個字都一樣的。

為什麼不向前進呢？事實上，之所以不向前進，乃是因為根據錯誤的出發點，即要協調三個迥然不同的計劃，特別是當一個應該研究這些計劃並要將這些計劃加以合併的委員會里，一位天主教民主黨的代表站起來從原則上反對建立弗里烏利—威尼斯—朱利亞大地區，如果不克服這些障礙的話，你們在這方面所作的聲明將會像你們在1960年7月所作的那些聲明一樣，仍然是毫無結果的。

關於弗里烏利—威尼斯—朱利亞大地區，由於它是一個特別區，我們贊成該地區委員會的選舉按照西西里、撒丁和奧斯塔河谷的方式直接進行。

但是，另外還有一些與大地區生活問題有聯繫的問題，這些問題最好由政府作些說明。首先，西西里的自治制度應該通過最後

解决仍然悬而未决的高等法院問題及其他問題来完成。政府在这个問題上持什么立場？應該把实施撒丁区复兴計劃的权力交給該区。在这方面，我們希望政府采取一个符合于那个地区大会的考虑和要求的明确立場。

就奧斯塔河谷区而論，关键在于解决免稅区問題。在这方面，政府許过許多願，可是一个也沒有兌現。

大地区自治問題是同我們认为必須最終予以恢复并一貫予以捍卫的地方自治問題有联系的。謝尔巴法案应予撤銷，或加以根本修改。但應該解决的最为尖銳的問題是根本改变在这方面系統地違反法律規定的作法，例如違反有关督察任期的法律規定以及督察当局为限制省、市作出决定的自由而进行的干預，違反了宪法明显的規定。由于这种作法的結果，現在有好多省、市沒有民主的行政机构。例如，羅馬的情况就是如此。在羅馬，一切有关督察任期規定都遭到了違反，首都行政由于督察制度不可能保证像目前局势所要求的那种有效的管理，已处于腐敗不堪的境地。

政府是否将保证宣布在明年春季在羅馬举行市选举？政府是否将作出正式的承諾？在那不勒斯和其他城市也应当作出这样的决定。

这种通过違犯法律、国家教会化等等而在国家上头建立起来的政权，对于我們的教育組織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必須从这一点出发来判断所必須采取的措施，来看所建議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目前的需要。今天提出的措施几乎完全是屬於技术組織的性质。这些措施所考虑的都是增加款項、发展教育組織、建筑新校舍等等。

这种扩充学校物质条件的做法是符合急需的，它本身是一項民主措施，我們完全贊成将被采取来促进这一过程的一切措施。通过这种扩充，在国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間安排新的比例关系，私立学校的比重要縮減而且要不断地縮減。

但是，爭取改善教育制度的斗争不能只归结为这一点；相反地，斗争在一定的時候主要必須变成关于文化倾向和方针的问题上。要不然，这些技术组织的措施是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的。自从法西斯垮台和宪法批准以来，过了这么多年了，当权的政党才认为有必要将我国教育制度的问题提出来作为政府活动的中心，想起来是可悲的。想起来令人疼心的是，在教育方面，我们在所有西欧国家的教育状况统计中仍占最末位。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截至目前为止所提出的关于教育方针的种种建议都是不够的。这些建议暴露了在实行符合指导调查委员会工作要求的新教育原则和新教育方法方面的一种奇怪的无能，而这个要求是，制订新的文化方针和发展学校改革的路线，使之符合今天的需要。

我们不应忘记，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一部分大垄断资本会为了自己而把教育问题抓到手里，组织他们自己的私立学校，以达到恩惠主义的目的，并进一步破坏国家教育制度应有的统一体制。

但是，除了上述问题以外，或者不如说，比上述问题更为严重的，还有关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和在同公民的关系中使用警察的问题。共和国秩序除了最初几年以外，一直没有改善过，在某程度上，这方面的情况反而更糟了。警察对劳动者的野蛮干涉事件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这些劳动者除了捍卫共和国宪法给他们保证的权利以外并没犯任何罪。人们竟至使用警察来反对罢工游行。

停止警察干涉劳动者

就在最近这几天里，一个这样的警察干涉浪潮又掀起了。政

府不能用諉过于执行人的办法来为自己辯解。務必发出明确的指令。但我們在内政部新部长就职时对该部官員的讲话中却根本見不到这样的东西。相反地，他号召繼續做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但是必須改变这一切。必須使警察免除保护雇主反对罢工者和劳动者示威的任务，这些罢工者和劳动者走上街头是为了公开示威。国家在劳工斗争中应当合理地站在劳动者一边，因为这个共和国的政府是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国家的政府。警察是为国家服务的，他們不能够成为被不断地用来向劳工力量进行威胁和挑衅的工具。

在提出这个問題的时候我已經讲到我的发言的最后一部分了。在这一部分里，我将简单地談关于經濟措施的一些看法。我們的議會党团还有其他一些同志要在这方面作更为詳細的发言，我只限于提出一些一般性的意見。毫无疑问，正是从我們国家生活的經濟方面、从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他們在工厂、田野和机关里所受到的待遇，产生了要政府执行新的方針的坚持的有时是强烈的要求。劳动人民的所有阶层都认为，近年来的經濟发展并没有变成整个国家的进步，而是变成了許多不平衡、矛盾和困难，这种不平衡、矛盾和困难的后果都沉重地落在只靠劳动生活的群众身上。工作的問題还没有得到解决；南部的問題变得更为尖锐。阶级斗争变得更为激烈；我們农业的所有结构或主要结构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你所說的話，以及你的許多同事們在天主教民主党那不勒斯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我們认为你們是認識到这个现实的。但是，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你們的那不勒斯党代表大会和政府的声明都沒有回答的問題。

当然，政府的行动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錯誤的方針，国家机器的各个部分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是問題不只是这些。根本的原

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壟断集团完全控制了經濟的进步，并把这种进步用来专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危害整个国家的利益。

現在，这是一个必須正視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某些东西必須予以控制、限制和粉碎。我們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羅馬伊里茜奧剧院的一次由第三种力量的政党——共和党人、激进党人和社会主义人——而不是由共产党所召开的會議上，也得出了和我們所得出的同样結論，即认为在目前有必要采取行动来击破統治着我国生活并首先使国家机器、继而使整个国家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大壟断集团的权力。

在你們的綱領里，这一点不見了，或者只占据完全无关紧要的地位。因此，这就产生了这种疑問：真正摆在我們面前的是不是一个革新經濟的計劃呢？或者它只不过是有限的、极其有限的建議，旨在糾正我国經濟形势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不平衡呢？这种計劃如果不被所有人接受的話，至少也为一部分大壟断集团所接受，因为它也可能符合它們要促进自己的进展、要促进自己对国民經濟新部門的影响的某些打算。如果采取你們所規定的、所提到的措施的人不是毅然地决心去摧毀壟断集团的权力的話，那末，甚至那些可能遭到你們所建議的某些措施的打击的壟断集团，都非常可能——在政府內外——进行一些活动，使所規定的措施归根結底还是对他們有利。我們肯定将看到，国家机器和壟断資本更加密切地結合起来。

但是，我們所要求的是，通过国家的行动，至少應該着手打破大壟断資本集团在国家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无限权力。

你們不加区别地說了一大堆关于企业家的話。但你們清楚地知道，广大的企业家今天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憎恶。今天没有任何政党、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要求采取反对他們的措施。可是他們大部分今天也已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摧毀那些也危害他們、束縛

他們、压制他們并阻碍他們发展的大壟断集团的权力。

因此，这是一个总方針的問題，但是这个总方針在我們方面正在变成具体的立場和要求；首先，有些尖銳的問題需要立即彻底解决，有些問題，我們不能容忍再拖延下去了，因为它們是致命的問題。你們終于也說，你們打算采取步驟，来廢除或着手廢除农村中的对分租佃关系。我們了解，如果在十年或即便五年以前依照广大的佃农群众的要求采取了这些措施，那末，我們傳統的农业結構就有一部分本来是能够得到挽救的。今天在这方面我們看到的破产如此严重和广泛蔓延，引起人們心中的痛苦，以至电影也不能不反映对分租佃制地区中存在的触目惊心的情况。

現在建議采取些什么措施呢？它的广度如何？是将在农村建立最广泛的恩惠主义的地区呢？或者是要作出真正的努力，通过取消南部过时的农业合同和廢止对分租佃制度，来解决那个宪法所規定并为我国所需要的彻底而广泛的土地改革問題呢？

这是我們提出的問題。

我們將同意朝着这个方向所将采取的初步措施，我們將合作来制定这些措施。但是我們坚持解决基本問題，坚持解决方針問題。因为，要是不在真正新的意义上改变方針，那末，局部性措施将得不到多少結果。

还有其他紧迫的問題，各方面都感到紧迫和需要及早解决的問題。关于卡拉布里亚—卢卡尼亚铁路，你們是怎么想的？政府是否准备立即声明，它将采取措施来实现这条未完成的铁路的国有化和改組，还有社会保險养老金額問題，为什么犹豫不說出你們建議作为社会保險养老金最低限額的数字？你們是否主張每月一万五千里拉？你們建議增加多少？政府的声明原应对這個問題說几句确定的話的，因为我們知道，痛苦的、不幸的領养老金者是怀着什么样的期待！对于他們說来，即便增加区区几千里拉，也就

意味着稍稍减少一些痛苦和忧虑。

但是，这些都是局部性的問題。你們一般地声言願意实施某种經濟规划化。我們接受这种方針，我們认为，如果打算反对壟断經濟的发展而代之以民主的发展，那末这种方針就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深信，我国的整个經濟政策将必遵循这个方針，不仅現在即在今后也必須遵循这个方針。

但是如果人們接受这个观点——人們是非接受不可的——今天就又产生了关于发展乃至改革和深刻地革新我国民主制度的严重問題。

这些問題到一定的时候必須予以解决，在处理这些問題时必須充分意識到我們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里所要达到和必須达到的目标。

我們現在把話說明白：关于經濟方面，我們反对任何以冻结工資或任何此类做法——諸如强制儲蓄或类似形式——为基础的规划化。相反地，我們认为，所需要的是逐步地、根本地增加工人、劳动农民以及所有依靠固定收入为生的各行业人員在国民收入中所应得的份額。

在这个範圍內，提出了同劳动者有組織的運動的关系問題。政府的声明在这个問題上談的太少了。这里提出了維護工会在企业里的作用問題以及保障工作場所的工会自由和公民的普遍自由的問題。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們不能妄想通过立法措施在意大利达到消灭人剝削人的目的；我們知道得十分清楚，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那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我們能够而且必須要求在一般的經濟规划化中承认工人斗争的积极作用以及工人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通过他們的自由工会組織而自觉地占有的地位。这是一个新的領域，我們必須有勇气在这个領域里前进。在前进时，我們既要尊重

我国宪法的原则，同时了解到世界正在前进、经济正在发展、各种民主组织的调整和扩大必须和这种发展过程相适应。

这里我要谈到另一批政治性质的问题。当处理规划化问题时，不能只规定建立某些机构，规定它们的职能、它们的各项职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旧的体制中安排它们的地位，等等。如果只限于这样提出问题，将导致一种官僚主义的作法，而不能真正改变经济和社会关系，不能真正进行经济规划化。范范尼先生，我们对你的建设性的想象持批评的态度，因为我们一直耽心那主要——如果不是完全的话——不过是做点儿官样文章，而没有勇气来改革那些应该不仅在官场而且还要在民主机构的发展中来进行改革的东西。

如果我们真正要着手规划化工作的话，就必须面对这个课题。宪法法院已经作出了一项判决，虽然这项判决的形式相当混乱，但它还是根据宪法的原则指出：经济规划化必须通过法律来实行。因此，议会显然负有一项新的任务（而我们对此感到高兴），这项任务也要求调整议会的一切工作机关的结构，特别是调整那些负责监督政府和官僚机构活动的机关的结构。

但是，这不仅仅是关于规划化指标方面的问题；这特别是准备规划方针的问题，这个方针必须能够激励群众、非垄断性企业家、广大的经济界和劳动界积极参与其事才行。这类事情以前已经发生过，但是那是在反对政府方针并和政府方针进行争论的情况下以一种无秩序的混乱方式发生的。于是，成立了南方银行，就是对要求一个“劳工计划”和要求有关我国经济活动的特定部门和有关我国的特定地区的城市工业化——诸如塔兰托或阿诺谷地或撒丁的复兴和西西里的工业化等——的具体措施的工会组织所提出的建议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是好是坏，我将不在这里来研究它）。

这些具体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群众、工人组织和整个整

个省份的居民都牵涉进去的斗争的目标。这些运动必须继续而且将继续下去。但是一个打算进行规划工作并要在领导国家经济活动方面采用规划化原则的政府，有责任使劳动群众和代表劳动群众的有关的机构，以有组织的形式参与这个工作。

这意味着，今天，特别是工人运动面对着一个新的行动领域，它必须善于在这领域中活动和前进，但不要丧失自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自主，不要变成一支从属的力量。

你们的政纲本身需要有这种进步。这是你们所说的东西里面的积极因素之一。我们将根据它来展开为促进我国经济的民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运动。

这一点和大地区议会的设立有直接的联系。我们理解为什么你们要把大地区议会的选举延期到1963年大选以后再进行。你们虽然可以把行政和立法细节留到以后再解决，但应该立即把这些大地区机构建立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支点，使它们对全面的经济计划的必要规划工作作出贡献。

尊敬的同事们，我相信，我刚才说过的话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行动路线是明确的。我们反对这届政府，因为它没有向全国提出能够充分保证我国经济和我们共和议会制度的前途的、导向民主革新的总方针。我们反对这届政府，因为它缺乏一项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和致力于和平的有效对外政策，这种政策在当前的严重国际局势下和这种局势所蕴藏的危险面前是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承认，在这届政府的政纲中，在政府向议会和全国提出的一些新课题中有某些新的东西。

我们说明了我们的保留。对于将要被提出的旨在处理和解决这些课题的一切措施，我们保留讨论的权利，对于这些课题我们将永远投票赞成我们认为客观上是适当的和正确的东西，即便它们仅仅是部分地朝向我们为了国家利益和为了发展我国的民主而要

求的那种革新和转变前进。

我們知道，被提出的政綱中的新的积极因素不仅仅是来自客观的需要，来自一些政治家的个人見解，来自对事物的新考虑，而是从基层产生的现实的运动的结果。我們將像过去一样全力以赴，繼續对展开这个现实的运动作出贡献，使它扩大，有組織和前进，使它具有愈来愈明确的綱領內容，并使它巩固地团結起来，而此种团結将必須采取比过去更加多样化的形式。

这就是我們給我們自己提出的任务。我們將尽力去完成它。我們已經取得的成果鼓励着我們，这些成果部分地也表現在所談过的事情中。我們对于我們行动的胜利、对于劳动群众为保障和平、为推动意大利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为使意大利共和国成为一个真正以劳动为基础的共和国而采取的行动和所进行的斗争的胜利，滿怀着信心。

(譯自 1962 年 3 月 6 日《团結报》)

在 1962 年 4 月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陶里亚蒂开始說，对于我們这次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代表大会前的討論，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国都有期待的气氛。

国家政治领导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我們对这些变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我們正在全国不无成就地开展的政治路綫，在我們面前引起了一个新的过程，就是說引起了有关对我們党的看法上的新过程。我认为，这样說是不錯的，即：对于直到不久以前实质上一直接受反共主义而現在也还部分地接受反共产主义的相当大一部分輿論來說，今天我們已不再是一个方便的靶子，而是正在变成一个問題——我还不能說正在变成一个希望，像我們过去曾經成为十分广泛的人們的希望以及現在我們仍然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希望那样——，即变成一个力量，对于这个力量，人們已經認識到它的效力，并且看到無論是要欺騙它还是要把它关闭在絕路上都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力量能够具体地努力研究，能够給今天被提出来的以及从我国整个局势中产生出来的各种問題提出解决办法。

所有这一切在傳統的反共立場中造成了危机的因素。例如，在第三种力量的反共主义中也造成了这些危机的因素。这种反共主义的鼓吹者之一，巴达利亚——他是一个并不缺乏才气的人——写道，今天共产党人已不再有什么政策，他們第一次接受了左派的政策方針。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他并不了解，人們也可以說——也許这样說还有更多事实根据——正是这种所謂第三种力量左翼才沒有有什么政策，因为他們終于走上我們多年来进行活动的場地，这个場地就是进行斗争，爭取实施宪法原則、爭取結構改

革、爭取国有化、爭取国家在經濟生活中进行干預以便使經濟生活具有有利于意大利集体的某种方針，等等。

天主教的反共主义本身今天在經歷深刻的危机；甚至一些把我們看作是处在民主范围之外的天主教领导人，后来也被迫承认我們的要求和我們的政策是民主的要求和民主的政策。

反共主义的这个危机因素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人們特別注意我們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間将进行的辯論和代表大会的結論，因为他們了解，在我們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們將深入地研究、將更好地闡明，將作出最广泛地触及我們政策的基本路綫的决定。

因此，这是新的因素，它促使一部分輿論有兴趣地注視我們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但是我們應該以更大的注意来看待广大劳动群众的趋向，認識到他們今天期待于我們的是什么。对这些群众來說，我們基本上曾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一个希望，是深刻改变他們的生活条件和使他們在社会上上升到另一种地位的希望。但一些群众今天需要比迄今为止更确定的方針、更可靠的領導；而只有从他們的社会觉悟和政治觉悟的增长和提高中才能够得到更可靠的方針和領導。（过去和現在同我們的青年联盟的同志們和一些干部进行的討論本身就表现出这种需要。）我們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應該解决这个需要。

最后，我們在筹备代表大会时和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場具有国际意义。这些立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陣营中将被討論，將得到贊同和引起分歧；而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

在对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談了这些看法以后，陶里亚蒂同志特別集中談一个問題，即和平共处問題和这个問題同各国国内問題的联系。

首先，陶里亚蒂同志重申，摆在我們共产党面前的主要目标是維持和平，造成使战争不再成为可能的世界形势。为此，必須在生

活在不同制度下的各国人民之間建立一种和平共处的制度。陶里亚蒂接着对这个問題进行深入的考察。他指出：但是，和平共处不仅意味着是一种用来指出这些国家政府之間必須求得協議的外交公式，而且还意味着某种更多的东西。当我们談和平共处时，我們是在确定这个前景，因为这个公式同对各国社会在目前时期，在不久和較远的将来的可能发展所采取的特殊看法是相适应的。

这就是說，为了达到和平共处，必須斗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领导集团不接受这个公式、拒絕这个公式并朝着使制度不同的各种社会之間的国际冲突加剧的方向行动；这种破裂和恶化也反映在仍然存在着有差别的阶级结构的各个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和剛解放不久的国家内部。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上风的一部分领导集团，拒絕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原則，它們实质上断言，资本主义大国在全世界必須占优势 and 占上风，资本主义领导集团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必須占优势占上风，而且必須繼續如此。

因此在国际关系方面必須有斗争，同时必須采取揭发帝国主义政策的行动，必須有积极的目标，以达到一定的目的和改变目前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之上而是建立在冷战和国与国之間的关系以及各国内阶级关系的恶化之上。

如果没有我称之为揭发这个因素——对于我們的行动來說，这是基本的政治因素——，争取和平斗争就没有效果。請你們回忆一下去年十月在意大利这里发生的事情：当时彼特罗·南尼組織了他的抗議游行，反对苏联在苏联的領土上进行的核爆炸。我們曾等待彼特罗·南尼現在組織一次相应的游行来反对美国所进行的爆炸；但是我們的等待完全幻灭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至少就促进十月份的那次游行的人的意图來說，那次游行不是争取和平的斗争，而只是利用形势从而进行卑鄙的反共勾当的一种手段。

我們当时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現不来談它，我們今天的态度仍然是那样；可是，我們應該承认，今天先进的民主力量未能进行能够向所有的人着重指出形势的严重性，指出美帝国主义者所爭取的行动的严重性的斗争，或至少未能組織这样的游行和示威。如果我們把当时那几个星期我們在无党派的、社会民主党的、天主教民主党的以及很遺憾，也有社会党的报纸上所看到的一切言論同今天所发表的东西比較的話，我們會再次确信，那时利用苏联当时絕對必要作的事情^①来进行反对苏联的运动的有些人是伪善的。

和平共处和劳动者的国际团結

从这种观点我得出一个結論，这个結論使我更好地深入領会这个問題，这个結論就是：劳动者的国际团結是爭取和平共处斗争的基本因素。如果缺少这个因素，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就缺乏最有效的动力而落空。

因此，隆哥同志強調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必要性并把它摆在中心地位，这是正确的和作得好的。在我們代表大会的整个筹备工作中，我們应当經常反复提到这个因素，并指出它对我们行动的全部发展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会上同志們談到了如何規定在这个大团結範圍內各个共产党之間的关系，这个团結是我們应当肯定和保卫的。当然，这种团結不仅容許而且要求有独立，或者，像我們所說的，要求有自主（在我們看来，这两个字眼是等同的，因而我們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来爭論，究竟應該說各党独立还是自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範圍內的这种独立或者自主，要求各国

^① 这里指苏联恢复核試驗。——譯者

共产党关系中有一定的规范，但同时要求有辩论；我认为，这种辩论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限度内，也可以和应该变成公开的辩论。当然，它应该是一场辩论，而不应该是互相谩骂和互相逐出教门，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天已经在世界上变成如此伟大和有力的时候，这样做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够像阿尔巴尼亚人那样进行论战，那样的论战没有给讨论提供任何论证，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而只是打算使关系更加尖锐。不能够用逐出教门的办法来进行论战，必须明确地，在必要的时候则必须公开地提出需要辩论的问题，提出这个或那个主题上有分歧的问题，使我们通过思想交流，首先能够证明我们的运动的伟大，证明我们运动内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从而能够使各党吸取彼此的经验而向前迈进。

扩大争取和平斗争的阵线

所有这一切应该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团结，因为我们是为了实现社会革新的目标而行动的力量，这些目标对所有的党都是共同的；而在这些目标当中，主要的是维持和平，因而也就是实行一种和平共处的政策。

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力量本身今天是否足够使我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迅速前进呢？我认为光是这个力量是不够的，就是说，必须扩大争取和平斗争的阵线，必须最广泛和最有效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力量和左翼的民主力量以及天主教力量吸引到争取和平共处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来。这些是今天向我们的运动提出的目标；而我们，在我们的范围内，应该努力来确定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方面，举例来说，有人提出欧洲主义问题，一些真诚地同

意欧洲主义的人把欧洲主义說成是一种超越民族界限以及創造有保障的和平地区的办法。不錯，我們同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时刻，民族界限将被消除，可是，我們同时认为，这是一个緩慢的、长期的过程，而且應該是沒有破裂地进行，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会得到与原来的打算相反的结果。这里問題是如何才能使欧洲各国人民彼此接近，才能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民互相接近。

西方真正的民主力量——工会

欧洲共同市場亦即整个欧洲主义运动唯一有效的东西，它被用来給西欧生产力的发展打上壟断資本的烙印，而肯定不是被用来造成西欧各国人民更密切的团結。为什么？因为整个欧洲主义运动今天完全缺乏民主因素。如果你們同一些参加斯特拉斯堡會議的代表們談一談的話，他們会向你們談肝餡餅和他們在斯特拉斯堡喝的葡萄酒，但同时会告訴你們，在那些會議上，他們什么也沒有干。由于缺乏民主因素，所以决定在欧洲範圍內應該采取哪一条道路的是那些領導資本主义政策的大国。这就是說，我們所面对的是专权的組織形式。

今天，在資本主义西方世界，能不能使民主因素进行干預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我很少相信那些談論組織欧洲議會民主选举的人們，因为我十分了解，这些选举是上层的勾当，因为那里沒有真正的民主代表。可是，今天在西欧存在着真正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西欧各国組織起来的工会，在这些工会面前摆着保卫和改善劳动者处境、同今天統治着西欧市場和整个經濟的大壟断集团进行斗争的任务和具体目标。我认为，开展工人的国际行动，这种行动从所有工会方面今天感受到的各国工会的要求这个基础出发，即

从具有反壟断資本內容的要求出发，对于創造西欧各国人民互相接近的条件，会比“欧洲主义”所有嘩众取寵性质的創議更有作用。

对于天主教运动，我們應該坚持不渝地要求它来参加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但是，我认为，对于天主教界，今天我們也應該更进一步，我們應該向天主教运动中头脑清醒的、負責的和真誠的分子，向那些感到有必要巩固正面临危險的和平的人們，向那些也同意民主演进和解决一定的社会問題的人們明确指出，能够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們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态度。只要天主教运动不調整它在这个問題上的态度，它就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民主的、爱好和平的、进行社会革新的、自主的、不依賴大帝国主义集团的、甚至能够制訂同这些大帝国主义集团相对立的政策运动。

最近时期，意大利对外政策发展情况的例子是很明显的：尽說空話，在行动方面，只是步資本主义世界領導者們的后尘。可是，你們別以为天主教界沒有感觉到这个問題，他們所感觉到的也許比我們所知道的更深刻。

在这方面，佛林格斯主教的講話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希里主教为討論天主教大会問題在热那亚召开的會議上对目前天主教的任务提出一系列看法，他是从“馬克思主义是希望的思想意識”这个說法出发的。这是頗为明确的立場。但是，我們應該向天主教界說，今天我們不再只是希望，我們是已經变成現實的希望，因而我們是确实无可怀疑的东西，我們是一支进步的、前进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糾正过去可能犯过的錯誤，并使关于摆在人类面前的問題的看法更合乎人情、更正确。我想說，上述第二個問題是需要同持有民主見解、爱好和平的天主教人士會談的最深刻、最現實的問題，但不是要同这样一些人會談：他們参加天主教党并且作为这个党的領導人談，其所以作为領導人，不过只是因为这会帮助他們在政治上层和社会上层占有某种位置。我們謀求同这些天主教力量合

作，因為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共處的制度，以及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拯救和平，避免我們的文明的毀滅。

接着陶里亞蒂同志提出和平共處對每個社會每個國家所提出的經濟、政治、社會諸問題應具有的意義的問題。陶里亞蒂說：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最困難的問題，我看到從辯論中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對此我們應該給予回答。首先，我們同意，和平共處不能說是各種對立思想意識的調和。在解放戰爭期間和戰後不久，我們在意大利同天主教人士和天主教民主黨合作了幾年而從未提出思想意識調和的問題，我們曾經一起做了一些大事情和積極的事情。但是，對於有關思想意識問題，我們必須要求的是，在這方面也應造成更好的互相了解，使以後能夠實現政治合作和實際合作，達到可能是共同的國內外政策方面的目標。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因素，我們應予以強調。

另外一個問題是：和平共處是否排除革命的突變和民族起義，是否排除各國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甚至是最激烈的鬥爭呢？應該堅決回答：不，不排除這些鬥爭，不能夠排除這些鬥爭。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情就有這樣的例子，就有受殖民主治壓迫的各國人民不得不用一切辦法進行鬥爭來打碎這種統治的桎梏的例子。和平共處也不排除這些鬥爭形式，它們都是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形式。

就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事情是怎樣呢？

民主在資本主義西方所受到的威脅

如果我們整個來看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看到在這些國家中，民主的地盤不斷地縮小，外力不得干涉各國內部事務、不得阻撓人民意志獲得勝利的原則不斷地受到違背。在某些

时候，我們可以問一問这个資本主义世界：你們的民主在哪里呢？你們在什么地方才是民主的呢？在有强大的人民和工人群众运动迫使你們成为民主的地方，你們才是民主的；而在大壟断集团的利益和政策占上風的地方，我們就看到那里的民主像鮫皮那样地縮小！你們看一看拉丁美洲，那里是美国影响最直接的地区；在这些国家里，人們看不到民主的进程，而相反地，我們看到上层进行不断的干預，阻撓民主的进展。于是发生这一个或那一个將軍的政变，有些总統由于外国大使的干預而被迫逃亡国外，因为他們不再能滿足外国主人了。古巴人民为了能够征收外国大地主的土地，为了开始經濟建設和革新政治生活，不得不拿起武器和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即专政的政权。

而在欧洲，讓我們看两个国家：葡萄牙和希腊，它們是最直接受到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統治的，在这两个国家里，沒有任何民主形式。

在意大利，我們也感觉到在民主制度中有靠不住的因素，我們决不应忽視和忘記向那些有民主思想和希望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公民指出这个靠不住的因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說，要进行深刻的經濟和社会革新的运动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呢？只能是爭取民主的斗争，反对外国为窒息人民意志的表現而对各国进行干涉的斗争。显然，爭取民主的斗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斗争也可能采取尖銳的、激烈的形式。我們是否譴責人民采取最尖銳的形式进行爭取恢复民主自由政权的斗争呢？任何有民主思想、自由思想的人都不会譴責这种斗争。

但是，今天为什么民主地盘不断縮小呢？因为有一个敌人必須加以反对，即帝国主义。今天，对全世界來說，帝国主义意味着大壟断資本的統治，如果希望扩大民主地盘并为了政治和社会革

新的事业而推进民主，今天就必須把矛头指向这种統治。

談到这里，陶里亚蒂問道，那么，在反对这些大壟断資本领导集团的斗争中，工人运动的战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呢？在我們为爭取和平共处斗争的时候，这个运动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呢？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两个論点：向社会主义和平迈进的可能性以及不同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道路。这两个論点是彼此紧密地联系的。但是，我們應該懂得，为什么現在才提出这些論点，而不在以前提出。列宁曾談到在革命过程中采取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但这是一个理論上的假設，在提出这个假設的时候，西方和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任务是用武器夺取政权。而我們提出这个論点，是作为目前形势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則，我們把目前形势称为实现社会主义、所有文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現在，当我們思索一下迄今为止人們如何向社会主义前进时，我們必須承认，这种进展是通过两个关键、两次深刻危机实现的，即1917年和1945年两次危机，这两次危机都同世界大战有联系。今天能不能按照类似的前景来工作呢？这是需要討論的問題，因为你們常常在工人，在希望走向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思想中碰到這個問題以幼稚的形式存在着。今天为这种目标而工作会是极大的錯誤。

今天世界战争会意味着一場核冲突，因而会意味着我們文明的主要中心的毁灭。而在一場核冲突以后，我不认为，剩下的人会能够提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問題。有人甚至想象剩下的人群会建立平均主义性质的制度。但社会主义是另外一回事，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最高的发展之上，社会主义的建設不能够从毁灭生产力的最先进的发展中心着手。

陶里亚蒂問道，那么怎样才能把現社会推向社会主义呢？可

以用和平方式来推进它。这是可能的嗎？又怎样才是可能的呢？我們回答說是可能的，在我們的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應該繼續回过来談这个問題，而且显然，在我們的代表大会上也應該明确地再談这个問題。但是，为了使和平的推进成为可能，主要地要有两个东西，即需要有民主的制度，因而就是要有发展民主的可能性，其次需要有斗争的可能性，即在經濟和政治方面进行真正的斗争的可能性，这个斗争所提出的要求要能打击目前的資本主义資產階級領導集团，准备逐漸深入的改革。

在这方面，陶里亚蒂談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問題，他着重指出，对于那些像我們一样希望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人們來說，民主意味着新的領導階級上台，意味着劳动階級取得对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領導。今天，这是关于自由的真正問題。有人向我們提出这个問題：“在取得社会主义以后，你們怎样看待先进的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有关自由的各种問題呢？”，对于这些人，我們應該坦然地回答：将来，自由問題的解决将取决于今天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問題。陶里亚蒂繼續着重指出，有些人排斥工人階級，排斥領導工人階級的先鋒政党，虽然他們非常了解这个党并没有提出消灭其他政党的問題，而是提出在民主法律的範圍內实现民主合作来建設新社会的問題。这些人决不可能建立使社会正义得以伸張的社会。

因此，問題是民主的問題；但是，此外，还必须进行斗争，爭取实现能够打击資產階級社会目前領導集团的經濟和政治要求。

工厂中的階級斗争和經濟要求

陶里亚蒂說，这里就提出了壟断資本問題，这个問題我們曾經討論过。現在我不打算来深入地談这个問題，我們将在代表大

会筹备委员会上詳細地討論它。沒有疑問，壟斷資本是从資本主義，从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产生出来的一种資本主義社会組織形式。今天，这是資本主義社会的組織形式。这种組織形式包括不同的方面。它包括生产活动，对市場的統治，政治活动和对政治領域的統治。如何同这个势力斗争呢？首先，我們决不要忘記，要依靠开展階級斗争，为爭取实现大工厂生产組織中今天所产生的要求而斗争。这就是反对壟斷資本斗争主要道路之一。还有关于經濟政策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們現行政策的本原，它們包括实现某些国有化的要求、规划化要求、国家干預以保证經濟民主发展的要求等等。这些要求触及整个有关国家和国家职能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一貫朝这个方向执行这个政策，其結果就是趋向于把壟斷集团今天为它們自己行使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大部分——經濟領導和政治領導职能移交給国家，即轉移到政府方面。在我看来，这就是达到国家資本主義的过程。但是，国家資本主義可能是許多不同的东西；在政权掌握在劳动階級手里的国家，国家資本主義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但它也可能是反动的、甚至是法西斯的社会的組織形式。事实上法西斯过去也曾几次使用过某些国家資本主義的措施。

那么，問題的关键在哪里呢？有一位同志在会上說：讓我們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既不是这个极端（壟斷資本主義）也不是另一个极端（社会主义）的中間形式。但是，对中間形式的探討最后会在資本主義和社会主义之間設置屏障。問題不在这里；問題是如何把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結合起来，提出旨在扩大国家資本主義的要求，同时在国家这方面进行民主斗争，使国家在承担国家資本主義的职能时也維持民主的特征，从而使劳动群众不断地、日益广泛地参加对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領導。

因此，問題是斗争和較量；問題是使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相結合，因為它們是不可分的；問題是使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保持在發展和擴大民主制度的軌道上，同時進行改革，限制並摧毀大壟斷領導集團的權力。

陶里亞蒂問，怎樣才能徹底摧毀這個權力呢？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制訂一條前進的路綫，一條將以各種不同形式發展的鬥爭路綫。我們知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意味着勞動階級取得國家的政治領導和經濟領導。我們知道，我們離這個目標還非常遠，但是，我們看到一些條件正在形成，在這些條件下，爭取達到這個目標的鬥爭將以與過去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以前未曾打開的道路正在打開，而且也必須能夠走這條道路。這些是需要辯論的問題。但是，我想提出一點意見，這個意見適用於我已經說過的各點。向社會主義前進要求勞動群眾以至中等階層的强大集團具有反資本主義、反壟斷資本的意識，而我們應該為創造和加強這種意識而努力。

這就是前進的另外一個條件。接着陶里亞蒂着重指出，必須提防這樣的危險，即：把所有這一切問題僅僅作為理論問題。相反地，它們應作為人的問題，從人方面，從勞動者、新的勞動階層、婦女、青年的生活方面，從農民、生產和非生產的中等階層方面提出，如果有人為了發揚反壟斷資本的意識而努力，今天這些中間階層是能夠具有這種意識的。

陶里亞蒂說，這裡一方面提出了文化問題，另一方面提出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問題。提出文化問題是因為發揚反資本主義和反壟斷資本的文化是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而大資產階級今天也是在這個陣地上戰鬥，在這個陣地上前進的，他們毫不猶豫地辦自己的學校，散播他們的學說，利用任何學說的推動力來從中取利和散播他們的群眾性文化。

提出真正的運動問題是因為不能憑幾道指令來實現社會制度

的改造；要依靠群众的转变来实现这种改造，必须善于组织群众的这些转变，使它们通过真正的斗争表现出来。而这种斗争首先是指工会斗争、农民斗争；但也涉及其他问题。例如，工业技术人员这个新中等阶层的问题；我们可以促使他们的反垄断意识成熟，以便使他们来参加运动，这种运动如果不是表现同反垄断的民主运动的真正联盟的话，至少也表现对这个民主运动的同情。

我们再次提出同天主教群众的联盟问题，必须在这些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向他们表达反资本主义的意识，表达走向不是由大资产统治世界的一种制度的要求。

陶里亚蒂最后说，最后还有几个涉及党组织内部活动的问题。这里提出三方面问题，隆哥同志已经很好地谈过了，但还应该深入地考虑，这些问题是：政策路线问题，纪律问题和工作的组织问题。

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进行制订路线的工作，然后需要有纪律。通过代表大会的筹备，我们必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争取所有的同志完全支持我们的政治路线的一切方面。在我看来，在这个工作中集中表现出我们党的这种能力：不仅能够新的形势下维持而且加强自己的群众性的党、活动的党的特征，不仅能够进行宣传而且能够在积极的政策的基础上前进，提出各种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推动自己的党员和很大一部分劳动者来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斗争。

因此，必须克服隆哥同志已经指出的各种不平衡，改进干部的使用和加速提拔干部的过程，提出甚至是对各个领导机构的批评，所有这些都是全党在筹备代表大会过程中应该处理的问题。

（译自1962年4月28日《团结报》）

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

根据一些报道，在天主教民主党领导机构最近一次会议上，在某一点上，一个发言者发出了一种得救和胜利的叫喊声，好像当年克利斯托佛罗·哥伦布的水手们发出的：“陆地，陆地！”的呼叫声一样。这个发言者叫嚣说：“用改良主义来击败共产主义！”这样就同摩洛哥和范范尼的更为拐弯抹角而在实质上相似的说法共鸣了，摩洛哥和范范尼企图阐明的正是这个观点。我们方面值得把这个绳结解开。

改良主义一向是被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所击败的，共产党人就是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继承人。尤其是列宁，无论是在取得政权之前，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还是在革命后，在同这个〔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和同这个〔工人〕运动中迷失方向的现象所作的斗争中，他都以非凡的精力、丰富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击败了改良主义。但是，你们看一看列宁的著作，在第三版三十三卷八十七页上，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就可以找到下述论断：

“布列斯特和约完全不是革命行动，而是改良行动的一个例证，甚至比改良行动更糟，因为这是倒退行动；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①

如何使这种把改良主义看作前进的运动——即便是缓慢的运动——的观点同一般的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和把改良主义作为革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页。——译者

命运动过程的障碍而进行的譴責协调起来呢？我們认为，問題不仅涉及速度，而且还要同我們在其中活动的形势以及运动的内容联系起来考虑。

改良主义的根本过错在于，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一直趋向于忘記和取消工人运动最終的总目标，即：打倒資本主义，取得政权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在尖銳的革命形势下，当能够和应该立即通过斗争来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却忘記和取消这些目标，那是背叛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尖銳危机中，同資產階級联合一起，阻撓十月革命所打开的巨大缺口的扩大，阻撓整个欧洲变成社会主义的欧洲的那些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都是叛徒。可是他們的行动在那时候并不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而純粹是反革命。但是尖銳的革命形势并不是常常出現的，也不由人們随意創造。宣称提出政权問題，这是不够的，因为這個問題届时应该立即真正地提出，并且可以通过直接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当我们不是处在一个革命的历史关头的时候，是否应该认为，工人階級的运动应当被迫停滯不前，而不应当提出可以达到而且构成列宁自己称为“革命階級斗争的副产物”的一些当前的具体目标呢？显然，在这种形势下，爭取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斗争就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主义也趋向于忘記劳动階級斗争的最后目标，使改革本身脱离爭取战胜資本主义制度的整个斗争。由于这种脱节，工人階級的行动趋向于停滯，失掉自己的冲击力，失掉热情和失掉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这种迟滯状态变成不再只是程度問題，而是质量問題。在改良主义立場上停滯不前的工人运动就变成資本主义社会內的一个附屬力量，而无法把自己的每一个胜利，那怕是局部的胜利，看作是走向最終目标的一个步骤，并利用这个胜利来更可靠和更迅速地前进。

那么，用改良主义来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和击败共产主义，这

种說法是正确的嗎？誠然，一般說來，关于工人运动及其发展的上述两种观点是对立的。可是，我願意劝告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从这种对立中得出十分有利于他們的結論时，要十分謹慎。首先，改良主义是某种与天主教的恩惠主义不同的东西，只有完全迷失了工人运动的道路时，它才会变成天主教的恩惠主义。但是，此外还要考虑一些更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关系到各种改革在資本主义結構发生深刻危机的現阶段会具有的那种性质。第二个原因关系到我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质。

在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的进展今天受到了公开的反动暴力的阻撓。很可能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如果不同时发生資本主义結構本身比較广泛的垮台，就不会发生反动政权的垮台，在資本主义結構垮台面前，甚至一种改良主义运动也可能比通常更急速地推进。在像我国这样存在着依靠人民的民主和革命的强大运动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如果不正視比較深刻地影响資本主义結構本身的改革，那就不可能采取改良主义的道路。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中間政府中合作时并不是搞改良主义。今天他們开始想搞改良主义。为什么我們不應該鼓励他們真正地搞呢？难道我們可以排除这一点：承担进行深刻的、真正的改革的义务，会使他們事实上更接近共产党人而不是更接近天主教民主党人，尤其不是更接近天主教民主党保守派。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度和运动的速度本身并不仅取决于他們，也将主要地取决于我們，也就是說，将取决于工人运动能够具有和保持的广度、深度和推动力。它将取决于这样的事实：由于像我們的党这样的革命政党所采取的行动，在劳动群众中决不会丧失对局部改革同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深刻的目标之間的联系的認識，这些目标既不会被取消，也不会被模糊起来。

党的质量、党的群众性、思想方向和实践方向在这种事态发展

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使天主教民主党感到愉快的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单纯用口头上的反对、用空洞的谩骂和用那些除了革命的外貌和调子之外什么也没有的所谓“通盘的代替”来反对改良主义。在这方面，列宁在我们开头引述的那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宝贵的警告：

“对于一个真正的^①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顺利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一开始就大书特书‘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一种神通广大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的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②

在我看来，从这一段话可以很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必须善于走上改良主义的场地，并善于采取这样的行动：不是阻擋，而是推进整个运动。只要我们能够具有这种能力，“用改良主义来击败共产主义”的打算也将仍然是落空的。

（译自1962年7月28日《再生》周刊。按《再生》月刊从1962年5月起改为周刊。）

① 此处意为“今天的”。——译者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88页。——译者

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 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我们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

自从我们上届代表大会后已经过了三年，在这三年中，充满了意义重大的事件。国际冲突甚至发展到最大的紧张和危险程度；千百万劳动者进行了工会斗争；政治矛盾不断发生，民主力量同怀有极权主义意图的保守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在1960年6、7月间悲惨的几个星期当中达到了顶点；在这次斗争之后，人们开始企图——尽管是胆怯的企图，并且充满了内部矛盾——在某些方面使我国政府的行动采取新的方针。

在上述形势下，我们党一直处在事态发展的中心地位。我们党发挥出战斗精神，光荣地应付了这些事件，它明确自己的责任，意识到自己为之而斗争的伟大目标——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但是，我想提醒人们不要有这样的见解，即：认为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应当是对意大利现政府的组成及其将来的命运作出判断。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意大利的中左政府是现时代国内和国际上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一个插曲。我们对它所采取的立场是我们党所提出的总的政治计划的一个因素，而且仅仅是一个因素罢了。我们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根据局势的一切可能的发展来制订和明确这个总的政治计划。

深入地思考一下最近在意大利、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

事情，我們就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实现一个轉折的条件正在日益明显地成熟。但是，这个轉折的实现可能不是朝向国与国之間的关系和各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根本好轉，就是朝向恶化，甚至发展到会发生災难的地步。因此，采取什么抉擇的問題就尖銳地提出来了。这个問題是对各个階級、各国人民、各个国家及其政府提出来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获胜宣告結束以来，已經有十七年了。在这十七年中，一些主要国家內和国际舞台上不断发生斗争。一边集結着为爭取結束对劳动人民的剝削和帝国主义的統治、爭取建立新社会、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階級、人民和国家，另一边則麤集着旧資本主义社会的領導集团，它們积极地企图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阻撓人类的这一前进。但是，大家知道：这些集团所采取的行动并未得逞。进步力量比保守反动势力要强大。社会主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之一，它凭借它的力量能够对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发生日益增长的影响。其他已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都經受住考驗，正在前进和加强，它們团結一致，在各方面建立了团結、合作和兄弟友誼的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的这些胜利的影响是深远的。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潰，而在許多国家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和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則在指引着广大劳动群众，为他們开辟新的前景，使他們对实现他們对幸福、自由和和平的願望的可能性，产生新的信心。

資本主义也繼續在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已經丧失了过去对世界的絕对統治。它面临着比以前更严重的問題和更尖銳的矛盾，同时，在許多国家，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出現了最反动的集团，它們是大壟断企业的代表，占居着优势地位。这些集团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它們的权力，策划侵略性和災难性的国际政策，力图限制和消除民主自由，保存或建立社会保守和反动的制度。

这种明目張胆的侵略性，这种对和平和民主制度的具体而严重的威胁，不能不在人民群众当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忧虑，不能不向所有热爱和平和民主的人们，尤其是向那些愿意在和平和民主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人们，提出新的反抗和行动任务。

采取抉择的必要性正是在上述情况下提出的。上述情况充满了重重矛盾和惊心动魄的因素，但是也为争取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的彻底斗争展示着取得胜利的前途。应当不仅看到暴风雨在威胁着我们，而且懂得向人们提出向自由和平的未来迈进的可靠道路。

因此，这就是我们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中心问题。我们过去做了抉择，我们现在再次做出这个抉择。我们是一个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和斗争的党。这项任务表达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人类的最先进和最优秀部分的千百年的宿愿。这项任务是事物发展本身提出来的，但是，我们有责任研究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应当如何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条件下向实现这项任务迈进。我们正是围绕这个问题举行我们的代表大会，当然，我们也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这个问题是我们时代的中心课题。

二、我们政策的连续性

我们一向肯定：我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把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深刻改造的必要性提上了日程。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的陈腐，未予正视和解决、在某些情况下反由于资产阶级执掌政权而变得更加严重了的基本问题或次要问题，所有这些应在一个总运动中提上日程并且加以解决，这个总运动的最終目标只能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就确定了我们正在打开其前景的革命的性質。

这个立场早在 1926 年我们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就被明确肯定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是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直接领导下拟就的。这个立场后来又被提出来，并得到了论证，得到了彻底发展，一直到在 1956 年的《纲领声明》中得到更明确的阐述。

但是，如果我们只限于确定这个立场，把自己封闭在这个立场上，那么，我们的政治才能就会是薄弱的，我们的行动也不会有很大规模，不会有伟大胜利。重要的是：了解在树立了这个永远不应忘记或忽略的总前景之后，我们行动的具体任务和我們斗争的目标，是怎样来自我們所面临的局势，这个局势是不容許人們从远远的地方加以预测的，它要求人們采取同它相适应的抉择和解决的办法。

事实上向社会主义前进，应当而且不能不按照如下方式实现，即：它在任何时刻都要切合每个国家的实际条件。我們探索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民族道路的全部工作，过去和現在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因此，应当考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应当考虑民族特点，政治斗争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条件，应当考虑民主生活的状况和形式，工人和人民运动的組織、力量、傳統和方向；当然，应当在我們所处的国际关系范围内来考虑这些因素。

可見这是列宁在論述各国工人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任何时候都提到和确认的一些基本真理。

但是，我們并不是很快和很容易地就能掌握所有这些真理的。在我們党存在的初期，极端主义狂热和宗派主义倾向誠然并未妨碍我們完成我們作为先鋒战士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使命，但是，这两种东西却没有使我們能够迅速地取得展开政治行动的必要能力。

1923—1924 年，在我們为克服幼稚的宗派主义而采取最初一

些重要步驟時，葛蘭西提起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承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頭幾年成立的若干國家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沒有能夠領會和在各國條件下正確地實行正確的共產黨的策略和策略原則。特別是我們沒有做到這一點。

於是，在葛蘭西的直接領導下，我們着手彌補這個缺陷。我們研究了哪些是使公開的法西斯反動派得勝的條件。我們從意大利社會的結構本身中找到了這些條件，並且從對意大利社會結構的分析中，我們明確了能使意大利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的各種動力。根據這個分析的結果，奠定了符合我國情況的策略和策略。我們制定了能夠形成一個新歷史集團的階級聯盟體系，這個新的歷史集團將使勞動階級進入我國社會的領導。我們指出了我們應當努力加以解決的主要症結和歷史問題，包括工農業問題，南部和農民問題，自治和全國統一問題。我們明確了只有通過為解決上述各項問題，為全體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國家利益而進行不斷的鬥爭，才能够取得多數，從而能夠創立我們前進的主要條件，我們有責任把國家從法西斯主義使之遭到的破壞中拯救出來。

在這個政治方針下，有一個問題若干年都未獲得明確解決。那就是我們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同爭取民主的鬥爭之間的关系問題。我們一直同法西斯暴政作鬥爭，要求恢復全部民主自由。但是，應當明確這個鬥爭本身怎樣包含着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因素，因此也就是應當明確：民主前景和社會主義前景是怎樣緊密結合的。事態發展本身和經驗引導我們走向正確的解決途徑。野蠻的法西斯主義浪潮席卷歐洲，使整個工人運動以及處在工人運動前列的共產主義運動，作出更加正確的估計來保衛民主成果和政治自由，把它們看成是經濟社會進步的因素，是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的必要因素和更好地組織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基礎。民主政府的成立會是人民力量團結起來擊敗法西斯主義的表現，會使我們的政

治观点通过行动而获得进展。我們考虑了并且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政党参加政府的问题。无产阶级的联盟和政治谅解被扩大到城市中等阶层，扩大到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和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此外，通过斗争经验和斗争的必要性，我们奠定了新的政治前景，我们不再是仅仅对反动派的进攻进行防御，而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制度。为了彻底击败法西斯反动派，使法西斯反动派永远不能卷土重来，这个新型的民主制度有责任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实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

这就是我们在抵抗运动中，在解放战争期间和以后所奉行的政策的出发点，由于在当时局势下，比只是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更为广泛得多的任务提出来了，并且日益占居首要地位，所以曾不得不对这个政策加以明确、改变和发展。

有人常说，解放后，在军事上使人民起义不能取胜的外国对我国领土的占领，是共产党人所执行的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我们的政策所依据的是一些更为深刻得多的原因。在抵抗运动中曾建立了民主力量的团结，从社会上说，这个团结广泛到包括进步的中产阶级集团；从政治上说，则包括天主教群众运动的一大部分。我们在倡导、组织和领导这一团结的人们当中是站在最前列的，这个团结有其革新我国整个生活的纲领，这个纲领只是部分地明文写出，但是它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先进的政治民主制度，实行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深刻改革，新的进步力量集团掌握社会领导权。我们的政策就是为争取这一解决途径而进行公开和彻底的斗争，这个解决途径意味着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民主发展和社会革新。因此，并不是什么我们不得不在与失败前景相联系的起义的道路同没有严酷性和冒险的安稳演进的道路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在我们面前打开的道路是客观环境、在战斗中取得的胜利、团结以

及在斗争中产生的纲领所提出的唯一的道路。问题在于努力克服和粉碎一切障碍和抗拒，并引导和推动已经胜利地经受了内战考验的真正群众运动。这就是当时提出的最革命不过的任务，我们会集中力量来争取完成这项任务。外国对我国领土的军事占领和对我国事务的干涉，没有起遏止当时并不存在的起义意图的作用，而是成为组织和领导保守反动的反对力量的因素，这些反对力量在一定的时刻曾使业已开始的革新过程陷于中断。

我们的这一政治方针，在当时所有的文件、著作和言论中都曾做了公开的宣布和解释。从这些文件、著作和言论中，可以找到后来我们称之为探索和肯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意大利道路的那种做法的主要因素。

在1944年4月11日那不勒斯发表的具有纲领性的首次讲话中就公开指出：

“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

同年9月，《再生》月刊上也明确指出：

“工人阶级知道：争取立即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今天不是他们的任务。”

这些论断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了解由于苏联在世界上所取得的地位而产生了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条件，因此有放松我们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联系的倾向。恰恰相反，早在1944年，我们就写道：

“一个为使文明和进步力量战胜反动力量而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是一件肯定没有改变社会发展规律的事实，但是它为工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先锋队的进步行动，创造了新条件。”

这个今天已经成为我们运动所熟知的观点，在1947年我们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又再次提出来。

党的杂志^①写道：“目前人们已经承认和接受这一点：在法西斯主义、苏联和欧洲各国人民群众为各国民主的胜利而做出的决定性贡献所创立的条件下，已经为争取自由的各国劳动者和人民的斗争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但是，紧接着它又写道：

“但是，毋庸置疑：意大利人民有责任用自己的方法来沿着这条道路行动，即应当考虑我国情况的全部特点，考虑我国的国际处境，我国的经济政治结构，我国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后来，我们就指出了总的战略目标，即建立一个能够实现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的改革、同时使劳动阶级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掌握国家领导权的进步民主制度。因此，像今天有人说的那样，民主运动的团结不仅对于对付法西斯复活的企图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且对于使国家生活的这种彻底革新事业成为可能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的这条政治路线绝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抵抗运动取得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所造成的局面要求这样制订的，而如下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即：1948年联盟被推翻和发生向保守的转变之后，这条路线也依然是有效的和现实的。

事实上，任何事件都没有能够消除或抹煞抵抗运动的基本成果。不仅是民主制度没有被消除或抹煞，尽管它在许多方面受到威胁，而且意大利人民最优秀部分身上占居主要地位的战斗性、组织性和斗争能力、对坚决实行社会革新的愿望、反法西斯精神和对民主和平事业的热爱，也没有被消除或抹煞。今天绝大部分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劳动者怀着新的热情从上述一切得到鼓舞。因此，在抵抗运动中和成立现行共和制度期间作为我们的指南的那个前景，并未关闭，相反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我们面前敞开着。这个

^① 指《再生》月刊。——译者

前景就是开展政治斗争和民主与和平的群众运动，来改变现行制度，同时把整个社会推向社会主义。我所說的和平，首先是指希望防止战争，但也是指把内战也看做一种应当避免的灾祸以及认为今天存在着能够避免这个灾祸的一些条件。因此，运动应当根据客观条件和保守反动的领导阶级的頑抗情况，用激烈程度大一些或小一些的形式来发展，而且它过去就是这样发展的。保守反动的领导阶级始终准备在他们认为有助于他们的目的时施用公开暴力。迄今为止，事情就是这样。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曾付出了鲜血和引起了死亡。人们在争取民主自由要求和保卫平时曾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总罢工，在公共广场上发生冲突和牺牲。保卫议会制度不受欺骗性选举法危害的斗争，震动全国达一年之久，最后以两次政治性罢工和竞选胜利而告终。1960年，专横反动的企图曾为如此广泛和坚决的民主运动所击败，这个运动曾把我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行动路线都始终是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依靠群众运动的推动力来对付最严重的危险。这种同群众持续而紧密的联系过去一直被我们看成是一种准备，它使我们能够胜利地对付任何反动冒险企图，而且事实上现在也是如此。

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就是这样在政治上被肯定下来，并且具体形成。我们把这个政策叫做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这种连续性是党的团结和力量的基础，是党同劳动群众的牢固联系和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效能的基础。我们正是希望在这种连续性的范围内展开这次代表大会的讨论并且作出决定。

我们并没有放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势中的任何因素，我们身上没有任何形式的肤浅和愚蠢的乐观主义。我们知道：意大利领导阶级已经一度求助公开反动制度来反对工人运动的前进。我们知道，保守的领导集团的目的何在，他们的行动是旨在千方百计

地阻撓政治社会的彻底革新，在劳动阶级和民主力量中间制造新的分裂，以求巩固他们的政权。我們知道：帝国主义的某些领导集团把我国看成是注定由它们长期统治的基地。我們并不低估困难，但是我們也不低估来自劳动群众的从事革新斗争的强大推动力，我們不低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力量，不低估社会主义事业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 and 活动中所取得的进展。我們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的运动能力、行动能力、斗争能力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念也是我們打算在会上重申的我們政策的連續性的一部分。

三、不是和平共处，就是我們文明的毁灭

向社会主义前进是触及今天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与各国间竞争所处的各个方面，触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的一种运动。向社会主义前进是为争取一些伟大目标的斗争，这些伟大目标关系到人类的大多数，即：

駕凌一切之上的和平；

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

各国劳动人民取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結束对劳动的剝削和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

争取能够保证一切人享有民主权利、保障他们的人格得以发展，消除来自贫困、剝削、暴政或剝削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统治的任何强制行为。

因此，我們把和平放在第一位。社会主义世界，就其本性来说，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不再有帝国主义，就是说，不再有剝削的领导阶级，而就这些阶级的本性来说，它们是要奴役别国人民的，是要用战争或用战争威胁来保持或增殖它

們的物质財富和权力的。

从資本主义发展为具有帝国主义特征时起，世界就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历次战争相隔只有短暫的时间，在这短暫的时间里，新的武装冲突又在酝酿成熟，并且趋向于变成世界冲突。

我所屬的那一代人的命运就是带有这种不断发生战争的标记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露出苗头到爆发是一段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露出苗头到爆发又是一段时期，最后則是冷战。因此，所說的这一代人的命运是痛苦和悲慘的，千百万人的生命被毁灭，无法估价的財富蕩然无存，进步被停止或遏制，人們的心灵陷入沮丧、焦虑和恐惧的万丈深渊。艺术和思想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这种荒唐悲剧的影响。

但是，今天的情况并未好轉，相反在若干方面倒恶化了。大家知道：一旦在大国之間发生武装冲突，因此也就是一旦发生新的世界冲突，那么肯定这个冲突是会用原子和热核武器进行的。但是，原子和热核武器不像过去的武器那样是針對战斗人員而发的。这些武器是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彻底地消灭敌方。不只是消灭敌方的武装力量，而且是消灭居民、工业中心、城市、海港、街道、农产区，总之，消灭一切。原子和热核武器目前已經发展到如此駭人和强大的地步，以致成为能够把它們发射到任何国家，发射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的手段，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說，使用这些武器就一定会达到这个彻底毁灭的可怕目标。無論从哪个方向都会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說：任何一方都不会幸免于这场毁灭。

因此，使用热核武器进行的一场世界冲突会意味着在設想的交战地区——这个地区今天大約包括当前整个文明世界——我們文明的各个地方都会遭到毁灭，現在无从肯定：在这场毁灭之后，幸免于难的人們是否还有条件生活下去。人类由于受到重大創伤，在能够重新打起向前迈进的任何精神以前，可能要拖延几个世

紀，在这种前景面前，甚至連談論这一部分殘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問題上可能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上，我們所面临的会是人类的自杀。

所有这些都是从所使用的武器的性质而来的。如今在研討和平与战争問題时，一貫从研究现实出发的馬克思主义，就不能把如下一点撇开不談，即：核武器的发现和普遍扩散，是武器性质的质变，这意味着只要用这种武器来进行战争，那么战争也就同以前的战争有质的不同。在战争性质的这种改变面前，我們的学說本身需要作一些新的考虑，要求作进一步深化和新的发展。为反对威胁一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侵略者而进行的保卫战，永远是正义的。如果执政了的工人阶级，面对着一个极其强大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而不拥有为击退和打敗任何侵略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并且不时刻准备使用这些手段，那就糟糕了。因此，即使在核武器的问题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把自己保持在它的敌人的水平上，哪怕这要它作出巨大牺牲。但是，尽管这种竞赛作为势所难免的事实已經开始，并且在道理上为人們所接受，难道不是从这里产生了如下一种局面嗎？即：由于日益激烈的冲突不断发生，由于不負責任的挑衅分子的活动，甚至由于某种物质上的錯誤，我們可能几乎是机械地、无法控制地墮入灾难的深渊。如果很清楚，核战争对于双方都是自杀，那么可不可以承认：爭执双方的集体自杀竟是件正义的、合理的事情呢？因此，用軍备来同軍备对抗，并不是什么解决办法。恐怖的均势不是什么解决办法，帝国主义的某些领导集团，特别是极端主义集团就断言：最大国之間的关系应当永久建立在这个恐怖的均势之上。恐怖的均势只能意味着灾难性的原子屠杀工具的不断积累，只能意味着这种工具在地球各个地方的散布，从“实力地位”出发挑撥战争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无休止的繼續。但是，无休止的繼續是办不到的，因为整个作法是要导致冲突和原子

灾难。

解决办法在于相反的方向，即在于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原子軍火庫将被束之高閣，将被消灭和摧毁，因而灾难也一定可以避免，它絕不再能进入可能的前景之内。如果不通过国际关系的根本緩和，即如果各国之間和各国人民之間和平共处，不管其政治社会制度如何，也不管其經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如何的这一原則不为普遍接受，那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

在我們的运动中，人們談論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間和平共处很久了。列宁在渡过了帝国主义对年青的苏維埃共和国进行的武装干涉这一时期之后，就第一个认为，这种和平共处是可能的。这个論点后来一直被保持下来，并且成为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全部和平政策的依据。但是，今天談論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是不够的。面对着原子冲突的灾难前景，应当肯定：和平共处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來說，而且对于資本主义国家和全人类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原子毁灭，也就是我們的文明、或者說我們大部分文明的結束。在这两条道路面前，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是毋庸置疑的。

四、古巴爭取独立的斗争及其教訓

但是，和平共处的国际制度意味着什么呢？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把这个目标当作我們的斗争的中心目标，对不对呢？为了回答这些問題，我們就得談一談国际关系的当前危机所引起的一些問題和今天我們的队伍中正在認真討論的一些問題。

一般都承认：国与国之間的关系从未像現在这样緊張过。过去几周，竟然达到战争結束以来从未达到过的緊張程度。有人說，人們都害怕得发抖了。說得有理，因为一連几天似乎不能避免核

冲突的爆发。其所以沒有发展到这种地步，那完全是由于苏联的主动，它提出合理的妥协，从而使暂时緩和成为可能。但是，局势至今还是十分尖銳的，最意外最严重的事情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这次危机过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和挑衅政策已經清楚地暴露无遺。美国政府对古巴共和国采取的行徑，海軍封鎖的宣布和武装干涉古巴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明目張胆地破坏国际法，破坏联合国宪章，破坏各国人民之間和各国之間关系上的文明习惯。說什么古巴政府为自卫而得到的軍备对美国是一种威胁，以致不能不采取报复性措施，这也是无济于事的。美国不是就把它的侵略性武器放到世界各地，放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緣，以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永久的和現实的威胁嗎？而且在通过合理的妥协撤走这些武器之后，美国难道不是又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延长全世界的警戒状态嗎？显然，美国所要取消的不是这种或那种武器，而是古巴人民的自由，他們的独立和他們在摆脱了殖民压迫后所作出的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抉擇。这就是决定性問題。在这个問題上，应当肯定和郑重宣布：古巴共和国有权作为自由的国家，有权繼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古巴的自由和独立不仅是古巴人民的事业，而且是各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自由、民主与进步的人們的共同事业。

我們断然拒絕这样一种人的立場，他們說什么由于古巴向社会主义前进把当前世界上的政治联合打乱了，所以应当受到批評，应当被看成是消极的。令人十分奇怪的是：这种立場竟受到那些激烈譴責把国际关系貶低为实力問題的人們的公开或隱蔽的維護。但是，否认世界上任何一国的人民有权成为自由的人民，有能力为自己建立一个对自己最合适的社会制度，那不是实力和强权政策，又是什么呢？各国人民的独立不是什么可以分割的财产，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这种价值是絕不能被否认的。

我們在这个讲台上再次表示我們对古巴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声援，再次表示我們同他們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联系。我們向古巴人民的代表們保证：这种声援是为意大利劳动群众大多数同意的。

在企图侵略古巴引起的国际危机的紧张日子里，我們党表现出善于勇敢地同群众一起并且在群众当中应付最尖锐的局面。无需中央的特别号召，所有主要的組織就立即动員起来，采取行动。在各省委员会的倡议下，举行了积极分子会议，这些会议号召共产党人、党的同情者和各种倾向的劳动者举行示威。在二十二个省，其中包括罗马、米兰、都灵、热那亚，持续了好几天的运动的效果是非常大的，以致整个公众舆论也受到影响并且动起来了。在另外三十一个省，虽然也有运动，但是没有那么强烈。在工厂中，人們停工和罢工，参加的工人有二百万以上。还举行了数以百計的群众集会。在最大的城市，尽管有政府当局的禁止，还是举行了群众游行。在米兰，一位青年同志由于自己对于民主事业的虔诚而献出了生命，整个城市以惊人的振奋精神一致頌揚他的牺牲。青年到处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社会党工人同我們一起，同他們的最优秀的领导人一起到广场上去。文化人士、作家和艺术家，同劳动人民群众一起发出抗議的呼声。

但是，如果說在古巴危机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畔政策的面目暴露无遺，当前国际形势中的另一些因素也显示出来，对这些因素也应当密切注意。

在过去几十年，在国际关系一贯所处的条件下，要使古巴人民保卫和拯救自己的独立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肯定地說，古巴会被侵占，它的自由会被破坏，殖民压迫和剝削的制度会复辟。其所以沒有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古巴共和国在爭取本国自由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古巴共和国从一个偉大的国家苏联那里，从其他社会主义各国那里得到了真正的友誼和援助。这使得古巴人民能够

繼續生活和工作下去，并且拥有为自卫所必需的武器。美帝国主义沒有能够实现它的侵略計劃，在最尖銳的决定性关头，当似乎肯定美国极端分子赢了一局，原子冲突就要爆发的时候，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又一次善于采取行动，避免战争，建議并且接受一种体面的妥协，那就是：用撤走导彈武器来换取帝国主义放棄侵略古巴，因而也就是换取对古巴独立的保证。

五、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

在爭取古巴独立斗争的进展中，我們发现我們的某些論断已得到证实，这些論断在今天具有原則意义。结果是，尽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挑衅，世界冲突的爆发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正以它的力量、它的物质資源、它的創議和它的威望来保卫各国人民的独立与和平。

但是，关于这个問題，过去和現在都在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激烈的爭論。1960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上就这一問題进行了广泛的討論。当时中国同志們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絕了这些观点，同时达致了一个共同的明确观点，但是，上述观点目前又以一种公开的和激烈的爭論方式被重新提出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这些喧闹的傳声筒又以特殊的方式加以仿照和傳播。

人們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是整个爭論的起点——因为說可以避免就会是說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經改变了，这是沒有的事，也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我們說，問題不在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問題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存在、巩固和不断加强，造成了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帝国主义領導集团已不再能为所欲为。不参加任何集团并贊成和平政策的强大的不結盟国家集

团的存在，加强了局势的这种新特点。同时各国人民在大規模运动中表現出来的、无疑对某些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也起作用的和平願望，也有助于避免战争。而且人們也不能說整个帝国主义陣营都是团結的。在它的內部，在那些最极端的准备犯一場罪行的集团同其他那些动搖不定的、归根結底还願意避免那种可能引起原子战争的狂热的集团之間，是存在分歧的。很清楚，在我們看来，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例如意大利或法国，只有在建立了进步的革新民主政权之日，才能停止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同样清楚的是，一个强大的群众与輿論运动，甚至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前，就能够迫使它接受某些有利于緩和国际关系的措施。

因此，看不到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或者肯定說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紙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都同样是錯誤的。正是在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不仅避免战争成为可能的，而且制訂一条爭取实现和平共处的积极政策也是可能的。

称和平共处为一种妥协是正确的，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实。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力量体系存在的时候，双方为了肯定和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声明放棄战争，从而譴責革命的輸出和反革命的輸出，这是一种妥协。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要素、一个前提，虽然它有巨大的重要性。牢固地保住这个前提以后，应提出和应该实现其他一些更为坚固和更为广泛的目标。认为和平共处政策可能导致简单的承认和維持現狀，即維持当前局势不变，等于划分势力范围等等，这确实是錯誤的。实际上，在当前局势中許多沒有解决的問題是尖銳的，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問題，現有的均势是基于两大軍事集团的存在与对立的。如果要創造一些能够建立一个沒有战争的世界的条件的话，就必须改变这一局势。

和平共处是国家之間关系的另外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相互了解、信任、排除战争的竞赛，以及充分保证各国人民的自

由与独立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是建立在合理解决今天仍然存在的、引起摩擦与不断冲突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人们想到的，有对德和约问题，柏林城的新地位问题，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恢复它的一切权利和被霸占的领土福摩萨问题。

人们还想到战争问题，即有美军参战的在印度支那南部继续进行的战争，想到中印边界问题。如果人们愿意实现和平共处，那么就应当正视并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这一切问题，举例来说，就像人们就老撾问题所作的那样。沿着这条道路，人们能够而且应当逐步达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必须使得能够提出并解决现在已经成熟的缔结目前两大军事集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建立欧洲、亚洲、美洲广大的无原子地区的问题。沿着这条道路，人们能够而且应当实现取消建立在全球各地的一切侵略基地，同时实现取消两个军事集团，禁止和销毁一切原子武器，采纳有监督的普遍裁军计划，这是唯一真正的最后证明人类克服了自我毁灭的危险，并奠定了所有国家、所有方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新的蓬勃而自由的发展的基础。

我认为，把那些认为这基本上应当是当前共产党人国际政策纲领的人指责为背叛马克思主义学说，背叛革命事业，把他们扣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甚至是对敌人卑躬屈膝的帽子，那是荒唐的。这是一个符合当前现实的纲领，它既未低估应当打击的敌人，也未低估局势中包含的危险。此外，这个纲领只有通过大规模斗争，通过动员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以及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结成联盟，不论其政治、思想、宗教倾向如何，才能付诸实现。这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进步力量在世界战线上同保守反动力量交锋。因此，它是当前在国际范围和在各国内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主要方面。

和平共处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解决今天的经济社会问题展开竞赛，在这些问题中就有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就有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通过经济政治斗争参加到这个竞赛中来，这个斗争处在比以前高的水平上，并且有取得伟大胜利的更广大的前景。

至于每个问题，这应当通过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

古巴冲突中，美国政府采取了粗暴的、不负责任的、蓄意挑衅的行径。苏联领导人没有丧失冷静，他们权衡了自己每个行动都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没有理睬美国极端分子发出全面冲突的挑战，相反却在最严重关头建议合理妥协，以求拯救和平，这是他们的功绩，而不是他们的罪过。为了这种负责行为，所有人都应当感谢苏联领导人。说什么这种负责行为是出自恐惧，出自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正如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所散发的、充满惯见的庸俗论调和谩骂的小册子里所说的那样，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的事。怎么能把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执行的政策同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投降行为等量齐观呢？在慕尼黑，一国人民——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遭到了摧毁。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古巴的独立却是得到保卫和保证。提出上述性质的看法，意味着不理解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战略应当是什么。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战略不是建立在头脑发热和冒险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相互了解，谈判，因而也就是建立在沉着地、合理地寻求可以为双方接受的解决办法之上的。

至于中印边界的严重武装冲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保持以前发表过的意见的实质。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我们不知道这次进攻的规模如何——开始的。

所有資產階級報紙對這個消息大肆叫囂，說什麼印度開始進攻，要把中國軍隊從他們的障地趕走。所有這些我們都沒有忘掉。這并不妨礙我們繼續認為：在兩個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它們任何一國都沒有、也不可能有帝國主義野心——中間發生武裝衝突，是沒有道理的，荒唐的。這兩個國家都是萬隆會議和聚會的倡導者，它們有責任通過和平途徑來解決一個有關邊界的問題，何況這條邊界又是通過幾乎人煙絕迹的地區。中國人民和印度人民都有責任以和彼此打仗大為不同的方式，以比彼此打仗更為有利的方式來使用自己的精力。中印之間的武裝衝突只能在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和平的鬥爭的發展方面產生消極影響。正如人們所見的那樣，這種衝突只能使印度領導集團更加嚴重地向右轉。而且，它對於那批中立國家，也是一個嚴重打擊，這些中立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是爭取和平共處的鬥爭中的一個積極因素。

我們對中國同志懷有很大的尊敬。我們了解他們為把中國人民從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而進行的英勇鬥爭。我們知道他們在受着侵略威脅，由於帝國主義及其奴僕們的勾當而被排出聯合國大會的艱巨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中已經取得怎樣的進展。我們了解他們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的倡議過去有過怎樣的價值。為此，我們在看到他們進行一場我們不理解其必要性的武裝衝突時，感到擔心。因此，我們高興地歡迎他們單方面停止軍事行動的創議，並且后撤，從而使必不可少的和平談判有可能開始和取得結果。但是，印度領導人對談判的抗拒和拒絕，他們的好戰傾向，印度的政策現在使我們感到非常憂慮。我們希望：爭執問題能夠通過和平途徑得到解決，中印之間能夠恢復友好、合作和兄弟關係。

六、爭取意大利的新外交政策

古巴問題在保證其獨立的條件下獲得解決——雖然還不是最後解決，中印邊界軍事行動的結束，可能已經開始了國際關係緩和的時期，我們希望是這樣。有人談到就停止核試驗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談到積極恢復裁軍談判、在柏林問題上立場相互接近的可能性。所有這些都充滿了希望，但是，絕不應當放鬆警惕，放鬆為爭取和平解決，反對和平敵人而鬥爭。

為了實現國際關係的新秩序，我們認為：我國採取積極行動是必不可少的。1961年夏范范尼曾略有改變舊方針的企圖，這個企圖已經以毫無結果而告終。在最近這次危機期間，執政者的言詞雖然比較溫和，但是實質卻仍是支持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必須深刻改變意大利的國際立場來消除這一實質。

今天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集團究竟意味着什麼呢？說什麼為了安全起見才必須參加這個集團，那是錯誤的。二次大戰以來，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任何人威脅我們，或對我們懷有什麼企圖。在由加勒比海的緊張局勢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最尖銳的日子里，儘管在加勒比海我們沒有什麼要同任何人瓜分，我們的安全與和平卻受到威脅，這正是因為我們參加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我們可能不由自主地被牽累到一場由美國政府的行動而挑起的災難性衝突里去，而美國政府竟未就這種行動同我國政府商量過。這不再是什麼結盟了，簡直是一條鎖鏈，一種枷鎖，它把我國貶低到喪失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的地步。

但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洲，除了是這種把任何決定性職能都把持在美國領導集團手中的做法以外，還意味着什麼呢？在這個組織中，法德政治軍事集團正在日益加強，這兩國都是距離民

主制度很远，并且敌视任何缓和局势和和平解决争执问题的，因此，它们原则上都反对和平共处和裁军。各种所谓的欧洲主义纲领今天都因为人们根本不考虑这一现实而变得面目全非，在这个现实下，如果我们当真愿意取得欧洲各国人民间的民主谅解，那就必须进行揭露，进行斗争，就必须改变一些方针。

我们再次依据抵抗运动时期的国际政策纲领，肯定意大利应当摆脱目前的处境，应当奉行置身于任何军事集团之外的外交政策，应当自动地开展密切符合其本国利益的国际行动，反对对我国事务的任何外国干涉，为消除对立集团和建立持久和平的新秩序而作出有效贡献。

首先，意大利人民必须摆脱最严重的负担，即在我国领土上设立进攻性原子武器基地。即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也没有任何理由非要我们这样一个穷困而人口奇多的国家承受这一重负，而大部分其他盟国都拒绝了它。我们给予各种倾向的文化界和报界人士关于要求撤除这些基地的倡议以高度评价。我们支持这一倡议。我们号召全体同志，我们所有的朋友，号召一切主张和平和进步的人们，为使这一倡议发展为真正的全国性征询民意的倡议而努力。

我国执政者并没有提出——即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开展有利于缓和局势和和平的有效行动的外交政策倡议。唯一的积极因素依然是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也扩大了同它们的文化关系。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以前提出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也看到并且揭发这样一个严重危险，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共同市场的领导机关可能又一次把我们推向以前的那种排斥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意大利需要拒绝对贸易交往的任何限制，以便有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它需要开始并且加速世界统一市场的恢复，这个统一市场的恢复就是和

平共处的經濟方面。我們需要发展我們同中立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应当是自主的,不是屬於大国际壟断資本所要求的那种新型的殖民主义滲透計劃之內,而是为了促进新的自由国家內的新經濟的自由发展,这种新經濟本身是蘊藏着向幸福和社会公平前进的能力的。

我們要为爭取使我們置身于任何軍事集团之外的外交政策而斗争:我們同时也要求意大利外交在今天最尖銳的問題上采取新的建設性立場,爭取通过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解决柏林問題,爭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爭取有监督的普遍裁軍,爭取通过談判解决世界上今天未决的一切問題。我們將支持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任何一步,即使是有限的一步。

七、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

近年来,特別是在西欧,更明显的是在最近一次战争中遭到失败的那些国家出現了生产力的扩张以及技术上显著的革新和进步。其結果,出現了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有些时候其速度相当迅速。这并不使我們感到惊奇。任何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从未认为,資本主义将由于其自发性的灾难以及經常存在着的經濟停滞而寿終正寢。目前西方的經濟发展进入到周期性經濟进展阶段,这种进展是不平衡的,跳跃的,它标志着資本主义經濟的特点。它既不是一种經濟革命,因而也不是制度性质的改变,而是一种发展,它证实了这一制度本身演进的規律。伴随着这一发展的是殖民主义的崩潰,这样,这一发展就給整个資本主义提出了若干新的非常尖銳的問題。事实上已形成了不平衡和深刻的矛盾,而各国整个巨大的、强有力的經濟体系正开始遭到实质上的变化。生产力的扩张以及技术进步本身使得生产的集体性和社会性更加强,而与此相

对的是財富和經濟权力集中在大壟断集团的手中。这些大壟断集团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們要求为了他們的利益来支配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以便解决已不再是可以在一个企业范围内解决的问题，这样，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就被推动来承担越来越扩大到經濟生活的领导方面的新的职能。这样，整个制度的基本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更为明显；而在各个国家中阶级斗争的状况就更激烈了。在工人阶级面前有着国家，它应该懂得在国家这一場地上进行活动，并且应该与国家较量。

在这种形势下，在欧洲六国中部分地实现了的并且趋向于扩大到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經濟一体化过程，变成了帝国主义在现阶段的一条新的、特有的路綫。伴随这一新的路綫而来的是竭力建立新殖民主义制度，以便继续剝削老的殖民地，而仅在形式上尊重新的自由国家的存在。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我們就已承认，由于生产力扩张以及所有經濟的进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国际性质，經濟一体化是今天资本主义經濟的客观趋势。我們当时预料对我們国家的有害后果仅是在农业方面；而我們譴責欧洲共同市場是大资本主义壟断集团加强統治的中心，是在我国加强壟断資本发展的工具，是对今天人們提出的經濟結構民主改革的真正的、严重的障碍，結果这种譴責是完全正确的和现实的。此外，在美帝国主义的推动下，以及在德法政治和軍事集团的领导下，共同市場趋向于具有大西洋集团附屬組織的性质。它变成了不是各国人民真正团結的工具，而成为加深目前存在的分裂的工具，成为和平共处政策和和平政策的障碍。共同市場設法把共同市場扩大到一些国家本身，产生了另一方面的結果，就是阻碍了各方面的貿易关系的扩大，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貿易关系，共同市場是企图拖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的。

这些深刻的經濟变化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严重的反应。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中，工人只是通过艰巨的、不断的斗争才能保卫住他們的生活水平，而由于緩慢的、經常的通貨膨脹，由于在工厂中雇主命令采取的劳动組織措施，由于今天的劳动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强加于工人的新的消費品价格，使得工人已得到的改善很快就被勾銷了。政府官員所談到的一切所謂规划化計劃都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冻结工人报酬的要求。工人組織为了建立他們在工厂中的权力以便有效地控制全部的工資份額以及为了参与經濟生活的領導所作的努力，却遭到了最頑强的抵抗。

在政治关系中，限制和取消民主自由，走向专制的、保守的以及社会反动的制度的傾向正在加强。在資本主义的欧洲，在那些存在着法西斯政权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今天必須加上另外一些国家，法国和德国，在这些国家中民主自由逐漸地被消除。在德国，那里出現了旧的軍国主义精神，納粹組織正在滋长起来，事实上存在着几乎没有掩盖的警察制度。在法国，由于傳統的資產階級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失敗而造成了真空，今天这一真空被一种新型的独裁填补了，这种政权是大壟断資本不受任何控制的統治的假面具。

在欧洲之外，整个拉丁美洲地区，除了个别例外，不存在任何民主的、人民自由的制度。在所謂第三世界的国家中，人們注意到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在向右轉，例如在印度以及其他地方。反对共产主义运动而采取的措施就是这种危险的向右轉的一部分。

这大致上就是今天資本主义世界給我們提出的一幅图景。但与此相对的是人民为爭取自由和打开走向建設新社会的道路而斗争的广泛的、蓬勃的运动的图景。在最近几年內，千百万人民已經打破了殖民主义压迫的枷鎖。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以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終。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旗帜胜利地飄

揚在美国的边境古巴島的上空。假如我們願意看一下辽闊的社会主义陣营,那末在我們面前出現的图景就是不断前进、巩固以及經濟、政治进步的图景。經濟发展的速度平均來說高于資本主义世界的速度三倍。苏联越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提出了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經濟物质基础的偉大的新任务。

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綱領就是这个建設綱領,它受到劳动人民群众和所有人类进步力量的很大关切和热烈欢迎。这一綱領是經濟、政治的巨大胜利的結果,是社会主义建設在各方面获得最終成就的結果。同时,不但由于这一綱領規定了生产力的巨大擴張,而且由于这一綱領具体地提出了解决人与社会組織之間的关系的新办法,这一綱領打开了令人神往的前景。这是一种解决自由問題的办法,这不仅仅是由于它建筑在消除經濟剝削的基础上,而且由于它把人的自由的、多方面的发展摆在社会生活的中心。

苏联过渡到經濟与社会建設的这个新阶段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强大因素;它增加了互相帮助的可能性;在完全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和特点的基础上,加速这些国家間接近和經濟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过程,一直到采取一个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經濟計劃。这是在国际上劳动合理分工的前奏和这种分工的第一次实施,这种分工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与大壟断資本有着最直接联系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加强它們保守的、反动的方針以及他們本身的侵略性,无疑也是企图对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这种稳步前进的。但是人們能够怀疑这种企图的效果。事实上,今天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推向結構改革以及与經濟发展、生产力新的擴張有联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是这样一种推动力,它使那些否定国家的任何創議和对經濟生活的干預的自由主义的概念处在最后的危

机中，并加以消除。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經濟計劃化和規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討論和接受，就是在一向是保守的，并与落后的、甚至是資本主义以前的概念有着联系的天主教教会的社会学說中，今天这种概念也有一定的地位，国家的經濟性质的任务得到了承认。当然天主教教会的学說以及資產階級領導集团接受这种計劃經濟和綱領，其目的显然是通过在国内以及在国际上采取合理化的措施来保存資本主义制度。但这不失为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标志。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資本主义制度現代形式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是这样一個阶段——列宁說过——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从这一客观的需要中，必須产生一种自觉的运动。

因而走向社会主义是今天摆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面前的任务。这不是一个輕易的任务，因为它必須在不同于那些經濟还是以农业占优势、政治結構往往沒有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条件下来完成。因而有必要进行探討，以及制定一条行动路綫，这就不仅要求运用、而且要求发展和丰富我們的理論。必需更好地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现实，以便在与劳动群众紧密的接触下成功地創造改变这一现实的必要手段。

在最近一些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中——这些文件是1957年11月的決議和和平呼吁书，1960年八十一个党会議的決議以及1958年^①羅馬欧洲十七个党的代表会議所通过的決議——都包括了解决这个問題的普遍和实际的重要指示。許多共产党的工作都是在上述方向进行，它們的决定也是在同一方向作出的。

中心的问题仍然是在爭取民主的斗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59年。——譯者

之間建立緊密的有機聯繫的問題。我們的任務是：保衛民主体制；把民主變成工人階級的事業；號召人民群眾動員起來，為反對任何反動和專制退化的企圖而鬥爭；以群眾的鬥爭來擊敗所有這些企圖以及把歐洲從殘余的法西斯制度中解放出來。同時，我們的任務還要發展民主，使民主体制具有符合今天條件的經濟和社會內容。這就是實行經濟結構改革的意義、國有化的意義、國家計劃和規劃的意義所在。把國家推上這一領域對我們來說也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只要同時有民主因素存在並得到發展，這種民主的因素不僅採取傳統的公共辯論的形式，而且迫切要求實行監督和民主的領導；使工人階級和各行業的勞動人民可以進行干預，以便把國家的干預變為反對大資本權力以打擊、限制和擊破大壟斷集團統治的鬥爭工具。這樣，就可以打開一種新型的民主的前景，一種革新的民主的前景，正如我們法國同志們所說的那樣，這種前途不是別的，而是為建立一個以勞動、社會主義與和平為基礎的新社會而鬥爭的最高階段。但是，如果不通過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廣泛運動和統一鬥爭的話，這一前景是不能實現的。

一些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兩次戰爭之間以及在冷戰時期，曾經是政府的領導黨，有時也是工人階級中占多數的黨，它們從未能確立和實現走向社會主義的具體前景。結果，它們喪失了人民群眾的信任，並讓位給保守的和反動的力量。這是破壞工人力量和人民力量團結的機會主義的、保守政策的失敗。但是西歐工人階級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戰鬥中必須說出他們的話。人們必須把話說出來以便重建在爭取民主和反對大壟斷資本權力的鬥爭中的團結，而且不僅要與貧窮的農民群眾，而且要與由腦力勞動者、技術人員、教授，即整個人民中的一部分所組成的城鄉中等階層建立有效的諒解和聯盟，今天資本主義領導集團企圖把這一階層變為一種純粹執行他們的意志的被动工具。這樣就打開了一

种統一运动的可能性，这一运动关系到所有不願意受到大壟断集团的統治，不願意被动地接受民主制度的結束以及原子毀灭竞赛的政党和所有組織，不管它們有着社会民主的傾向，或有着天主教的願望。为創造这一群众性的統一运动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也是一种准备对付任何反动企图的最有效的方式，它是目前摆在資本主义国家面前的最严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共产党人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

八、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目前在世界上有組織在九十多个党内的四千二百万共产党员。这是遍及各文明国家的一条网，是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的一支军队。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特别是对于那些一开始就参加締造这一偉大运动的人們，他們知道为了达到这一巨大的成果进行了多少次斗争，与多少敌人进行了战斗，克服了在我們行列中产生的多少困难。

但是，必須繼續前进，因为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越来越重要和严重了。了解了这种必要性，就推动我們对我們的运动、对这一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以及对还需要我們去解决的问题进行客观的研究。

不論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或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工人党和共产党都是群众性的强大的、巩固的政治組織。他們过去进行了，現在还在进行着巨大的斗争，并对一切反对反动派、爭取劳动人民的切身要求以及爭取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斗争作出真正的贡献。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內我們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重心已經移动了。这一事实并不使我們惊奇。必須能够懂得这一事实的客观原因，并看到这是证明我們的运动是生动

的东西，它的扩大是沒有限度的。就是在那些共产党还不能具有群众組織性质的地方，共产党还是聚集了劳动阶级优秀的一部分和最坚决的分子，聚集了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和能够发展符合于实现这些任务的手段的先鋒队的核心。我們认为这样一件事实有着特別重要的意义，即在法西斯統治的国家中，首先是在西班牙，在葡萄牙和希腊，强大的共产党进行了一种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并与所有人民阶层保持接触的广泛性的斗争，这样的广泛性斗争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权下从未能够組織起来。我們以莫大的兴趣注視着在拉丁美洲、在亚非新的自由的国家、在还遭到殖民制度压迫的国家中的共产党的扩大和加强。

在我們这届十大中出席了六十三个外国同志，我相信他們代表了三十三個共产党和工人党。我們不仅以我党的名义，而且代表所有有着阶级意識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向所有这些同志致以兄弟般的敬礼。我們感謝他們来到这里把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这些經驗對我們來說是宝贵的。

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員科兹洛夫同志致以特別的敬礼。我們要求他把这种敬礼和我們的祝賀帶給偉大的列宁党的所有领导同志，特別是它的書記赫魯曉夫同志。我們委托科兹洛夫同志告訴苏联领导人，如果說在我們党内以及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对人为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神話进行必要的、不可避免的破除而引起了痛苦的感情上的反应以及广泛的辯論是真的話，那末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我們的运动与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党的联系过去一直是、現在更是紧密的、极重要的、切身攸关的。如果說今天有着这样的工人事业的战士，他們充分了解到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決議的意义，并且珍視在赫魯曉夫同志的創議下和领导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的革新工作对革命的命运所具有的巨大的和决定性意义，那末

在这些战士中站在前列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人。

我也願意对法国共产党的代表致以特別的敬礼，它的斗争与我們的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們对法国共产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了對他們的将来有着巨大意义的选举上和政治上的成就感到高兴。他們向所有人证明：自由的事业和民主革新的事业是掌握在可靠的手中。他們把爭取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团結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對我們所有的人都將有好处。

今天，摆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我們的运动的团結問題。由于等待着我們的任务重大，也由于敌人与反对者——它們始終准备就我們的不和的任何表現进行投机和挑衅——對我們的打击的殘酷性，所以我們需要这种团結。但是，我們必須懂得，今天要用与在別的情况下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和保持这种团結。运动的发展本身和走向社会主义条件的不同，使得必需建立这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建立在集中化和行不通的若干国际中心或地区性中心的存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各党有作决定的自主的基础上。这样就加重了我們每一个党对本国的工人階級和對所有其他共产党承担的责任，因为我們的自主虽允許我們享有进行判断和进行兄弟般批評的自由，但决不能达到这个地步，即：以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所作的事情为根据来判断我們每个党。

正如1957年和1960年的国际會議文件所說的那樣，这种团結应当从忠于我們的学說的原則，以及从国际无产阶级团結一致的加强中产生。只能在这种团結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爭取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斗争，而这种团結一致對我們來說，以及对自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任何人來說，都應該是一項不可动搖的原則。就是应当在这种团結的範圍內和在这些原則的基础上，對我們之間可能有爭論的問題进行兄弟般的辯論，但是辯論应当是严肃地和以高度負責精神来进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假借在爭取和平共处和持久和平斗争的意义問題上表現出来的分歧——在这个問題上同中国同志也有分歧——而发动的运动，与共产党人之間的辯論毫无共同之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把这种爭論轉变为直接针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针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誹謗和誣蔑的宣傳运动。这种宣傳运动是不容許的、是挑衅性的、对进行这个运动的人本身也是有害的。这种宣傳运动假装是反对修正主义，实际上是在于保卫宗派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滿口挂着革命的冠冕堂皇的大話，而不知道工人阶级及其先鋒队所面临的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真正任务。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拒絕批評斯大林的神話，也就是拒絕承认最近一段時間构成我們思想和行动的主要准則。他們一方面硬說要对帝国主义进行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又排斥爭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群众斗争，这种斗争是目前反帝斗争的形式。他們大声宣称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但是他們的国际主义在于攻击共产主义运动集体制訂的正确立場，企图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破坏团结，以此来消除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使我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中国同志們并没有看到这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今天所起的真正作用，而且与他們保持着一种不能允許的团结一致。

应当以适当的武器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凡是把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看作一种在群众斗争之外自己实现的自动过程的倾向，都是修正主义的。这种立場在工人阶级中是最危险的。它势必导致向资本主义卑躬屈膝和使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秩序范围内起从属的作用。但是，不能用詞句来同这种倾向斗争，也不能用把工人运动局限于消极等待灾难日子的来临和局限于官僚主义式地重复旧日的言論和立場来同它斗争。要用主动的政治行动来同它斗争，勇敢正視形势提出的新的斗争目标，永不脱离现实，尤

其永不脫离群众，善于懂得群众所要的是具体的运动，这一运动要能保证他們的要求和对自由与和平的願望得到实现，要能使他們前进，要能使他們在当前資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影响不断增长。而教条主义則是我們在实现这些任务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障碍。

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斗争，意味着通过新的主动行动、新的經驗和新的成就来在事实上发展我們的理論。

二十大的决定給予这一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必須坚持这些决定，并把它們向前推进，不應該害怕揭露过去的錯誤并继之以糾正这些錯誤以及确切地研究这些錯誤发生的环境和錯誤的內容。斯大林所提出的錯誤的政治方針，关于敌人随着我們的胜利而增多的錯誤理論，破坏法制和其他宗派关門主义，是一件紧身衣，它使得共产主义运动不能在战争结束后获得許多新的陣地，使它不能表现出全部力量，使它不能施展一切創造力量，不能向全世界表明我們为之斗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是有效的民主制度。

我們欢迎为重新取得在这一方面所失掉的东西而作的一切。因而我們將怀着极大的兴趣，繼續进行探討来进一步認識过去所犯的錯誤，以及进一步了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为加速經濟与政治建設的进步所取得的理論上和实践上的胜利。

我們强烈地感到这种必要：我們进行共同工作的局势的不同，不应导致各个党彼此孤立、不諒解和出現曖昧的态度。因此我們主張經常进行双边的、多边的接触，以便了解确切的情况，互相了解和交流經驗。我們认为，举行一些會議广泛地，假如可能的話，甚至公开地辯論普遍关心的問題是有益的，例如最近举行的关于資本主义經濟一体化問題的討論。在西欧我們特別感到有一些任务我們还没有用适当的方式去对待它們。例如为支持在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同法西斯制度战斗的人民而进行的統一的斗争。又如这

个問題，在共同市場国家內工人階級在工会領域內以及在工会領域外的經濟运动与政治运动的配合，不把自己局限于对这一組織的消极面进行揭露，而是展开积极的行动，并号召和推动其他工人力量加入統一的运动，以及在国际範圍內开展反对大壟断集团、爭取貿易自由、爭取劳动人民的当前經濟要求和爭取对目前資本主义一体化进行民主代替的斗争。

九、今天意大利的面貌

意大利是近几年中經濟发展最快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由这一发展引起的結構变革最深刻的国家。能够与之相比的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早先就是工业先进的国家，它們保持了和加强了这种情况。而意大利的經濟却改变了內部的組合。由于重工业、电力工业、电机工业、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的显著成长，意大利已由一个农业工业国变成为一个工业农业国。在葛兰西学院的經濟會議上，我們在优秀的专家的帮助下深入地研究了这些变革。这些变革的結果使得意大利获得了过去所沒有的国际竞争能力。这就形成了一部分企业界要求摆脱美国經濟领导集团的指示和命令，寻求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的傾向。为了駁斥那些在許多讲台上努力宣揚經濟自由化的陈詞烂調，我們不能不提一下一个国营企业——国家碳化氢公司——对整个經濟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个公司是在違反国内外大壟断集团的意志的情况下对傳統的結構作了某种改革的基础上成立的。

客观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十年內国民收入翻了一番，每年以相当高的比例增长，工业活动的比重大有增加，农业活动的比重則在减少，因而在大批青年和妇女参加生产以及农业雇員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工业中从业人員有了全面的增長。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

的。我认为一个政治性代表大会的任务并不是去探討和肯定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沿着怎样的曲綫发展，也不可能去探討和肯定是否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其他一些国家中已經明显出現了的迟緩甚至停滯的趨勢，或者去探討和肯定是否將出現相反的趨勢。这并不重要，我认为必須批評目前在一些政治性代表大会上盛行的那种习惯作法，即硬要論证意大利經濟在十年內或更多的一些時間內應該自然而然地达到某一水平之上。只有以社会主义的准則来論证将来，这种論证才有意义，也就是說要从目前必須解決的問題以及劳动人民所渴望解决的迫切需要出发，具体确定必須达到的部分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些目的應該采取的方法。只有遵循这一准則，对經濟的預見才具有政治意义和人道意义。

在研究有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活动方式的意大利社会情况时，比这些不断增长的經濟指标更使人惊異的事情是人們不滿目前生活条件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在我看来，这就是目前形势真正的特点，也正是这个浪潮使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置身于普遍的經濟社会革新运动的前列。

根据統計局的材料，1960年罢工共有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九千小时；1961年有七千九百十二万七千小时；而1962年头七个月就有九千四百三十九万八千小时。这些数字与工会直接計算的数字比較起来是少了，这也許是由于沒有把如下一点考虑在內，即在現代化工厂中，就是占很小百分比的劳动人民自願停止工作，事实上就等于整个工厂的罢工。从工会計算的数字来看，1960年的罢工在一亿二千九百万小时以上，而今年头十个月則在三亿八千五百万小时以上。只在米兰一地，到現在就罢工达五千一百万小时，光在七月到十月間就罢工三千五百万小时。所有大、中工业中心也都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在都灵，浪潮是如此汹涌，它冲破了一个最大壟断企业为了破坏工人群众的团结和战斗性而树起的反动壁

垒。菲亚特工人所进行的团结一致的罢工以及他们的胜利是有着全国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总的阶级斗争状况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

这种巨大运动的轴心当然是广大工人阶层，证明了他们都表现出高度的战斗精神。青年和妇女是站在最前列，三年来运动扩大了，发展了，并给人以很大的教育意义。人们从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制度和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罢工出发，为统一行动提供了很大可能性。业已取得的胜利打开了同意几个行业统一进行谈判的道路，今年甚至发展为各行业全国性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巨大斗争，这些斗争不仅要求在经济数量上的改善，而且要求一种新的合同制度，来确认和扩大工会在工厂中的权力，也就是确认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合同权力以及在国家生活中的分量。这是一种明显的进展，它使得新的问题产生了。工人阶级感到有必要去解决这些目前涉及社会上整个阶级关系的问题。除了合同斗争之外，不应忘记还有二百多次反对一些工厂解散、争取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反对老板专权和反对法西斯、争取和平的工会活动和罢工。

在农村，尽管三年中减少了七十五万男劳动力，但雇农、对分佃农和小自耕农的运动仍在发展。农业工人和雇农在1960年7月进行了一次总罢工，在1961年进行了三天全国性罢工，后来又进行了总数达六千万工时的省、区罢工。1962年的运动更加扩大了，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罢工，还开展了共计八千万工时的其他运动。1960年以来，对分佃农在统一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活动。从那时起，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示威活动、停止工作以及争取签订企业协定的斗争接连不断。

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要求数量上的经济改善、要求缩减工时、要求工资平等，等等，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除了这些要求外，他们还提出了其他有关合同体制、保险制度以及一些特殊地区的土

地所有制等要求。对分佃农的目的明确地说就是取消对分制合同，取得土地所有权。自耕农、佃农通过广泛运动提出了税收制度的问题、减低佃租问题、从残存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使那些至今还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取得这个所有权的问题。在全国农业会议开会期间和以后，各地农村举行了上千次的大会、小会、活动和辩论，从而再一次提出改造土地结构和实施宪法规定的全面土地改革的迫切要求。

但是工农斗争的巨大发展还不能为我们概括形势的全貌。必须补充一些常常被称为中等阶层的一些阶层的运动，如国家雇员和公务人员，乃至法官，他们正在辩论是否应该进行罢工来保卫他们的要求。但是劳动人民阶层的活动有着更大的意义和更深的影 响，他们的命运与目前文明社会的组织所处的贫穷条件是相联系的。这种贫穷条件推动了教授们对他们的恶劣而不相称的生活条件、对他们在完成教育和科学任务时所遇到的困难进行抗议，推动了没有足够的教室来进行学习的大学生进行抗议，推动了上千个医生穿着白衣在首都的街道上举行游行来表示抗议，推动了家庭妇女和农妇聚集在议会的大门口、推动了领取养老金者、战争残废者、房客以及公用事业用户等提出抗议。

假如说这种“经济奇迹”创造了推动我们社会整整一部分人民进行抗议和运动的条件的话，那末这种“经济奇迹”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社会上来说，“经济奇迹”意味着富有阶级的大发横财。它加强了资本的积聚，加强了大垄断组织的经济力量和权利，但是却 没有解决我们社会的对于人民生活有着决定性意义的问题。相反，它使得新的问题产生了，并且尖锐了。

没有解决所有人的工作问题。还存在一百四十万的失业群众，其中百分之六十在南部。意大利失业者占整个欧洲经济共同

体整片地区失业者的80%。半失业者約有二百萬，大部分在农村。这是十分严重的数目，特别是假如你們再看一看移民的数字的話。从1946年到1961年移住国外的有二百三十萬，仅仅从南部就移出了一百七十六萬人，其中九十萬人迁至北部。

沒有解决同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工資問題。意大利的工資和工資增长速度，在整个共同市場中是最低的。在这些国家中，意大利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增长最快，而工資增长最低。从1953年到1961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80%，整个劳动价格增加了18%。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只改变了十分之几，从1958年到1961年，甚至减少了。一些职工生活水平的改善常常是，或者主要是由于加班、双重劳动以及在一个家庭中不只有一个工資劳动者。生活价格的上漲目前严重地威胁着現已取得的成果。

沒有解决劳动人民的住房問題。从1953年到1961年房租上漲了262%，目前又要大大上漲，平均上漲10%以上，占收入的30—50%。得到補貼的民房建筑处于整个欧洲最低水平。

面对着这种情况，我們完全可以說，老的特权階級从“經濟奇迹”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而工人和劳动人民却为此付出了代价。整个意大利社会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在这社会中旧的缺陷和不平衡变得更为明显，更为尖銳了，而且还产生了新的不平衡，产生了新的极其尖銳的問題。生产力的擴張是在使整个文明社会的組織发生危机和动搖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样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为恢复資本家階級統治而进行的重建工作的荒謬以及一个以資本买卖和利潤为最高法則的社会的各种矛盾。建筑了警察別动队的軍营和北大西洋集团的駐在地，却没有建筑校舍、医院和科学實驗室。由于建筑业上的投机，城市急剧地扩大着，但是常常变成为一些奇形怪状的形式，压抑着劳动人民，迫使工人由于票价既貴、又組織得很坏的交通运输而丧失了一天的大部分時間，而且沒有給居民

提供出学习和集体生活的必要的可能性。妇女参加生产破坏了一部分老的反动习惯，但是又使对一种文明的、社会性的服务組織的要求变得尖锐起来，这种組織目前几乎根本不存在。于是加深了家庭和睦的危机。全面土地改革至今沒有实现，使得全国都受到了損失，而全面土地改革之所以必要，不但由于它是宪法規定了的，而且由于它能保证整个經濟的平衡发展。大部分的农村情况是极其混乱的：中小农户处于危机，被抛棄的土地数目不断增加，阿尔卑斯山地和丘陵地带人口递减、在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下大批逃往城市。至于意大利經濟和社会机体上的根本症結，即由于严重不平衡而分裂成南北两个意大利的存在，它并没有消失，根据所有公布的数字来看，反倒变得更加严重了。尽管建立了一些大工业中心，但是由于拒絕进行全面土地改革，却給南部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建立大工业中心是一件积极的事，为了实现这一点，南部劳动群众曾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但目前只不过改变了一小部分情况。假如經濟政策的方針不改变的話，那末前景不是解决南部問題，而是恶化南部問題。假如人們計算一下，每一个搬到北部去寻找工作的南部人为了安家立业至少需要花費四百万里拉的話，那末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必定有数百亿里拉的消費集中在北部地区，这就将形成有害于南部的新的不平衡，使得南部陷于經濟蕭条和衰微之中，甚至使南部的一些根本問題，首先是土地問題和文明社会的民主組織問題，无法得到解决。

这些客观条件促使劳动人民不得不开展运动和斗争。这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的情况：这个社会的各种結構正在經歷一次危机，它在寻找一条出路，但还没有找到。我們談到的这些如此严重的問題，目前在任何一个与群众有联系的政党的所有會議上反复地提出来，并使人們感到忧虑，使人們怀着不安的心情加以譴責，从而与官方的那种乐观主义恰成鮮明的对照，这并不是偶然的。

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一談到这些問題就頌揚他們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按照人的意志建立和組織起来的，它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并与自由密切联系着。这是荒謬的。我們目前的社会就是他們党所选择的和强加于人的那些方針造成的結果。在这个社会中找不到上述那些痕迹。占居統治地位的是大壟断資本的利益，而不是經濟民主发展的利益。目前的社会組織是絕對地等級森严和閉关自守的。甚至像職員和技术人員这样的中間行业也逐漸降为只起执行任务的作用，这种作用使人們联想到工人在工厂的自动綫上所起的作用。在掌握經濟生活領導权力的人与只应服从这种权力的人之間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沟。青年的前途以及妇女解放的前途是困难的、艰巨的，并且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要紧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不在于才能，而在于参加某一个社会集团，在于对統治集团奴顏婢膝，在于在这些集团的集权下放棄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和判断的权利。

学校体制的危机也許是目前深刻的社会不平衡的最明显的表現之一。学习的願望是出自要求获得一个像样的工作职位以及要求在幸福和尊严的条件下取得进展。这样就新形成一种普遍的求知，这种求知乃是現代社会的特点，因为目前思想和科学正在解决新問題，千百万人正在从事新社会的建設。我們还没有使所有儿童都能入学受教，一直到十四岁为止。我們有中等学校，但是它的教育方針誰都摸不清。我們有职业学校，但無論是現在还是将来，都不能滿足日益增长的工业需要。我們有大学，但它在履行自己的种种职责方面有困难，而且并非經常能够履行这些职责的。我們有科学研究工作，但無論同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相比，都处于末位。而且如今还有人在討論怎样教授拉丁文呢。真正的討論应当是对教育总方針和內容的討論，因为这是学校和科学体制危机的真正基础。老一套的文科教育是时过境迁了，因

为它本身带有那种闭塞的贵族气质，这种气质是由法西斯时代的某些蜕化现象造成的，其所以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因为目前不再存在过去的那种条件了，在过去的条件下，这种文科教育是对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领导阶级歌功颂德的。应当以不同的方式来研究旧世界，应当根据新历史学說和社会学說来进行研究。主要问题是文化界的团结，这种团结今天只能通过人们过去和现在为了完全控制大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的艰辛探索来实现，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保证他们的未来、进步和幸福。我们满意地看到，目前有许多人都感到有必要进行革新，有必要创造一种以反法西斯思想为依据的、生气勃勃的、致力于社会斗争的现代文化，这种必要正通过一些受到公众舆论的广泛欢迎的重要创作和作品而得到人们的肯定。

十、计划政策与向左转

整个意大利社会需要一个深刻的革新工作。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应当再次以抵抗运动中的一些政治方针为依据，并在现今的条件下把这些方针加以发展。必须奠定新型民主的前景，通过尊重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纲领性指示并将其付诸实施，来实现这个前景而工作和斗争。应当对经济结构进行一些改革，以便有可能实现经济民主发展，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发展来尽可能迅速地解决今天如此尖锐的问题，来克服现有的不平衡。为此必须对当前大垄断集团的统治进行斗争。我们一向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和领导，这一革新工作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接受并促使一些垄断资本生产部门的国有化。我们已经通过了电力工业国有化，即使其原则并不完全正确，并且过多地照顾到垄断资本的财产。还有其他一些部门，如制糖、水泥、化学，在这些部门中，垄断

資本的积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需要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来维护总体利益。私有经济的积极性将永远享有极为广泛的活动余地，我們絕不建議消灭这种积极性，相反，因为我們預見到在我們所希望的經濟社会革新工作中有这种积极性存在和参与。

我們同意政府的經濟綱領原則。如果国家实行計劃政策成为政府行动的軸心，那么我們只能够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进步来欢迎。

但是必須馬上讲清楚。制訂和实行經濟計劃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打算尊重和发展民主的民主国家呢，还是一个繼續服务于特权經濟集团和大壟断資本利益的保守的和劳資协会式的国家呢？是一个从条文到精神方面都实施共和国宪法的国家呢，还是一个像迄今为止繼續无视和違反宪法的絕大部分規定的国家呢？

应当深入討論这个問題。实际上，在西欧有一些国有化和所謂的规划化例子，两者都无非是在大壟断資本与配合和維護其利益的政府之間达成的一种純粹的協議。甚至大壟断資本也能够接受这种规划化，尤其是当实现經濟发展的合理化和平衡的某些措施成为完全必要的时候，例如今天意大利所发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的国家資本主义，就不是損害經濟財政寡头的权力，相反，倒加强它們的权力，甚至在所謂經濟計劃中还規定禁止提高工資或把工資控制在預先确定的限度內。

我国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国家。今天我們不能要求一个涉及整个生产和交換領域的計劃化。但是，如万諾尼計劃那样的一般規定也是不够的，而各个政治保守派別正是打算局限于这样一些規定。我們要求的計劃政策应当是民主的，它的实施是为了实现那些今天在我国已提上日程的經濟目标，尤其是社会目标。因此应当准备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手段，但是無論是手段也罢，目标也

罢，都应当考虑到劳动群众的需要、要求和运动本身。要求劳动者和他們的工会組織放棄他們的自主和他們爭取提高工資的斗争是不能容許的，荒唐的。这一斗争是为事实所迫必須进行的，它是对于經濟发展的一种刺激，而不是一种障碍。因此国家首先应当支持工人組織爭取扩大他們的各項权利和合同权力的行动。实际上这样就使一种民主因素去发挥作用，即为限制大資本权力而进行监督的因素。如果不打击大資本权力，民主計劃化的任何目标都不可能实现。生产与消費合作社組織本身应当通过新的适当的发展来为这一斗争贡献力量。

在农村，始終未决的尖銳問題是全面土地改革問題。全面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变当前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保护中小农户，廢除諸如对分制和其他类似租佃制的过时而有害的契約形式，发展自耕农之間的新的合作形式。如果不遏止壟断資本向农村渗透，如果不通过一些受劳动群众监督的机构的活动来建立农业发展的民主組織，上述各点就都不可能实现。

在城市，如果不采取措施征收地皮——这些地皮今天是大資本堡垒之一——城市就不可能获得合理发展。

在落后地区，特别是南部和島屿，如果不实行一个使集体利益压倒直接追求私人最大利潤的計劃化的話，有关发展农业和革新基本經濟結構的决定性問題就不能得到解决。

意大利現行国家，能够实行这种民主計劃化政策嗎？我們相信能够实行，但是条件是：要实现国家結構的改造，这是由共和国宪法所規定和指示的。我們指的是建立区域机构，确立、保卫和扩大宪法所規定的地方自治，議會发挥其决定与监督的职能。制訂一个不包括大地区計劃、地区計劃和城市計劃的全国性計劃，是不可能的。这样，經濟民主发展和政治民主就在一个进行研究、討論、决定、实现和监督的广泛制度下結合起来。这是政治生活的一

个新制度，但是，今天不論是國家的最先进部分，还是那些落后部分都傾向于这个制度。所有的大城市都感到这样一种要求，即要求越出固守在本城範圍內的旧行政单位的界限，并要求有規模日益广泛的計劃与前景。所有农业地区都感到有必要同心协力来阻止整片整片地区的衰微。迄今为止在区域自治組織方面取得的一切經驗都是良好的，而且如果没有保守集团和执政党对农业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經济社会革新工作的破坏，这些經驗本来会更好，例如西西里区就是。

我們滿意地看到，其他党派逐漸意識到我国民主制度的这种新发展，对于全國的利益來說，必不可少的。甚至在执政党的队伍中，在它或其他天主教組織所召集的會議上，也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一些新傾向和提出一些新方針。那不勒斯代表大会^①就表明了这一点，我們认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此外，天主教民主党及其傳統的同盟者，至少从1960年以来就面临着拋棄中間主义政府形式——其議會多数实际上是向右的——的实际必要性。我国的民主和反法西斯意識、新的尖銳問題的发生、老一套宣傳的失效，所有这些都使它們不能不轉变。就在这些不同因素汇集一起的情况下，产生了新的中左議會形式，这个形式又組成了由社会党人支持的政府。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个政府，必須考虑到天主教民主党那不勒斯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新的安排的局限性与条件。代表大会声明支持国家对經济生活进行更为广泛的干預，从而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如下問題仍然存在，即这些干預是應該具有限制和击破大壟断資本权力的性质呢，还是仅仅应当被看成是实现經济合理化而不触动大壟断資本权力的一种手段呢？实际上，在大部分天主教民主党領導人的言論中都同意这后一种解釋，

^① 指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执政党)在1962年初举行的代表大会，会上确定了該党的中左路綫。——譯者

甚至在代表大会后，他們也是傾向于这个方面。最后，天主教民主党长期以来就是資產階級的領導党，长期以来就致力于破坏民主力量、工人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團結，长期以来就认为就自己的性质而言應該永久指导政府活动，因此它的政治路綫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改变。即使天主教民主党現任領導人不得不接受所有这些新东西，他們也要硬說这是他們老一套方針的繼續，或者說这是为了更深入地进行迄今很少得逞的反共斗争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办法，其目的是要展开更为有效的行动来击破人民力量，要使社会党接受他們的这些企图，而社会党迄今为止拒絕了这些企图。

因此中左的政治形式是个混杂的东西，在其中积极面与消极面相互交錯，彼此混合。閉眼不看政府綱領某些条文中所体现的积极面，是一个严重的錯誤，我們过去沒有犯这个錯誤，将来也絕不会犯这个錯誤。这些积极的綱領条文是集体統一制訂的結果，在这一制訂工作中，我們也有不应漠視的一份。这些条文符合我們提出的某些要求，这些要求正是我們上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提出的。我們可以提一下：在这些要求中，有动力資源国有化，还有国家实行經济发展計劃。因此，关于所謂我們处境尷尬和企图最后插一手的整个宣傳运动是毫无根据的，这正像有人現在只是因为我們坚持要求遵守和执行綱領諾言而指責我們同現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一样荒謬，甚至社会党人也这样指責我們。

实际上，天主教民主党那不勒斯代表大会的決議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已經逐漸占了上風，这就說明当前政治局勢全部恶化的原因。今天，天主教民主党領導人的政治計劃似乎相当清楚了。政府綱領的各个方面的統一性与完整性已被他們否定了。在农业方面，我們看到：甚至連农业會議上提出的要求也被可耻地拋棄了；所有农民組織提出的改良要求遭到了拒絕；他們采取了一些保全整个土地制度和有利于壟斷資本滲入农村的措施。在区域建制

問題上，他們拖延和拒絕通過具有決定意義的法律，即選舉法。與此同時，他們以右派蓄意阻撓和議會提前解散為依靠，指望選舉造成一些新情況，在這新情況下，向左轉可能被取消，他們也從而回復到與舊的中間主義停滯狀態相類似的某種形式上去。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有任務進行公開的鬥爭，反對上述企圖，有責任號召一切願意向左轉的人們來進行鬥爭。

向左轉意味着和平政策，意味着爭取緩和局勢和和平共處的具体行動：

意味着經濟民主發展和對大壟斷資本作鬥爭；

意味着土地改革，復興南部，實現耕者有其田；

意味着在民主國家範圍內確立和發展各種自治；

意味着全民通過這一民主制度，實行對經濟和政治的領導與監督；

意味着國家生活一切領域的革新與進步；

向左轉首先意味着使人民群眾、使被剝削者和貧苦人民享有更多的福利、享有自由、社會公平和文化，意味着全體人民進入國家的領導。

十一、爭取工人力量和人民力量、民主力量 and 社會主義力量的團結

向左轉是不是一個切实可行的目標呢？又怎樣才能實現向左轉呢？這個目標在我們為向社會主義前進而進行的鬥爭中的價值如何呢？

首先，向社會主義前進意味着行動，而不能意味着在單純宣傳、單純為今天的狀況提出抗議以及等待偉大日子到來方面停步不前。

也不能仅仅进行鼓动和斗争，尽管鼓动和斗争对于改善经济条件和保卫政治权利是如此必不可少。改善经济条件有可能由于整个经济变化而被取消，保卫政治权利也有可能由于反动派的进攻而被取消。为了设法避免上述两种情况，工人阶级应当能够作为在政治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提出自己的倡议和目标的积极、自主的因素来进行干预。资产阶级领导阶级在由于工人运动所取得的力量而不能再把工人阶级的干预置于不顾时，就只得接受这种干预，但是，它们会从各方面力图减少这种干预的效力，把这种干预引向具有纯粹的恩惠主义性质的次要目标，这些目标是不能改变政治社会关系的实质的。工人阶级如果被迫接受这种立场，最后必定要处于单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工人阶级的目标——社会主义——就会被束之高阁，被置诸脑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落得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下场，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由于完全改变立场，已经干脆负起为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来统治的任务了。

劳动人民的处境的任何改善，即使是有限的改善，对特权和剥削的任何打击，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没有比“越糟越好”这一政策更愚蠢、更有害的了。我们是一向拒绝这个政策的。即使在中間政府时期，我们也要求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具体措施，并且赞成一切意味着改善、意味着成就的东西。但是除了这些临时性措施之外，还有两个根本问题，工人和人民的要求必须触动这两个问题，即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的政治领导问题，以求削弱，可能的話則是粉碎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绝对统治。因此，就要考虑结构改革，国有化，经济民主发展计划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提出表面上看是比较严肃的异议。争取这些目标的斗争是在现行国家内部进行的，而现行国家保持着它的资产阶级国家性质，因此，不会有什么质的飞跃。說得好。我們

知道国家的阶级性是什么，它不会因为通过一项或一项以上的国有化就有所改变。我国宪法——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宪法——也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但是，这个道理还是抽象的。为了把道理说得具体，就应当研究一下目前领导阶级的权力集团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就应当研究一下依靠政治性的进展来改变这个权力集团的可能性和方式。战前的人民阵线历届政府是否改变了国家性质呢？抽象地说，没有；具体地说，则开辟了新的政治社会前景。问题在于看一看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通过在今天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其内的民主组织基础上展开的行动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是否有可能开展这样一个运动和取得这样一些成果；这些成果会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并且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显然，在接受这个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景时，我们抱有一种逐步发展的看法，根据这个看法，很难具体地说到何时才会实现质的改变。我们所预料的是：在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民主组织的一些国家里，劳动阶级为争取成为领导阶级，从而为开辟通向革新整个社会结构的道路而进行的斗争，可以延展到一个长时期。把这个斗争降低为议会竞选和等待取得 51% 的选票，那将不只是幼稚而且是幻想。资产阶级统治阶级时刻都可能阻止取得这个成果。但是，有些人向我们建议说：应当干脆由上层决定来组织什么“权力委员会”，然后向前迈进，这些人的建议是同样幼稚，而且甚至是更加幼稚。

这样一来，夺取政权的想法就会成为滥调。当工人阶级已经在数量上和组织上很强大的时候，当它今天在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里拥有从事工会活动和政治运动的能力的时候，它就要以更为复杂和灵活得多、但是也更为有效得多的形式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其办法是：保卫民主制度和代议制度，要求区域和地方自治，

为实行一些根本改革而斗争，提出实行下层监督和直接民主形式的新建议。工人阶级能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来自同非无产阶级居民阶层的谅解、合作、结盟的群众力量呢？在别的国家，这些阶层是那些没有差别的广大的无土地的贫农群众。

这是决定性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根据随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而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形成的各阶层情况，如果想为共同利益而解决当前的切身问题，就不仅可以而且需要使全体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集团。我们可以看一看人们对工人阶级所进行的伟大斗争表示怎样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可以看一看：农民群众和农民组织正在农村通过争取改变土地制度的斗争，形成一个巨大的统一整体。正是根据这些事情，提出这样一个斗争战略：用孤立垄断集团的办法，击破围绕这些垄断集团而建立的权力集团，为建立另一个权力集团而创造条件。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谅解、合作和结盟，应该朝新的方向进行，应当非常广泛，非常强大，以致能够在领导集团企图施用暴力来阻止进展的情况下，粉碎它们的企图，把它们坚决击败。

当然，这个经济社会革新方案包含着许多新事物。它包含着在一个以劳动和社会公平为基础的社会里有不同的政党存在，而通过这个战略所要达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这个方案包含着保持和发展一些自由权利，这些自由权利有一部分今天已经得到确认，但是，只有到了不再有经济剥削的时候才能具有其全部价值。这些新事物可以算是西方工人阶级对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共同事业的贡献。

但是，并不是所有可能在反对大垄断资本的斗争中意见一致的政治集团，今天都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存在着日益有助于在群众中间启发社会主义觉悟的条件，我们的责任就在于为启发这个觉悟而努力。甚至在天主教组织和教

会人士方面，今天也有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原则了。教会最近采取的社会立场中的新东西，就是表现出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也不能认为，受到革新要求和保守精神逼迫的教会领导集团能够对社会主义世界长期继续采取冷战立场。今天，社会主义觉悟同民族觉悟是不可分离的。我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劳动问题、土地问题、南部问题，都不能在地方上解决，而应当在全意大利解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团结才能得到完全的体现。

当在我们的政界中采用了目前的中左政府形式时，我们曾按照符合我们对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上述看法的一些准则，对它作了判断。这个政府形式给民主力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行动的场地，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个行动应当继续尽可能具有统一的性质。这种统一行动会使人向前迈进。但是，占居主要地位的却是这样一种打算，即：打算破坏民主力量之间取得谅解的任何可能，打算粉碎工人和人民运动的团结。

天主教民主党为了解释它目前执行的这个政策，曾大放反共厥词，虽然在口头上拒绝反共的纯属歧视性的方面，但是却把反共变成主要的思想意识问题。谁也不想把别人所拒绝的思想立场强加于这些人。问题在于经济抉择和政治抉择。反共本来是过去几年用来掩盖作出促使受过抵抗运动的胜利的沉重打击的那些特权阶层恢复统治的决定性抉择的幌子。今天，反共又用来达到同样目的，用来把必要的革新事业降低为这些特权阶层准备接受的一些现代化工作，如此而已。

社会民主党接受这个立场。从该党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不再对它过去的过错以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过错进行认真的良心检查了，今天西方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在为这些过错付出代价。只要能抱着像我们在对我们过去的活动进行良心检查时所抱的那种批判精神来

深入地进行良心检查，这种良心检查就会为整个工人运动开辟新的统一前景。共和党人迄今在论战方面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在实践方面却总是委曲求全。今天社会党人面临着葛兰西在1923年提到的那个问题，葛兰西当时写道：“近三十年来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乃是用来选拔资产阶级国家的新的领导分子的仪器。”这是他向人民党^①提出的批评。这正是当前的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向社会党提出的东西，他们以采取某些合乎时代的、合理化措施为交换条件，要求社会党参加大西洋和反共阵线，要求它着手破坏工人力量和人民力量在各方面——从总的政治方面和行政方面到工会方面——的团结。最严重的事情是：社会党人当中有人竟像南尼那样力图为这种分裂政策进行全面的辩白，借口说什么我们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使我们变成碰不得和冥顽不灵了，特别在争取政权的斗争问题上是如此。但是，今天每逢工人和民主运动正视有关经济政治组织的根本问题时，我们都是政权的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的。况且，同已经取得政权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团结，对于一个愿意继续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运动来说，是有根本意义的。这并非说，应当由我们来解决这些国家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要对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负责。实际情况是：南尼由于看到他的党有一大部分人陷于困惑，并且明确表示拒绝，所以找寻一些论据和借口来为他接受天主教民主党现任领导的分裂、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辩白。他拒绝同像我们这样一个工人和人民的政党一起解决政权问题，同时却力图从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他力图从屈从分裂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策方面找到解决政权问题的办法。

^① 人民党是天主教民主党的前身。——译者

我不想使人以为，我們之所以这样說，是因为我們害怕有被孤立的危險。要把像我們这样的—一个党从工人和劳动者群众中孤立出来，那是办不到的。但是，把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当作采取某种政治决定的先决条件，这倒确实是反动保守势力为了取得优势地位而要走的道路。法国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那里，“孤立”共产党人的目标曾作为第四共和国全部政策的指南。共产党人是否陷于孤立了呢？不要作梦！共产党人今天在工人和人民当中比过去更加根深蒂固了。但是，民主却被取消。在决定性关头，本来能够获胜的統一运动却不願意反对反动派了，于是反动派看到門已敞开，就乘虛而入。这个极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教訓是有普遍价值的。比方說，在第三世界的各国内，采取反共措施，对我們的运动进行迫害，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呢？只能在反对帝国主义政策残余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使必要的人民团結受到削弱。

但是，我們不仅应当对天主教民主党领导的分裂意图提出批評，而且还应当开展广泛的、全面的、十分协调的行动，以便形成一个統一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将要求和强行实现作为向左轉的内容的那些方針上的变化。形成这个运动的前提和条件存在着。我們认为工人阶级在整个經濟革新事业中所占居的头等重要的自主的地位，对我們來說，使統一行动和恢复工会运动在組織上的統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們在工会运动中进行斗争的同志，应当为实现上述統一而努力。同样，我們认为地方自治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使我們在这方面坚决保卫一切人民力量的合作，使我們巩固和扩大他們的团結。特別必要的是：使来自下层的强大推动力和个别运动具有更高的政治内容，办法是：集体制訂一些綱領措施，制訂有关区域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具体計劃以及有关确认工会权利、爭取土地改革、监督大壟断組織的活动和学校改革等的建議。无疑，下届議會应拥有其結構和政治革新的明确綱領，但是，

从秘密會議和不清不楚的妥協中是产生不了这个綱領的。这个綱領应当是一个普遍运动的表現，这个运动的基础只能是团結的基础，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团結，但是也許比过去更深更广，我們应当为此貢獻更大的力量，而且我們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此，把当前大規模群众斗争提高到普遍的政治运动水平上，乃是我們現在面临的主要任务。

十二、革新和加强党：长期的任务

現在，最后一点，讓我們研究一下近年来我們党的方針、活动和发展。我认为，总的說来，我們应給以肯定的估价。我們曾面临新的复杂的問題；面临过充滿危險的国际形势；面临过經濟、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巨大变化；面临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严重的問題和辯論。总的說来，我們以及时、正确的方式行动，改正我們过去的应加以改正的看法，不断地努力使我們的行动适应新的现实，既不向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也不向教条主义屈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阻碍我們以工人的革命人民的党的特点来面对和解决新的任务。我們的战斗性从未减退过。对于近年来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斗争，我們的貢獻是决定性的。錯誤和缺点是可能有的。我們承认錯誤和缺点并以必要的辯論部分地改正了它們。敌人說我們队伍迷失方向，产生混乱，他們总是把自己的妄想和现实混淆起来。我們党员数字包括青年党员，减少至两百万以下，南方地区失去选票，以上情况部分是和客观进程有关，而我們的政治組織行动还没有适应这种客观进程。

上次代表大会后，党内对国内及国际問題进行了連續不断的广泛辯論。这次大会提出的提綱就是这个辯論的結果，也是我們在民主与和平之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战略和策略路綫的相继发

展。尽管綱領或許过于冗长，它却早被領導干部和大部分黨員广泛討論过，在大会討論和修改后，它将成为全党團結一致，为达到它的目标而工作的基础。

如果現在我們問，在广泛的正面图景中主要的缺点是什么，我认为那就是無論在开展局部斗争和开展全面的政治运动中，缺少足够能力把我党的政治路綫变成具体行动。在几方面都表現了这个缺点。結構改革的要求很难摆脱一般化、很难突破单纯限于辯論的局面，很难变成具有质的成就的前景的群众的广泛統一运动。在农村，正确的指示往往被瑣碎地执行，限制了它們的效力。在南部，为了解决南部問題，如全面的經濟，政治进步、土地改革，南部社会整个結構的民主改革等等，而形成的傳統的統一热情在部分变化了的条件下也在减少，这不仅由于我們的責任。我們党在工人階級中的根基无疑扎得更深了。但是，在工人階級中，在由工会行动轉到政治运动的过程中，也遇到困难，这就減緩了局势向左轉的速度。

因此，我們應該提出两个問題：掌握党的政治路綫，具有在行动中貫徹实施政治路綫的能力。

我們滿意地注意到，在我們的队伍中，出現成批成批新的同志，他們积极参与制定我党政策，在全国各地区和生产活动各部門积极貫徹党的政策。这是积极的进程，标志着我們无限的生命力，虽然，我們應該看到参加以上活动的妇女为数还是太少了。此外，我們应当指出，在这部分同志和許多同志間存在距离，这許多同志不参与制定党的政策，他們极忠实于党，关切党的斗争并参加这种斗争，但缺少主动精神和不間断的活动，而这种主动精神和不間断的活动正是来自充分掌握政治路綫。这种距离，过去也局部存在，應該加以克服。克服的方法首先是从数量和质量上加强和改进党內的思想工作。我們应在这方面实现真正的轉变，而从这次大会就要开始这个轉变。

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主要部分提供給我們的黨員和文化人士使用。幾乎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所有列寧的主要文章以及十三卷列寧全集。這些文章很難，只有一部分黨員可以理解。我們也出版了一些很基本的通俗著作，黨員在黨內找不到極淺近的東西，可以使他們充分掌握我們政策的基本路線。我們的學校進行了良好的活動，但非常局限。我們的日報是意大利銷售最廣的報紙。但它在人民群眾中銷售還太少，而黨為根本改變這種狀況所做的努力還不夠。我們的刊物發行量比任何其他政治刊物發行量都要大，但是，在黨內還應更多地學習和研究黨的刊物。對知識的渴望和願受正確指導的要求今天是強烈的。在支部、在青年俱樂部舉行的思想意識性的、一般題材的座談會，有關此類問題的辯論會，蜂湧而來的青年人總是很多的，他們就是今天在我們的群眾大會上看到的大批青年。我們知道必須啟發他們的社會主義政治覺悟。具有這種覺悟並懂得我們政治路線實質的青年將不會退出我們的隊伍，他會以他的活動給我們作出寶貴的貢獻。

我認為，大會後，黨的領導機構的首要任務之一，將是採取必要措施來實現我所談到的轉變。我認為大會的任務在於以會上的辯論和決議來準備這個轉變。

應該很清楚，我們不把重復現成詞句的本領看作思想意識的進步。我們所要的是理解我們的原則，有說服力地論證我們政治路線的正確性、政治路線的階級基礎以及它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我們所要的是這種能力：理解隨着形勢變化而產生的政治路線的發展。

加強思想工作能使我們在文化活動領域中更加強自己。在戰後以及在被野蠻的專制放逐了二十年之後，馬克思主義做為一種最活躍、最深刻、能了解一切現實發展的思想流派而在意大利範圍內加強起來，我們對它得到加強不會表示不滿意。我們的同志，經

济、哲学、社会等問題的学者，对这个进步作出了貢獻，我們为此感激他們。必須前进，不离开我們业已规划的道路前进。馬克思主义是如此丰富和可靠的学說，它不害怕、而是要求同現代思想的其他流派交鋒，就像它不拒絕、而是要求在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流派中寻找和加强自己的真理的萌芽和条件一样。和其他思想流派的交鋒不能变成教条主义式的預先拟定的譴責。應該就內容进行辯論，进行交談。在交談中，不会不研究新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是通过和社会及人类新现实有关的思想发展而呈現出来的。人們愈能掌握原則，就愈能引导这种交談和研究。因此，身为学者、文化人士的同志們的責任很大。这是对自己負責和对全党負責的事情。这也因为，我們并不认为，政治領導机构的責任在于以它們的最高決議解决在学术方面，在有关艺术、文学、电影的方向和实施等方面所討論的專門問題。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問題上只提供总的方針，这个总的方針是在广泛的文化領域中发展，它反对一切企图否认人在社会生活和在为新世界而斗争中的价值的东西，但它的加强也由于它了解产生具体問題的一切条件，由于它对这样一些人的容忍，这些人为了某种发展和由于內心的痛苦，而不是由于为落后的势力服务，在真誠地艰苦地探求真理。

为了有效地实现和发展党的政策，党要保持、巩固并加强它的群众性政党的性质。要維持黨員的数字。对黨員数字下降要弥补。要进行緊張的工作来在我們很早就指出的三个方面进行弥补：工人、妇女、青年。确切地說，这些目标大部分正在完成。确实，應該广泛地把青年一代的工人和妇女引进党内来。在这两方面，存在着阻碍和有害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場，因为这种立場使人們对必要的工作丧失信心和热情。至于青年人，我們滿意地欢迎最近共青团代表大会的方針和決議。應該在計劃中和事实上，恢复共青团作为群众組織的面貌，謀求同青年的各阶层及其所有組

織建立劳动和斗争的联系。这并不排斥辯論，不排斥热忱地探討正确解决目前社会发展问题的办法，但不应当是像道徒式的閉門造車的辯論，而应永远从劳动和现实斗争出发，再回到劳动和现实斗争中去。关于妇女问题，最近的妇女会议使我们大大地前进了，但我们不要为它的成績而麻痹大意。对妇女工作及妇女本身的忽略，甚至有时是輕視，是一种旧恶习，它反映意大利社会几世紀来的落后。如果不警惕，不在这问题上战斗，不把它视为我們整个活动的基本问题，我們就不能前进。教条主义和空論傾向是危险的，它用理論來說明所謂妇女解放的问题已經过时、仅仅因为大批妇女参加工农业生产，得到了独立报酬。这种想法，尽管塞滿社会主义的詞句，也是錯誤的。这种思想沒考虑到意大利情况的殘酷现实，不知道如家庭危机，把职业教育限制在男性的荒唐作法以及其他问题，这都是妇女切身问题。他們尤其不知道，大批参加劳动甚至会使妇女条件更加严重化，因为她们担負着两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一是职业活动，一是家务劳动，后者也是生产活动。妇女解放的问题仍保有它的尖銳性，具有新的面貌，并要求为达到經濟、法律、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新目标而斗争。妇女解放本身是陈旧的社会結構改革之一。我們呼吁一切民主和进步的朋友都为这些改革而战斗。

我們党的群众性是我們在解放战争中和战后，在人民热情高漲的基础上，得到加强并由我們爭取来的。人民的热情表示出，劳动阶级由于我們为了拯救国家而进行的斗争，由于我們的团结政策，由于我們对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而信任我党。今天，我們感到能够产生类似的人民热情的条件正在成熟，因为我們所要求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仅仅由于形势所迫，不是仅仅符合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前进，而且是为了真正減輕千万人的貧穷、困窘所必需的，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大多数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对自由和进步的向往所必需的。为此，我們願意成为开放的、能够向各方面

扩展的，能够同各种社会进步力量接触和結盟的党。我們願意成为富有經驗、但精神年青的党，全体人民能够在其中找到他們的斗争的向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会对它满怀信心。

从这个我們无论如何也不能遺棄的我們党的性质的确切观点中，得出我們为組織問題而謀求的具体解决办法。

我們的队伍中要充滿民主精神，团結和紀律。这些品质互不矛盾，相反它們是結合成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在意大利，我們是党内討論最多的党，我們随时准备举行辯論，在群众中，在朋友和反对者中展开这种辯論。这是因为我們相信自己，不惧怕任何較量。像摧毁斯大林的神話所造成的那种困难局势，我們也是通过討論来应付和克服的。可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民主生活意味着党员广泛而持續地参加党的活动，意味着这样的做法和领导，即使党员能够参加党的活动并且促使他們参加这些活动。因此，命令主义、压制内部民主，领导集团固步自封，几乎是官僚式地防范来自基层的监督等等形式都是应该加以反对的。这是目前的主要危險，因为在强大的有組織紀律的組織中也有这些表现。不言而喻，同这种危險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要造成組織上的无政府主义，恶劣的嘩众取寵的民主，以及取消领导机关的坚强、負責的领导和指导行动。领导机构永远要和基层保持有机联系，了解基层的思想和需要，答复它們提出来的要求，并且滿足由于和群众及实际情况接触而产生的要求。这就要求扩大各级领导干部的队伍，这并不是为了要有龐大的领导机构，这样的机构往往是一种阻碍，而是为了最广泛地制定政策，使生活在劳动現場、同生产和劳动人民有直接接触的共产党员参加政策的制定。这样，就能更好地实现团結和紀律。沒有团結和紀律，党就不能发展和战斗。

我們过去一向反对，而且現在仍然反对形成分裂以及圍繞对立的立場結成派別。这不是党民主的进步、而是后退。如果这样，

党的活动，内部的辯論将会按照預先策划的方式而被瘫痪、被歪曲和造成僵局。我們的原则是我們制定政策的統一出发点。我們的集体決議是我們行动的統一基础。如有分歧，持有分歧意見的同志也被吸收到領導工作和实际工作，以便加强民主和加强我們队伍的团結。

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上，我們談过革新和加强，这是彼此不可分开而且目前还摆在我們面前的目标。革新和加强，是一个持續的过程，需要全神貫注，需要毅力、探討和創造精神。組織形式不应由各个时期和各种情况預先規定的教条和制度来决定。必要时，要会打破框框而踏出新的道路。这是今天，在很多情况下，我們的基层組織應該善于做事情，如果我們想保证前进的能力，保证在社会生活組織的新条件下，深入群众，深入現代工厂，新兴的龐大的城市，新型的农业企业，以及深入学校的话。我們的組織要同生产过程結合这一点應該是坚定不移的，但大会要研究新的結合形式，以便使这种結合有可能扩大和更加有成效。

我們号召大会全体代表广泛辯論这些問題以及所有有关它的活动問題。我們的工作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这些工作包括农民工作、議會工作、合作社、地方行政管理、南部地区及自治地区等等。我們从地方領導到中央領導都需要认真、負責的批評。中央領導不拒絕任何旨在发现缺点、錯誤和指出克服办法的批評。

願我們这次大会使我們在不断革新和加强的事业中大步前进。

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可靠領導，意大利共产党万岁！

在进行爭取全国社会革新斗争的工人階級团結万岁！

劳动者的国际团結万岁！

前进，为在民主与和平中走向社会主义而前进！

（譯自1962年12月3日《团結报》）

在意共十大的总结发言

陶里亚蒂一开始就说明他的总结将是相当简短的，因为这一天大会工作相当紧张，尤其关系到投票，这需要一两个小时。

陶里亚蒂说：首先，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宣称对大会讨论所提出的问题的情况表示满意，我们应该表示一种非形式的，而是实质的深切的满意。我认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将占据异常重要地位，这是由于大会讨论的内容，大会讨论的倾向和同这种倾向相符的决议，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党的若干基本优秀品质，证实了意共是处于国际舞台上争论的问题的中心的党。我们党在国内是严肃而冷静地对待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针，做出一些符合于意大利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要求进步、自由、民主、和平的人们的利益的决定。

我们证实了我们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党，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党。这个党在意大利工人和民主运动中有其深厚根源，它有能力领导这些运动以新的、适应于形势的、符合我们为之而斗争的伟大目标的方式来逐步解决我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在各种情况下所面临的问题。

陶里亚蒂感谢踊跃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报界代表，指出他们在各自报纸上不仅以巨大篇幅来报道大会工作情况，给以评论，而且还更为突出地强调了我们代表大会在国际上和在国内的重要意义。我国各报，一星期以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讨论和决议上，这一事实不仅证明我们党的强大力量，而且还证明其他事情。公

众輿論最大的一些报纸，这几天在我们代表大会的事实面前，确实再也不能谈论什么我们党陷于危机了，而且它们也没有再这样谈论。我们指出这一点，并非怀有恶意，而是怀着满意的心情。然而，也许值得指出：对我们代表大会的注意意味着人们感到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的线索来自全世界，来自我国各生产部门，因此，我们的决议才有了重要意义和现实意义，才有了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

談到这里，陶里亚蒂說：記者先生們，誠然，在你們對我們的評論中，並不是你們所有的判斷都能為我們所接受的。某些判斷可能出於心不在焉，對我們講的話沒有給以足夠注意。奇怪的是：譬如有人從我們的討論中以及從我在大會開幕時所做的報告中，聽到對天主教會領導集團的稱贊，因為他們居然迎合社會主義了。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要說這樣的話，或者要有這樣的想法。同樣，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要說或是要認為：只有共產黨才能有效地代表工人階級和人民運動，正像許多起初評論我們大會工作的大報中的另一家所說的那樣。後來，《前進報》^① 記者也提出了這種論調。他們反復指出：在我們看來，如果沒有共產黨人顯聖，什麼也好不了。

所有這些都不符合我們的立場，不符合我們所制定、提出並為之而鬥爭的政治路線，不符合聯合一切民主力量、社會主義力量、先進力量的廣泛團結的政策。在這次大會上，我們又一次確認，這個團結政策是我們黨全部活動的軸心。

有人又想說什麼我們的立場是共產主義的惡狼披上民主外衣。羅馬一家反動報紙就是這樣說的。我感到遺憾的是：在《前進報》的評論中也有時也透露出這種性質的判斷。此外，有人從第一天

① 意大利社會黨機關報。——譯者

起就想向我們開火，硬說我們實際上是反對自由的。可又為什麼呢？他們提出了如下一點作為這個判斷的論據，即我們沒有預見到在今天工人階級和人民執政的國家中會向後倒退，我們沒有預見到舊的領導階級——封建階級，資本主義前的階級或資產階級——會復辟，而正因為我們沒有預見到這種可能性，甚至把這種可能性從現代歷史的前景中完全排除出去，所以我們就是否定自由的一部分，就是反對自由。於是，必須弄清自由本身的概念。你們難道當真認為，比方說，走向自由就意味着我不想說是走向俄國的沙皇或是克倫斯基，而是走向霍爾蒂政權、畢爾蘇茨基政權^①，意味着走向如同保加利亞國王保里斯那樣的君主制，如同長年壓迫羅馬尼亞人民的那種制度的君主制嗎？這些制度都是為這些國家的大地主利益效勞的。

自由難道意味着倒退？不，倒退不能算自由。自由意味着進步，向新的目的前進，消滅剝削和特權。自由意味着向社會主義前進。《人民報》^②這次也對我們的事情感到興趣了，至少它本着一定的客觀精神，力求避免對我們的思想進行極為粗暴的歪曲。陶里亞蒂說，然而，我想對這家報紙的編輯們指出在他們評論中出現的兩種論斷，一種是乏味，另一種則是欠謹慎。

乏味的一點在於它認為1948年7月14日以及這一天以後發生的事證明我黨是不民主的。這種論調所缺乏的倒不是政治味道，而是道德味道，是缺乏道德感！欠謹慎的一點在於他們再一次想把我們黨說成不是一個民族的黨，不是一個意大利的黨，不僅因為它是一個國際主義的黨，而且因為它是什麼蘇聯的發言人。我們不是任何人的發言人，我們維護和平和和平共處政策，我們願意避免戰爭。陶里亞蒂轉向天主教民主黨記者說：假如你們認為這是

^① 霍爾蒂和畢爾蘇茨基是匈牙利和波蘭過去的法西斯統治者。——譯者

^② 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機關報。——譯者

苏联的政策，那你们就犯了天大的不谨慎，竟认为今天意大利人民的大多数，人类的大多数是支持苏联政策，就是说，支持想把世界从原子灾难，从一次新的世界冲突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政策！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陶里亚蒂接着说，有些就我们代表大会发表的意見，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疲倦的表现。也许我的报告太长了，而讨论又始终要求人们付出一定的精力来注意它全部进行情况。但注意力不能总是集中。也许正因为这个，才有可能在另一家属于激进派的报纸上发表这样的论点：说什么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对我们的党员指出意共今后几年在意大利政治中应起的作用。如果我们连这个也没有指出，那么，我们在这里讨论国家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讨论通过国有化实行工业改革，讨论规划化形式和土地改革等等，就是徒劳的。甚至我们就提到议会上的几项具体法律——城市规划法和解决中小农户危机的提案——而进行的讨论也是徒劳的了。所有这些，我们的代表大会竟都没有做到。陶里亚蒂说，我明白有时人们是会睡着的，但我要对一个有显著地位的政治派别，特别是激进派的代表进一言：当我们讨论如此重要、如此性质的问题时，你们竟睡起觉来，那是说不过去的。

我们的讨论具有非常突出的国际主义。我们再一次对各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的代表同志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感谢他们把经验告诉我们，感谢他们对我们党的祝贺，感谢他们往往用我们觉得甚至有点过奖的词句来承认我们的力量和我们们的政治能力。

这当中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部分地是不和谐的调子，我愿意敬奉几点意见。不过，首先我愿意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志重说一

遍：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是怀着尊敬，敬意，對它的領導人是有感情的。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摧毀殖民制度，在全世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寫給我們的充滿熱忱的賀信表示感謝。但是，我們拒絕中國共產黨代表在這裡提出的批評，而且我們很堅決地拒絕這些批評，這些批評既涉及一些國際方面的問題，也涉及一些我們政策的問題。

陶里亞蒂接着說，首先，我願以完全友好的方式向這位中國同志說，某些論據是不應當使用的，因為人們在誇張他自己的論據的同時，就破壞了他所說的一切東西的牢靠性。當你說資本主義已在南斯拉夫復辟時——大家都知道這不是真的——就沒有人相信你說的其餘一切了，因為大家都認為其餘一切也都不過只是夸大其詞而已。

此外，中國共產黨代表同志提出的論點都是引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舉行辯論和作出決議的論點。在我們整個討論中，都提到這些決議。這就是1957年的決議和1960年11月會議的決議。幸好，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些決議包含着一條政治方針總路線，這些決議都不能越過這條路線。這些決議指出了在目前世界形勢下我們政治戰略的若干關鍵問題。但是決議接着又讓各黨根據本國特點，他們的工作和戰鬥的條件以及在本國內開展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必要性來開展他們的行動。

再說，中國同志在他發言的整整一個部分中正確地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之前的一段時期中，曾由於執行一條它自己的政治路線而前進了，而這條路線是同——比如說——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3月至10月的革命過程中所遵循的戰略和策略路線絲毫不相符合的，中國政治路線規定了結成各種聯盟，以便以適合於中國條件的方式，來使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取得政權。

因此，你們不否認這些特點，而我們也不否認這些特點。但

是，存在着一些基本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們的決議中已被明確說明了。然而，在這些基本問題中，有一個問題是首要的和主要的，那就是關於爭取和平和爭取和平共處的鬥爭的問題。八十個黨的決議說：“能夠制止帝國主義侵略者實現他們世界戰爭計劃的時候已經到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工人階級、民族解放運動、所有反對戰爭的國家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的聯合努力，能夠防止世界戰爭”。從這一避免戰爭的可能性的論點出發，得出爭取和平共處的鬥爭戰略。實際上，這一決議還說：和平共處政策是符合各國人民的基本利益，因此也符合意大利人民的利益的。

這就是我們在我們的代表大會上所堅持的第一點，而且我們在依據業已作出的這些對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都具有約束力的決議進行我們的工作時，還將繼續堅持這一點。

中國同志提出討論的第二點，關係到我們爭取結構改革的政策。在這一點上，人們進入了同我們面臨的客觀條件、民族特點、意大利及其他國家的經濟政治鬥爭的發展更加密切聯繫着的範圍。但是，基本路線，即使是在這方面，也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在這同一個決議中指出，共產黨人的任務是，保衛和發展民主，使經濟關鍵部門國有化和使這些部門管理民主化，以便把全部經濟引向和平目標，滿足人民的切身要求，實現徹底的土地改革，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條件，保衛農民、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壟斷組織的專權。決議還說：共產黨人為爭取所有機構、所有行政部門、政治部門和文化部門中的公眾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普遍民主化而行動。

但是，這正是我們政策的關鍵，而中國共產黨代表同志在這裡批評了這個政策，他說：這個政策不符合意大利人民的利益。

人們不懂，在有八十個共產黨參加的如此重要的會議上，怎么能通過這樣一項決議：在這項決議中竟提出一條不符合像意大

利人民这样一个在欧洲生活中占有这么大分量的人民的利益的政治路綫——也就是我們的路綫。

因此，我們拒絕就這個問題所提出的批評，同時，相反地，我們號召全體同志，並且呼喚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代表們，遵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認為應在目前制定的這些偉大的戰略路綫。

關於我們和阿尔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之間的爭執，我們批評阿尔巴尼亞同志，因為他們的辯論不是一種辯論，不是像在由國際團結聯繫起來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之間能夠而且應該展開的那種討論。我們可以給中國共產黨代表同志一系列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都是阿尔巴尼亞勞動黨出錢在我們的基層黨委會中散發的。我們在這些材料中，發現了對我們黨的攻擊、誹謗，甚至連表達的風格和方式，都同我們在工業家聯合會以及在資產階級領導集團和意大利大壟斷資產階級所資助和維持的瓦解共產主義運動的各個組織寄給我們的基層黨委會的材料中所發現的一樣。這就是我們譴責阿尔巴尼亞領導人的地方，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求中國同志不要保持同他們的團結，而相反地要求中國同志使他們了解，如果他們願意辯論、討論，誰也不拒絕辯論和討論。但是，我們拒絕這種不負責任地誹謗、中傷的作法，這種作法只能有利於瓦解我們運動的隊伍。

我們根本不願意在我們黨和阿尔巴尼亞勞動黨之間，形成一種深刻而持久的分裂局面，不過，我們正式要求阿尔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重新採取共產黨人之間的討論應該而且能夠採取的語調，如果他們願意討論的話。當人們想批評一個黨或一個黨的某個領導人的行動時，應當抱客觀的態度批評，而不要忘記共產黨人之間的討論所應採取的平靜和兄弟般的語調。應當明確地說出事情，就事論事，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討論，拋開只會有利於我們的敵人的分裂性的低級做法。

我們願意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緊密的、兄弟般的、互相了解、諒解和友好的關係。為此，我們在昨天大會通過的提綱中，我們用尽可能最平靜的語氣插入了我們的批評意見。陶里亞蒂說，但是，我自己在政治委員會討論代表大會的最後決議時，堅持主張在這項決議中儘管拒絕對我們路線的批評，但是不要明確提到中国共产党，因為這一決議是要在廣大群眾中散發的，它有鼓動的性質。我認為不指明中国共产党是有好處的，目的在於避免和中國同志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我還要說一點。我認為黨的新領導機構應該邀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派一個代表團到意大利來，特別是來了解我們的黨，來看看我們在什麼條件下工作，看看我們真地是為意大利勞動群眾利益而鬥爭的黨，同時還可以和他們交流思想，以便在各方面增進和加深了解。我認為，在我本人甚至在黨的新領導機構選出和在這以前所能做到的範圍內，我可以在这次代表大會的講壇上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這一邀請。

陶里亞蒂這時就國際問題和國內問題的聯繫，再次同資產階級報紙進行論戰。

有些輿論喉舌由於我們如此深入和詳細地討論了國際問題，討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而向我們提出了批評，這是令人十分奇怪的，特別奇怪的是這樣一種批評：說什麼我們在我們的大會上把這些問題放在突出地位，是一種迴避深入探討意大利局勢的問題的做法。事情不是這樣，也不可能是這樣，其根本原因在於：在我們向意大利工人階級和意大利人民提出的有關國際問題的目標，同我們提出的有關我國經濟政治結構的革新和必要的改造的目標二者之間，是密切相連的。

和平共处

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爭取各国人民自由的斗争，同工人阶级和劳动阶级爭取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彼此正是相通的。因此，我們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爭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偉大斗争轉化到意大利国内，而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斗争前提在于爭取和平共处，避免世界原子冲突，通过和平和裁軍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国内經济政治改革、改造我国經济的目标和改造我国政治结构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同我們所从事的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完全相通的。而且，我們的代表大会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深入地討論了这些經济性的和政治性的目标，特别是努力把我們为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使我們革新我国结构、为劳动阶级开辟掌握經济政治生活领导权的道路的总的劳动群众統一运动而采取的进步和革新行动，同对我国局势的分析和对在这个局势下提出的目标的分析結合起来。

因此，詢問我們是否提出什么代替办法，或者对此表示怀疑，那是枉費心机的。显然，我們提出了一个代替办法。我們提出过一个代替办法来代替在几个群众性大党的团結破裂后最初几年所推行的反共政策。我們也提出过代替中間主义政策^①的政策，今天我們又提出代替中左政策的政策。我們承认中左政策中包含的那些积极因素。我們今天提出的代替政策就是我們称之为向左轉、轉向我国真正革新的政策。

我們明白，今天領導着天主教民主党的反动集团，特别是保守

^① 指天主教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和自由党联合組閣的政策。——譯者

集团,执意否认共产主义运动代表着一种代替办法。但是,我們不明白,那些在我国願意实现进步和革新的政党也否认这一点,我們不明白,社会党同志們也否认这一点。这些政党时常把政治代替同是否参加在卡米魯齐亚宮为了决定現政府的工作、决定現政府繼續存在与否的問題而举行的著名會議(我們不說参加政府)这桩事情混为一談。我們对于那些参加这些會議的人毫不嫉妒和羡慕,这些人面临着要从天主教民主党領導人的曲折、狡詐和伪善中找出一些明确的东西的艰巨任务。我們代表着一种代替办法,因为我們是一个偉大的运动,因为我們是为爭取深刻革新我国生活而斗争的一个运动的灵魂,或者是这个灵魂的一部分。

陶里亚蒂談到这里說,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首先想向社会党对我们大会的致賀表示謝意,并且就龙巴迪同志所致的賀詞的內容談几句话。也許我要說的話并不完全符合其他同志的看法,对这些同志的看法,我們在討論过程中已經談到过了。

陶里亚蒂說,我的印象是:龙巴迪同志发言的特点是困窘和矛盾。龙巴迪同志是从断言如下一点談起的,即他說今天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所面临的目标是:从在国家内部展开的斗争出发,为实现这个国家的政治改造而前进。我們現在并不要展开辯論,探討上述論点的創始权(《前进报》的同事們每天都在做这项工作,硬把我们所談的事情中所有正确或有益的东西的創始权归諸于他們自己),我們不要这么鼠目寸光。陶里亚蒂說,我想提一下我們从1944年以来所执行的政策,当时在意大利再次打开了改造意大利国家的結構、組織和領導中的某些根本东西的前景。

当时,我們为了打倒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而开始同保皇党的几个部长合作;为了推进整个群众运动来制訂充滿許多綱領性因素的宪法以及后来为爭取实行宪法規定的各項改革原則而斗争,我們同所有群众性大党取得了合作。从那时起,我們就一直是努

力从内部来采取行动的。

因此，在龙巴迪同志用高度自信的强调语气向我们提出的公式，同共产党人所奉行的政策二者之间，基本上是相符的——我不想说是相同的。因此，龙巴迪同志的发言是矛盾的，因为他既然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拥有在我们身旁或同我们一道进行各种斗争的丰富经验，就不能看不到这种相符之处。在提到了上述一点之后，于是，他说，我们两党关系的前景，不再能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景了，而应当变为距离越来越大的前景。矛盾就在这里。该是什么距离呢？是思想距离还是政治距离？陶里亚蒂说，如果你们谈的是思想距离，那么当你们肯定自己打算从国家内部来工作，以便能够改造国家的结构和性质，从而使劳动阶级掌握领导权时，你们就并非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因为倘若你们相信的话，你们也就会同我们一样相信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两个共同相信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党，在它们的思想意识上就不能没有深刻的相似点。这种相似点并不能，也不应使这两个党永远做同样的事，对一切问题都做出同样的回答。但是，这种相似点是可能消逝的，只要两党中的一个党丢掉了社会主义的目标。陶里亚蒂对龙巴迪说，如果你们抛弃了这个目标，显然，思想距离就会深刻化，但是，如果这个目标仍然存在，如果承认为走向这个目标而在意大利社会中采取的行动方式是一致的，那么两党距离深刻化的前景就是矛盾的。

至于政策问题，龙巴迪的讲话令人感到更加奇怪，因为当谈到政策问题时，就应当对当前形势和对为改变这个形势而采取的行动方式作出判断，以便把一些要求推进一步，这些要求中的一部分已经包含在中左政府纲领中了。

我们现在坚持认为——而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已经这样坚持了——，中左纲领中提出的各项措施是一个有机地结合一起的整体，如果放弃这些措施的一部分，就等于打击整个纲领。社会党怎

么能够拒绝我们这个立场呢？但是，社会党同志，你们在要求实现纲领方面应当还要坚决一些，因为你们对政府负有重大责任，因为你们懂得这个问题是今天我国面临的问题，你们感觉到工人阶级当中和你们队伍内的如此活跃的左派把这个问题向你们党特别尖锐地提出来。

当你们达到不得不向自己提出是否继续支持一个不实行你们所赞成的纲领的政府问题的地步时，你们怎能说什么同为同一个目标而斗争的我们党的距离会越来越大的呢？

关于较远的前景，有人谈到什么有社会党参加的政府。我们早已说过，这不会使我们羡慕和嫉妒。如果有人谈到共产党是否有可能参政的话，我们的答案是：应当参政的是工人阶级，是劳动群众！

同社会党人的关系

陶里亚蒂说，我不认为，有什么“电钮室”。国内存在的是政治斗争，而参不参加政府是这一政治斗争的一个因素。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政府的纲领，这个政府的作为，它对局势本身产生的、国内产生的绝顶重要的问题的答案。这些绝顶重要的问题是由一个像意大利过去和现在开展的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所提出的。这个政府会致力于革新还是会致力于保守？如果这个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从破坏来自下层的革新运动的团结和破坏群众运动的团结出发，它就不会致力于革新。

演讲人继续说，我也拒绝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有责任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要晓得应当要求什么，怎样实现某些改革。因此，我拒绝这个想法，有人用一个新造的丑恶的名词把这种想法叫做共产党人的“唯

要求論”。不，問題在于實現触动經濟結構和政权的經濟社会改造。我国的新社会力量上台，这就是問題所在。我怀着很大兴趣听了培魯齐亚省委会同志的发言，他談到了烏姆布里亚区如何在我們同社会党人以及一些天主教民主党人的倡議下，提出了革新該区的經濟、农业和工业結構問題，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个要求已为議會会所接受，虽然这个要求后来沒有付諸实践。但是，通过規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工作有了进展，这些群众运动不仅是在工会和政党方面展开，而且还在市鎮、省和合作社方面展开，于是就这样制訂出一項革新計劃的梗概，参加制訂这次計劃的有全体劳动群众，这就使保守集团陷于孤立。

在不久的将来，在今后几月，在大选以后，我們將朝着什么方向行动呢？我們的行动方向将是最后迈出实现这些要求所必需的几步，还是相反地因为要孤立共产党人而使在这方面已經迈出的一步丧失效力呢？問題的提法就是这样。应当选择什么，不仅对我們來說，而且对社会党同志來說，都是不能够有疑問的。

我想再談得广泛一些，简单地提一下另一个有特色的区域面临的問題，那就是艾米利亚区。一个从事保守派那套論战的腐朽家伙米西罗利·馬里奧，提出了要在艾米利亚区实行深刻經濟改造的問題，其目的是要使中等阶层脱离农民、雇农、对分佃农、城市工人群众。这样，在那些致力于社会政治保守勾当的人們看来，艾米利亚問題无疑就得到解决了。艾米利亚是一个特殊区域。它地处工业三角地带^①的側面，是真正指引和领导我国政治的最大中心之一，也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工人运动的搖籃之一。这个运动是从农村、从雇农、貧苦佃农和最初一批工人中发展起来的，在某一时刻甚至曾嘗試提出政权問題，即在1920—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

^① 指都灵、米兰和热那亚三个地区。——譯者

战以后。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的是：由于领导这个运动的人执行了错误的方针，这就为今天保守派和反动派论战家希望重现的那个现象开辟了道路。就是说，城市中等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人数最多、同时也最贫苦的农业工人、对分佃农和工人群众。这种脱离就是造成意大利工人运动失败和法西斯上台的一个事实。这样，最反动集团就占了上风，而当时，企图依靠法西斯主义来使自己在国家中赢得一个新的领导地位的城乡中等阶层，最后却同工人、雇农、贫苦对分佃农和农民一样遭到了失败。

显然，今天法西斯上台的前景在意大利是荒唐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疑问，在一个像艾米利亚这样一个区域，在意大利全国，保守方针和革新方针的斗争问题却是提出来了。在艾米利亚，这些新的中等阶层已经加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些阶层出身于平民，如今还保存着平民出身的痕迹和烙印，尽管他们的经济地位是加强了。他们还保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意识：在这个意识中，理智因素和根据革新国家社会这一总问题来提出他们本身的问题的愿望，还存在着，没有消灭。这就是为什么反动派在艾米利亚极力想推行另一种政策。这个政策就是社会保守政策，孤立共产党人政策，因为该区有40%、甚至也许有40%以上的劳动群众是追随共产党人的。他们想孤立左翼力量。如果把社会党人也计算在内，左翼力量就大大超过50%。孤立的目的在于为恢复保守派的权力开辟道路，这些保守派的任务是使各行业劳动者屈从于大垄断组织，阻碍意大利全国在经济社会进步道路上前进。

团结的前景

在我们同社会党人交锋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抉择是什么呢？你们将选择革新力量集团呢，还是将采取有利于保守集

团的行动，破坏团结，破坏为推动艾米利亚区和全国沿着经济政治民主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呢？

当大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感到有必要执行比只是在参加多少是有成就的工会斗争时所执行的职能更加广泛的政治职能时，他们的前面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全国，在大城市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在南部地区提出了，在自治区也提出了，到处都提出了。是一个前进的前景，它的目的是使劳动阶级的代表掌握国家生活领导权、从而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更加稳步地行进。当我们谈到团结时，我们特别指的是这一点，我们所谈的是一种在一个一个区，在一个一个城市，在经济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个一个部门实现的团结，一种汇成一个应当日益壮大、应当具有日益显著的政治性的运动的团结。

当然，为了实现我们所提出的目标，必须工作，必须努力。必须接近那些距离我们还远的人们。特别是应当接近天主教劳动群众，使他们了解这些政治经济革新目标就是他们心目中所向往的那些目标——这也正是我们向青年、妇女和工会提出的一项任务。因为正是同样的生活条件，正是世界上进步和反动之间进行斗争的同样方式，在推动着他们，引导着他们。

意共书记谈到这里说，在讨论中有一位同志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他对我们提纲中的两点作了若干保留。关于国际关系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点，我基本上已经作了答复。关于我们对某些帝国主义领导集团所作的判断一点，我们对这位同志说，看不到分歧是一个严重错误。当看不到有分歧时，就再也不能制订政策了，就会固步自封，就会站在一堵墙面前，不能跨过去了。为此，当涉及最大的那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时，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分歧怎样成熟着，这些分歧的根源不是在这些人的头脑里，而是肯定存在于美国人民群众、工人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

同样也存在于全世界的和平和进步的意願之中。

但是，陶里亚蒂还对这位同志提出一个实质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意見：不同意这些問題的这位同志本应感觉到有責任在讲台上发言，因为这样就会比較清楚地看出他拒絕的是怎樣的立場，是否可能做到使彼此信服。陶里亚蒂又說，討論對我們是有好处的。有时，一些报纸對我們的討論进行投机，但是，我們的討論本來是我們探討和接近真理以及探討和接近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綫的一种方式。

今天，在全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表現的团結面前，猜测哪个是溫和左派、哪个是极端右派、哪个在我們党的领导人当中更明显地具有“太子”的面貌，哪个相反地又有鮪魚或鯊魚的样子，这种投机是变成次要的事情了。我們党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团結，更加一致，更加确信它的政治路綫的正确性和实现这条路綫的可能性。

陶里亚蒂特別对各省委领导人說，同志們，你們有責任在代表大会召开后立即行动起来，以便把我們党內的这种加强，把党所获得的这种更高的威望，体现为党员人数的增加和我們組織的巩固。

當我們为把新战士吸收到我們党的队伍中来而斗争和工作时，我們就是在为民主的利益而斗争。只要人民群众当中普遍存在着不关心政治，普遍存在着认为沒有必要参加某个党或支持这个党的政策的看法，那么民主就会丧失陣地，就会遇到日益严重的危險。因此，我們在加强我們党时，也是在負起一項总的民主任务。我們对省委书记同志、大会代表和各级党领导人說，在代表大会召开后，諸位就立即通过展开宣傳我們的決議的运动，通过爭取大批新生力量参加我們党、爭取青年、妇女、工人、知識分子、各行业劳动者参加我們党的运动来进行这项工作吧。

陶里亚蒂在長時間热烈鼓掌中最后說，同志們，今后几月，我

們將要进行一些異常繁重的斗爭，這些斗爭有政治性斗爭，工會性斗爭，也許還有選舉斗爭。我們懷着對我們力量的自信，昂揚走向這些斗爭。我們是意大利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最大的黨。我們知道我們的任務是致力於革新和團結。我們願意、而且也將在和平和民主中向社會主義前進。

（譯自 1962 年 12 月 9 日《團結報》）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